
万卷方法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
质性研究手册
研究策略与艺术
[美] 诺曼 K．邓津 (Norman K.Denzin)
[美] 伊冯娜 S．林肯 (Yvonna S.Lincoln)
主编
朱志勇 韩 倩 邓 猛 等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质性研究手册：

研究策略与艺术

[美] 诺曼 K. 邓津(Norman K. Denzin)
[美] 伊冯娜 S. 林肯(Yvonna S. Lincoln)
主编

朱志勇 韩 倩 邓 猛 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12)第1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手册. 研究策略与艺术 / (美)诺曼 K. 邓津(Norman K. Denzin),(美)伊冯娜 S. 林肯(Yvonna S. Lincoln)主编;朱志勇等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8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SBN 978-7-5689-1313-3

Ⅰ.①质… Ⅱ.①诺… ②伊… ③朱… Ⅲ.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手册 Ⅳ.①C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6334号

质性研究手册:研究策略与艺术

[美]诺曼 K. 邓津(Norman K. Denzin)
[美]伊冯娜 S. 林肯(Yvonna S. Lincoln) 主编
朱志勇 韩 倩 邓 猛 等译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邬小梅 责任印制: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6.5 字数:343千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89-1313-3 定价:58.00元

《质性研究手册》（全四卷）撰稿人

（按写作章节顺序排序）

诺曼 K. 邓津（Norman K. Denzin）
伊冯娜 S. 林肯（Yvonna S. Lincoln）
莫滕·勒温（Morten Levin）
戴维·格林伍德（Davydd Greenwood）
弗里德里克·埃里克森（Frederick Erickson）
克利福德 G. 克利斯蒂安（Clifford G. Christians）
盖里 S. 坎内拉（Gaile S. Cannella）
苏珊 A. 林汉姆（Susan A. Lynham）
埃贡 G. 古巴（Egon G. Guba）
弗吉尼亚·奥勒森（Virginia Olesen）
辛希亚 B. 迪拉德（Cynthia B. Dillard）
泌威·欧卡帕劳卡（Chinwe Okpalaoka）
乔 L. 基切洛依（Joe L. Kincheloe）
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沙利 R. 斯坦伯格（Shirley R. Steinberg）
米切尔 D. 加迪纳（Micheal D. Giardina）
乔舒亚 I. 纽曼（Joshua I. Newman）
肯·普卢默（Ken Plummer）
詹姆斯 H. 刘（James H. Liu）
多纳 M. 默滕斯（Donna M. Mertens）
马丁·苏利万（Martin Sullivan）
希拉里·斯泰西（Hilary Stace）
朱莉安娜·奇克（Julianne Cheek）
约翰 W. 克雷斯韦尔（John W. Creswell）
查尔斯·特德列（Charles Teddlie）
阿巴斯·塔沙考里（Abbas Tashakkori）
本特·弗莱杰格（Bent Flyvbjerg）
朱迪思·哈默拉（Judith Hamera）
巴巴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
詹姆斯 A. 霍尔斯坦（James A. Holstein）
亚伯 F. 古布里厄姆（Jaber F. Gubrium）
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
安杰·克劳格（Antjie Krog）
玛丽·布里登-米勒（Mary Brydon-Miller）
迈克尔·克劳尔（Michael Kral）
帕特里夏·麦奎里（Patricia Maguire）
苏珊·诺夫克（Susan Noffke）
阿努·萨波洛克（Anu Sabhlok）
简尼希 M. 莫尔斯（Janice M. Morse）
苏珊 E. 凯希（Susan E. Chase）
苏珊·芬利（Susan Finley）
林达·肖皮斯（Linda Shopes）
米歇尔·安格罗西诺（Michael Angrosino）
朱迪斯·罗森伯格（Judith Rosenberg）
乔·普罗瑟（Jon Prosser）
塔米·斯普里（Tami Spry）
沙拉·加特森（Sarah N. Gatson）
安希·佩拉吉拉（Anssi Peräkylä）
约翰纳·鲁苏乌尔里（Johanna Ruusuvuori）
乔治·凯姆伯里斯（George Kamberelis）
格里·迪米特里亚迪斯（Greg Dimitriadis）
哈里·托兰希（Harry Torrance）
戴维 L. 奥希德（David L. Altheide）
约翰 M. 约翰逊（John M. Johnson）
劳拉 L. 埃林逊（Laura L. Ellingson）
伊丽莎白·亚当斯·圣·皮埃尔（Elizabeth Adams St. Pierre）
朱迪斯·戴维森（Judith Davidson）
希尔瓦纳·迪-格雷乔里奥（Silvana di Gregorio）
罗纳尔德 J. 佩里亚斯（Ronald J. Pelias）
提尼克 A. 亚布麻（Tineke A. Abma）
加伊 A. M. 韦德肖温（Guy A. M. Widdershoven）
朱迪斯·普雷斯勒（Judith Preissle）
玛格丽特·艾森哈特（Margaret Eisenhart）
A. 苏珊·朱罗（A. Susan Jurow）

《质性研究手册》（全四卷）译校者

（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战龙 陈学金 崔雪娟 邓　猛
董　轩 杜　亮 范晓慧 冯燕玲
韩　倩 靳　伟 雷月华 刘　艳
罗梓月 裴　淼 琼斯梅娜 阮琳燕
桑国元 宋　萑 滕　珺 王　熙
王赫男 向　辉 闫晓庆 姚　岩
于丽芳 翟晓磊 张　遐 张华军
张婧婧 朱志勇

本卷目录

第Ⅲ部分　研究的策略

总目录

第Ⅳ部分 收集与分析经验资料的方法

第Ⅴ部分 解释、评估与呈现的艺术和实践

第Ⅵ部分 质性研究的未来

第Ⅲ部分

研究的策略

PART Ⅲ STRATEGIES OF INQUIRY

朱志勇 译校

有责任心的质性研究者会从历史、互动和结构化的角度来全面审视自己的研究。他或她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信仰、偏见、不公正以及不平等现象(Mills, 1959, p.7)。一些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学者会尝试发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凸现出来的公共或私人问题以及个人遭遇等。在这一过程中,质性研究者会不由自主地把自身的经历作为调查资源,经常对自己进行历史性的反思和自传式的分析。他们会寻求经验研究(empirical inquiry)的策略,帮助他们在生活经验、社会不平等以及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任何一个研究的意义解读和研究材料中锤炼出来。

经验研究由其所采纳的范式和特定范式下重现的与人类经验、社会结构和文化相关的问题所规范与塑造。然而,研究者经常会询问怎样利用质性研究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一些批判性的理论工作者会审视那些能够产生阶层与经济结构的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同性恋研究、建构主义、文化研究、批判种族论以及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们都倾向于研究陈规旧习、偏见以及与种族、族群和性别相关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尽管我们在研究前提中已多次澄清研究不要带有价值倾向,但在质性研究中很难找到价值中立(value free)的研究。这种澄清使得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价值取向更明显。

研究者作为一项研究项目的解读者,从来都是在充斥着价值与经验的物质世界里工作;同样,世界也是由学者所持有的范式与视角所组成的。但是,这样被解读出来的世界使人们质疑个体所秉持的范式与视角。这种范式是与更高的伦理要求,甚至是与一种解放的、世俗的社会科学的价值与政治理论相联系的。

随着调查研究的计划与实施,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的选择。我们将逐一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每一个问题都会产生一系列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与要素。

研究设计[1]

正如我们在第1章所讨论的以及朱莉安娜·奇克在本手册第14章中所分析的那样,研究设计是使研究者处于经验世界之中,因此在研究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五个基本问题:

1.如何使研究设计与所使用的范式或视角相联系,即经验资料如何受范式的影响并与范式产生互动?

2.研究者如何利用这些资料解释研究实践和变化?

3.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是什么?

4.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与策略?

5.采用什么方法或研究工具来收集和分析资料?

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第Ⅳ部分详细介绍。

范式、视角和象征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批判主义的范式在质性研究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它们有着不同程度的自由度。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从一个严格设计的一端走向结构化程度更低的另一端。实证主义研究设计着重于在研究计划的早期就对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研究地点、抽样说明以及研究策略与方法进行规范,然后在研究计划中将研究各阶段撰写出来。在解释性研究中,事先完美的设计可能会阻碍新想法的出现。因此,当质性研究者预先设计研究程序时,应该要保持一定的弹性,随时能够解释说明新出现的或意外出现的材料和不断发展的复杂情况。

研究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包括不同的阶段:思考、计划、开始数据收集、完成调查、分析以及撰写报告。朱莉安娜·奇克(本手册第14章)认为研究计划的详细程度是由资助机构决定的。一般而言,资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当地资助、专项资助、家庭赞助、企业或国家各种基金资助以及政府机构资助等。根据资助方的不同要求,研究计划可能包括预算、文献综述、保护被试隐私的承诺、批准研究的文件、访谈安排以及研究的进度表。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试图穷尽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尽管解释/建构主义的设计并不如此)。这样的设计能够提供完整清晰的研究路径图。采纳这种研究传统的学者希望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后实证主义以及非实证主义的研究设计中有意保留了很大的弹性与模糊性,这样的设计思路基于建构主义、批判主义的范式,或者基于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及文化学视角。受这些范式影响的研究往往不太重视正式

资助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假设，对于结构化的访谈与调查、预先设定的研究策略以及分析技巧等也持保留态度。研究者往往遵循研究的路径，利用本领域内已经形成的一些经典的质性研究模式。例如，受独行的民族志者(loneethnographer)的鼓舞，研究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达到前辈大师们(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米德[Margaret Mead]、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戈夫曼[Erving Goffman]、贝克尔[Ernest Becker]、列维-斯特劳斯[Claud Lévi-Straus]、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的水平。因此，质性研究者通常是从一个人在长期深入研究后能够独立完成的研究开始的。

资助质性研究的政治与实践

朱莉安娜·奇克所撰写的第14章对于研究资金、研究伦理规范以及研究市场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陈述，她分析了资助质性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政治和实践方面的问题，包括寻求、获得与接受资助的方式。出于政治原因的资助往往会倾向于某些特定的研究形式。对研究证据(evidence)政治性的关注——什么是证据——会产生与研究设计和样本规模相关的问题，而选取混合研究方法设计会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

奇克表明了质性研究作为一种产品是如何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运转的。研究者获取资助相当于将自己出售给特定的资助机构，而这些机构可能并不理解质性研究实践的独特性。她还讨论了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IRBs)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澳大利亚，在获得大学的研究伦理委员会(University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的正式批准之前，研究者不能进行任何以人为被试的研究。在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IRBs最早关注的是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质性研究在研究伦理委员会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为这种类型的研究经常被认为缺乏科学性。事实上，IRBs俨然已成为研究方法审查委员会，将科学限制在一个分支或一种版本之下。在英国，皇家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设计不佳的研究是不符合伦理要求的。这意味着研究的科学性与伦理性是审核一项研究的两个重要标准。奇克通过大量观察发现，医学领域的质性研究者往往被看作是会犯伦理错误的代表。她认为，质性研究者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提前回答审查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对研究的控制也是关键。奇克认为，从赞助者那里获得资金(目的是为了从事研究)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活动。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不能令赞助者满意怎么办?

因此，研究中接受外部赞助会产生各种问题。研究人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去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其研究，这种压力导致研究成为一种买卖的商品。奇克认为这是危险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影响无处不在，是由市场而非利益相关者或者研究同行决定我们研究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我们是为了发现去做研究，还是为了获得资金从事研究?

研究设计的策划

简恩斯克(Janesick, 2000,2010)描述了研究设计的过程。她认为,一个好的质性研究设计应该是开放的、有活力的过程。在格莱汉姆(Martha Graham)、崔宁汉姆(Merce Cunningham)、艾利(Alvin Ailey)、艾斯纳(Elliot Eisner)以及杜威(John Dewey)等学者的影响下,她从美学、艺术以及象征学的视角来审视研究设计的过程。在杜威和艾斯纳的影响下,她认为研究设计是一个即兴发挥的艺术,是一个包含不同经验、解读与呈现的事件与过程,而非拼凑而成的作品。艺术塑造并成就了经验。研究的艺术同样需要精心计划,它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热身、扩展活动、设计决策、缓和行动、解读以及撰写。

研究谁?研究什么?

质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包含了各种社会现象和/或过程的不同个案和例证。我们在决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时,有三个策略是需要考虑的:第一,选择单一个案或单一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被斯泰克(Stake, 2005)定义为内在的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研究者对于单一个案或社会现象中的事例进行详细的研究,例如,对一间教室、一件艺术作品或者一个家庭内的死亡事件进行解剖与分析。

第二,研究者可以关注一系列的个案。斯泰克(Stake, 2005)称之为多个案研究方式(collective case approach)。这些个案被作为专门或者综合的产品进行分析。第三,研究者可以采用过程策略(process approach)来研究某特定过程中的复杂事例,这一过程往往通过很多不同的个案呈现出来。邓津(Denzin,1993)进行的对于酗酒复发的研究就集中分析了不同职业的酗酒复发情况。这一注重过程的策略同样扎根于特定的个案。

研究设计因多个个案、单一个案或者过程策略而变化。抽样方式在不同情形下有所不同。这些需求与议题也往往因为研究者所秉持的不同范式而发生变化。每个个案或者过程中的事例都烙刻着总体现象的印记。然而任何一个事例都是特别的、唯一的。例如,每个教室都和其他教室相似,但是每个教室又各有不同。

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实证主义者、建构主义者以及持批判论的质性研究者运用理论抽样或目的抽样,而非随机抽样的方式。他们寻找的是与研究的特定过程最有可能相关的人群、场景以及个体。同时,对于群体、概念以及观察之间的比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研究者试图理解调查过程中的所有相关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反面个案。

在文化研究传统里,这些抽样和选择问题经过后现代民族志学者的解读会各不相同。这些研究者往往愿意针对少量的经验材料(个案或者过程)进行集中研究。萨特(Sartre, 1981,p.ix)认为个体或者个案从来就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或者个案,他们往往是作为广泛的社会经验或者过程中的特定事例而被研究的。萨特(Sartre, 1981,

p.ix)指出,"个体不断相加成就他/她的时代,并被这一时代泛化而具有普遍特征;反之,个体的单一性特征是特定时代复制的结果"。因此,研究单一个案就是研究一般性质的总体。因此,任何个案都包含着普遍性质的痕迹。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者和后实证主义者很少对反面个案、概括化和个案选择等感兴趣。如同斯泰克(Stake,2005)所言,他们假定读者会从个案中归纳出符合自己个人经验的理论。

这些策略在运用事例的方法中讨论得更为详细(Denzin,1999;Psathas,1995)。帕萨斯(Psathas,1995,p.50)指出,"事例的方法"将现象中的每一个事例都作为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证明特定文化场域中的成员对于该现象的文化理解。

例如,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中,"一种表达方式往往不能够代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尽管他们的结构特征相同;话语分析者通过研究语言表达方式来理解语言体系是怎样在社会系统的交互运用中被激活的"(Fiske,1994,p.195)。这就是事例方法的运用。话语分析者研究表达方式之间互动的时机就是事例方法产生作用的时候。

帕萨斯澄清了事例的意义:"关于某件事情的事例就是一个发生了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特征与结构可以被检测与分析,借此来发现这些特征与结构组织的方式"(Psathas,1995,p.50)。发生的事件就是证据(evidence),"用来证明事件发生的机制,例如,关于对话中'轮流替换'的机制"(pp.50-51)。

话语分析者的任务是理解这些事例以及他们的互动是如何运作的,说明是哪些规则在运作这些事例,并说明事例的结构。分析者会监控整个互动过程,"首先观察发生的事件……观察事件发生的顺序,检测研究被试的言行"(Psathas,1995,p.51)。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意义的解读是关键,它可以体现一个既定的表达方式是如何进行的,其包含的意义为何。实用的准则由此获得(Peirce,1905),一个行为的意义在它产生的结果中体现,包括解释过去经验以及预测将来的结果。

至于一个特定的表达方式是否会再次发生并不是主要的事情。从人群中进行抽样的问题也不重要,因为不可能事先决定选取何种场合下发生的事例(Psathas,1995,p.50)。事实上,在至少分析一个事例之前是不可能收集所有的事例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事先判定哪些特征能够使每个个案成为"与上一个个案类似的下一个个案"(Psathas,1995,p.50)。

这意味着帕萨斯很清楚,很少涉及经验的一般性概括的目的不是抽象的或者经验性质的概括,相反,"目标是提供符合标准的分析"(Psathas,1995,p.50)。每个分析必须与个案相符合,"必须能够为与个案相关的现象提供充分的、独特的分析"(p.51)。

研究的策略

研究的策略是指研究的技巧、假设、实施以及资料分析等。这些具体的策略使研究者得以顺利地从范式转向研究设计进而到资料收集的阶段。研究的策略将研究者和特定的技术方法联系起来进行经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例如,个案研究依赖于访

谈、观察以及文本分析。研究策略使研究者及其研究范式定位于具体的经验资料情境和方法论实践中,例如,选取一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本手册第17章)。

我们对本部分所讨论的研究策略进行简短的综述。每种策略都对应非常复杂的文献历史、经典案例以及一系列运用这些方法的具体技巧。当然,每种策略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一些与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范式传统相关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

约翰·克雷斯韦尔(本手册第15章)、查尔斯·特德列和阿巴斯·塔莎考里(本手册第16章)对混合研究方法,即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潮流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讨论。尽管对于混合方法的组成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克雷斯韦尔、特德列和塔莎考里认为,混合方法的研究是在单一研究或一系列研究中收集、分析和组合质性与量化的经验材料的过程。克雷斯韦尔列举了关于混合方法的11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定义的争辩、什么是混合方法研究、范式的争论——不同范式在同一研究中的兼容问题、目前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讨论是如何受到后实证主义青睐的,以及混合方法的价值。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克雷斯韦尔对混合方法进行了重新评估。

特德列和塔莎考里(以及克雷斯韦尔)对于混合方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认为它与最近的重视自然呈现的方法体系有重合之处(Hess-Biber & Leavy,2008),还与稍早时期关于三角验证(triangulation)的讨论相联系(Denzin,1970)[2] 并与评价、护理、教育、残疾、社会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相关联。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混合方法研究具有兼容并蓄、范式多样、崇尚多元、拒绝二分法、循环往复、强调研究问题等多个积极的特征。同时,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注重平行设计、顺序设计、多层次设计等不同的质性与量化方法的灵活混合运用。这些策略被系统地进行分类和分析。

作者们还对实用主义、变革取向和辩证理论三个主流范式进行了回顾与讨论,甚至对是否该关注范式进行了辩护。一些学者认为范式一词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同意这一点。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批判主要包括方法的不相容、存在后实证主义的偏见、质性研究部分屈从于量化的部分、经费问题、流于表面的方法双语论以及肤浅的哲学讨论(例如,实用主义的形式)。特德列和塔莎考里相信所有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

实用主义的旁白

作为在芝加哥学派受过训练或者支持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并不认可实用主义的所有观点和主张(Denzin,2010; Lincoln,2010)。因此我们在这里非常谨慎地提出异议。

混合研究方法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玛格

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的实用主义联系在了一起。从本质来看,经典实用主义并不是一种方法论,它是一种意义的原则,一种关于事实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观点之上,即不能在经验发生之前就赋予某事件一定的意义。实用主义者关注行动和事件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后果和意义。这种关注超越了任何一种特定的方法论,也就是说,解释者研究、检验并且反思一项行动和它的后果,而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论是不能够达到这种目的的。看起来也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达到这一水平上的意义。

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Rorty]、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韦斯特[Cornel West])拓展了经典实用主义的学说。他们支持完全解释性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很明显是反实证、反基础和完全情境化的实用主义,基于这种实用主义观点的混合方法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混合方法研究界在兼容性问题上认为,将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相结合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质(QUAL)和量(QUAN)在实践或认识论层面上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根据这种理解,实用主义者不承认在质的认识论和量的认识论之间存在范式冲突。因此我们可以将实用主义理解为支持混合的或多样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践哲学和应用研究哲学(Maxcy,2003,p.85)。

对实用主义中的实践后果和"什么在起作用"的问题感兴趣的霍伊(Howe,1988)提出了另一个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依据,称为"收银机实用主义(cash register pragmatism)",而不是经典实用主义。但是"什么在起作用"并不是实用主义关注的焦点,实用主义者关注的问题是行动的后果,不是方法论的整合。因此,在这里混合方法研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支持多元主义或者多种框架是一回事(Schwandt,2007,p.197),但是在收银机实用主义之上建构一种社会科学则是另一回事。"什么会起作用"包含两层意思,或者说有两个后果。第一,忘记质性和量化研究框架的范式、认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差异是错误的。差异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为此而忽略了第二个问题,正如当前所阐释的,混合方法研究几乎没有为评估解释性和情境化经验提供策略。

个案研究

本特·弗莱杰格(本手册第17章)对个案研究下了一个常识性的定义,即对个体的深入分析。通过研究,他驳斥了对于个案研究策略的五个误解:(1)一般知识比个案知识更有价值;(2)研究者不能从单一个案中进行归纳概括;(3)个案研究不适于理论建构;(4)个案研究倾向于强化研究者的偏见;(5)很难根据特定的个案研究进行归纳和概括。

弗莱杰格认为,与在预测性理论和通用性理论上的徒劳无功相比,具体的个案知识更有价值。从单一个案中进行归纳概括是有可能的(比如达尔文、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研究),并且单一个案研究也有助于产生和检验假设。与任何其他的研究方法相

比,个案研究并不会使研究者在证实预先设想的概念上产生更多的偏见。在通常的意义上,研究者并不倾向于使用个案研究进行归纳。弗莱杰格还阐释了个案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价值,并且在确立它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斯泰克(Stake,2005)认为,个案研究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个研究对象,例如一个孩子或者一间教室。从本质上来看,研究者最终感兴趣的是一个过程或者个案群体,而不是个体。斯泰克列举了几种个案研究的类型。每一个个案都是复杂的且具有历史和情境性的实体。个案研究有独特的概念结构、用途和问题(偏见、理论、三角验证、叙事、个案选择和伦理学)。研究者通常要提供个案的信息,例如它的特征、历史背景、它和情境及其他个案的关系,以及它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伦理问题,个案研究的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自我反思,并与研究的利益相关者和研究共同体进行互动。

表演民族志

朱迪思·哈默拉(本手册第 18 章)对表演研究、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和批判教育学之间微妙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详细讨论,她将这些与批判教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表演民族志能激励文化的发展,能让文化充满活力,并将教育性、表现性和政治性元素融合在一起。哈默拉在第 18 章强调了一些关键术语(表演、民族志、表演性和审美学),及存在于表演民族志空间和实践中的哲学上的偶然性、过程中的语用学,以及教学与政治的可能性。她的观点补充说明了本手册中泰德洛克和斯普里(分别在第 19 章和第 30 章)论述的内容。

表演是一种解释的、身体化的行动,是一种认识方式,也是道德话语的一种形式。表演民族志可以具有政治性,用于激发他人从事道德行动,它更加追求具有公民意识的话语,即一些学者提倡的一种表现式公民身份(performative citizenship)。表演民族志是批判性学者理解这种历史运动的一种途径,也是帮助我们想象完全自由的乌托邦社会的一种行动。

叙事民族志

巴巴拉·泰德洛克(本手册第 19 章)提醒我们,民族志倾向于在一个更加全面和有意义的情境中理解特殊的偶然遭遇和事件。泰德洛克还详细说明了参与式观察如何演变为对参与的观察(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民族志的操作、框架、代表和读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激情的、叙事的、呼唤的和偏激的民族志和自我民族志领域都已经出现了这种论调。

泰德洛克认为,美国早期的民族志有着社会批判主义和公众参与的传统。弗郎兹·博厄斯(Franz Boas)、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等人通过他们的社会批判以及对公共行动和政治行动的呼吁来塑造民众的观念。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民权运动和反越南战争的社会背景下,批判民族志获得了新的发

展动力，而民族志中的批判理论主要是通过戏剧创作付诸实践。在拉丁美洲、非洲及其他地方，当地的政治剧院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伯奥（Augusto Boal）和弗莱雷（Paulo Freire）等人的作品中获得发展。

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伊迪斯·特纳（Edith Turner）和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Bruner）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表演民族志。在表演民族志中，文化被视为一种表演，对文化的解读也具有表演性。民族戏剧和公共民族志由此开始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而得以发展。公共民族志是批判时代问题的一种话语，它是批判民族志的拓展和延伸。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巴巴拉·泰德洛克（Babara Tedlock）和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担任编辑时期，《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开始发布政治参与类的文章。泰德洛克认为，只有在一个充满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科学才能服务于它们所实施的群体，而不是服务于教育者、政策制定者、军事人员和财政人员等外在群体。公共民族志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充满了编织叙事、双重意识、表演、非虚构文学创作、历史、戏剧以及魔幻现实主义。遗失的记忆被再次获得，它们向我们袭来，并像蜘蛛那样编织着我们生活的捕梦网。

对诠释实践的分析

在本手册第20章中，霍尔斯坦和古布里厄姆拓展了他们长达20多年的建构主义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质性研究表达，它建立在民族志方法论、会话分析、本土文化的制度性研究、福柯式的历史批判研究和话语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章中，二人在诠释领域达成了一个发展性的共识。这一共识显示了社会建构主义取向是如何与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福柯），以及作为本土社会成就的意义和秩序的情境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霍尔斯坦和古布里厄姆注意到了赋予日常生活以结构和意义的诠释叙事程序和实践。这些反思性实践既是质性研究的来源，也是它的主题。知识往往是情境性的，蕴涵于某一特定的文化之中，并根植于有组织的和互动的场景之中。我们的陈规旧习和思想意识以及对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理解都是在这些场合中得以产生的，也正是在这些场合中体现了被史密斯（Smith，1993）称作统治工具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则关系。霍尔斯坦和古布里厄姆以史密斯的研究为基础，详细阐述了话语和社会结构的批判理论。继而，他们还表明了反思性话语和话语实践是如何改变交叉分析和批判的过程。这些实践建构了当地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对于建构主义分析、诠释性资源和本土资源的重视使质性研究充满生机并更加转向反身性。在这种机制下，我们可以反抗和质疑那些威胁到社会正义的压迫性现实。

扎根理论

凯茜·卡麦兹（本手册第21章）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扎根理论

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资料的收集和分析通过自发的反复过程而相互影响。扎根理论这个术语是从经验资料的连续性概念分析中发展而来的。卡麦兹具体说明了扎根理论在21世纪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促进关于正义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学者用系统的工具来描述正义的社会情境,并且能够超越它,对非正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维持进行解读和分析。他们有明确的价值立场,并且可以制订出改革议程。一些学者关注社会正义问题主要是因为它阐明了一个理论问题,而其他的社会正义研究学者则认为研究社会正义问题是他们的应为之事或者应尽之责。

卡麦兹认为,从本质上看,扎根理论包括收集和分析经验资料的指导原则,并且能够建构出解释所收集经验资料的中层理论框架。她在第21章中概括了扎根理论的历史,从早期格拉泽(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的作品到最近格拉泽、斯特劳斯和科宾(Corbin)的宣言中所体现出的转变。她还对比了格拉泽、斯特劳斯和科宾的实证客观主义和她自己的更具有解释性的建构主义,架起了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桥梁。扎根理论是如今社会科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解释性策略,它赋予了研究者一系列与"良好科学(good science)"的准则相一致的特定的步骤以供遵循。但卡麦兹也清楚地指出:在不接受早期实证主义者的观念时是可以使用扎根理论的。她还认为,混合多种方法的扎根理论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运用越来越普遍。

卡麦兹回顾了扎根理论所使用的基本策略,并且将这些策略运用到了社会正义的研究领域中。她还提出了使用扎根理论对社会正义问题进行研究时可能会被问及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关键的判断准则。一项研究能够展示出可靠性和原创性吗? 它和活生生的经验世界有关系,并能引起共鸣吗? 它有用吗? 它能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吗? 它有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吗? 通过这些判断准则,卡麦兹改造了早期芝加哥学派研究社会正义问题的传统,同时也将扎根理论带入新世纪。她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与符号互动论的实用主义倾向是一致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将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方法。

以人权的名义

南非著名学者和诗人安杰·克劳格(本手册第22章)为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进行了两年的无线电广播访谈和报道。他的文章一向以独特的幽默和自传体式的风格见长,文章是以记述一位年轻的寡妇围绕一口井叙述其家庭100年的历史故事而开始的。在故事中有这样一些问题:她问这里谁是学者? 谁是原始资料? 是记录原始叙事故事的Bleek吗? 是进行追踪研究的Liebenberg吗? 是本章节的作者吗? 是澳大利亚丛林中的讲述者吗? 是故事中的妇女吗? 谁有权利讲述这个故事? 谁有权利进入这种话语情境中?

克劳格以轻松活泼的方式详细叙述了她和一位学术管理员的经历,这位管理员告诉她,她本人是原始资料,而不是学者。然后她讨论了Konile太太的故事,她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的证词首次是以不连贯的原始资料的形式出现的。处于社会底层阶

级的人不是不能讲话，而是不论是在第一还是第三世界，他们的声音都被特权阶层忽略。我们有倾听和行动的职责，我们要听见那些哭泣的证词。

参与式行动研究

玛丽·布里登-米勒等（本手册第23章）等人认为，参与式行动研究（PAR）通过参与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假设知识的产生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每一个参与者多样化的经验和技能对于知识的产生都至关重要。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鼓励社会参与者参与到研究过程之中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参与式行动研究就如同爵士乐即兴演奏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费力，但实际上却是多次"严格训练"的结果。参与式行动研究如同大榕树一样，普通人能够聚集于此，讨论问题并做出决定。

布里登-米勒及其同事在回顾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不同传统和历史阶段时注意到，参与式行动研究早期主要是在传统学术环境以外的南半球或者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的。这是一段历史的潮流，从保罗·弗莱雷在巴西提出的批判教育学，到博尔达（Fals Borda）在拉丁美洲的倡议、斯堪的纳维亚的民众学校运动、亚洲和澳大利亚参与式行动网络的建立、费恩（Michele Fine）对于全球年轻人创造精神的倡导，再到女性主义、读写能力、社会公正、劳动、民权和学术主张的抗争，参与式行动研究正在挑战"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差异"这一传统思想。收集、分析、理解和分配经验资料的策略是与认识论、社会理论或者道德立场无法完全分离的。

研究者们在三个地方进行了参与式行动研究：Sabhlok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对自主就业妇女协会进行了专题论文研究；Alicia Fitzpatrick与美国西南部地区的印裔美国年轻人进行合作；Michael Kral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进行了因纽特人自杀预防和改造项目的研究。每一个个案研究都显示了参与式行动研究在挑战和冲击当前所存在的权力和特权结构方面的力量，从而为那些经常被忽视的人提供分享他们知识和才能的机会，最终带来积极的社会变化，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政治社会体系。

质性健康研究

莫尔斯（本手册第24章）指出，质性健康研究由于主观性问题而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质性研究。质性健康研究者主要研究重大的生活质量问题以及生死问题。莫尔斯考察了质性健康研究的起源、历史、研究内容和范围，并且对2009年《质性健康研究》（*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发表的所有文章进行内容分析。通过确认质性健康研究本身作为学科分支领域的重要性，莫尔斯说明了如何使质性方法适合在临床实践中运用。《白人男孩》（*Boys in white*）、《庇护所》（*Asylums*）、《死亡意识》（*Awareness of Dying*）等经典著作奠定了质性健康研究的基础，其影响范围甚至拓展到了质性健康研究之外的领域。

1997年,莫尔斯创立了"国际质性方法论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y,IIQM)"以及被Sage数据库收录的月刊《质性健康研究》。IIQM很快通过八个国际网站中心与115个大学建立了联系,今天已经形成了全球性的支持质性健康研究的网络系统。

莫尔斯还考察了健康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包括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知情同意书、疾病研究、死亡研究、病人研究以及医务人员对评价的恐惧等问题。对此,她提出了一些开展临床研究的策略,例如回顾性访谈以及将护理者视作共同研究者。莫尔斯认为,质性健康研究是一种特殊的质性研究,其特殊性体现在它对于教育、培训、方法和知识传播方面独特的需要。我们赞同这种观点。

总 结

总而言之,本手册第Ⅲ部分的各章节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质性研究作为促进社会改革和推动社会公正的工具。一旦过去沉寂的声音被人们所知晓,他们就能够作为社会改革的代言人为自己说话。研究和政治行动被联系在一起,语言和意义体系被改变,范式也面临挑战。本手册第Ⅳ部分的主题就是如何理解这些声音。同时,请倾听本手册第Ⅲ部分呈现的各种声音,它们是对行动的呼吁。

注 释

1.艾伦(Mitch Allen)的论断对我们理解范式与研究设计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2.邓津(Denzin)提出的三角验证包括多种质性方法的结合,如传记、个案研究、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民族志等。它并不包括质性和量化方法的结合。

参考文献

Denzin, N. K. (1970). *The research act in sociology*. London: Butterworths.

Denzin, N. K. (1993). *The alcoholic society: Addiction and recovery of self*.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Denzin, N. K. (1999). Cybertalk and the method of instances. In S.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107-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2010). *The qualitative manifesto*.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Fiske, J. (1994). Audiencing: Cultur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89-198). Thousand Oaks, CA: Sage.

Hess-Biber, S. N., & Leavy, P. (Eds.). (2008).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New York: Guilford.

Howe, K. R. (1988). Against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incompatibility thesis, or dogmas die har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7*(8), 10-16.

Janesick, V. J. (2000). The choreograph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379-399). Thousand Oaks, CA: Sage.

Janesick, V. J. (2010). "*Stretching*" *exercis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Lincoln, Y. (2010). What a long, strange trip it's been ...: Twenty-five years of qualitative and new paradigm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6*(1), 3-9.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xcy, S. J. (2003). Pragmatic thread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earch for multiple modes of inquiry and the end of the philosophy of formalism.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51-90).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irce, C. S. (1905). What pragmatism is. *The Monist*, *15*(2), 161-181.

Psathas, G. (1995).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rtre, J.-P. (1981). *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wandt, T. A. (2007). *The SAGE dictionary of qualitative inquiry*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mith, D. E. (1993). High noon in textland: A critique of Cloug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83-192.

Stake, R. E. (2005).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443-466). Thousand Oaks, CA: Sage.

14 资助质性研究的政治与实践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FUNDING QUALITATIVE INQUIRY:

MESSAGES ABOUT MESSAGES ABOUT MESSAGES …

⊙ 朱莉安娜·奇克(Julianne Cheek)

邓猛 译 朱志勇 校

亲爱的读者:

这一章是关于如何资助质性研究的一系列思考。换句话说,就是关于如何出售研究思想和研究知识从而获得研究资源。因为无论我们进行何种类型的质性研究,实际上我们是一直在出售、出卖我们的时间、劳动和研究项目。当谈论那些影响所有质性研究者的问题时,通常我们指向的是特定的读者。这些读者可能并不能十分确定如何开始为他们的质性研究获得资助。我希望通过这一章的学习,这些读者能够获得有助于得到资助的实践性信息,以及开展持续智力工作和对资助质性研究的政治与实践进行反思的动力。

对于这一点,一些读者可能认为资助质性研究的讨论与他们毫不相干。如果你也是这么想,那么你可能认为你所感兴趣的研究并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或者与资助者之间的互动,它仅仅需要时间。对此我的回答是,这种观念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质性研究的资助等同于或仅仅局限于研究者自身以外的资源支持,这种观念更多的是从金钱支持的角度来思考的。此外,它隐含的另一种假设是研究者所消耗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于研究的资助。这种观念忽视了研究资助包含不同的形式这一事实。

例如,资助可能是以工资的形式聘请研究人员和引进研习生,甚至免除主要研究者的其他责任来进行研究。支持还可以是提供资金购买设备,例如购买数据记录仪或者电脑,还有非资金形式的支持,例如直接提供项目研究中所需的设备。其实,无论是金钱性质的还是非金钱性质的资助,都可以使研究者获得必要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此外,研究机构激励计划也可以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资助质性研究,例如,奖励那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补助、出版物和成功的研究结果为机构获得研究收入的研究者。这些奖励可以通过基础设施补助的形式为研究者在机构内部建立研究中心。

莫尔斯(Morse, 2002)指出,认为质性研究的成本不高或者相对于其他研究类型成本较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迷思。据我了解,这种迷思目前已经出现了,它遍及整个质性研究历史,并渗透于质性研究领域内外。究其原因,在

于对质性研究资助概念以及研究资助构成要素的狭隘理解。所有的研究者,无论是基于方法论还是实际的利益考虑,都需要某种形式的研究资助。对于任何研究来说都是如此,甚至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由研究者自己独立完成、不需要大规模设备、特殊化工作环境或者像化学材料这样的昂贵消耗品的质性研究。其实,在研究中有偿劳动时间和无偿劳动时间的投入都是我们在实际中需要的研究资助。因此我认为获得质性研究的资助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关注的问题。

这一章有许多可以用于获得质性研究资助的形式。例如,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如何为获得资助写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提案,但是这也会存在一些风险,会使得研究者与资助者,特别是那些掌管大型研究项目的资助者之间的讨论过于狭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助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另外,它还会导致这种讨论仅仅局限于如何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可行的方法集中于影响质性研究资助的政治因素,例如,考虑我们如何开展政治性的研究。研究者已经在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强烈地呼吁质性研究要坚决抵制过多带有标准化、排斥性、实证主义倾向的政治性证据(Denzin & Giardina,2008; Holmes,Murray,Perron,& Rail,2006)。这样一种关注所带来的可能危险就是将关于资助和质性研究的讨论局限于政治方面,这种政治可以看作是外部强加于质性研究的。事实上,这有可能反过来强化政治在我们关于资助和质性研究讨论中的中心地位。通过这种方式,证据的政治性就会错误地取代质性研究和资助,甚至证据本身成为关注的中心(Long,2010; Morse,2006a)。

鉴于以上情况,我该如何组织这种讨论呢?关于如何获得质性研究资助的探索和反思主要集中于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我称之为实践性(practices),涉及资助的寻求、获得与接受。这个领域主要是关于资助质性研究的实践层次,例如资助的来源、资助可能的形式,以及为了某一特定的研究寻求资助的策略,还有关于资助议案的撰写和议案的内容,包括研究谁、研究什么、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以及为什么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是这些内容如何被资助和研究的政治性所影响。政治性(politics)是本章的第二个领域。我的经验是,寻求与获得质性研究资助的实践活动与在研究和资助过程中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是不可分离的。一个研究者选择到哪里寻求资助、他们如何寻求和申请资助、当他们收到资助时做什么,这些问题的讨论兼具实践性和政治性。

我一直在谈论的政治指的是什么呢?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支配许多西方政府和管理部门的政治理念都源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政治理念支配下的政治活动推动了市场竞争、效率以及由审计衍生的对于绩效责任的理解(Cheek,2005; Kvale,2008; Torres,2002)。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一种类型的研究证据会优先于另一种证据,隐含于其中的就是争议性的证据概念。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我们做研究的方式(产生证据的方法和程序);二是考虑采用何种形式的证据以使研究结果具有有效性、可接受性和有用性(Cheek, 2008, p.20)。邓津(Denzin, 2009,p.142)引用莫尔斯 (Morse, 2006a)的观点,指出现在不是有无证

据的问题,而是谁能决定某物是不是证据。这就使得重点从证据本身转移到了证据的政治性上,即决定一种研究结果是否为证据的权力。这种政治已经渗透到了许多研究资助者的观念之中,从而影响了考虑和分配质性研究资助的方式(Cheek,2005,2006; Hammersley,2005; Morse, 2006b; Stronach,2006)。

因此,很少有研究者能够在研究的竞技场中免受政治渗透的影响。例如,在宏观的政治层面上,质性研究者在寻求研究效率、产出和质量等方面的证据过程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由政府主导的审查和审计(Cannella & Lincoln,2004; Denzin,2009)。在研究实践的微观层面上,对于研究和研究证据的狭隘理解也在不断影响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能够使用的方法类型(Atkinson & Delamont,2006; Morse, 2006b; Torrance,2006)。因此,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质性研究和证据的政治性之间一直存在着持续性的紧张、冲突甚至是决裂(Denzin & Giardina, 2006,2007a,2008,2009)。这些紧张、冲突和决裂一直在不断发展,并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资助质性研究的方式。综合考量,我认为,探索政治和质性研究资助实践活动之间的临界面是十分关键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如何最有效地资助我们的研究,而且还因为这个临界面能够塑造我们的研究形式。

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呢?在政治和质性研究资助实践之间的分界面如何影响我们的研究形式呢?我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是否会因为认识到很容易得到资助便去选择一个特定的质性研究领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资助者就有权考虑优先资助那个领域,而这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领域。在方法论方面,如果一个资助者比较倾向于某种研究方法,那么我们也会调整我们的研究设计与之相适应。当然,由资助者设定范围未必一定是坏事。的确,有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常识。然而这确实引发了关于谁驱动谁的问题——是资助驱动研究还是研究驱动资助?抑或二者之间的某物在驱动?在一定程度上,这有可能使资助作为支持研究的本意发生扭曲,对支持本身的关注已经接近于甚至超过了所支持的研究。研究者实际上所做的就是购买和出售与研究项目等量的资助。

以上所有这些都会引起质性研究者思考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时是很难做出选择的,并且这些复杂的问题还与影响他们获得质性研究资助方式的实践活动与政治联系到一起。对于我来说,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需要时常反思我最初的研究动机——是进行研究还是获得资助?我会售卖研究或者购买资助吗?我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改我的研究以获得所需的资助?更重要的是,在这方面我做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如何能够想方设法使政治和质性研究的资助相匹配或者使质性研究远离政治和资助?从质性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准备放弃什么?改变什么或者调整什么?许多质性研究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采取折中的方式以获得资助。谈论这些折中问题比较困难,也很少有文章论述这些问题。然而,我们不去论述我们所做的,这与我们实际上去谈论我们所做的一样具有教育性和重要性(Cheek,2010a)。

综上所述,我可以总结一下,我所要探究的是如何尽可能想方设法地在资助质性研究方面采取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既要产出研究成果,同时又

要感到自己可以控制这些成果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这种讨论必须直接联系我们每天生活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我们作为质性研究者如何能够生存并且发展?对于缺乏经验的研究新手来说,特别是那些正在寻求他们第一个研究或学术职位,或者还没有获得聘用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在没有出售的情况下,你是如何努力应付甚至适应管理部门、研究机构、调查委员会和研究市场的需要的?所有这些问题在探索与资助质性研究有关的元理论和元信息时都处于中心地位(Bochner,2009)。拆解和揭露这层层的思想和信息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求质性研究的资助,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寻找资金:从哪里开始以及需要扪心自问的难题

当你尝试着为你的质性研究寻求资助时,你应该如何开始,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希望调查的研究问题,你想进行的研究类型以及需要的资助类型。但是所有这些中最关键的就是当你在考虑如何为你的质性研究寻求资助时,无论采用什么策略,吸引资助首先要做的就是拥有一个深思熟虑的研究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设计。你必须清楚地了解你为什么想获得资助,换句话说,你想研究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研究。关于质性研究设计已经发表了很多优秀的文章,也是本手册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讨论了。我想强调的是,正如莫尔斯(Morse, 2008)所言,一个看似简单的、完美的质性研究设计背后是平时努力的思考。只有在你确信已经花了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去这样做时,你才做好了进入下一步的准备:寻找研究资助。

下一步要做的不仅仅是确定可以获得哪些资助,还要明白这些资助提供者如何理解和思考研究。他们对质性研究计划感兴趣吗?他们对于所资助的研究问题有特别的偏好和要求吗?在尝试寻找潜在的资助者和资助项目方面的信息时,质性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是质性研究不主动、也不善于去形成有关资助提供者或者与他们进行互动的经验方面的集体智慧。例如,目前还没有一个潜在资助者的名单,也没有对那些已经获得资助或者在资助机构评审小组担任代表的研究者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梳理,导致集体的智慧无法得到发挥。然而,在为质性研究寻求可能的资助来源的过程中,仍然是有策略可以使用的。

一种策略就是使用正式的社交网络,例如,每年在伊利诺伊大学举行的质性研究大会,也可以使用非正式的社交网络去探索哪些资助给予了质性研究、以何种形式,以及哪些研究项目获得了资助。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者还应去发掘尚未获得资助的质性研究领域并思考其原因。这会使你从一开始就了解那些对质性研究不感兴趣的资助者,从而节约了你的时间和精力。另一个策略是使用一些数据库和出版物,它们将潜在的资助来源、在寻求资助过程中申请的频次,以及

在各自的项目计划中申请的成功率编目成表。例如,澳大利亚的GrantSearch电子数据库,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下,它每两年就会发布书面材料。它宣称已经有3 000多个条目来确定资助资源,这些资助者包括各个层面的政府、大学、基金会、私人部门和专为澳大利亚申请者提供的海外资源,他们所提供的资源涉及学习、旅行、研究、商业、专业发展、艺术、体育、娱乐以及社区组织等各个方面(GrantSearch Register of Australian Funding,2010)。当然,以上这些潜在的资助来源为质性研究所提供的资助在各个国家甚至在一国之内的获得机会和相对重要性都是不同的。

在为质性研究努力寻求资助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接受一位赞助者的资助就会无情地将研究者和他的研究与那位资助者的价值观联系到一起(Cheek,2005,p.400)。因此,在寻找潜在资助者的过程中,有时很有必要反思一下是否要从某一个特定的资助来源去寻找资助。例如,大部分的研究者在面对烟草公司提供的资助时都会犹豫不决。对于一些从事健康相关领域的质性研究者而言,是否接受医药公司所提供的大量资助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一些公司依靠榨取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劳动来获得利益,在这些国家中人们获得的报酬很低,甚至不能维持生存,向这些公司寻求资助会怎么样呢?一个资助者的环境记录重要吗?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资助的政治性又会在另一个方面影响质性研究者,即来自资助者的政治影响。在面对这种政治时所要采取的立场就是所有的质性研究者都必须反思何时运用策略去寻找资助。此外,质性研究者受雇的机构可能就有政策规定不能接受哪些资助。了解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确定了潜在的资助来源,为了获得质性研究资助的机会,研究者对资助的搜寻可以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有时资助者会有他们想资助的特定领域或者优先考虑的事。如果你的研究计划与资助者感兴趣的领域相一致,那么就很有可能被资助。因此,了解资助者是否有优先考虑的或者感兴趣的领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确实有,那么就找到这些领域的相关方面。当然,你在权衡研究问题与设计以适应资助者的优先领域(a priority area)时,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困难。在这方面你必须自己做决定。坦率地讲,当寻求和获得资助成为我的主要研究动机时,我的一些研究也会去适应资助者某些特定的要求。这样做有一些理由。一个就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和许多其他的研究者一样,体验过吸引研究资助的压力,并且这种压力是持续性的。另一个理由是很难获得资助的严酷现实。鉴于这些,我一直努力进行思想上的挣扎,决定是否需要对此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需要,我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实用主义者呢?是努力为我想进行的研究计划寻求资助,还是容忍并接受研究其他的尽管不是我最初打算研究的但却可以获得资助的东西呢?我是应该调整研究以适应资助者的要求和安排来进行研究好些,还是拒绝调整,最终无法进行研究更合适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也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质性研究者,每一个人都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准备对研究问题进行多大程度的修改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在细化和完善寻找潜在资助和资助者的过程中,了解资助者过去资助过

什么项目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位资助者过去资助过质性研究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类型的？研究者应该尽力找到任何由资助者发布的资助指导纲领、申请书或者其他的相关文件，例如详细阐述资助或研究活动的年度报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由资助者提供的所有申请书或者指导纲领都是关于研究的一些未成文的、未言明的假设以及理解研究的方式（Cheek，2005，p.394）。如果我们发现很难使质性研究适应资助申请的要求或者这位资助者没有资助质性研究的记录，那么这就强烈地暗示我们，资助者在制订资助规划时，可能不会考虑质性研究。这至少告诉我们应该更多地了解资助者关于质性研究的倾向观点。

在这个方面，审核申请书和评审程序的专门小组成员自身的情况能够给我们提供进一步有用的信息。评审小组成员具备质性研究中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吗？如果具备的话，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指评审小组成员中有丰富经验的质性研究者或者是参加过质性研究的短时会议，非常熟悉质性研究的人——他们将这些孤立的事实当作黄金准则（Morse，2003a，p.740）。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评审小组有没有可能向外界的评审专家征询意见以应对超出他们共同的专业知识范围的申请呢？如果评审委员会成员都没有质性研究专业知识，标准评审程序也没有将小组外部的意见考虑在内，那么这可能预示着申请议案的失败。如果征询了外界专家的意见，那么专家的意见是如何被征询的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专门小组寻求专业知识协助的方式经常也是非常独特的（Morse，2003a）。

有时我在心中也会权衡一下是否要接受外来的专家意见，尽管这可能会对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我一直在拨款评审小组担任代表，我们在进行评审时采用百分制，0.5 分或者更少的分数差距就会决定哪些申请被资助、哪些不被资助。因此，每一个专门小组成员的分数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只有一位成员明确或者投票中支持质性研究，那么成员给出的分数实际上就会使得这样的申请在资助竞争中处于无竞争力的地位，成功的概率会低于 20%。采用平均分的方式计算某一质性研究所得到的分数，将不利于质性研究获得资助。

在考虑完以上的实践问题和资助者所遵循的程序之后，如果研究者有机会获得质性研究的资助，那么在寻求资助中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亲自接触资助机构。接触资助机构的目的不同，采取的方式也不同，具体的做法取决于赞助者分配资助的方式。如果资助的分配是按照年度轮回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在这些资助轮回期以外的时间寻求资助就没有意义了。另外，这可能还会给别人留下不良的印象，认为你还不了解资助者的资助操作方式之类最基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去与负责资助筛选方面问题的管理者或公务人员交谈。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资助分配程序方面的信息，也是为了使负责申请的行政人员了解研究者和他本人的想法。这会使得他们记住你的名字，同时也体现出你对于你自己的想法以及在与他们建立工作伙伴关系方面的认真态度。如果一位潜在的赞助者还没有确定资助的轮回日期但是资助申请全年开放或者研究者并

不完全清楚地了解如何申请资助,那么此时非常重要的就是找到该组织中合适的人员来谈论你的研究想法和你的为人。当然这样做有些困难,因此在最终找到合适的人交谈之前,在尝试着进入该组织并要建立不同的联系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礼貌地坚持下去。

如果成功地获得了与资助机构中关键人物见面的机会,你一定要做充足的准备从而显示出对这次会面的重视,同时在见面时要充分地阐述你的研究想法。尝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思考你的研究。他们为什么应该资助你?你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要做到这些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你要清楚并且准确地传达你要表达的信息以及你要推销的研究。在会面之前最好提供一页纸的概念性文件给他们,在文件中要陈述你的研究思想、所需的支持类型和任何已经完成的准备工作。这份概念性文件还应包含你自己以及研究团队中其他成员的信息,这是因为跟踪记录是资助者所要考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此外,你一定要避免提交一份格式标准的、多页的以及目的多样的让人感觉可读可不读的简历。修改你的简历,以条目式跟踪记录的方式突出你的研究经历,向资助者展示你的研究经验和专业知识能确保在预算内准时完成研究(Cheek,2005)。如果你没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研究开始之前可以加入一个有丰富经验的研究团队。然后你在与团队成员一起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学习逐步建立你自己的学习成果跟踪记录。另一个建立跟踪记录的策略就是先寻找一些面向经验不足且处于早期职业生涯阶段研究者的资助机会,一些经验不足的研究者可以获得少量的研究资助,这有助于他们解决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如何在没有简历清单记录的情况下获得简历清单记录!

寻求资助:签约做一项研究

当研究者试图寻找质性研究的潜在资助时,一个不同的策略就是响应政府或者其他组织的呼吁和宣传,这些组织和政府正好也在寻找资助对象来做一项特定的研究。这种特殊情况可能涉及任何或所有的实质性的研究重点,以及研究开展、写作和递交结果的时间框架。从不同程度上来说,研究者有机会寻找支撑这种研究的方法和中心。我们经常可以在报纸的投标版中找到为这种研究资助所做的广告。资助者要求感兴趣的研究者或者组织从商业的层面上提出一个议案来拟订具体的研究计划,资助者通过研究招标,购买进行研究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时间,这些知识和时间是他们所缺乏的。例如,资助者进行投标可能是为了寻找能够开展一定数量的研讨会或者访谈的研究者,从而获得某些预先设定的研究目标。在这里,我强调的重点就是研究者如何能够使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研究与一个特定的、有时间限定的资助机会相匹配。

当资助者在设计一项研究投标时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至少需要花费多少钱才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专业知识和研究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本最低

的研究方案就必然能取得成功。现在资助者关心的是从投入中得到的价值，这意味着不仅仅要满足研究中的高标准，而且还要考虑需要多少钱才能达到这些标准（Cheek，2005，p.394）。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预算在整个资助申请过程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同时还意味着为这个项目预设的资助最高额度可能会使质性研究很难达到所要求的研究目标。一般情况下资助者很容易低估一项质性研究项目所需要的时间和相关的研究成本。另外，他们也很容易掉入自己所设的陷阱之中，即通过低估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和项目成本或者过多地要求研究者在所要求的研究时间内交付研究内容来使自己在投标谈判中更具有竞争力。在研究项目的成本核算以及如何确保研究者所承诺的都可以实现这两方面，资助者可以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和业务开发办公室获得更多的帮助。这些办事处都有其资助的范围，并且也期待进行投标研究。

投标式研究的特点就是研究过程的每一部分时间都比较短。有可能是仅仅几天来准备一个申请，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完成了研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质性研究都适合这种短时间节奏的要求。如果资助者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临时报告，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有时研究者很难甚至是不可能以一种零散的方式将整个研究"切"成小片来递交临时报告。研究者将时间和精力投入这样的临时报告会引起很多挫折和失败，因为这会转移研究者在整个研究中的时间和注意力。强调时间限制的研究结果所产生的一个危险就是它带来了一些非理论性的、非常肤浅和浅薄的质性研究设计和结果。莫尔斯（Morse，2003b，p.846）指出，如果质性研究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思考，那么它就会"走向终止或者半途而废"。她的评论可以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短时间内就递交的研究结果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研究设计失去了支撑它们自身的理论基础，变成了研究的技巧或一系列研究程序。

对于一些质性研究者来说，多年以来，从合同式研究获得资助已经成为每天所要面临的现实。对于其他质性研究者来说，由于许多国家政府和资助者不断减少在研究者生成项目（researcher-generated project）上的财政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投标式研究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质性研究者应该深刻地思考投标方面的问题，例如，他们准备放弃或者能够容忍自己放弃多少对研究设计的控制。他们如何将从快速资本主义文本（fast capitalist texts）中出现的紧张局面融入他们的质性研究中，例如，将研究产品转化成可递交的形式，将研究时间表转化为里程碑？这不仅仅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它所传达的信息就是研究可以被简化为或者被当作一系列的任务。潜在的意思就是一旦确定了任务，那么就可以对研究团队的工作和研究质量进行评估，不管他们是否已经完成了任务。

例如，我作为研究团队的一员参与过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合同式研究（Cheek et al.，2002）。这项研究合同中有一部分内容概括了研究团队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那些衡量任务成功的工作标准。在合同的标准和最佳实践部分中规定的一个任务是获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合同中所确认的相关工作指标是

签署同意书(signed consent forms)。获得所有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实际上成为签署同意书的代名词。对于知情同意和这种同意的获得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意义存在一系列的争议和复杂问题,我们的研究团队对此有着不同的观点。然而一旦我们签署了这份合同,就要通过递交资助者在签署同意书方面要求的内容以及确保在研究中充分地考虑同意和伦理因素,来解决潜在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与资助者讨论过这种紧张和冲突。为什么?也许回顾之前的内容可以发现,我们在进行研究交易时倾向于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既要满足资助主体所施加的要求,同时,我们也要感觉在进行研究时没有对要求有所妥协。这项研究涉及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领域,研究结果将会被政府作为在此领域中行动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做这项研究,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面临获取参与者的知情同意和得到知情同意表格的这些问题。

回答这些两难问题并不容易,它们没有对错之分,关键问题在于,当我们打算向资助者出售思想或时间的时候,我们准备放弃或者交易什么以及我们不准备放弃什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作为研究者,我们一直在出售一些东西。出售问题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然而,我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仍然一直在反思的是我试图出售什么,我将如何出售它,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出售。所有的质性研究者都可能会问他们自己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我们将要出售一个研究问题、我们的时间、专业知识,还是所有这一切?以出售我们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来开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别人的研究时,我们会感觉如何?在开展那种研究时我们准备交易什么或者不准备交易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是本章中一个关键的内容。

寻求资助:在递交资助申请前的考虑

然而,即使我们在寻求质性研究资助时已经使用了以上的一些或者所有策略,在申请资助前仍然有许多功课要做。在找到潜在资助者后的兴奋之余,或者面临提交研究议案和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临近的压力,研究者很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获得了资助,资助者的期望是什么。例如,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研究过程之中?他们希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整个研究过程?他们期望获得全部数据还是一部分?他们想让他们在研究团队和团队会议中的代表或者组织顾问委员会来指导研究的形式和方向吗?这会如何影响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资助者和参与者的关系?

尝试写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方案与申请资助同样关键。在由于找到了研究资助来源而被冲昏头脑之前,重要的是要记住申请或者接受任何来源的资助都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活动(Cheek, 2005)。它涉及研究者与资助组织和他们的代理人所签署的合同协定,这些代理人包括负责确保研究完整性和及时性的管理者。研究者如果刚开始只关注如何获得资助然后再考虑这些细节将是一个很糟糕并且危险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资助者和研究者各自的期望不同,如果

研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得到资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谈论这些并不是描绘一幅充满厄运和沮丧的画面,只是要警示研究者应该仔细考虑你要缔结的合同和合作关系,并且要确保它是你愿意进行的。

此类协定的范围和正式性会因资助者的不同而不同,并不是所有的资助者都期望参与到研究中或者干涉研究的开展。然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形式,在接受资助之前,研究者和资助者都应该讨论、协商并且记录下研究内容和如何进行研究方面的假设。这包括可以谈论哪些研究内容以及由谁来谈论。由于合同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书写也不能出版相关的研究内容,因此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质性研究者都感到不舒服(Cheek,2005)。对于研究者而言十分关键的是要与资助者商讨如何报告研究结果,什么时候和在哪里报告;怎么使用研究数据以及谁拥有这些数据;研究者在学术文献中可以发表什么内容。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是建构研究者与资助者之间积极工作关系的核心,也体现了双方的相互尊重。还要记住这种开放式沟通应该贯穿于整个研究计划始末,如果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或者由于某些原因,研究计划的一些方面,例如研究的时间表,发生了变化,这种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

同样重要的是,在研究团队内部应该也要讨论和协商这些问题,以便于他们在与资助者讨论前能够达成内部一致。然而,由于团队内部经常会出现不一致意见,因此这种讨论和协商并不容易实现。确定无疑的是,我们不能忽视这些不一致意见。另外,团队还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例如,个体成员可以获得哪些支持;在研究的时间框架和最后的报告中个体应负的责任;见面的频次;如何解决团队成员之间的不一致;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中谁负责联系资助者。在整个项目中这些问题对于团队功能的正常发挥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研究过程中深思熟虑这些问题会给资助者带来信心。如果资助者知道研究工作的分工情况,并且对研究内容的清晰性和连贯程度感到满意,那么他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简单。

在资助者与研究者所缔结的协定中研究的参与者应该知道什么,在这一点上资助者与研究者应该达成共识。质性研究是建立在研究参与者与开展研究的这些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任的中心就是坦率和真诚,包括谁资助这项研究,在研究者与资助者所缔结的合同中参与者可以知道或者不能知道研究和研究结果的哪些内容。此外,研究者还应准确地告诉参与者谁将获取研究数据以及如何保证参与者的匿名权。这对于减轻那些对资助者有依赖关系的参与者的担忧尤为重要,例如,资助者的客户、供应商或者雇员。这既是基于伦理因素,也是基于实践因素的考虑。

因此,寻找质性研究的资助不仅仅是寻找资助来源,我们还要考虑这种寻找过程和可能获得的资助是如何影响研究和研究者的。在所有的资助协议中,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放弃他们在项目本身以及项目进行方式上的一些自由。决定放弃多少自由是质性研究者寻找资助和研究市场中必须经历的一步(Check,2008),在获得和接受资助以及开展研究之前,研究者必须将如何走好这一步作为寻求潜在资助来源的一部分。

吸引资助的书面文件:撰写寻求资助的议案

做完所有这些并且也已经找到了资助研究的潜在来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起草一份寻求研究资助的议案。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质性研究设计的内容或者如何为质性研究写议案,关于这方面讨论的经典例子已经有很多了(例如 Carey & Swanson,2003; Morse, 2003b; Penrod,2003)。我在这里关注的焦点是揭示资助议案写作过程中的紧张与冲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读者对于优秀研究甚至普通研究构成要素的多样化理解所引起的。简单地说,就是你如何在为多方利益群体写一份议案的同时,还要在研究目的和方式上保留你想做的研究项目。修改和调整研究思想以适应特定的读者是资助写作技巧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当然,这一技能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学习到。

撰写资助议案时,我们必须与资助者的指导准则保持一致,同时也要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例如负责研究实施前批准工作的伦理委员会。因此,每一个资助申请,甚至是同一个项目,都会随着它所要面对的读者的特点和需要而改变。精心制作一份通用的议案递交给不同的资助者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原因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有些专家不止在一个评审小组任职,可能在此之前已经看到过你的议案,会让他们感觉你的议案没有目标针对性,并且是可多次回收利用的;第二,为一位潜在的赞助者而写的议案不一定适合为了特定的读者,即评审委员而写的议案,因为这些读者可能会在议案的形式以及它所包含的细节方面有自己的假设和预期。这些都会随着资助项目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正如我过去所强调的,对于研究者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他们的读者以及这些读者的期望。有时,评审委员可能会在得知研究已经获得资助之后,在议案中所期望的细节方面以及呈现的形式风格方面提供一些有益的指导。

遵守指导准则是撰写申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最基本的层次上看,这意味着研究者应该在整个申请中都要符合文字或者页码限制。此外,研究者还要遵循指导准则中所要求的其他领域的规定。例如,如果指导准则中规定,一份申请应该包括 100 字左右的总结,可以使用 10 号字体或者更大号的字体但不能超过 10 页,同时还要概括出研究目标、结果、宣传策略、当前研究的重要性和新颖性、方法、伦理因素、预算和预算理由,并且要提供一份关于研究者跟踪记录的陈述。要做到这些,一个好的策略就是将指导准则中所确定的每一个领域作为申请书不同部分的标题来使用,这会使得你的写作更有组织性和结构性,同时也使得这些不同领域的要求在你的写作中得以充分的体现。评委给申请书打分的时候,他们会在每一个领域给予一定的分数,所以让评委一目了然地看到你如何设计各个部分是十分重要的。

一份好的研究议案必须是清晰而简洁的。在申请中,你应该使用评审小组能够理解和可阅读的语言,因为这些评审委员可能并不在你的专业知识领域内

工作或者研究。充满专业术语和行话的申请不会给评委留下良好的印象。在议案中,你必须清晰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保证所写的每一个方面都与研究问题有关。例如,研究方法应该清晰地描述它们如何与研究目标联系起来。任何的文献回顾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层次上,而是应该能够回答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在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内已经研究过了什么,哪些正在研究等方面的问题。你应该表明所提出的研究是如何适应资助者的优先考虑和资助范围的。你应该让这些联系贯穿于整个讨论和文本当中,不要让评审委员去做这些工作或者期望他们去做,因为他们有很多申请要看,没有时间做这些。作为一个研究者,永远不要低估一份申请当中的常规工作与行政工作,例如预算。

当我们在撰写议案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记住,你是在向资助者出售你的研究和你的专业知识,因此陈述研究者的跟踪记录相当重要。对于竞争资助的研究者而言,跟踪记录的结果是确保研究结果发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保证研究在获得资助方面更有竞争力。离开一份有力的出版物跟踪记录,研究者很难赢得资助。评审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据收集和计算方便的权宜之计考虑,才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定量指标评估出版跟踪记录(publication track records),当前使用最普遍的就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尽管影响因子与某一特定期刊的影响有关(Cheek,Garnham,& Quan,2006),但现在影响因子越来越多地与资助者和大学管理者所常说的"影响(impact)"交换使用。这种做法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许多资助项目中,影响因子常常作为评估研究工作的质量和影响来使用。因此,申请资助的指导准则要求研究者在出版跟踪记录上列出他们发表文章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其错误假设就是影响因子越高,申请者所发表的文章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因此,对一种期刊影响力的测量就转化成了对某一篇文章影响力的测量,接下来这又转化成了对于某一研究者的水平和影响力的测量。

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并且传递了关于在哪里和为什么出版的层层信息。在这之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既然在评估资助申请时越来越强调基于可测量的、影响因子驱动的出版跟踪记录,那么质性研究者仅仅在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吗?当向不熟悉质性研究的资助主体呈现他们的出版跟踪记录时,质性研究者如何展示某些出版物的影响?例如这本手册,它确实没有影响因子。到哪里去发表他们的研究以及为什么发表是所有的质性研究者都必须走的另一条路线。

撰写寻求资助的方法:取得平衡并适度折中

在为获得资助所写的文件中,我们还要决定如何为特定的读者撰写我们的方法。我们不仅要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还要决定我们是否会涉及方法的具体细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根据我过去申请资助写作的经验列举三个例子,以此来探究我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第一个问题是我将样本量写入质性研

究议案,以满足研究项目所需的详细而合理的预算,这个案例展示了对界限的处理和做出的折中与权衡。

案例一:决定在样本大小方面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

拟订一个深思熟虑的、合理的预算是撰写资助研究议案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对于提供资助的人来说,询问研究项目是否合理地使用他们的资助以及要求对于资助数量的理由进行陈述,都是符合情理的。研究者也应该让资助者知道他们为什么需要这种类型的资助以及资助的数量。通常情况下在谈到为什么申请资助时都需要进一步详细地陈述预算方面的理由和精确度。例如,下面的内容摘自一份资助议案的预算理由:

> 需要一台专业的信息转换器来转换录音访谈信息,估计一个小时的录音数据需要三个小时去转录。我们有 50 个访谈,每个至少一小时,因此录音访谈最少有 50 个小时。考虑一些访谈时间可能会长一些,需要额外加上 10 个小时,因此,60 个小时的录音×每个录音转录时所需的 3 个小时 = 180 个转录小时,每小时 17.50 美元,180×17.50 美元 = 3 150 美元。

从这个理由陈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研究中与访谈有关的成本之一就是转录访谈数据的成本。这部分预算的根据是用访谈的数量乘以每次访谈的转录成本,从而得出最终的花费数字。

尽管这一方面代表了一份预算及其相关的陈述,然而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在得出这些数字上所做出的折中。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研究进行之前就得到关于访谈数量的精确数字。为了与质性研究的归纳法保持一致,我们往往不能准确地确定在研究中我们会访谈多少参与者。然而,计算每个访谈所需要的成本,例如访谈转录费用,是资助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项目预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访谈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要进行多少访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预算并论证它呢?毕竟,评审委员会期望我们能够提供合理的预算。

尽管很不情愿,我们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决定在议案中预先拟订访谈数量。我们先拟订了 50 位访谈的样本量,这一数字主要是根据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以往文献中所使用的样本量确定的。我们在议案中写道,我们预先设定 50 次访谈(25 个老人及其 25 个家庭成员)是根据过往的研究文献所确定的。最终,我们幸运地获得了项目资助,并且在完成研究之后我们还发表了研究结果,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阐述了我们所使用的样本量(Cheek & Ballantyne, 2001)。后来我们为研究申请资助时,这个研究还涉及访谈老人及其家庭成员。写这份议案时,我们引用了第一次发表的研究成果,在样本量方面我们写道,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预期对 25 个老人及其 25 个家人的访谈可以满足研究的需要。最终我们顺利地获得了这项研究资助,实施研究,并发表研究结果。后来我们做了更多的研究,研究结果也都发表了(Cheek, Ballantyne, Byers, & Quan, 2007; Cheek,

Ballantyne, Gilham, et al., 2006; Cheek, Ballantyne, Roder-Allen, & Jones, 2005)。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我们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了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即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具体说明所需要进行的访谈数量。我们引用了我们自己过去的文章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折中和权衡。如果我们没有给出所要进行的访谈数量,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资助的。然而,我们确实给出了一个数字,那么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可能就是我们能够使质性研究设计中那些不确定性变得确定。我们也可以尝试控制我们所做出的折中和权衡,例如,我们可以在议案中使用一些词语,如"根据预期",25个访谈会满足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在研究报告中写上为什么我们选择的对老人或他们家人的访谈数量不是25个,而是多于或少于25个(Cheek & Ballantyne, 2001)。另外我们发现,在这些研究中,从每组中访谈25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已经影响了实践,并且在试图解决这些群体中的社会公平和人权问题(Cheek, 2010a, 2010b; Cheek, Corlis, & Radoslovich, 2009)。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决定做这些时,这是一条安全线,当然毫无疑问的是有的读者会认为我们或多或少推销了自己以争取获得资助。

莫尔斯(Morse, 2003a)也向我们分享了她在需要具体说明样本量以计划预算时所做出的权衡和折中方面的反思。她进行反思主要是由于她有过被评审委员会拒绝资助申请的经历。她解释说在撰写议案过程中,为了与质性研究的原则保持一致以支持她的研究设计,"抽样工作一直在进行直到达到饱和状态"(Morse, 2003a, p.740)。然而她依然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如果想形成一个预算就需要一个数字。莫尔斯所选择的数字及其依据主要是根据她过去做质性研究的经验来确定的。"经验告诉我你必须计算一些数字作为所需要的资金数量;经验还告诉我缩小样本而不是扩大样本是很愚蠢的。"(p.740)然而,在这个事例中,通过折中和权衡所给出的数字却成为了一个问题。莫尔斯说:"这个数字是多少并不重要,我的错误在于给出了一个实际数字。评审委员会告诉我,在质性研究中样本量是不可预测的。"(p.740)尽管这个观点有些价值,但在实际中这样做会将设计的复杂问题还原为被剥离了理论基础的简单规则(rules),同时也使得我多年的质性研究经验不再发挥作用。实际上这还使得获得质性研究资助变得更加不可能,因为如果在研究中没有对于样本量的引导,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开展这项研究的预算。如果没有形成预算,那应该申请多少资助?

莫尔斯和我自己的经验都强调在撰写申请时质性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是,既要写出一份有竞争力的议案,同时又不采取妥协折中等权宜之计。接受资助的研究既是政治活动也是实践活动,因此如何写、写什么、不写什么,这些不仅仅依据指导准则作出决策,实际上他们决定了在撰写议案时捍卫什么与放弃什么。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方法论上,质性研究的哪些内容是可以/可能/必须通过修改以满足一些读者(例如资助者)的要求呢?这是所有质性研究者共同面临

的问题。我将在以下部分使用为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写作的例子,进一步从做决定和选择路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

案例二:书写伦理或"使方法符合伦理"而获取资助

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把为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准备的书面文件作为获得资助方法的讨论部分多少会有些意外。但是,事实在于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与正式的评审小组一样,在决定一个研究项目是否能获得资助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大部分资助者都要求在给予资助之前,研究项目能够被正式成立的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批准。尽管并不是每一位资助者都要求这种批准,但在一些地区,例如在澳大利亚,大学研究员在他们的研究进行之前必须得到相关的大学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因此对于质性研究而言,获得资助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研究伦理性的正式评审过程。

从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质性研究者都会支持这种做法,然而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角色和功能与质性研究和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与冲突,这种张力与冲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明显增加,并且随着我们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表现得愈加明显。许多紧张的矛盾来自研究中伦理问题的分歧,这些问题有些是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有些不是。这尤其涉及在证据的政治性背景下有关方法的问题,这种证据的政治性包含了对研究证据构成要素的狭隘理解。坎内拉和林肯以其独特的视角探究了这些紧张矛盾(Lincoln & Cannella,2007;也参见本手册第 5 章),他们关注的是在实际中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是提供方法论上的建议还是伦理上的建议。

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认为,他们的职责包含阻止那些因研究设计比较差而不能提供任何有意义或者有用信息的研究(Lacey,1998)。因此,研究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首次出现于医学和科学领域之中,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对有问题的医学实践做出的反应。医学和科学的方法与传统更加符合传统质性研究的要求(Lacey,1998)及对研究的理解(Lacey,1998)。由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拟定的指导准则往往能够反映这种思考研究的方式。

这对于我们写作方法部分有什么意义呢?一些质性研究者在过去有过被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阻碍甚至否决研究的经历,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不是一些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成员所期望的实验性的、以演绎为基础的研究(Denzin & Giardina,2007b; Lincoln & Cannella,2002; Lincoln & Tierney,2002)。这种研究从研究范式上来讲是不符合伦理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有些缓和,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逐渐认识到质性研究也是一种合理的研究形式,然而紧张和冲突仍然存在。例如,质性研究者发现,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所要求的一些信息在以归纳为基础的研究中是很难提供的,如要求研究者详细说明在访谈过程中每一个访谈问题的确切表述,或者要求说明样本量的确切数字,这又一次引出了我们过去谈论的在构建研究预算时说明样本量的问题。此外,当所需的访谈对

象多于第一次预期时,也会让质性研究者感到挫折。

紧张与冲突有时还会来自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之间。如果质性研究是在几个不同的地点进行,例如几个医院,每个地点都有自己的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并且某一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不接受另一个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批准,那么质性研究者就会发现对于同一个研究他们能获得一些委员会的批准,却不能获得其他委员会的批准。这会产生很多问题,并且由于研究不能按照被资助的申请要求来进行,也会危及所接受的资助。如果将时间花费在协调一个或多个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上,这将使得投标与合同研究时间相对较短的研究更为紧迫,导致研究者在投标竞争中没有竞争力。正如前面所指出的(Cheek,2005),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决定研究是否能够获得资助甚至推进方面,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比资助者有更大的权力。有时是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成员而不是由资助者组成的同行评审小组决定最终采取的方法,这其中包括国家层面的,所谓的"金星"级别的同行评审资助项目计划。

面对这些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也许关键在于以某种形式确保两个问题的讨论能持续进行下去,即林肯和坎内拉(Lincoln & Cannella,2007)指出的伦理和质性研究的问题。我们首先提到的是伦理的日益官僚化的影响以及相伴出现的对研究的日益严格管理的问题。这种讨论主要是关于我们如何掌控这种现实,即我们必须将研究提交给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而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可能并不支持或并不熟悉质性研究。在本章关于寻找资助的部分中,我谈论了很多尝试理解资助者思考方式的问题,以使我们能够了解资助者的想法,尽管不一定要接受,这同样适合于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主席讨论你的项目。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以前的申请副本,以便从它们的写作风格和深度中受益。你应该从你的研究及其方法方面入手,不断反思你准备放弃什么和保留什么,最终使你的研究通过伦理审查。

然而,如果仅仅关注如何使研究通过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审查,那么这就等于将伦理检查视作开展研究的一种工具和权宜之计。正如林肯和坎内拉(Lincoln & Cannella, 2007)提醒我们的,还有另一个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讨论,即从研究的角度看伦理是什么以及可能是什么的问题,它还涉及建造我们的教学空间、研究的实施以及我们塑造研究伦理和研究实践的培训(Lincoln & Cannella,2007; Schwandt,2007)。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并不强调控制伦理过程的方法,而是更多地讨论伦理问题的原因。我们也不会简单地论述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在一些问题上日益增多的干涉的消极影响,例如更多地强调方法论而不是伦理问题,我们是可以进行积极和建设性讨论的。一直在反思伦理官僚化问题的学者赫德里提醒我们,在这些限制之下仍有可能进行持续的、能动性的反思,因为有限的视野并不能抑制洞察力的深度和丰富性(Hurdley,2010,p.518)。

案例三:混合方法——为设计而写还是为资助而写

案例三主要探究资助写作方法问题中的紧张和冲突,集中于讨论方法的选

择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探讨质性研究领域中混合研究的定义,并且出现了相关的期刊、书籍(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 Greene, 2007; Hesse-Biber, 2010; Morse & Niehaus,2009; Teddlie & Tashakkori,2009)和手册(Tashakkori & Teddlie,2003)研究这个问题。混合方法的提倡者认为这种研究设计能够增加分析问题的深度,并且能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尽管如此,但对于我来说,混合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还是很容易被简化为一种思考技巧和使用技巧,为资助而进行的写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通过这些我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要表达这个意思呢?本章其他部分的内容将解答这些问题。

尽管混合研究设计越来越重要,并且不断流行开来,然而我们在定义一些有争议的概念时仍然存在困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强调混合什么,如何混合以及什么时候写或者讨论混合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混合方法指在同一研究、项目或者研究序列中质性和量化方法的使用(Creswell,2003; Hesse-Biber,2010; Morse & Niehaus,2009)。然而,有时它也指同一范式下两种方法的使用,尽管这种"混合"的方法在研究中并不是同等重要的。作为对传统混合方法中量化方式优于质性方式的回应,海希-比伯在她最近的书中提出了关于混合方法的四个目标,其中两个目标分别是确立质性研究方法在混合方法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向研究者提供"对于质性混合方法的观点和实践更加详细的理解"(Hesse-Biber,2010,p.9)。

莫尔斯和聂豪斯(Morse & Niehaus, 2009)对混合方法提出定义,这个定义尝试将混合研究设计中强调的多样性纳入其中。他们认为,"混合方法设计是一个科学严谨的研究计划,它由归纳或演绎性质的理论所驱动,这种方法设计包括质性和量化的核心成分以及补充要素"(2009,p.14)。这个定义是从能够产生理论影响的综合研究设计的角度来强调混合方法的,这与混合方法研究领域中关注混合方法设计建构的"以方法为中心"的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Hesse-Biber,2010,p.vi)。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会儿我们还要回过头来再讨论它,因为它对我们使用混合方法来思考资助申请的写作会产生一些影响。

近来对混合研究的关注越来越多,有趣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并不是新的,它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很多年了,包括在质性研究中。例如,思考一下民族志,它涉及观察、访谈和其他收集数据的方式(Morse & Niehaus,2009)。混合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这种方式的重要程度,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于莫尔斯和聂豪斯(Morse & Niehaus, 2009)、海希-比伯(Hesse-Biber, 2010)、克雷斯韦尔和普拉诺·克拉克(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默滕斯(Mertens,2005)以及其他人的作品来不断地更新混合方法领域的知识。但是这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对混合方法的强烈兴趣,也不能说明许多学生和有经验的研究者为何迫切地参加有关混合研究的课程和研讨会。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于,研究市场的政治和实践是研究者对混合方法兴趣不断

提升的原因。

在2004年接受访谈时(访谈的稿本可见:Hesse-Biber & Leavy,2006,p.335),莫尔斯在被问到如何理解"多样化方法"的演变发展时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她说:"我认为多样化方法将陷入混乱之中,但最终会自己解决。"在被问及她是什么意思时,她的回答是:"我认为为了获得资助,使用混合方法的压力会淹没或者优先于质性研究的目标。我认为资助机构会说他们资助质性研究实际意味着他们是要资助混合方法,这仍然使得质性研究处于劣势地位。"(p.335)在这里莫尔斯指出了资助写作影响方法选择的方式以及我们选择方法写作的方式。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当我申请一个关注量化研究的资助时,(小部分)质性研究的成分要素会增强该资助的竞争力。这种看法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在过去的资助轮回期中使用质性和量化方法的混合研究更容易获得成功,其假设是不同的方法混合赋予了议案更大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研究设计的理论性及其方法混合的一致性。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会使质性研究者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尽管由于一些原因,质性分析被作为事后思考而加入量化驱动的项目中,然而在研究中加入质性的成分也可能会改进研究的结果;作为研究团队的一员加入研究之中,可能会提高研究者对于质性研究的理解。加入一个阵容强大的团队还有可能帮助质性研究者建构跟踪记录。另一方面,接受这样一种邀请也会冒一些风险,即质性研究有可能会被认为是由剥离了理论基础的方法所构成的。类似地,将混合方法设计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长久使用,会使得我们在思考时强调不同方法的使用,而不是在一个整体连贯的和理论驱动的设计中使用不同方法。如果这样做,会将混合方法设计降低成一种技巧而不是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式。正如莫尔斯和聂豪斯(Morse & Niehaus, 2009)以及海希-比伯(Hesse-Biber,2010)所强调的,混合方法是一种理论驱动下的研究设计,而不是简单地在研究中混合方法。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质性研究者对于以特定方式进行资助方法写作中动机的反思,这种反思的出发点就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和挑衅性的问题,即当我们写资助申请时,选择混合方法设计的理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解决问题呢,还是因为使用这种反对完全质性设计的方式更容易获得资助的机会呢?另一个出发点可能就是反思为什么在混合方法框架内的质性研究比起完全的质性研究更容易为资助者所接受。也许这是因为在一些资助者的观念中,混合方法能够在日益高涨的基于证据的实践运动中更好地适应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

同样地,也许正是由于许多资助者和资助评审小组成员更加熟悉混合研究方法。莫尔斯(Morse, 1991)提出的四种混合类型(QUAN→qual,QUAN+qual,QUAL→quan,QUAL+quan)似乎是科学"应该"有的样子。下面的摘要来自对混合方法内部一些策略的描述:"在顺序型(QUAL →quan)和同时性(QUAL + quan)三角验证的质和量的要素中,样本的选择必须是独立的"(Morse,1991,

p.122)。莫尔斯将记号、符号和箭头纳入复杂的数字中,直观地表示混合方法策略,这与表示科学和科学话语的传统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这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相似是否能消除资助者和其他人的疑虑,使他们相信研究是完善的并且方法也是可靠的,而不是这些符号所代表和传递的是什么。然而研究者所要做的折中与权衡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概念,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对这种方式的理解会变得混乱和模糊。

这并没有显示混合方法就不是质性研究中一个有价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不应该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从质性研究和资助的接触面上所存在的紧张、冲突与潜在的断裂方面来看,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天生就必然比任何其他的研究方法有更多的问题。相反,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当我们在为寻找资助写研究方法时,混合方法可以为我们在是否以此为卖点的选择问题上提供一个优秀的例子。混合研究设计并不是为了在资助者所关注的全部研究方法和设计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海希-比伯和利韦所言,在方法方面"多并不必然就更好"(Hesse-Biber & Leavy,2006,p.334),但是如果在方法选择上真的有灵丹妙药的话,那就是适合的设计与适合的原因相匹配,用以探索研究疑难或研究问题。

资助:在研究市场中转换和交易

在关于资助质性研究的政治和实践问题上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例如如何寻求资助,需要什么样的资助,我们如何思考这种资助的写作申请以及在实践中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讨论的各个方面,我们涉及了购买与出售研究的研究市场的概念。在这种研究市场中,对质性研究的资助并不局限于支持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资助是一种商品,是交易的单元。例如,作为个体的研究者能在他们研究成就的基础上,通过研究获得工作、晋升和长期聘用。研究机构也能在这个市场中进行交易,他们可以用机构的研究成果换取报酬,例如从政府那里获得研究基础资助以及市场中的竞争等级,接下来的讨论将使用研究市场中"转换和交易(wheeling and dealing)"的隐喻来组织结构,以此来进一步探究上面的观点。这是本章中在政治上最开放的一部分,它将我们关于资助质性研究的政治和实践方面讨论的焦点从微观层次的特定项目、资助者或方法转移到了宏观层次的社会背景。

西方国家的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处于上升趋势,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也在持续发展,但在经历 2008 年和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之后,许多国家政府都开始消减资助。结果,大部分大学和研究密集型组织机构被迫依靠"混合经济(mixed economies)",他们的资助一部分来自政府,其他的部分依赖于员工活动的收入。对于作为个体的员工来说,为缺乏资金的机构招徕收入成为必须要做的事,并且日益成为机构对员工的一种期望。员工实现这种目标的一种方式就是获得研究资助,它能够通过几种方式为机构带来收入。第一种方式是直

接来自所开展的研究所获得的利润。当合同式和投标研究本身令人很感兴趣而且具有吸引力时就采用这种方式。一般情况下,在这种研究资助中,研究者可能为了研究团队的时间和研究成本及经费向咨询市场收取费用,这与那些成本和经费受限的资助项目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那些资助项目中,如果研究者是大学工作人员,那么他们可能不会为研究者的时间付款。鉴于这些,大学、研究组织与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合同式和投标式研究资助。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

这些关于信息的信息与一个事实相关联,即研究收入是政府评估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研究表现的依据之一。在许多国家,为了将研究机构中研究者的研究问题与项目转化成测量集体研究机构的表现成就,会使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复杂的公式(Cheek,2006; Torrance,2006)。例如,在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十年已经出现了所谓的测量与确保研究质量方式的多个版本,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绩效问责(accountability)的审计驱动(audit-driven)概念基础之上的,以此来确保澳大利亚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研究能够达到政府、工业、商业和社区的优秀标准。在写本章的同时我加入了一个被称作澳大利亚卓越研究(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ERA)的研究项目。ERA 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和许多之前的研究一样,随着研究的进行会变得更加复杂,2010 年它有 12 个关键的文件列在 ERA 网站上(2010 年 7 月),包括一个 53 页的评估指导手册和 89 页的详细提交指导手册。ERA 项目中包含了评估研究表现的公式,澳大利亚政府将根据评估结果向高等教育机构发放报酬,排名最高的机构将获得大部分的报酬。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ERA 的评估结果将在机构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公开发布和出版,各机构之间要根据研究表现进行比较,在机构内部的各部门之间也要进行比较。评估名次表会被印制出来并且公布,在名次表中,根据公式决定的研究表现来展示机构的名次。在这些表中排名靠前的大学可以冠之以"顶级""最高"或者前八等澳大利亚研究型大学等名誉,从而在研究市场中推销自己。这种推销可以吸引那些希望与高水平并且有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建立联系的资助者,也可以用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接着,通过已完成的研究生项目和出版物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进而将研究收入、研究生完成的数量和出版物作为公式的一部分来进行评估从而产生更多的收入。通过这种方式,像 ERA 这样的项目不仅能够为研究带来回报,而且他们还能促进这种报酬的不断循环。研究市场中就是充满了这种层层复杂的关系。

但是还有更多的关于信息的信息。在研究市场中,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收入都是平等的。在这些评估、项目和公式中,不仅仅依靠资金的绝对数量,资金的来源也是很重要的,其影响就是产生一个复杂的资助分类体系。例如,在澳大利亚,在写本章内容的时候,我所获得的资助根据它的来源被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备受追捧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竞争性资助注册单(Australian Competitive Grant Register)中的资助(2010)。某一特定的大学或者作为个人的研究者所获得的澳大利亚竞争性基金(Australian Competitive Grants,ACG)的数量及其相

应的资金总额,对于机构和研究者而言已经成为衡量研究质量和研究活动的依据。

在这里我还有更多的信息。在澳大利亚,所有的资助中最令人自豪的是获得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 & MRC)与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的资助。从历史来看,这些资助项目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支持和威名。的确,研究机构有时会制作出自己相对的全国排名名次表,在表中会分别列出来自NH & MRC和 ARC 的资助数量以及资金总额。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明显,即这样做比他们在国家研究表现名次表的相对排名更加清晰,这种关于成就表现的选择性报告成为国家和国家研究市场中转换与交易的组成部分。在写本章的时候,悉尼大学的网站骄傲地吹嘘"从 2009 年开始悉尼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新的、同行审阅的、研究者驱动的研究项目的数量和资金方面获得了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和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两个一流的研究资助"。它还宣称"悉尼大学不仅在领导全国,而且从 2009 年开始,它通过从 NH & MRC 和 ARC 吸引资助,由此取得了资助金额的个人最好成绩"。这里是公开使用例如"一流"和"个人最好"等竞争性市场语言的。在这种研究市场中,资助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有价值并且能被计算的!

这种想方设法的排名,以及将研究资金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资金,其后果会影响到个体层面的研究者。研究者所得到的资金数量以及资金的来源成为评估个体研究者研究成就与影响力的指标,至于这些资金用来干什么,甚至它们是否真的需要并不是关注的要点。例如在一些研究领域中,资金可能主要用于购买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资助的数量实际上就成为衡量设备的花费以及在特定的机构中研究质量的标准。当前越来越强调资助要为研究机构提供额外的收入,这对研究者所产生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没有这种研究收入的研究者被认为不如能够吸引大量资金的研究者那样有研究生产力。一些研究者的个人履历上记载着研究者个人通过一周工作三十多个小时的有偿劳动来获得研究资助,然而关于这种个人履历的书面文件与那种记录研究者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吸引了几十万美元的资助相比,二者在当前市场驱动的研究背景下是没有共同点的。这对另一些质性研究者区分不同类型研究资助的回报形式所产生的一个影响是,获得某种特定类型的资助已经成为研究本身的目的,而不是支持研究的手段与工具。这其中的危险就在于,对于高度珍贵的资助来源的要求和期望会影响和颠覆研究设计,例如,如果一个所谓的"金星"级别的研究项目不利于质性研究资助或者特别是某些其他类型的质性研究,质性研究者将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的位置?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这种资助来源,还是放弃我们的质性研究而采纳资助者所支持的方法和技巧?如果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的研究计划,那么我们会努力使我们的质性研究看起来更符合这些资助者和他们的决策小组所期望的研究类型吗?我们准备做出多大的调整以使我们的研究适应资助者的要求?我们是应该选择退出还是选择进入研究市场和它所开拓的空间?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研究者在选择退出和进入的问题上会产生一种矛盾心理。选择进入，从而获得研究市场的认可，这似乎提供了促进和改进质性研究的机会。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外部的资助可以作为在奖励资助计划的平台中获取机构的权力和位置，质性研究能够从内部工作转向尝试改变与质性研究相对立的工作。更有甚者，在许多机构中，吸引这种类型的"奖励性"资助会得到基础设施资金的"回报"，以及获得建设核心研究团队和发展研究中心等非现金支持。这样做可以为不同形式的质性研究提供资助机会，而它们原本可能吸引不了资金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从而有助于抵制质性研究的潜在消减和被同质化为外部资助机构接受的形式。因此，尽管参与研究市场不一定会推进质性研究，但是这仍是可能的，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尽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在我心中徘徊的问题是：这是通过自我反对来抵制过度的研究市场的方式？或是某种程度上的推销？在无意间创造出质性研究者的双重结构和新的二元对立，在研究市场中获得高额奖励的"拥有者"成为主流和重要的一类，而其他的"未拥有者"则完全依附于他们？

邓津和林肯提醒我们，"当面对具有政治要求和风险的未来时，我们都陷入与过去相对立的工作中。"（Denzin & Lincoln，2005.p.xv）对于我而言，这种陷入经常导致劳累和挫败。例如，我很好奇研究生产力的下一个改革或审计在哪里，它会采用何种形式？我在思考自己已经并且将继续花费多少时间用于不断地为研究的影响、质量和产出提供证据，而只要政府一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跟着变化了。这十年来，这些审查和复核彼此交织和凝结，它们是同一套旧修辞的新版本，是思想的重复，在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研究和证据假设的基础上沉淀了一层又一层。

在所有这一切中，对于我而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批判和在研究市场中生存下来之间存在张力，而对二者关系的驾驭并不是简单或轻松的（Cheek，2007）。我时常会质询自己申请某种外部资助的动机，我是为了做一个我渴望从事的项目，还是我需要外部资助为我在研究市场的记分卡上加分？如果二者兼有，那么哪个更重要一些？在研究市场中转换和交易，并享受能够"购买"终身教职、晋升和研究基础的权力，我是否不得不做一些我所不耻的事情？我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是否变成斯特劳纳奇和托兰希（Stronach & Torrance，1995）在将近20年前所指的那种毫无保留的激进？如果是的话，我是否可以被指控为在本章说了太多我做的事情，而很少涉及那些我不会说的（Cheek，2010a）？

像许多其他质性研究者一样，我仍在寻求某种中立立场，我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中立立场是怎样的，因为我猜想它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追求的中立立场是以我自己而非其他人的方式参与资助质性研究和研究市场的政治和实践，而且这种参与是我自己的选择，不是被逼无奈，也不是由于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Cheek，2008）。

谢幕:作为持续对话的资助政治和实践

亲爱的读者们,该如何做总结呢?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将一个需要拓展的讨论作为最后一部分,例如本章的一段总结。然而此时,"总结"这个词看起来并不恰当,也不适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以及有待讨论的内容。本章至多希望成为"一段持续讨论中的一个评论"(Maxey,1999,p.206),这种持续性的讨论是关于远离资助者的要求、证据的政治性或者质性研究自身内部的批判等保守观念,也是关于我们质性研究者要自己创造和选择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我们能够申请资助、选择是否妥协,并且知道那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同时我们相信,持有这种立场背后的思考和反思将有益于质性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壮大。这是因为当我们被迫尝试表达我们做这些决定的基础时,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什么因素可以使某物兼具质性和研究的双重特性。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出自质性研究本身而不是强加于它的外力。换句话说,它能够使我们选择是否采纳那些关于信息的信息。

参考文献

Atkinson, P., & Delamont, S. (2006). In the roiling smoke: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contested fiel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6), 747-755.

Australian Competitive Grants Register (ACGR).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innovation.gov.au/Section/Research/Pages/Australian Competitive GrantsRegister(ACGR).aspx

Bochner, A. P. (2009). Warm ideas and chilling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3), 357-370.

Brennan, M.(2002).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alities of grassroots research in educ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staff.vu.edu.au/alnarc/forum/marie_brennan.html.

Cannella, G. S., & Lincoln, Y. S. (2004). Dangerous discourses II: Comprehending and countering the redeployment of discourses (and resources) in the generation of liberatory inquiry.*Qualitative Inquiry*, *10*(2), 165-174.

Carey, M. A., & Swanson, J. (2003). Pearls, pith, and provocation: Funding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6), 852-856.

Cheek, J. (2005). 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387-409).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eek, J. (2006). The challenge of tailor-made research quality: The RQF in Australia.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 (pp. 109-126).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heek, J. (2007). Qualitative inquiry, eth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Working within these spaces rather than being worked over by them.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9-43).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heek, J. (2008). A fine line: Positioning qualitative inquiry in the wake of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1).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heek, J. (2010a).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hesitations about what we say about what we do.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human rights* (pp. 100-111).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heek, J. (2010b). A potent mix: Older people, transitions, practic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Nursing*, *15*, 2.

Cheek, J., & Ballantyne, A. (2001). Moving them on and in: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for and selecting an aged care facil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1*(2), 221-237.

Cheek, J., Ballantyne, A., Byers, L., & Quan, J. (2007). From retirement village to residential aged care: What older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say.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15*(1), 8-17.

Cheek, J., Ballantyne, A., Gilham, D., Mussared, J., Flett, P., Lewin, G., et al. (2006). Improving care transitions of older people: Challenges for today and tomorrow. *Quality in Aging*, *7*(4), 18-25.

Cheek, J., Ballantyne, A., Roder-Allen, G., & Jones, J. (2005). Making choices: How older people living in independent living units decide to enter the acute care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Practice*, *11*(2), 52-57.

Cheek, J., Corlis, M., & Radoslovich, H. (2009). Connecting what we do with what we know: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er People Nursing*, *4*(3), 233-238.

Cheek, J., Garnham, B., & Quan, J. (2006). "What's in a number": Issues in providing evidence of impact and quality of research(er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6*(3), 423-435.

Cheek, J., Price, K., Dawson, A., Mott, K., Beilby, J., & Wilkinson, D. (2002).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nursing and nurses in general practice.* Available at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Content/work-pr-nigp-res-cons-rept

Creswell, J. W. (200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2009). The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 Or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9*, 139-160.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6).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7a).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7b). Introduction.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9-43).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9).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social justice.*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05). Prefa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ix-xix). Thousand Oaks, CA: Sage.

Excellence in Research for Australia. (2010). *Key 2010 documents.* Available at http://www.arc.gov.au/era/key_docs10.htm Giddings, L. S. (2006). Mixed-methods research: Positivism dressed in dra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Nursing*, *11*(3), 195-203.

GrantSearch Register of Australian Funding. (2010). *Funding at your fingertips.* Available at http://www.grantsearch.com.au/

Greene, J. C. (2007).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inquir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Hammersley, M. (2005). Close encounters of a political kind: The threat from the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nd practice movement. *Qualitative Researcher*, *1*, 2-4.

Hesse-Biber, S. N. (2010). *Mixed methods research: Merg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New York: Guilford.

Hesse-Biber, S. N., & Leavy, P. (2006). *The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mes, D., Murray, S. J., Perron, A., & Rail, G. (2006). Deconstructing the evidence-based discourse in health sciences: Truth, power, and fasc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 *4*(3), 180-186.

Hurdley, R. (2010). In the picture or off the wall? Ethical regulation, research habitus, and unpeopled ethnography. *Qualitative Inquiry*, *16*(6), 517-528.

Kvale, S. (2008). Qualitative inquiry between scientistic evidentialism, ethical subjectivism and the free marke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1), 5-18.

Lacey, E.A.(1998). Social and medical research ethics: Is there a difference? *Social Sciences in Health*, *4*(4), 211-217.

Lincoln, Y. S., & Cannella, G. S. (2002, Apri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radical right: Cats and dogs and other natural enem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Lincoln, Y. S., & Cannella, G. S. (2007). Ethics and the broader rethinking/reconceptualization of research as construct.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67-84).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Lincoln, Y. S., & Tierney, W. G. (2002, April). "*What we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 …":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IRB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6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Long, B. (2010). [Review of the book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3), 432-434.

Maxey, I. (1999). Beyond boundaries? Activism, academia, reflexivity and research. *Area*, *31*(3), 199-208.

Mertens, D. (2005).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tegrating diversity with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se, J. M. (1991).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Methodology Corner*, *40*(2), 120-123.

Morse, J. M. (2002). Myth #53: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cheap.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10), 1307-1308.

Morse, J. M. (2003a). The adjudication of qualitative proposal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6), 739-742.

Morse, J. M. (2003b). A review committee's guide for evaluating qualitative proposal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6), 833-851.

Morse, J. M. (2006a).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6*(3), 395-404.

Morse, J. M.(2006b). Reconceptualizing qualita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6*(3), 415-422.

Morse, J. M. (2008). Deceptive simplic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8*(10), 1311.

Morse, J. M., & Niehaus, L.(2009). *Mixed method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Penrod, J. (2003). Getting funded: Writing a successful qualitative smallproject proposal.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6), 821-832.

Ramcharan, P., & Cutcliffe, J. R.(2001). Judging the eth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sidering the "ethics as process" model.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9*(6), 358-366.

Riesman, D. (2002, November/December). Reviewing social research. *Change*, 9-10.

Schwandt, T. (2007). The pressing need for ethical educa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growing IRB controversy. In N.K.Denzin & M.D.Giardina (Eds.),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85-98).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Stronach, I. (2006). Enlightenment and the "heart of darkness": (Neo) imperialism in the Congo, and elsewhe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 (6), 757-768.

Stronach, I., & Torrance, H. (1995). The future of evaluation: A retro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5*(3), 283-300.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Eds.). (2003).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9).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orrance, H. (2006). Research quality and research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 (pp. 127-148).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Torres, C. A. (2002). The state, privat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some eth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Comparative Education*, *38*(4), 365-385.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0). *Research achievements.* Available at http://www.usyd.edu.au/research/about/major_achievements.shtml van den Hoonaard, W.C. (2001).Is research-ethics review a moral panic?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1), 19-36.

15 混合方法研究的争议

CONTROVERSI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约翰 W. 克雷斯韦尔(John W. Creswell)

邓猛 译　朱志勇 校

在过去的几年里,混合方法作为一种备受欢迎的研究方式被应用于许多学科与国家中,并且各种资助机构也支持混合方法的应用。随着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在一些会议和期刊中也出现了很多批判混合方法的评论。这些评论既有来自混合研究领域内的学者(例如 Greene, 2008; Morse, 2005; Creswell, Plano Clark, & Garrett, 2008),也有来自领域外的(Denzin & Lincoln, 2005; Howe, 2004)。尽管人们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关注在持续增加,但关于它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社会科学家和混合方法领域所忽视。

本章将主要关注这些争论。我讨论了 11 个广泛的争议,涉及混合方法的定义和描述、哲学上的争论以及进行研究的程序问题。

对于每一个争议我都会呈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多样化的观点立场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本章的结尾,我将反思这些争议的影响。我希望这种讨论能够帮助混合方法的研究者、学生以及政策的制定者进一步理解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审视已经出现的多样化观点,并且反思混合方法领域新的约定。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我希望这种反思能鼓励他们对于质性研究在混合方法设计中已经发挥的和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持续的讨论。

接下来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反映了我过去 20 多年的写作成果,有时也包括自我反思式的批判。我在方法论的发展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 20 世纪 70 年代接受了正规的后实证主义训练,在 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一个建构主义者通过教授质性课程进行了自我教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我通过写作与教学倡导混合方法。作为混合方法的代言人,我在各种会议和《混合方法研究》(*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JMMR],过去的 5 年我一直担任该期刊的创始联合编辑)上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一些学者为了让我了解最新问题而递交给我的论文让我注意到了很多争议。当我看到这些不同的材料时,我希望能够对这些争议话题以及学者们给出的可能性答案进行持续讨论。

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

这里我将呈现一些在2009年3月的一次讨论中所进行的对话。当时在位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卫生服务研究小组(Health Servies Research Unit)的赞助下，我参加了阿伯丁大学的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系列研讨会。当我向来自健康科学领域的50位学者组成的小组介绍完混合方法研究之后——他们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埃尔芬斯通大厅，这是一个古老的聚集地，它的屋顶高大，呈拱形，横幅挂在椽子上，橡木镶板墙上挂着几个世纪之前的杰出学者画像——令我十分吃惊的是，会议组织者突然要求各个小组提出并且记录下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点与缺点。我不想错过这样一次对混合方法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关键机会，便迅速开始记录。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混合方法研究的价值("混合方法能解决每一个问题吗?""是否存在混合研究提出的不能实现的预期?")；哲学和理论的问题("那些拥有坚定单一世界观的人是否反对混合方法?""在混合方法中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吗?""在混合方法中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处于平等的地位吗?")；研究的程序与过程("研究问题与混合方法能够完全匹配吗?""研究者在这两个领域有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吗?")。

在"古老的"埃尔芬斯通大厅中所出现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对于混合方法"新的"关注并没有逃过我的注意，但事后想想，听到这些问题并不令人惊讶。最近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期刊(Giddings，2006；Howe，2004)、本手册的第3版(Denzin & Lincoln，2005)、会议陈述(Holmes，2006)，以及《混合方法研究》杂志中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学者已经针对这些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2006年，我在一篇文章里对质性研究在混合方法中的地位方面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Creswell，Shope，Plano Clark & Green，2006)，并在2007年的国际质性研究大会上又做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报告(Creswell，2007)。根据这些讨论，我们能够及时解决这些争论问题。正如表15.1所概括的，我在本章将解释说明这11个争议并且提出一些问题，这些争议反映了库恩(Kuhn，1970)在数年前所说的关于研究转型期的问题：

> 不断增加的激烈言辞、尝试任何事件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达、诉诸哲学、对基本问题的争论，所有这些都是从一般研究向杰出研究转型的表现(Kuhn，p.91)

表15.1 混合方法研究中的11个关键争论与问题

争论	提出的问题
1.混合方法研究定义的演变与拓展	什么是混合方法研究？它应该如何被定义？定义中什么转变了？
2.质疑质性描述和量化描述的使用	"质性"和"量化"的术语是有效的描述吗？在使用这些术语时能得出什么推理吗？在实践中两者存在差别吗？

续表

争　论	提出的问题
3.混合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吗?	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混合方法的概念? 混合方法是否早于通常所认为的开始时间? 20 世纪 80 年代末之前开始了哪些混合方法的实践?
4.什么激发了人们对混合方法的兴趣?	对混合方法的研究兴趣是如何增加的? 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资助机构起了什么作用?
5.范式层面的争论还在继续吗?	研究范式能混合吗? 在混合方法中范式处于怎样的发展地位? 应该根据学科领域来建构混合研究的范式吗?
6.混合方法青睐后实证主义吗?	随着混合方法中后实证主义的兴起,质性的、解释性的方法会被边缘化以至于沦为次要地位吗?
7.在混合方法中有固定的话语吗?	谁控制着混合方法的话语? 混合方法近似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吗?
8.混合方法在术语上应该采用双语表述吗?	混合方法研究的语言是什么? 这种语言应该是双语的还是反映量化和质性的术语呢?
9.混合方法程序有很多容易混淆的设计吗?	混合方法研究者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设计? 当前的设计是否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反映实践? 应该思考采用全新的设计方式吗?
10.混合方法研究不适合其他研究方式的设计和程序吗?	混合方法所宣称的观点是否被高估了(因为其他研究方式的不恰当)? 混合方法可以被看作是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提出的一种方法吗(例如民族志)?
11.除了通过质性与量化研究所获得的价值外,混合方法还有什么额外价值吗?	与只使用单一质性或量化方法研究相比,混合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吗? 混合方法研究的价值如何通过学术研究得以证实?

定义的演变与拓展

在所列举的这些争议中,处于最顶端的当然是最基本的问题:混合方法是什么? 它是如何被定义的?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简要回顾过去混合方法定义的转变。例如,早期评估领域的学者(Greene,Caracelli, & Graham,1989)为混合方法研究下了一个定义,他们在定义中强调方法的混合以及方法与范式的分离,他们认为:

> 在这种研究中,我们认为混合方法设计包括至少一个量化方法(用来收集数字)和一个质性方法(用来收集文字),同时这两种方法在本质上与任何特定的研究范式都没有关系。(Greene, Caracelli, & Grahqm, 1989, p.256)

十年之后,混合方法的定义从混合两种方法转变为在研究过程的所有阶段发生的混合,混合方法已被视为一种方法论(Tashakkori & Teddlie,1998)。研究

过程中所包含的哲学视角(比如世界观)、推理判断和结果解释都可以混合。因此，塔沙考里和特德列(Tashakkori & Teddlie,1998)将混合研究定义为“在一项研究的方法论中质性和量化方式”的结合(p.ix)。这些作者在《社会与行为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方法论取向,他们认为,“混合方法研究已经发展到了独立方法论的程度,它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术语和相关技术”(Tashakkori & Teddlie,2003,p.x)。

几年之后,当我和克拉克(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在编写介绍混合方法的书籍时,我们将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假设的方法论取向结合起来,我们认为:

> 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哲学假设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设计。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所包含的哲学假设能够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引导质性和量化研究对研究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混合。作为一种方法,它关注在单个研究或者一系列研究中质性和量化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混合。它的中心假设是,与任何单一的研究方式相比,质性和量化方式的结合使用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p.5)

自此,许多学者都模仿这个定义来描述混合方法,例如斯泰克(Stake,1995)在一个个案研究中的定义。我们对于混合方法的定义既有哲学取向也有方法取向,它包含了我在不同的研讨会和报告中提出的混合方法的核心特征和要素(Creswell,2009a)。在混合方法中,研究者:

- 令人信服且严谨的收集与分析质性数据和量化数据(根据研究问题)。
- 以组合(combine)或融合(merge)的形式,并行地混合(合并或连接)两种形式的数据,或者有顺序地把一种数据的获得建立在另一种数据的基础上,再给予这种或这两种数据优先级。
- 在单个研究或者在一项研究的多个阶段使用这些程序。
- 在哲学世界观和理论视角中建构这些程序的框架。
- 将这些程序合并到特定的研究设计中以指导开展研究的计划。

这些核心特征在描述混合方法研究中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回顾混合方法文章并从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中使用质性和量化方法中总结出来的。

当然,并不是只有我提出混合方法的这些普遍特征。在一篇被频繁引用的发表在《混合方法研究》上的文章中,约翰逊等(Johnson,Onwuegbuzie, & Turner,2007)在19种定义(由21位高产的混合方法研究者提供)的基础上,对混合方法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在下完定义之后,他们还为定义中的变量作注释,例如混合什么(方法、方法论或者不同类型的研究)、在哪个研究阶段进行混合(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混合的范围(从数据到世界观)、混合的目的或者原理(拓展还是验证)、驱动研究的要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核心要素)。通过综合这些不同的观点,作者们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

> 混合方法研究是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将质性要素与量化研究方式相结合

的研究类型(例如,质性和量化的观点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推理),从而达到深入理解研究问题和证实研究结果的目的。(Johnson et al.,2007,p.123)

在这个定义中,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混合方法视为方法,而是更多地将其当作一种从观点跨越到推断的方法论;他们也没有将混合方法视为收集数据的方法,而更多的是当作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一般化结合。他们将多种观点纳入这个定义,并没有特别提及范式(Greene, 1989)或者哲学视角(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混合方法的目的是拓展理解和证实的广度和深度,这并不是建议针对某一研究问题就必须要使用混合方法,而是避免落入"非质性就量化"的强制选择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建议使用一个普遍的定义。

格林(Greene,2007)提出了另一个定义,他认为混合方法是看待社会世界的一种方式:

混合方法能够促使我们积极地参与到多方对话中,包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和听,解释社会世界的多种方式,以及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等问题有不同的观点。(p.20)

这个定义将混合方法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化领域之中,也许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将混合方法定义为"用多种方式去观察"进一步拓宽了混合方法的应用范围,而不只是局限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例如,可以用它来考虑纪录片的设计(Creswell & McCoy,出版中)或者作为一种监控南非东开普省艾滋病感染群体的方法(Olivier,de Lange,Creswell,& Wood,2009)。后来,我举办了关于混合方法的专题讨论会,表明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混合方法的案例。我以戈尔(Gore)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作为讨论会的开始,在电影中戈尔将统计方法和个人叙述结合起来进行使用(David,Bender,Burns,& Guggenheim,2006)。把混合方法定义为观察的方式拓宽了它在社会生活的应用。

然而,在回顾完这些多样化的定义后我仍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普遍的定义或者普遍适用的核心特征吗?这些普遍的特征是否会限制我们对混合方法的看法?我们需要多样化的定义吗?对于那些刚接触混合方法的个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表达他们的研究目的并且让其他人相信他们所采用的方法的合理性吗?

质性与量化描述使用中的问题

研究者往往使用诸如"质性的(qualitative)"和"量化的(quantitative)"这类符号来讨论混合方法。戈尔电影中统计和故事叙述的使用进一步加强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二元对立的区别,"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是很有用的描

述吗？当使用这些术语时又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是由一批学者首先提出的，他们发现“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是与研究设计和范式相互混淆的，而不是指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另一批学者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感到这些术语的使用会缩减方法中的多样性，造成一种不可接受的二元对立。

吉丁斯（Giddings，2006）认为“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成为研究范式的标准描述，并且正是这两个术语使得非实证主义研究者有了“立足之地”（p.199）。学者们往往是在评估社会科学中质性—量化争论的背景下使用“质性范式（qualitative paradigm）”这个术语（Greene，2007）。格林指出将“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与更加广泛的哲学问题相区分是十分有价值的，它有利于消除方法与哲学问题的混淆。另一个混淆出现在设计层次上。沃格特（Vogt，2008）坚持认为：“从质性和量化设计的角度来思考是一个分类错误”（p.1）。他认为所有的研究设计，例如调查、文献分析、实验和准实验，都能够将数据编码为数字和文字。

“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让人更加沮丧，因为它制造了在实践中不能把控的二元对立的区别。学者们经常将“质性”等同于文本数据，将“量化”等同于数字数据。在最近发表于《混合方法研究》的一篇文章中，桑德洛夫斯基等人（Sandelowski，Voils，& Knafl，2009）反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他们指出，计算经常涉及质性判断，数字也经常与文本联系在一起。此外，质性数据在数据分析中经常被转化为分类数据，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会忽视组内（例如质性）和组间（例如质性和量化）的相似性。吉丁斯（Giddings，2006）的看法与这种思想产生了共鸣，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掩盖了方法论的多样性。

对“质性”和“量化”意义产生混淆的往往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混合方法应该意味着用单一的方法收集多样化的质性或量化数据（Shank，2007；Vogt，2008），而不是同时收集质性和量化数据（混合方法）。一些学者已经厘清，一种数据（例如质性的或量化的）的多样化来源应该被称作“多元化方法（multiple methods）”（Morse & Niehaus，2009，附录1），而不是混合方法。此外，不管人们如何看待混合方法，这两种观点都依赖于“质性”和“量化”之间标准的、二元对立的区别以巩固他们的观点。

举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来说明“质性”和“量化”应该是指方法。克罗蒂（Crotty，1998）绘制了一个图表，这个图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不同层次的研究进行分类的概念框架，它将这些研究的层次分为认识论、理论视角（例如女性主义理论）、方法论和方法，但是抛弃“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看起来是要扰乱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与健康科学领域长期使用的交流模式。在我们找到代替的术语之前，一种跨领域的话语方式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如何使用这些术语。在二元对立的差别问题上，混合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打算摒弃这种对立而支持以连续谱的形式呈现质性和量化的差异（Creswell，2008；Tashakkori & Teddlie，2003）。混合方法的研究者还应注意区分“多元化方法研究（multi-method studies）”和“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studies）”。前者收集多

种类型的质性数据或量化数据,后者既包括收集质性数据也包括收集量化数据。在健康科学领域,"多元化方法"这个术语主要用于收集这两种数据的研究(Stange, Crabtree, & Miller, 2006),尽管在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项目中,克拉克(Clark, 2009)发现"多元化方法"意味着64%的时间用于收集质性或量化数据的多元化方法,36%的时间用于混合方法。

根据以上对于混淆和二元对立区别的讨论,我们应该避免使用"质性"和"量化"这两个术语吗? 为什么混合方法的研究者没有清晰地辨别方法、设计和范式之间的区别呢? 混合方法应该涉及多样化的质性或量化方法或者二者的结合吗?

新旧对比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在这些研究中已经使用了质性和量化这两种研究形式,这就导致了另一个争议:混合方法是一种"新"的方法还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 最近一些学者强调这种"新",并且将混合方法称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Tashakkori & Teddlie, 2003, p. 5),"第三个研究范式"(Johnson & Onwuegbuzie, 2004, p. 15)以及"社会科学天空中的一颗新星"(Mayring, 2007, p.1)。诸如此类的宣言引起了一些批评者的质疑,他们想知道,"新的混合方法运动主张什么。主要的混合方法支持者坚称他们所发展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Holmes, 2006, p.2)。

我经常将混合方法的源头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当时有几本著作专门描述和定义什么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混合方法,这些书的作者都是独立工作者,他们中有人来自美国(Brewer & Hunter, 1989)和英国(Fielding & Fielding, 1986)的社会学专业,有人来自美国的评估行业(Greene et al., 1989)和英国的管理领域(Bryman, 1988),也有人来自加拿大的护理行业(Morse, 1991)和美国的教育领域(Creswell, 1994)。在随后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大量重要的著作也相继出现,所有这些研究都在写关于一种研究方式的书、章节和文章,这种研究方式在一项研究中不再简单地将质性和量化的因素相分离,而是将二者联系或者结合起来。此时,在社会科学领域,质性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方法论,由此进入了"模糊类型(blurred genres)"阶段((Denzin & Lincoln, 2005)。质性和量化研究者仍然在进行哲学上的争论(Reichardt & Rallis, 1994),但是已经开始有所缓和,并且一直呼吁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新方法论。

回顾过去,我一直在考虑这些学者是否真是在讨论结合质性和量化数据的第一批人,曾经参与我的专题研讨会的一些学者说混合方法并不是"新的"。霍尔默斯(Holmes, 2006)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评论道,

> 主要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们所发展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质性和量化研究的替代形式,但是新颖之处在哪里呢? ……民族志研究者和其

> 他的社会研究者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混合方法来收集数据，此外，进行个案研究的研究者和任何其他使用三角验证的学者也都一直在使用混合方法。(p.2)

想要证实这是否是一种新思想，需要回归诸如社会学、评估和行动研究领域的历史文献当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前的讨论是如何匹配今天的混合方法的？当时的三条思考线索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多元化方法的使用；在量化研究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世界中使用质性研究的讨论；混合方法的非正式方案。

从多元化方法的角度来看，1959年坎贝尔(Campbell)和费斯克(Fiske)通过使用一个多特质的多元化方法矩阵(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提出了在心理特征的聚合与判别验证中使用多元化方法的问题。他们认为在验证过程中应该使用多个特征和多个方法。然而，他们的讨论局限于多样化的量化数据来源上。在20世纪70年代，邓津(Denzin,1978)通过他的数据三角验证(在一项研究中使用各种数据)的思想确定课题研究中几种方法论的组合。他说，"我现在提出一个作为最终方法论的准则，其原则就是在每一个调查中都应该使用多元化方法。"(Denzin,1978,p.28)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著名的学者一直在呼吁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将质性研究与更多的量化—实验的方法结合使用(Patton,1980)。坎贝尔(Campbell,1974)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议上做了关于"行动研究中的质性知识"的著名报告。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方法应该能消除质性和量化研究中受最终权威观点影响的问题，并且要能重新确立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克龙巴赫(Cronbach,1975)在他的著名文章《超越科学心理学的两种学科》(Beyond the Two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表达了对于认为社会科学仅仅可以模仿自然科学的看法的担忧。坎贝尔和克龙巴赫刚开始都是量化研究者，后来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质性或者自然主义的研究。

其他一些学者也开始采用非正式的形式结合这两种方法，很明显，他们是现在混合方法的先驱。在社会学中，希伯(Sieber,1973)讨论了田野工作与调查方法的相互作用，并且确定了结合这两种方法的步骤。令希伯感到痛心的是，有"太少的例子来证明一般性的原则"(p.1358)，他认为需要"一种新的研究风格"(p.1337)。他还进一步讨论了使用这两种方法的顺序：并行调度(cocurrent scheduing)或相互交织(interwearing)(p.1357)。同样重要的是，他引用了很多包含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并且讨论了他自己的包含不同数据收集形式的研究项目(Sieber & Lazersfeld,1966)。

早期混合方法思想的另一例子来自评估领域。在评估领域中，帕顿提出了"方法论的混合"(Patton,1980,p.108)。他倡导在评估中使用人类学自然主义的研究，其基础就是将"整体—归纳范式(holistic-inductive paradigm)"作为更传统的"假设—演绎(hypothetical-deductive)"方式的补充。他为项目评估推荐了几个建立在这种结合基础上的模式。一个研究设计可以采用实验设计、量化数据和

统计分析的纯粹的假设—演绎方式,也可以采用自然主义研究、质性调查和内容分析的纯粹质性方式。他还提出了四种混合方式的模型,这一模型不同于使用实验或者自然主义的设计、质性或量化设计以及质性数据的数量化转化。他为这四种模式绘出的图表类似于最近一些学者提出的混合方法设计的图表(Johnson & Onwuegbuzie,2004; Tashakkori & Teddlie,1998)。

整体来看这些文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混合方法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甚至更早。这些早期的学者主要关注集合多样化的方法,包括量化(调查)和质性(访谈)数据。他们通过使用一些术语为混合方法新创了一种语言,例如比较普通的"相互作用(interplay)"、更加特殊的"并行调度(concurrent scheduling)"(Sieber,1973,pp.1353,1358)。他们提供了使用多元化方法的研究案例,并且运用过程的方式思考设计、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对不同类型的混合方法设计下定义,例如涉及数据转换的设计(Patton,1980),将方法嵌入的设计(Sieber,1973)。

另一方面,尽管这些早期的学者对于质性和量化数据之间的相互作用感兴趣,然而他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这两种方法应该如何结合,以及为什么结合(Bryman,2006),他们并没有阐明这种浩大的设计的可能性以回应现在所认为的不同目的问题(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2011)。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讨论有关设计的名称问题,然而他们的设计总数目是有限的,很难与最近讨论的广泛的设计可能性相比较(Creswell & Plano Clark,2011)。此外,他们也没有一套能够对设计进行速记描述的符号标记系统(加号和箭头),这个到1991年才出现(Morse,1991)。对于程序问题的详细讨论(例如根据质性数据开发一套仪器)、混合方法问题的使用(Creswell & Plano Clark,2011)或者更大的哲学问题都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前的学者们确实为混合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塔沙考里和特德列(Tashakkori & Teddlie,2003)所认为的那样,早期的这些学者们大部分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p.5),他们正在非正式和常识意义上开展研究。一位学者最近评论道,关于混合方法最令人吃惊的是现在所有的学者都相信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并且已经发展成一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论(与Du和Shell的个人交流,2009年8月17日)。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详细的和概念化的思考方式来看待混合方法研究。这种体系化的方式比早期直觉式的方式更好吗?为什么当前的混合方法研究者(包括我自己)没有给予最初提出那些思想的现在称之为混合方法的早期研究者更多的荣誉?

到底是什么驱动了混合研究?

一场"新的运动"或者一颗"新星"的思想表明方法论领域正在出现新的趋势。什么推动了混合方法领域不断增加的兴趣呢?正如苏格兰阿伯丁研究会所

认为的那样,混合研究仅仅是对资助方案的反映吗?

自从《社会与行为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Tashakkori & Teddlie,2003)出版以来,对于混合方法的研究兴趣就在不断增加(Creswell,2009b)。这本手册包含四个部分,总共759页,主要论述了当前和未来方法论的和分析上的问题。根据国家健康机构资助的项目报道,以2003年作为大致的基准年,混合方法的发展情况已经被记录下来(Plano Clark,2010)。目前已经有了专门报道混合方法经验研究和方法论讨论的期刊,例如2007年的《混合方法研究》,2008年的《国际多样化研究方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2009年的《国际应用商务和政策研究中的混合方法》(*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in Applied Business & Policy Research*)。还有比这些更早的期刊,例如《质性和量化》(*Quality and Quantity*),《田野方法》(*Field Methods*)和《国际社会研究方法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除此之外,最近很多期刊也已开始出版特刊来集中论述混合方法,例如《学校研究》(*Research in Schools*,2006)、《家庭医学年度报告》(*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2004)和《咨询心理学》(*Th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05)。至少有16本书讨论关于混合方法的问题,包括Creswell & Plano Clark,2011;Greene,2007;Plano Clark & Creswell,2008;Teddlie & Tashakkori,2009;Morse & Niehaus,2009等人的书。出版混合方法书籍的作者来自不同学科领域,例如护理和健康领域的研究者(Andrew & Halcomb,2009)、心理学的研究者(Mayring,Huber,Gurtler,& Kiegelmann,2007;Todd,Nerlich,McKeown,& Clarke,2004)。在混合方法书籍的章节中涉及各个学科领域,例如社会工作(Engel & Schutt,2005)和家庭研究(Greenstein,2006)。在过去的五年,在英国召开了关于混合研究的国际会议,并且还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学科出现了关于混合方法的出版物,例如来自欧洲的心理学(Mayring et al.,2007)、澳大利亚的护理学(Andrew & Halcomb,2009)、日本的语言学(Heigham & Croker,2009)、瑞士的社会科学(Bergman,2008)和南非的教育学(Creswell & Garrett,2008)。

鉴于混合方法的这些发展,我必须要问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发展?或多或少可能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紧迫发展背景下的各种资助来源鼓励了混合方法研究(Giddings,2006)。在一个关于家庭收养的混合方法研究中,米奥和马奇(Miall & March,2005)写出了他们的资助者如何要求他们改变研究问题和设计,从最初关于量化研究问题的设计转变为增加一些质性研究问题和设计。霍尔默斯(Holmes,2006)宣称混合方法将研究者降低为"去人性化的技术人员(depersonalized technicians)",这些技术人员默默地为资助机构寻求对问题答案的聚合,而不是观点和思想的差异。

另一方面,质性研究的合理性也鼓励研究者以多元化的方式思考问题。质性和量化的研究领域中有经验的方法论者能够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处理复杂的议题来解决跨学科的研究问题(Mayring et al.,2007)。然而现在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混合方法是否仅仅反映了资助兴趣?混合方法研究者

所应对的问题是否真正需要一个混合的方法论？来自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表明研究者正在“不加批判、不加消化地接受”混合方法(Freshwater,2007,p.145)。

持续进行的范式之争

哲学导向的学者们多年以来一直在争论混合了不同的世界观和范式的混合方法研究是否可行。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不同的范式(本体论或现实主义)能混合吗？一些学者信守这样一种观念,即范式或者世界观有严格的界限,不能相互混合。霍尔默斯(Holmes,2006)则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进行这样一种研究,它对现实持某一特定的观点,同时这中间又嵌套着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我们如何在单个的项目中协调并处理互相矛盾的话语体系?”(p.5)。这里所使用的混合方法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方法与范式联系到了一起,那么研究者在使用混合方法研究时会混合范式。这种立场被认为是纯粹主义立场(Rossman & Wilson,1985),并被古巴和林肯称为“不兼容命题(incompatibility thesis)”(Howe,2004),在混合方法论文中作为混合性观点而被讨论(Johnson et al.,2007,p.123)。持有这种倾向的个体认为,范式有不连续的和不可渗透的界限,那些对具有清晰框架的范式进行讨论的文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Guba & Lincoln's tables,2005; Creswell,2009c)。2005年,古巴和林肯抛弃了这种人为的边界,谨慎地宣称范式的要素在一项研究中可以相互混合起来。促使这种观点产生的因素是范式与方法之间的脱钩,例如一个范式并没有特定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方法,因此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能与这个范式联系到一起(Johnson & Onwuegbuzie,2004)。

随着思考的大门开始向多样化的范式开放,混合方法学者现在对于将范式纳入混合方法中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例如,格林和卡拉希利(Greene & Caracelli,1997)采取了辩证的立场,认为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可以使用多样化的范式,但是每一个范式都应该得到尊重并且它们的结合使用应该产生良好的张力和新颖的观点。我的立场与之类似,但是我认为多样化的范式应该和一项研究设计的不同阶段相联系(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2011),由此范式也与研究设计相联系。例如,一个以量化调查开始的混合方法研究最初反映了后实证主义者的偏好,但是在接下来的讨论阶段,研究者就转变到了建构主义范式,重新将范式与设计联系起来能产生一定的意义。

仍然有一些学者倡导匹配混合方法的潜在范式,还有一些学者在实用主义中寻找范式(Johnson & Onwuegbuzie,2004; Tashakkori & Teddlie,2003)。实用主义的历史根源来自皮尔士(Charles Peirce)、詹姆斯(William James)、杜威(John Dewey)、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它强调研究问题的重要性、经验的价值、实践后果、行动和对真实世界的理解。这些倡导者认为实用主义“对于混合方法研究来说是一个哲学上的伙伴”(Johnson & Onwuegbuzie,2004,p.16)。默滕斯

(Mertens,2003,2009)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范式观点,他构建了变革性—解放框架(transformative-emancipatory framework),这个框架阐明了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创建一个更加公正和民主的社会,并且这个目的应该贯穿研究的整个过程"(Mertens,2003,p.159)。默滕斯由此创造性地将研究目的与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各个阶段联系起来。

对于混合方法的范式是涉及单一范式还是多样化的范式或者阶段性的范式的问题,摩根(Morgan,2007)提醒混合方法领域的研究者应该注意库恩(Kuhn,1970)最初对于范式的描述。摩根使用的范式定义是:"范式是共同的思想体系,它影响研究者寻找的知识类型和研究者解释所收集证据的方式。"(Morgan,2007,p.50)他认为范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范式应该是:(1)世界观,一个包罗万象的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2)认识论,包含来自科学哲学的思想,例如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3)"最佳"或者"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4)在一个研究领域中一群学者共同的信仰。摩根强烈支持的是最后一个观点(库恩所接受的,Kuhn,1970),他还讨论了研究者是如何在专业领域就哪些问题最有意义、哪些程序最适合回答等方面达成共识的。

另一个混合方法研究者登斯科姆比(Denscombe,2008)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登斯科姆比使用诸如共享身份、研究共同问题、形成网络、在追求知识中合作以及形成非正式小组等概念,描述了共同体的运作方式。这种思路将注意力集中于混合方法领域中出现的新分裂,在这一新分裂中,不同的学科用不同的方式采用混合方法,创造出独特的实践并且培育出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学。例如,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退伍军人管理研究中心的健康科学领域,学者将混合方法定义为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估程序(Forman & Damschroder,2007),这个概念使混合方法适应于退伍军人健康服务的管理这一研究背景。混合方法适用于学术领域的另一个例子是学科导向的混合方法书籍的出现。我仍然担心混合方法的学科分裂是否会进一步导致混合方法领域的研究者在哲学上的差异。学术界的思路会继续发展吗?或者这种对话会遇到混淆现实的困难吗?在混合方法研究中混淆现实的问题都是一种范式领先于另一种范式吗?

混合方法青睐后实证主义

评论家们宣称混合方法更支持实证主义而非解释主义。混合方法真的有青睐后实证主义而轻视解释主义的取向吗?很多学者都赞同这个观点,产生这样观点的背景在于他们把混合方法看作是对质性研究的保守的挑战(Denzin & Giardina,2006)。邓津和加迪纳相信保守的政体会实施以科学为依据的研究模式。例如,2001 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强调绩效责任制、高风险测试和成绩分数,这其中所体现的研究模式就是"运用严格的、系统化的和客观的方法论获得可靠而有效的知识"(Ryan & Hood,2006,p.58)。

在这种背景下,质性研究被边缘化了,复杂和动态的背景以及由性别、种族、民族、语言、阶级和多样化的知识所产生的社会差异都尽可能地被降低到最低程度(Lincoln & Canella,2004)。2002年,在该法案实施一年之后,国家研究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教育中的科学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中确立了一系列的指导准则,要求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研究、研究问题是可以进行经验研究的、使用相关的理论以及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方法,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还应使用一系列的逻辑推理、重复性研究、归纳等(Ryan & Hood,2006; Shavelson & Towne,2002)。霍伊(Howe,2004)将国家研究委员会的观点称为"混合方法实验主义(mixed-methods experimentalism)",并且认为它更多的是量化的实验研究,较少是质性的解释性研究。此外,这种方式还把量化—实验方法提升到了方法论等级的顶端,同时它也限制了质性方法,使得它在追求积累知识的目标中沦为辅助性的角色(Howe,2004,pp.53-54)。他还认为,"并不是说质性方法在这种方式中就不能被适当地使用,而是说它们天生是在解释主义的目标框架之内试图理解和表达局内人的观点"(p.54)。这种解释主义的目标重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评估结果,包括对话中所有相关的话语,并且参与到质性数据的收集程序从而推动对话,例如参与式观察、访谈和讨论组。这种对话还应该具有批判性并且参与者的观点也要接受合理的检验。

本手册第3版的出版再一次回应了霍伊的论题(Denzin & Lincoln,2005)。邓津和林肯在批判性和解释性的框架中直接讨论了"混合方法运动",并将质性方法带出那种天生的宿命。最后,吉丁斯(Giddings,2006)在他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中讨论了在混合方法中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及非实证研究方法论被边缘化的问题,她指出,"在研究中以方法论的形式反映出来的特定观点,即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观点也将继续反映到混合方法的思想中"(p.200)。吉丁斯认为,通过分析和约定俗成的风格、结构化的研究设计方式和数据收集就可以表达出混合方法思想。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某些特定的方式上混合方法研究者已经把质性研究降低到从属地位。在研究设计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案例(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在这些案例中质性方法经常能在实验性的干预研究中发挥支持的作用。我们一直认为,无论质性方法在传统的量化实验中扮演什么角色,它的使用都会将质性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地位,为使质性研究成为一种合理的研究形式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是否能实现必然会引起争论。我们在文章(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中所采用的混合方法的设计方式也会进一步巩固吉丁斯关于混合方法中结构化思想的观点。在混合方法数据分析中,由昂乌格布齐和特德列(Onwuegbuzie & Teddlie,2003,p.356)使用的"显著效应大小(manifest effect sizes)"强化了混合方法的后实证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混合方法中的很多研究青睐质性方法,一些设计还将量化方法置于质性方法的从属地位(见克雷斯韦尔和克拉克[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所提到的解释性的序列设计)。另外,那些将变革性—解放性的框架应用到混合

方法中的文章也强调质性研究(Mertens,2009)。仔细阅读国家研究委员会所做的关于教育科学方法的报告后可以发现,具有学术意义的教育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既是量化的(描述性的、实验性的)也是质性的(解释的),霍伊(Howe,2004)也承认这一点。尽管有证据显示在混合方法领域,解释主义者的文章正在增加,但这远远不够。最近的一篇论文(Sweetman,Badiee,& Creswell,2010)指出混合方法研究重视在默滕斯的变革性—解放性框架内行动领域的融合与对话。这篇论文考察了几个混合方法研究,这些研究将残疾、种族、女性主义和社会阶级等作为理论基础,同时论文还提出了研究者将这些理论基础纳入他们的混合方法项目的方式。此外,关于反映这些理论基础的认识论方面的证据,可以在《混合方法研究》(JMMR)上最近发表的论述妇女社会能力(Hodgkin,2008)和非裔美国妇女对科学的兴趣(Buck,Cook,Quigley,East-wood,& Lucas,2009)的文章找到。尽管有这些研究,但是混合方法设计将解释性方式边缘化的证据是什么?我们需要纳入更多解释性观点的混合方法研究吗?在那些轻视质性方法的干预研究中,质性研究的使用能发挥支持性的作用吗?或者在那些传统上重视实验方法的领域内,质性研究得到发展了吗?我们需要更多接受"混合方法解释主义"的文章吗?正如霍伊(Howe,2004)所建议的那样,在这些文章中量化研究被降低到质性研究的从属地位吗?

混合方法中的固定话语

毫无疑问,在混合方法中更多解释性的、理论性的研究会拓宽它的话语体系,这就引发了对于混合方法话语的争议。一些评论者提出问题:在混合方法中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吗?这里面存在混乱吗?这些问题围绕混合方法的议题并优先考虑后实证主义的思想——对于混合方法中话语后现代式的担忧。谁控制着混合方法研究中使用的话语和语言?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最近一篇重要的文章论述了这些担忧(Freshwater,2007)。弗里希沃特是一个编辑,也是护理行业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她一直很关心混合方法是如何被"解读"的以及由此产生的话语。话语被定义为在组织和解释学术性科目或者混合方法研究领域中的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规则或者假设。不加批判地接受混合方法作为新兴的主流话语会影响它的定位、呈现和延续方式。她呼吁混合方法研究者要明确阐释研究者所创造的混合方法文本与读者/观众所看到的文本之间的内在权力斗争。她认为混合方法太过于"关注固定的意义"(p.137)。在此基础上她提出混合方法正在"远离不确定性、走向稳定性"(p.137),例如以客观的第三人称进行书写、平实的语言以及杜绝相互矛盾的解释。她要求混合方法研究者要采纳一种"不完全的意义(sense of incompleteness)"(p.138)并且建议改革需要:

需要探究混合的可能性,这种混合鼓励形式、类型、习俗和媒体的根本性相互交织。这里没有清晰的表现规则,研究者在现实的工作中伴随着不可判定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在这里,读者和作者能够自由地获得混合体验。

这些看法都是一种积极的批评,也是呼吁混合方法研究者使用他们的话语解决问题,同时也是混合方法研究者承认混合方法的混乱并且认识到这个领域仍处于“青少年时期”(Tashakkori & Teddlie,2003,p.x)。

通过提供可视的、线性发展的混合方法研究程序,约翰逊和昂乌格布齐(Johnson & Onwuegbuzie,2004)清除了这种混乱。当研究设计被赋予了特定的名字时,当研究者没有将混乱带入研究设计时(Creswell et al.,2008),以及当研究者寻求定义中的共识时(Johnson et al.,2007),混合方法就变得有条理了(例如解释性序列设计——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这些例子都指向一个“被固定”或者“逐渐稳定”的领域。但是这也引起我们的思考,例如混合方法研究者如何讨论它的混乱局面、模糊界限和潜在问题?那些无组织的混合方法能像服务于有经验的研究者那样很好地服务于研究新手吗?

是否需要双重语言?

是否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阵营都能够支配混合方法的语言?是否存在混合方法的主流语言或者占主导地位的一套规则系统?韦格特斯基和科尔(Vygotsky & Cole,1978)认为语言的社会文化观可以解释个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学习过程包含了这种语言的渐进内化。混合方法的语言是什么?当前正在讨论的一个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混合方法研究的双重语言,以使它既不支持量化研究也不支持质性研究。提出这个问题让我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在早期质性研究中存在的对效度问题的担忧,以及可靠性和真实性之类的术语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独特的语言来讨论效度问题(Lincoln & Guba,1985)。

随着混合方法语言的发展,在术语使用方面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例如,在关于效度的文章中,昂乌格布齐和约翰逊(Onwuegbuzie & Johnson,2006)有意将效度称为“合法化”,由此在混合方法词典中创造了一个新词。当我们对研究设计类型进行具体阐述时,我们也创造了新的名称,例如探索性序列设计(exploratory sequential design),这种描述性的标签意味着设计应该首先使用质性数据满足探究的目的,然后使用量化数据进行解释(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以一个自创的双语性术语为例,有研究者在最近一篇心理学文章中使用“量质论(qualiquantology)”这个术语来表达他们对于将质性和量化方法混合在一起使用时的不舒适的杂乱状态(Stenner & Rogers,2004)。

混合方法领域的其他研究者较少使用双语词汇。特德列和塔沙考里(Teddlie & Tashakkori,2009)更倾向于使用一种更富有量化色彩的语言,他们使

用“推论(inferences)”或者“元推论(meta-inferences)”这样的术语来表示将结果纳入连续的概念框架中以解决研究问题。尽管“推论”既可以与质性研究相联系,也可以与量化研究相联系,但是它更经常地被用于量化研究中从一个样本或群体得出结论。另一个例子是里奇等人(Leech, Dellinger, Brannagan, & Tanaka, 2010)使用“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这个术语来表示混合方法的总体效度概念。这个术语是从量化测量思想中借用的。在质性方面,默滕斯(Mertens, 2009)提出的个人转型思想明显有质性的根源。毫无疑问,目前已经出现的语言既有双语的也有单一研究语言的(质性或量化的)。最近混合方法书籍中术语表的使用显示了对于共同词汇的需要(Morse & Niehaus, 2009; Teddlie & Tashakkori, 2009)。然而这些例子也引发了一些难题,比如谁控制混合方法的语言?它如何进行表达?这些语言应该包括哪些?此外,这些事例还带来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混合方法议案和项目的写作如何影响项目的批准、资助和发表?

令人困惑的(以及复杂的)设计

不仅语言会使混合方法的话语充满困惑和争议,对混合方法文章中讨论最多的研究设计,研究者也面临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关于混合方法研究实施的名称和类型。一个混合方法研究者如何进行一项混合方法研究呢?当我的同事克拉克(Vicki Plano Clark)和我一起为混合方法研究新手写该领域的导论时(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我们列出了来自评估、护理、公共健康和教育多个领域中12个不同的设计分类体系。

为了减少这种混乱,我们建议对设计类型进行缩减。三角验证的(或现在称为聚合的)设计会在某一段时间同时收集质性和量化的数据。解释性或者探索性设计要求在两个阶段分开收集数据,先收集质性数据,再收集量化数据(或者反之)。在嵌入式设计(embedded design)中,一种数据嵌入到另一种数据之中,它可以是在同一个阶段同时收集的,也可以是在两个阶段按照先后顺序收集。所有这些设计中,我们更加关注质性和量化数据、两种数据的安排和研究过程中数据的混合。为了呈现这些设计,我们使用莫尔斯(Morse, 1991)首次提出后来经过修订的概念体系,此外我们还绘出了这些程序的图表并且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文献中建构这些图表的高级指导原则(Ivankova, Creswell, & Stick, 2006)。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设计并不复杂,足以反映真实的实践,然而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为混合方法研究的新手提供设计。并且我们现在也注意到了在文献中所使用和宣称的其他复杂设计。例如,纳斯塔希和同事在文章中论述了一个多阶段复杂评估设计,并将按照序列和同时收集数据的方法结合起来(Nastasi et al., 2007)。各种期刊所发表的设计已经纳入了方法的“不同寻常的混合”,例如质性和量化的纵向数据、话语分析与调查数据、不断重复的从属的质性数据的结合,以及从质性主题与调查数据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变量(Creswell, 2011)。这些设计

还提出了在同一表格中排列质性和量化数据的交叉模型,这种方式也符合质性软件的矩阵特征(Kuckartz,2009)。

我们的设计和这些分类将类型学带入到混合方法设计中。马克斯韦尔和卢米斯(Maxwell & Loomis,2003)认为我们需要找到类型学的代替形式,他们对研究过程中的目的、概念框架、问题、方法和效度五个相互作用的维度进行了系统的定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提供了更加全面、更为广泛的视野来定义混合方法设计。霍尔和霍华德(Hall & Howard,2008)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协作形式,即两个或更多的选择相互作用,这样它们的组合效应比单个效应的总和要大许多。研究者在看待混合方法时并没有优先采用哪种方式,而是平等地考虑它们的价值。研究者也从多样化的视角出发平等对待这两种方式,这样就平衡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研究团队中的合作包含了在质性和量化方法中同样的技能专业知识。

这种协同方式再加上对于类型学观点的挑战共同促进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之间差异的松动,也解决了方法主导性的问题(Denzin & Lincoln,2005),同时这种方式也强调拥有多样化专业知识的研究团队。基于以上讨论,研究设计的类型学是否已经过时?新的、更自由的设计会促进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思考吗?

不合适的设计

另一个关于设计的程序性问题是混合方法是否不适于其他领域的设计。随着混合方法越来越受欢迎,传统的设计不适用于这些使用了混合方法的领域吗?这里有几个例子。许多年来,量表设计广泛应用在量化研究中(DeVellis,1991)。量表设计的早期阶段经常需要一个最初的探索,尽管这可能包括回顾文献而不是进行广泛的质性数据收集,例如焦点小组的使用(Vogt,King,& King,2004)。有人可能会认为量表应该是混合方法研究的独特环节,然而在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以开发研究工具为目的的混合方法设计比比皆是(Myers & Oetzel,2003)。

另一个例子是内容分析。这种量化程序涉及两个方面,质性数据的收集以及采用量化的计数方式对质性数据进行转化和分析。在这种方式中,并没有把质性和量化数据放在一起,但是这既是质性研究(数据的收集),也是量化研究(数据的分析)。如果一个人认为混合方法既收集量化数据也收集质性数据,那么内容分析就不符合混合方法研究的要求。内容分析是一种单独的方式吗?或者正如桑德罗斯基(Sandelowski et al.,2009)所言,数据转换是混合方法设计的一部分吗?对于混合方法研究而言适宜的界限是什么呢?

也许混合方法事实上是大量设计中一套附属的程序集,我把这种方式称为使用一个框架来制订混合方法程序。最基本的思想是一些较大的框架成为占位符,研究者在这种占位符之内收集质性和量化数据(或制订混合方法程序)。这

个思想最先出现于一位参加研讨会学者的提问:“民族志是混合方法研究吗?”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从传统上来讲,民族志学者既收集质性资料,也收集量化数据,并且在他们对文化共享群体的描述和分析中都会用到这些数据。莫尔斯和聂豪斯(Morse & Niehaus,2009)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许多民族志学者都把他们的方法论看作一种独特的方式,民族志应该被视为独立于混合方法之外。

但是我担心将混合方法看作民族志内的一种附属程序是否是最合适的做法。研究者似乎都是在更大的框架之内使用混合方法,例如在叙事研究(Elliot,2005)、实验(Sandelowski,1996)和个案研究(Luck,Jackson,& Usher,2006)等框架内。也有一些其他的框架,例如在社会网络分析中(Quinlin,2010)、女性主义的视角下(Hesse-Biber & Leavy,2007)或者在行动研究中使用混合方法(Christ,2009)。如果混合方法设计可以延伸至这些不同的框架,那么拓展混合方法使用范围的目的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混合方法和其他的设计之间的边界在哪呢?这种边界是必要的吗?

额外的价值

不管研究是否合适,混合方法研究的效用——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都会受到它是否有价值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我们早些时候的定义中(Creswell & Clark,2007),我们最后谈到了这个假设,即方法的结合比起单独使用质性或量化方法来说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这个假设能被证实吗?追溯混合方法最近的发展,我想起了 Sage 出版社总裁在一次午宴会议中问我的问题:“与单独使用质性研究或者量化研究相比,混合方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吗?”(Creswell,2009b,p.22)。对这个难题的回答是证明混合方法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键。不幸的是,在混合方法领域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我能够展示一系列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假定性研究。一种方式就是借助于早期研究所使用的研究程序,这些研究往往会比较参与式观察和问卷调查的结果(Vidich & Shapiro,1955)或者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Sieber,1973),同时要考察这两个数据库在理解一个研究问题上是否有分歧。第二种方式是做一项实验,在实验中读者分别参与到研究的质性方法组、量化方法组和混合方法组。在实验中,研究者会具体解释实验结果,例如结果解释的质量、更多证据的融合、研究的严密性或者研究的可信性,同时实验也会比较这三个小组的结果。第三种方式就是考察混合方法研究作者的出版产出,其形式可能是“科研产量”,例如有学者(O'Cathain,Murphy,& Nicholl,2007)所提出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宣称是混合方法研究的作者是否真正混合了数据来评估结果。其他形式可能是质性文献分析,也可能是主题分析,这些主题来自混合方法经验研究的作者和方法论研究的作者的价值陈述。例如,来自沟通研究领域的作者们认为混合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研究结果中的局限:

> 为了更加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说明研究中可能的局限,我们应该追求更广泛的跨文化交流课程的学生参与评估。(Corrigan, Pennington, & McCroskey, 2006, pp.15-16)

当然,也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混合方法领域不能充分地解决这个争议,因此我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比起单独的质性或量化方法,混合方法研究能更好地解决研究中所提出的核心研究问题吗?评估它的标准应该是什么?为什么混合方法研究者没有积极主动地讨论这个议题?

总　结

关于混合方法的批判性评论都是针对它的意义和定义的,这些批判触及了它存在的核心。这种讨论主要是争论混合方法是否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论、一种结合或者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关键问题在于混合方法是否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它是否会强化对术语的偏见使用以及是否会产生质性数据与量化数据之间的错误的二元对立性区别。

我假设混合方法研究者十分认真地对待范式(世界观、观念和价值),我看到范式讨论是混合方法文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讨论话题,从一种单一的范式观点,例如实用主义或者变革性—解放性的观点,到辩证的方式中使用的多样化范式,再到设计中的范式,这些不同的范式都出现了多样化的观点立场。现在已经不再讨论哪一个具体范式或者使用多少范式,而是集中于在学术界内使用范式。批评者仍然关心当前的混合方法是否青睐后实证主义的思想以及是否会制造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话语。

到目前为止,在混合方法文献中还没有哪些话题能像它的方法和设计这样被广泛地讨论,在研究中过于注重方法有时是以牺牲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为代价的(Gurtler, Huber, & Kiegelmann, 2007)。另外,混合方法文献的批评者也看到了令人困惑的、不同类型的、有着不一般名称的设计,同时混合方法提出了太多的、超过它本身应该拥有的设计,并且它的结果也是有问题的。

这些争议的影响在于他们中间有很多是相互联系的,我在这里把他们进行分类整理也是很勉强的。当学者们讨论这些争议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讨论涉及很多话题而不是深度分析任何一个争议。另外,这些争议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的,从混合方法的意义与合理性等基本问题到它的哲学基础,再到进行混合方法研究的实用性问题。从最根本的方面来讲,我的观点是混合方法领域的学者应该尊重这些争议的存在并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

一些读者会说我忽视了一些关键的争议问题,例如研究问题与方法、效度、混合方法的评估、混合方法研究的写作以及“谁关心方法”这些普遍性问题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其他一些读者可能会将我的观点看成是蓄意侵犯

(Richardson,1997):挑战混合方法而不是支持、倡导它。还有一些人认为我的评论是在试图打开混合方法话语的大门,就像我在担任《混合方法研究》的合作编辑时所提出的那样。也有一些人将我论述支持与反对这些议题的正当理由看作是后实证主义偏好的证据。所有这些对我的看法既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对这些争议讨论的结果感兴趣,也许不应该将苏格兰埃尔芬斯通大厅视为铜墙铁壁,我应该已经见到围墙所投射出的阴影。最后,我建议那些对混合方法感兴趣的人应该再次评估他们对于现在所提出的这些争议的承诺。正如库恩(Kuhn,1970)所说,"对我来说,一次变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改变,它涉及群体承诺的某种重建"(p.181)。

参考文献

Andrew, S., & Halcomb, E. J. (Eds.). (2009). *Mixed methods research for nursing and the health sciences*. Chichester, UK: Blackwell.

Bergman, M. M. (2008). *Advanc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London: Sage.

Brewer, J., & Hunter, A. (1989). *Multimethod research: A synthesis of styles*. Newbury Park, CA: Sage.

Bryman, A. (1988).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ryman, A. (2006).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How is it done? *Qualitative Research*, *6*(1), 97-113.

Buck, G., Cook, K., Quigley, C., Eastwood, J., & Lucas, Y. (2009). Profiles of urban, low SES, African-American girls'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A sequential explanatory mixed methods study.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4), 386-410.

Campbell, D. T. (1974). *Qualitative knowing in action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Campbell, D. T., & Fiske, D. W. (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6*, 81-105.

Christ, T. (2009). Designing, teaching, and evaluating two complementary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urse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4), 292-325.

Corrigan, M. W., Pennington, B., & McCroskey, J. C. (2006). Are we making a difference? A mixed methods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struction on American students. *Ohio Communication Journal*, *44*, 1-32.

Creswell, J. W.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2007, May). *Concerns voiced abou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Qualitative Inquiry Congr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Creswell, J. W. (2008). *Educational research: Planning, conducting, and evalu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Creswell, J. W. (2009a, October). *The desig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occupational therapy*. Presentation to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Occupation, New Haven, CT.

Creswell, J. W. (2009b). *How SAGE has shaped research methods: A 40-year history*. London: Sage.

Creswell, J. W. (2009c).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2009d, March). *What qualitative evidence means for mixed methods intervention trials in the health scien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Research Seminar hosted by the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Unit,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Aberdeen, Scotland.

Creswell, J. W. (2010). Mapping the developing landscape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45-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W., & Garrett, A. L. (2008). The "movement"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educato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8*, 321-333.

Creswell, J. W., & McCoy, B. R. (in press). The use of mixed methods thinking in documentary development. In S. N. Hesse-Biber (Ed.), *The handbook of emergent technologie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11).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Plano Clark, V. L., & Garrett, A. L. (2008).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 In M. M. Bergman (Ed.), *Advanc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pp. 66-83). London: Sage.

Creswell, J. W., Shope, R., Plano Clark, V. L., & Green, D. O. (2006). How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extends mixed methods research.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 1-11.

Cronbach, L. J. (1975). Beyond the two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0*, 116-127.

Crotty, M. (1998).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research: Meaning and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London: Sage.

David, L., Bender, L., Burns, S. (Producers), & Guggenheim, D. (Director). (2006). *An inconvenient truth* [Motion picture]. United States: Paramount Classics.

Denscombe, M. (200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mixed methods approa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 270-283.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6). Introduc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s* (pp. ix-xxxi).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Vellis, R. F. (1991).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Elliot, J. (2005). *Using narrative in social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Sage.

Engel, R. J., & Schutt, R. K. (2005). *The practice of research in social work.*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elding, N. G., & Fielding, J. L. (1986). *Linking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Forman, J., & Damschroder, L. (2007, February). *Using mixed methods in evaluating intervention studies.* Presentation at the Mixed Methodology Workshop at the national meeting of 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Arlington, VA.

Freshwater, D. (2007). Read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ntexts for criticism.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34-145.

Giddings, L. S. (2006). Mixed-methods research: Positivism dressed in dra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Nursing*, *11*(3), 195-203.

Greene, J. C. (2007).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inquiry.* San Francisco, CA: John Wiley.

Greene, J. C. (2008). Is mixed methods social inquiry a distinctive methodology?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1), 7-22.

Greene, J. C., & Caracelli, V. J. (Eds.). (1997). Advances in mixed-method evalu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integrating diverse paradigms. *New Directions for Evaluation, 7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reene, J. C., Caracelli, V. J., & Graham, W. F. (1989).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1* (3), 255-274.

Greenstein, T. N. (2006). *Methods of family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2005).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191-2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rtler, L., Huber, L., & Kiegelmann, M. (2007). Conclusions: The reflective use of combined methods—a vision of mixed methodology. In P. Mayring, G. L. Huber, L. Gurtler, & M. Kiegelmann (Eds.), *Mixed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p. 243-245). 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Hall, B., & Howard, K. (2008). A synergistic approach: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with typological and systemic design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3), 248-269.

Heigham, J., & Croker, R. A.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Hesse-Biber, S. N., & Leavy, P. L. (2007). *Feminist research practice: A prim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dgkin, S. (2008). Telling it all: A story of women's social capital using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 (4), 296-316.

Holmes, C. A. (2006, July). Mixed (up) methods, 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ive framework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xed Methods Conference, Cambridge, UK.

Howe, K. R. (2004). A critique of experimentalism. *Qualitative Inquiry, 10*, 42-61.

Ivankova, N.V., Creswell, J. W., & Stick, S. L. (2006). Using mixed methods sequential explanatory design: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ield Methods*, *18*(1), 3-20.

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J. (2004).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3*, 14-26.

Johnson, R. B., Onwuegbuzie, A. J., & Turner, L. A. (2007).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12-133.

Kuckartz, U. (2009). *Realizing mixed-methods approaches with MAX-QD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hil-lipps-Universitaet, Marburg, Germany.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ch, N. L, Dellinger, A. B., Brannagan, K. B., & Tanaka, H. (2010). Evaluating mixed research studies: A mixed methods approa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4* (1), 17-31.

Lincoln, Y. S., & Cannella, G. S.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power, and the radical right. *Qualitative Inquiry*, *10*(2), 175-201.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Luck, L., Jackson, D., & Usher, K. (2006). Case study: A bridge across the paradigms. *Nursing Inquiry*, *13*(2), 103-109.

Maxwell, J., & Loomis, D. (2003). Mixed methods desig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241-2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yring, P. (2007). Introduction: Arguments for mixed methodology. In P. Mayring, G. L. Huber, L. Gurtler, & M. Kiegelmann (Eds.), *Mixed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p. 1-4). Rotterdam/ Taipei: Sense Publishers.

Mayring, P., Huber, G. L., Gurtler, L., &

Kiegelmann, M. (Eds.). (2007). *Mixed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Mertens, D. M. (2003). Mixed methods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research: The transformative-emancipatory perspective.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135-1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rtens, D. M. (2009).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New York: Guilford.

Miall, C. E., & March, K. (2005). Community attitudes toward birth fathers' motives for adoption placement and single parent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6*, 380-410.

Morgan, D. L. (2007). 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1), 48-76.

Morse, J. M. (1991).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Nursing Research*, *40*, 120-123.

Morse, J. M. (2005). Evolving tren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dvances in mixed methods design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5*, 583-585.

Morse, J. M., & Niehaus, L. (2009). *Mixed method design: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Myers, K. K., & Oetzel, J. G. (2003).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assimilation: Creating and validating a measure.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1*(4), 438-457.

Nastasi, B. K., Hitchcock, J., Sarkar, S., Burkholder, G., Varjas, K., & Jayasena, A. (2007). Mixed methods in intervention research: Theory to adaptation.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64-182.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Pub. L. No. 107-110, 115 Stat. 1425 (2002).

O'Cathain, A., Murphy, E., & Nicholl, J. (2007). Integration and publications as indicators of "yield" from mixed methods studie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47-163.

Olivier, T., de Lange, N., Creswell, J. W., & Wood, L. (2009, July). *Teachers as video producers and agents of change: A transformative mixed methods approa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annual Mixed Methods Conference, Harrogate, UK.

Onwuegbuzie, A. J., & Johnson, R. B. (2006). Types of legitimation (validity)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1), 48-63.

Onwuegbuzie, A. J., & Teddlie, C. (2003).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ata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351-383).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on, M. Q. (198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lano Clark, V. L. (2010). The adoption and practice of mixed methods: U. S. trends in federally funded health-related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6*(6), 428-440.

Plano Clark, V. L., & Creswell, J. W. (2008). *The mixed methods reader.* Thousand Oaks, CA: Sage.

Quinlin, E. (2010). Representations of rape: Transcending methodological divide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4*(2), 127-143.

Reichardt, C. S., & Rallis, S. F. (Eds.). (1994).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ebate: New perspectiv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Richardson, L. (1997). *Fields of play: Constructing an academic lif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Rossman, G. B., & Wilson, B. L. (1985). Numbers and words: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a single large-scale evaluation study. *Evaluation Review*, *9*(5), 627-643.

Ryan, K. E., & Hood, L. K. (2006). Guarding the castle and opening the gates.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conservative challenge* (pp. 57-77).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Sale, J. E. M., Lohfeld, L. H., & Brazil, K. (2002). Revisit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mixed-methods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36*, 43-53.

Sandelowski, M. (1996).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vention studies.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19*(4), 359-364.

Sandelowski, M., Voils, C. I., & Knafl, G. (2009). On quantitizing.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3), 208-222.

Shank, G. (2007). How to tap the full potentia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by apply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 Mayring, G. L. Huber, L. Gurtler, & M. Kiegelmann (Eds.), *Mixed methodolog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p. 7-13). Rotterdam/Taipei: Sense Publishers.

Shavelson, R. J., & Towne, L. (Eds.) (2002).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y Press.

Sieber, S. D. (1973). The integration of fieldwork and survey metho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35-1359.

Sieber, S. D., & Lazarsfeld, P. F. (1966). *The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USOE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 No. 197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Stake, R. (1995). *The art of case study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ange, K. C.,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2006). Publishing multimethod research. *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 *4*, 292-294.

Stenner, P., & Rogers, R. S. (2004). Q methodology and qualiquantology. In Z. Todd, B. Nerlich, S. McKeown, & D. D. Clarke (Eds.), *Mix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01-120). Hove an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Sweetman, D., Badiee, M., & Creswell, J. W. (2010). Use of the transformative framework in mixed methods studies. *Qualitative Inquiry*, *16*(6), 441-454.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Eds.). (2003).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3).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From data triangulation to mixed model design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671-701).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9).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odd, Z., Nerlich, B., McKeown, S., & Clarke, D. D. (2004). *Mix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Hove an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Vidich, A. J., & Shapiro, G. (1955). A comparison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urvey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 28-33.

Vogt, D. S., King, D. W., & King, L. A. (2004). Focus groups i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Enhancing content validity by consulting member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6*, 231-243.

Vogt, P. W. (2008). Quantitative versus qualitative is a distraction: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Brewer & Hunter (2006).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Online*, *3*, 1-10.

Vygotsky, L. S., & Cole, M.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Yin, R. K. (2006).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re the methods genuinely integrated or merely parallel?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1), 41-47.

16 混合方法研究：当代研究领域的新议题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NTEMPORARY ISSUES IN AN EMERGING FIELD

⊙查尔斯·特德列(Charles Teddlie)　阿巴斯·塔沙考里(Abbas Tashakkori)

邓 猛 译　朱志勇 校

混合方法研究(MMR)，也可称作“第三次方法论运动”，其研究方法和范式已经在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领域里持续讨论了至少三十年。一直以来，质性研究者和量化研究者之间的“范式争辩”是基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假设的相互作用，混合方法研究则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第三种选择形式，认为在同一项研究中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兼容的并能有效使用(Howe，1988；Tashakkori & Teddlie，1998)。

本章简要陈述了当代混合方法研究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包括理论和概念、实践操作以及对“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评论。我们建议读者把本章看作当今混合方法研究问题的“样本”，若感兴趣，请查阅文后的参考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与起源

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

随着混合方法研究领域的发展，一些学者一直在力求准确定义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Creswell，2010；Greene，2007，2008；Johnson，Onwuegbuzie，& Turner，2007；Tashakkori & Teddlie，1998，2003a)，但关于这个领域不同称呼的争论仍在继续，包括混合方法研究、多元方法研究、混合方法、混合方法论、混合研究、综合研究等不同的名称。

幸运的是，“混合方法研究”这个术语因被普遍使用而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例如，在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期刊和这本手册的第2版里都使用了该名称)。我们猜测这个术语会被长久地使用下去，因为它现在已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这足以使它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广泛传播。

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约翰逊等人(Johnson et al.，2007)概括了19种可供选择的定义，虽然这些定义各具特色，但约翰逊等人将这些定义综合起来，

认为:

> 混合方法研究是研究者或研究团队将质性要素与量化研究方式相结合的研究类型(例如,质性和量化的观点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推理),从而达到深入理解研究问题和证实研究结果的目的。(Johnson et al.,2007,p.123)

我们采纳这个定义是因为它包含了我们所认可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本质特征:方法论的折中主义(methodological eclecticism)。这个术语的使用频率较低(例如,Hammersley,1996;Yanchar & Williams,2006),哈默斯利最先对这个特征进行如下描述:

> 暗含于混合方法研究之中的是一种方法论的折中主义。事实上,人们也经常提供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结合,因为它能抵消每个方法各自的缺点。(Hammersley,1996,p.167)

我们对方法论折中主义的定义不仅仅是把质性和量化方法进行简单结合从而消除各自的缺点。折中作为折中主义这一词汇的词根,意思是指"从各种不同的来源、系统或风格中选择那些似乎是最好的"。对我们来说,折中主义方法论首先是从一系列的质性、量化和混合方法中选择最恰当的方法,然后再将它们综合起来,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研究你所感兴趣的现象。秉承折中主义方法论的研究人员一定是研究方法的行家[1],他能聪明地(而且往往是出于直觉)选择最好的方法,来解决在研究过程中频繁变化的研究问题。

注重质性方法的混合方法研究起源

20世纪70年代后期混合方法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取向出现在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应用领域中,例如评估、护理和教育等领域(例如,Greene,Caracelli,& Graham,1989; Miles & Huberman,1984,1994;Morse,1991;Patton,1980,1990,2002;Reichardt & Cook,1979;Rossman & Wilson,1985)。混合方法研究起源于应用性而不是纯粹的人文科学,这并不是偶然,因为这些学科往往需要研究者从实用主义和广阔的视角出发,利用所有收集到的数据来解决实践问题。

在早期的混合方法研究中,研究者将质性要素添加到那些最初是量化的研究中,从而加深对数据结果的理解。在评估研究中,混合方法研究将形成性成分(这个项目如何或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添加到总结性成分中(项目工作)。在人文科学里,这种差异是与因果效应(即因为 X 而导致 Y 的变化)而不是因果机制(即 X 如何导致 Y 的变化)相关联(例如,Shadish,Cook,& Campbell,2002)。

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从参与者和调查人员的叙述中收集到的信息,往往被证明对于理解复杂现象最有价值。例如,对一些学校采用质性取向的个案研究显示,这些学校所表现出的情景与行为模式要比数字指标的统计学意义更加复杂(Teddlie & Stringfield,1993)。简单地说,对于很多研究者及参与者来说,叙述(故事)在本质上比数字更令人感兴趣(而且更具有启发性)。因此几位混合方法研究先驱都撰写过关于质性方法的文章,这并不是巧合。

在本手册第 4 版中我们向质性研究方法对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了我们的敬意,同时在这本手册里一些学者也表达了对混合方法研究中将质性方法置于量化方法的从属地位的担忧(例如,Denzin & Lincoln,2005;Howe, 2004)。我们并不是在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有关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献。事实上,质性加量化的研究强调对于人类"数据收集工具"和结果解释进行详细的主观性理解,这是所有现存的混合方法研究文献最重要的价值。

我们也相信混合方法研究能够将一个重要维度添加到量化研究中。当前的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已经存在很多对随机可控试验(RCTs)重要性的讨论(Mosteller & Boruch,2002;Shavelson & Towne,2002),而 RCTs 可能代表鉴定因果效应的"黄金标准",将质性成分(例如个案研究)添加到设计中也能让研究者讨论因果机制。在混合方法研究文献中有几个例子,包括(1)健康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混合方法干预项目研究(Song,Sandelowski,& Happ,2010)和(2)多个学科中的群体个案方法(也称为实验民族志,例如 Teddlie,Tashakkori,& Johnson,2008)。混合方法研究能够让研究人员在这些领域里考察研究问题,而仅靠传统的量化方法是无法做到这点的。

混合方法研究的当代特征

在开始这部分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在混合方法研究领域里一些学者可能不认同我们下面描述的这些混合方法的特征,或者不认同对这些特征的解释。这是学术界大部分新兴领域都会面临的问题,新思想提出之后必然会引起对该思想的争论。尤其是混合方法研究,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表格 16.1 列出了混合方法研究的 8 个当代特征)。

我们在本章的前一节描述了混合方法研究的第一个特征:方法论的折中主义。这个特征起源于对"方法的不兼容"观点的否定,持"方法的不兼容"观点的研究者宣称在同一个研究中混合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并不合适,因为与他们各自范式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霍伊(Howe,1988)用可兼容的论点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结合是一件好事",并且"否定了'方法的结合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间断与混乱'的观点"(p.10)。霍伊提出将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备选的范式,该建议已获得其他许多学者的支持(Biesta,2010; Johnson & Onwuegbuzie,2004; Maxcy,2003;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表 16.1 当代混合方法研究的 8 个特征

特征描述
1.方法论的折中主义
2.范式的多元主义
3.强调研究领域各层次的多样性

续表

特征描述
4.强调连续性而非二元对立
5.研究的反复性和循环性
6.根据研究问题(或研究难题)决定研究中所要采取的研究方法
7.一组基本的研究设计和分析过程
8.暗含于“第三种方法论领域”的平衡和妥协

方法论的折中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结合方法,而且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认为的最好的方法工具来解决问题。我们将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称为“优质设计(design quality)”[2],并且将它作为我们确定混合方法研究的推论质量框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Tashakkori & Teddlie,2008)。此外,我们相信对人文科学领域任何特定的研究来说,最佳的方法可能是纯质性的、纯量化的,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

舒伦伯格(Schulenberg,2007)列举了一个复杂的混合方法研究中方法论折中主义的例子,该研究发生在警方做决策的时期。她的数据来源包括对个别人员的访谈、受访者提供的文件、从警察部门网站收集的质性数据、省级政府的文件、人口普查数据和因犯罪而被逮捕的青少年比例的统计数据。从警方那里收集来的访谈数据最初实际上是质性形式(半结构式的访谈),随后被转换成数字形式(量化)。

舒伦伯格(Schulenberg,2007)利用这些不同的数据源形成了五个独立的用来解决研究问题和假设的数据库。她采用了八种质性技术和六种统计量化技术,其中包括 t 检验、卡方检验、多元回归、方差分析、内容分析、连续比较和扎根理论技术。刑事学家/社会学家的方法论折中主义(鉴赏力)是显而易见的。

混合方法研究第二个当代发展的特点是范式多元主义,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范式都可以作为混合方法使用的哲学基础。这个特点体现了混合方法研究对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否定,也被混合方法研究界广泛接受。

我们之所以认为当代混合方法研究是一个“大帐篷”,因为目前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人员来自不同的哲学倾向群体(例如,实用主义、批判理论和辩证观)。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因为个体的概念框架不同就把他们从混合方法研究界剔除出来是不明智,而且也是没必要的。我们认同邓津(Denzin,2008,p.322)对问题的解释,该问题最初由古巴(Guba,1990)提出:“范式倾向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个人的长途冒险行程;我们每个人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一种偏爱的范式,我们应该尊重这种范式。”

虽然范式多元主义得到了混合方法学者的广泛认同,但是与混合方法研究有关的理论和概念上的对话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后面我们将概括出混合方法研究领域的发展和争议。

当代混合方法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研究领域各个层次的多样性,涉及的范围从广泛的概念维度到狭窄的经验维度,这点在方法论折中主义和范式多元主义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并且还将延伸到其他问题。例如,混合方法研究可同时解决各个领域中的验证性问题和探索性问题[3],而单一的研究方法经常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此外,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将那些由于数据来源和分析的复杂性而导致在结论和推论方面出现分歧的观点进行分类,使之具有条理。

混合方法研究一定程度上出自三角验证方面的文献(如,Campbell & Fiske,1959;Denzin,1978;Patton,2002),而且通常与不同来源的结果密切相关,然而,越来越多的人(Erzberger & Kelle,2003;Greene,2007;Johnson & Onwuegbuzie,2004;Tashakkori & Teddlie,2008)意识到将不同来源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分歧,这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同一个现象或一项新的研究设计过程的复杂性。

当代混合方法研究的第四个特征是强调连续性而不是二元对立。混合方法研究的显著标志就是用连续谱代替"非此即彼(either-or)"的形式,这种连续谱能描述一系列的选择形式(Newman, Ridenour, Newman, & DeMarco, 2003; Patton, 1980,1990,2002; Ridenour & Newman,2008; Tashakkori & Teddlie,2003c)。例如,我们可以将质—混合—量(QUAL-MIXED-QUAN)的多维度连续谱运用到各种研究问题中,包括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抽样、数据收集和分析、效度或推论质量等方面(Teddlie & Tashakkori,2009)。非此即彼的这种二元对立形式(例如解释性或探索性问题、统计或者主题分析)已经被其他一系列的选择形式(包括整体的问题和混合数据分析的新颖方法)代替了。

当代混合方法研究的第五个特征是反复性和循环性。混合方法研究可以描述为循环研究,在同一个研究中既包括归纳逻辑也包括演绎逻辑[4](Krathwohl, 2004; Tashakkori & Teddlie,1998)。这种循环表现为通过归纳逻辑从扎根结果(事实和观察)到一般性推论(抽象概括化或者理论),然后通过演绎理论从这些一般性推论(或理论)到尝试性假设或者特定时间或结果的预测。研究可以从循环中的任何一点开始:一些研究者可能从理论或者抽象的概括开始,而其他人可能从观察或者其他数据点开始。随着研究者对于现象的深层理解,这种循环可以重复进行。我们相信所有的研究项目都至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不管他们的起始点在哪(Teddlie & Tashakkori,2009)。

这种循环的方式可以从以下二者之间的区别来定义:

> 验证的情境或逻辑(context or logic of justification)——与检验预测结果、理论和假设相关的过程。
>
> 探索的情境或逻辑(context or logic of discovery)——与深度理解一个现象、理论和假设的概括化相关的过程。

尽管许多混合方法研究的学者承认验证的逻辑是他们研究中关键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也强调探索情境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创造性的洞察力,从而产生新

知识(Hesse-Biber,2010; Johnson & Gray,2010; Teddlie & Johnson,2009)。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发现成分经常但并不总是来自与质性数据分析相关的新兴主题。

我们也将研究的循环本质定义为描述签名混合方法研究特征的“衰退和流动”,例如序列研究设计。在该部分的后面可以看到更多关于签名混合方法设计特征的详细说明。

大多数混合方法研究的文章中都会提到的第六个特征是,根据研究问题(或研究难题)决定研究中所要采取的研究方法(Bryman, 2006; Johnson & Onwuegbuzie,2004; Tashakkori& Teddlie,1998)。研究问题的中心最初是让研究者(特别是研究新手)远离那些与范式争论有关的哲学问题,专注于选择最适合他们研究问题的调查方法。

关于研究起点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表述了。研究者是以一个世界观或概念问题、开展研究的一般目的、研究问题或者以上几点的结合来开始一项研究的吗?纽曼等人(Newman et al.,2003)坚定地宣称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与研究问题相比,研究目的已经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然而我们认为,一旦研究者确定了研究问题(例如,研究动机、目的、个人/政治的问题等),研究问题的细节将会决定采用什么工具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有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研究问题会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修正和重新聚焦。然而,研究问题往往也会指向研究的路径。

混合方法研究的问题经常是很广泛的,它既需要深入的、浮现的质性数据,也需要集中的、预先计划好的量化数据。这些广泛的“雨伞式”的问题经常需要分解为具体的子问题。然而,在一些(顺序)混合方法研究项目中,混合性的问题出现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之后,而不是作为最初的“雨伞式”的问题。例如,通过收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可能会询问和解答一个广泛的和浮现的问题,在此之后跟随着一个关于研究结果在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推广性的问题或者推广到一个群体的问题,尽管在这些混合方法设计中会出现次序问题(在研究中出现的顺序设计,或研究开始之前就设计好顺序),然而这两组结果必须合并起来以使我们达成更加广阔的理解(例如元推论)。

现代混合方法研究的第七个特征是有一套基本的研究设计和分析过程,虽然有不同的名称和图表解释,但它们大部分已得到认同,例如我们称平行混合设计(Teddlie & Tashakkori,2009,p.341)为:

> 在混合方法设计中,混合以独立的方式同时出现或者按顺序出现。为了回答同一个问题,同时计划并实施了质性和量化的方法。

这些设计也被称作并行设计、同时设计和三角验证设计(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p.85),但是其定义中存在更多的共同性。

在这一部分的前面,我们提到了签名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和分析过程,例如顺序混合设计或转化程序。我们称这些设计和分析过程为“签名”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定义与质性或量化方法有关的混合方法研究;对于混合方法研究来说,它

们是独特的,并且有助于使混合方法与其他两种方法相分离。这些签名设计和分析过程包括:

- 顺序混合设计"是混合方法的一种设计形式,混合发生在研究的各个时期(质性和量化的);一个问题或程序链经常出自或独立于过去的链条;研究问题建立在另一个问题之上并且可能随着研究的进行而发展"(Teddlie & Tashakkori,2009,p.345)。
- 量化过程指将质性数据转化为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数字编码过程(Miles & Huberman,1994; Sandelowski,Voils,& Knafl,2009)。
- 质化过程[5]指将量化数据转化为可以进行质性分析的文本数据的过程(Tashakkori & Teddlie,1998)。

更多的混合方法研究所固有的签名设计和分析程序在后面会进行详细讨论。尽管对于独特的混合方法研究和分析程序的存在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在术语和定义方面仍存在不同意见,并且这些不同意见进一步拓展到更加复杂的类型学。例如,由于研究中质性成分的突发特征和混合方法研究的转换能力,许多人相信在混合方法研究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类型学,其他人则为了简化和教学的缘故,寻求在大量的基本设计中达成共识。

混合方法研究的第八个特征是暗含于"第三种方法论领域"的平衡和妥协趋势。混合方法研究是建立在拒绝二元对立这个论题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们倾向于在研究中达到质性和量化的平衡,同时形成一个独特的混合方法研究身份特征。这种平衡与约翰逊和昂乌格布齐(Johnson & Onwuegbuzie,2004)对实用主义的描述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实用主义是在哲学二元主义与为那些看起来不可解决的概念争论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法之间寻求一个中间地带。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再一次提及古巴(Guba,1990)关于范式的三个阶段:

- "提供可选择的范式来减少对抗冲突。"
- "探索范式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途径。"
- "三个主要的解释性领域……必须了解如何进行相互之间的合作。"(Denzin,2008,p.322)

我们相信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这些主题,它们需要在三个方法论领域的对话中寻求妥协。

混合方法研究中的理论和概念问题

尽管在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些宽泛的特征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在混合方法研究内仍然能持续进行关于基本理论和概念问题的对话。我们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1)与范式相关的问题,这些范式也指其他相关的术语,例如立场、方式、框架、观点和构思模型等;(2)与混合方法研究的语言相关的问题。

与范式的使用相关的问题（或概念性框架或心理模型）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提供关于范式多元主义概念的详细信息，然后我们提供混合方法研究三个范式倾向，之后讨论一些反对持续关注范式问题的评论。

在前文中我们将范式多元主义作为现代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个特征。多样化的范式可以充当潜在的概念框架，这种观念是解决复杂的哲学和概念问题的实践方式：研究者只使用符合他们特定“智力冒险行程”的哲学框架。

大部分混合方法的研究者同意将范式多元主义作为一个起点，但是他们必须(1)考虑可替换的范式倾向；(2)确定这些倾向中哪些与自己的观点密切相关。下面的三个范式倾向在当代混合方法研究中是广为接受的：

- 实用主义及其解释。
- 与价值论假设相关的框架。
- 涉及在同一项研究中使用多样假设框架的辩证立场。（Greene，2007；Greene & Caracelli，2003）

在进一步考察这些观点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地再次考虑范式多元主义的后果，它一直被假定反对单一范式方法（例如，后实证主义和量化方法；建构主义和质性方法）。邓津（Denzin，2008，p.317）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拒绝单一范式的方法：

> 当从一种范式转向多样化认识论范式时，许多人宣称在不同的范式之间会出现不兼容，不仅仅是实证主义及其他的批评者，建构主义之间的不兼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话语言论的发展，不同范式之间的互补优势逐渐显现，并且如今在混合方法领域被很多人所接受，这是开始重新书写历史的地方。在同一个混合方法研究中可以使用多样化的范式……因此我们要开始庆祝单一理论或方法论范式的终结。

我们应当认识到邓津的分析不仅强调范式多元主义，而且还强调研究者有可能在同一研究中使用多样化的框架。这个观点仅仅得到上述当代观点倾向的支持（辩证的立场）。遵守实用主义或者建立在价值论假设基础框架上的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普遍使用那种观点。

实用主义及其解释

许多方法论者在选择范式时偏爱实用主义（Tashakkori & Teddlie，1998），这种偏好从历史上看可追溯到霍伊（Howe ，1988）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兼容性假设。这种对待哲学问题的实用主义方式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使用“日常实用主义”解决研究和评估问题（Biesta，2010）的应用科学家。

最近出现了一个更具有哲学色彩的实用主义（Biesta，2010；Greene & Hall，2010；Johnson & Onwuegbuzie，2004；Maxcy，2003；Teddlie & Tashakkori，2009）。这种实用主义提出疑问，“除了拒绝二元对立的思想形式之外，实用主义对于混合方法研究来说还意味着什么？”我们简单地描述了最近针对这个问题的三个实

用主义的解释(Biesta,2010; Greene,2007)。

约翰逊等(Johnson & Onwuegbuzie,2004)大胆尝试了与哲学实用主义有关的"范式或系统构建",提出了实用主义的21个特征,试图全面描述这种哲学的原则以及他们是如何与混合方法研究相互联系的。

约翰逊等(Johnson et al.,2007)定义了三种实用主义:偏左的、偏右的和中间的(经典实用主义),并进一步将辩证实用主义定义为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支持性哲学(Johnson,2009,p.456),将经典实用主义与格林(Greene,2007)的辩证方式结合在了一起。约翰逊等人的贡献在于使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表达和详细地阐述实用主义。

相比之下,毕斯塔(Biesta,2010,p.97)声称"实用主义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哲学态度倾向,而应该作为一套解决问题的哲学工具"。毕斯塔强调杜威一直反对哲学体系的建构。毕斯塔还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促进了主客观认识二元论的分解:

> 杜威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不同的出发点参与问题的讨论,以至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丧失了它的意义……对于混合方法研究领域来说这是相当主要的,因为它清除了不同方式之间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明白不同的方式在做与经历之间、行动与后果之间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的联系,以至于我们需要以实用主义的方式判断我们的知识主张。(Biesta,2010,p.113)

毕斯塔指出哲学的实用主义帮助我们理解没有哪个方法论在知识生产方面天生就比另一种更适合。我们必须凭借我们在选择、利用和融合所有可以获得的方法论工具方面所做工作的优秀程度来评估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成功做到了方法论的折中主义吗?

格林(Greene,2007)将实用主义称为备选范式(相对于主流的传统范式),它能推动方法的积极混合与研究结果的融合。格林和霍尔(Greene & Hall,2010)进一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描述了思想如何影响研究者进行研究的。在格林和霍尔以及其他人(Biesta,2010; Johnson & Onwuegbuzie,2004)看来,实用主义所产生的研究过程是建立在对民主的价值和进步的承诺基础之上的,这个过程是问题解决型的、行动导向的。

与价值论假设相关的框架

默滕斯(Mertens,2007)确认了四个与范式相关的基本假设,古巴和林肯(Guba & Lincoln,2005)在过去论述过它们,分别是价值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默滕斯等人(Mertens,Bledsoe,Sullivan, & Wilson,2010,p.195)进一步描述了需要优先考虑的、充当表达其他三个信念体系基础的价值论的假设,因为变革性的范式来自清楚了解研究者如何处理社会公平问题的需要。价值论的假设建立在边缘化和其他群体之间的权力差异之上,起源于这些差异对不同群体的影响(Mertens et al.,2010,p.195)。

在对范式的讨论中,我们所强调的哲学问题本质上是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知识,知识如何获得以及“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变革性或者批判性框架(例如,女性主义)内的学者优先考虑价值论方面的问题,集中探讨价值判断的本质。这种价值论的假设意味着变革性或批判性框架内的学者对于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混合方法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被用于最重要的价值服务体系之中。

辩证的立场或思考方式

辩证的立场假设所有的范式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事物,并且使用多样化的范式有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研究现象。实用主义和认识论导向的框架仅仅使用一种观点看问题,然而辩证的方式要求在同一个研究中同等看待多个假设性框架。格林(Greene,2007,p.114)指出:

> 我一直坚定这种立场,即方法与研究者关于世界和知识的假设、研究者的理论倾向和专业经验等方面不可分离……所以当一个人混合方法时,他也可能会混合范式和构思模型假设以及研究方法论的广泛特征。

格林的辩证观让我们的注意力从范式不可比较的特性转移到了不同的、独特的(但是并不是天生就不可相容的)特性,例如远—近,内—外,特殊性和普遍性等。格林和霍尔(Greene & Hall,2010)的辩证观与毕斯塔(Biesta,2010)的实用主义一致,因为这些哲学体系并不是将各种哲学假设或观念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范式包(paradigm packages)”。

反对持续关注范式的观点

自从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来,范式这个术语对三个方法论领域的发展都发挥了关键作用。最近,学者们对于混合方法研究中持续关注范式这一问题感到担忧。例如,巴泽利(Bazeley,2009,p.203)认为“尽管关于‘范式之争’的认识论方面的争论激发了我们对于混合方法论相关问题的思考,然而它们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遗产’已经阻碍了方法融合的进步”。

摩根(Morgan,2007)将“范式”这个术语解构为四个可能的(并不相互排斥)观点:

- 范式作为世界观(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
- 范式作为认识论(摩根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范式)。
- 范式作为模型示例(例如,“示例”展示了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 范式作为学术领域或研究领域内关于问题类型、研究方法的共同理念。

摩根认为古巴和林肯(Lincoln & Guba,1985;Guba & Lincoln,1994,2005)使用形而上学的范式提醒我们注意用质性研究取代量化研究。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关注以上所提到的基本假设或信念,同时特别强调认识论,并抽离出了质性观点与量化观点之间不可比较的差异,由此产生了范式之争。

摩根进而认为现在是时候从形而上学的范式[6]这一过时的概念转移到在一

个研究领域作为共同信念的范式了,其理由是前一个范式存在概念性问题(例如对质性和量化方法不可通约的强硬立场),而后一个是对库恩所使用的这个术语更加准确的解释[7]。摩根对于一个研究领域中共同信念的关注推动了人们对学术界观点的重视(Creswell,2010; Tashakkori & Creswell,2008)。

混合方法研究的语言

过去我们将混合方法的语言当作混合方法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Teddlie & Tashakkori,2003)。那时,我们使用结合了质性和量化术语的双语或创造本领域所特有的语言来辨别混合方法研究。自那以后,我们能同时看到这两种趋势。

例如,最近我们将质性和量化研究中都在使用的一些常见分析过程编列成表,这是一个双语的例子。尽管一个人可能使用数字而其他人使用文字作为数据,然而这些过程在认知上是可以互换的。例如,一位掌握了双语的混合方法研究者知道聚类分析与连续比较法的分类过程使用一样的方法:组间变异最大化和组内变异最小化。其他的例子包括对比一个样本不同部分的分析;比较事实结果与期望结果;对比研究设计或要素的成分从而发现差异。

在发展能够跨越方法论界限的语言过程中识别这些常见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另一方面,文本框 16.1 呈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出现的,与混合方法数据分析有关的部分独特的术语。新的分析过程的出现构成了混合方法研究中一个最具有创造性的领域,而这些新的分析过程大部分来自那些使用质性和量化数据来解决研究问题的研究者。以混合数据分析为例,混合方法研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既涉及双语术语也涉及了独特的混合术语(文本框 16.1)。

文本框 16.1　混合方法研究的数据分析术语部分列表

- 交叉跟踪分析(crossover track analysis)
- 数据转化或变换(data conversion or transformation)
- 数据导入(data importation)
- 完全整合的混合数据分析(fully integrated mixed data analysis)
- 混合的数据分析(fused data analysis)
- 内在混合的数据分析(inherently mixed data analysis)
- 综合数据显示(integrated data display)
- 综合数据缩减(integrated data reduction)
- 反复的连续混合分析(iterative sequential mixed analysis)
- 变体的数据分析(morphed data analysis)
- 多层次混合数据分析(multilevel mixed data analysis)
- 叙事档案组合(narrative profile formation)
- 平行混合数据分析(parallel mixed data analysis)
- 平行追踪分析(parallel track analysis)
- 质化过程(qualitizing)
- 量化过程(quantitizing)

- 序列混合数据分析(sequential mixed data analysis)
- 单一追踪分析(single track analysis)
- 类型学发展(typology development)
- 担保性断言分析(warranted assertion analysis)

这些术语由以下作者创造或使用:

Bazeley, 2003; Caracelli & Greene, 1993; Greene, 2007; Greene, Caracelli, & Graham, 1989; Li, Marquart, & Zercher, 2000; Onwuegbuzie & Combs, 2010; Onwuegbuzie, Johnson, & Collins, 2007; Onwuegbuzie & Teddlie, 2003; Tashakkori & Teddlie, 1998; Teddlie & Tashakkori, 2003, 2009.

混合方法研究实施中的问题

相对于最近关于理论性和概念性问题的讨论,如何实施混合方法研究的议题逐渐获得了重视。这种趋势反映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将混合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方法论,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种研究如何被实施、传播和利用等细节问题的越发好奇。

《社会与行为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Behavioral Research*)的第2版不仅描述了如何实施混合方法研究,而且还阐述了研究者的世界观如何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式。文本框16.2呈现了本章前一部分中总结的不同范式取向如何影响混合方法研究实践方面的信息。

文本框16.2 世界观如何影响混合方法研究实践

虽然在研究者的世界观影响其研究方式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却很少有人讨论这在混合方法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最近出版的第2版《社会与行为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Behavioral Research*)的一些章节非常细致地呈现了一些真实或假想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如何在其独特的世界观影响下进行混合方法研究。这些章节包括:

- 格林和霍尔(Greene & Hall,2010)描述了Michelle(一个假想的研究者)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中学生在日常活动中互动的研究。Michelle持有辩证调查者的观点,即协调自己的价值观,使之符合潜在的多样化的哲学框架(建构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观点引导了她的研究。
- 格林和霍尔(Greene & Hall,2010)描述了Juan(另一个假想的研究者),持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她研究的是学校如何既要服务于不同的学生群体,又要符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要求。
- 海希-比伯(Hesse-Biber,2010)描述的是女性主义传统中的多种研究,包括尼泊尔的林地使用和提华纳的性工作等。
- 默滕斯(Mertens et al.,2010)描述了变革的范式传统中的研究,包括新西兰的残疾人全纳教育和卢旺达的消除贫困等研究。

在实施混合方法研究中存在一些宽泛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仅讨论了其中几个。我们讨论研究设计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讨论数据分析是因为在这个领域要花费大量的精力。

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多样化的选择

从格林(Greene et al.,1989)在评估领域和莫尔斯(Morse,1991)在护理行业的文章开始,设计类型学长久以来已经成为混合方法研究的重要特征。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能在很多方面发挥作用,包括为该领域确立共同的语言,为使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研究者提供蓝图计划,通过介绍那些明显不同于质性或量化研究设计的设计来使混合方法研究合理化,并提供有用的工具以达到教学目的。

最近,一些学者声称现在过于强调研究设计类型学(Adamson,2004;Bazeley,2009),他们认为应该更多地重视其他领域(例如数据分析)。尽管这种设计类型学在该领域的未来可能不会得到广泛发展,但他们将继续成为混合方法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在混合方法设计中许多所谓的数据分析程序事实上是受研究设计制约的;也就是说,它们与特定的设计类型相关联(例如,顺序混合方法设计中的顺序数据分析)。

尽管一些学者赞同某些预先设定的设计,其他人则宣称,由于混合方法研究项目的反复性,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类型学不可能很全面(例如,在项目过程中可能会增加新的成分或线索)。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因为新手研究者都想要设计"菜单"以便从中选择一个正确的设计类型,类似于量化研究中所提供的那种"菜单"(Shadish et al.,2002)。相比之下,使用混合方法的研究者则被鼓励不断反复检查和比较一项研究中的研究结果,并且在设计和数据收集程序上做出相应的改变。

那些寻求他们自己的混合方法设计"家族"的研究者在当前的"市场"中有各种可行的选择方案(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Greene,2007;Leech & Onwueg-buzie,2009;Maxwell & Loomis,2003;Morse,1991,2003;Teddlie & Tashakkori,2009)。纳斯塔西等人(Nastasi,Hitchcock,Brow,2010)最近考察了各种不同的设计类型学[8],将它们分为基本的和复杂的类别,并且从九个独特的标准和维度确定了它们的差异。

尽管有人对于缺乏设计的具体数量和类型方面的共识感到不安,我们还是相信这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并且类型学中最有用的部分还是会保留下来。类型学的最终价值在于当研究者计划或实施他们的混合方法研究时,能够向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选择方法以备选择和利用。类型学的多样性可以通过考察两个观点而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两个观点是很独特的并且自从被第一次介绍后就不断的发展,它们是詹尼弗·格林(Jennifer Greene)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观点。其他

人的观点也同样是有价值的,但是我们这样选择是因为它们可以揭示特别有趣的对比。

格林宣称研究者在设计混合方法研究时不能把方法从假设性框架中分离出来,因此,她鼓励研究者在单个研究中混合这些框架。她的设计因五个基本的目的而与混合方法联系到了一起:三角验证、互补、发展、创始和扩展(Greene,1989)。卡拉希利和格林(Caracelli & Greene,1993)辨别了部分设计(component designs)与综合设计(integrated designs)之间的差异,前者的方法仅在推理的水平上相互联系和混合,而后者的整个研究过程的方法都是相互融合的。

格林(Greene,2007)提供了两个部分设计的例子(聚合、发散)和四个综合设计的例子(重复、混合、嵌套或植入、出于价值观而进行的混合)。这六个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例子所反映的五个基本目的与最初的目的是一致的。格林(Greene,2007,p.129)指出,设计一项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涉及遵守某个规则,它是一种具有艺术性的混合技能。

在我们实施混合方法设计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将设计与研究目的相分离。这并不是否定目的的重要性;很明显,如果你没有进行研究的目的,你就不可能开展研究。我们认为目的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社会—政治的概念,并且我们相信每个个体在进行研究时都有多样化的目的,从"促进个人职业生涯"到"理解复杂的现象",再到"推动社会",这些目的相互缠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

我们的设计类型学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而发展(Tashakkori & Teddlie,1998,2003c; Teddlie & Tashakkori,2009)。我们的体系基础是研究过程的三阶段模型,它是从巴顿(Patton,2002,p.252)提出的实施研究的"纯粹和混合策略"发展而来的。这三个阶段分别是概念化阶段(研究中具体问题的规划)、经验性阶段(方法论上的操作、数据收集、分析等)和推论性阶段(新兴的理论、解释和推论等)。在混合方法中,这三个阶段都有质性和量化方式的结合。当前在我们的类型学中有四个混合方法设计家族:平行的、顺序的、转换的和完全综合的。这些设计家族是建立在"实施过程的类型"之上,也就是当实施一项研究时质性和量化的方式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方法研究看起来越来越多地使用基本方式的结合,经常会引起带有多样化类型或数据来源的完全融合设计。

与格林的观点类似,我们在辨别混合是仅仅发生在一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是经验性阶段)还是遍及整个研究。对于这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最近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到混合设计与准混合设计之间的区别;前者在前面的段落中已经定义过了,后一种设计收集两种数据,但是很少或没有对研究中的结果和推论进行综合。

这两种关于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观点具有以下共性:

- 反映了连续性和内在一致的观点。
- 它们以一种有趣的、与该领域变革相关的方式不断发展,这在当前是切实

可行的。

- 从影响混合方法研究的学位论文和其他的项目来看具有启发性。
- 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促进了混合方法研究设计文献的发展。

在将我们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观点与她的观点进行比较时,格林(Greene,2007,p.117)指出:

> 我对于混合方法设计的思考与塔沙考里和特德列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也包含一些差异……在现代混合方法讨论中当然还存在很多互补性的但同时也是独特的思想。

混合方法数据分析

在混合方法数据的分析过程中,质性和量化数据分析策略可以在研究中进行组合、连接或合并(Teddlie & Tashakkori,2009)。当前与混合方法设计数据分析相关的话题需要花费大量的能力和精力,特别是涉及计算机生成的应用程序(Bazeley,2010)。巴泽利(Bazeley,2009,p.206)最近指出,混合方法设计从基本理论和设计类型学占主导的文献转向一个领域,在此领域存在概念上的进步和源自支持融合的分析性技能的突破,混合方法研究将要走向成熟。

我们将对分析问题的讨论局限于上一章中所预示的混合方法语言的话题:(1)在质性和量化研究中类比分析过程的鉴定;(2)混合方法研究分析程序中独特术语的产生。这种类比过程正如格林(Greene,2007,p.155)所说的,“使用不同的方法论传统之下的数据分析”。

在对这个过程的早期论证中,米尔斯和休伯曼吸收了量化研究传统的因素,并且通过两个维度的交叉将这些因素应用到质性研究传统当中。米尔斯和休伯曼(Miles & Huberman,1994)用一个例子详细阐述了纵向学校改进项目的实施,他们用列代表年数,用行代表干预层次。

类似地,昂乌格布齐(Onwuegbuzie,2003)运用量化研究中效应大小的概念创造了一个类似的质性的类型学,包括三个类别(明显的、调整过的和潜在的质性效应大小)。量化研究中的效度大小指用统计指数表示两个数字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质性研究中效度的大小产生于一个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叙事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是在这些变量量化之后表达出来的。

我们相信,混合方法研究者未来会更多地使用在质性或量化传统中运用过的分析框架并在其他研究方法传统内发展类比技术。这既需要在质性和量化方式中有适当的训练,也需要从混合方法观点中创造性地理解类比过程的能力。

类似的,对各种不同的研究者而言,创造性的洞察力已经产生了文本框16.1中混合方法研究数据分析术语的冗长列表。这些术语指一般的分析过程(例如数据转换);一般分析过程中的特定技巧(例如平行混合数据分析内的交叉跟踪分析);利用多种计算机程序的复杂迭代混合数据分析。巴泽利(Bazeley,2003,p.385)描述了融合性数据分析:

> 质性数据分析软件能够将量化的数据纳入质性的分析中去,并且能将质性编码及其形成的模型转化成一种可以进行统计分析的格式……分析的"熔合(fusing)"会让研究者超越不同来源的混合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通过不同的但独立的方式使用相同的数据从而更加完全地理解当前的话题。

混合方法数据分析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对于现在混合方法研究第三个特征的讨论:颂扬各种层次研究事业的多样性。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质性和量化研究中无论研究结果和推论是否存在分歧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因为分歧也能让研究者更加深入地理解问题并且推动研究的继续进行。

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批评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这个领域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批评。在这一部分,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些重要的批评。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对混合方法研究最常见的批评是它的兼容性问题,这个问题认为在同一项研究中混合质性和量化方法是不恰当的,原因在于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范式之间存在着认识论差异(Howe,1988)。在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第一个特征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方法论的折中主义,它主张我们在回答研究问题时可以自由结合最好的方法论工具。尽管方法论折中主义的哲学辩护很重要,但反对这种兼容性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即研究者已经有效地在整个社会与行为科学的历史中结合质性和量化方法,产生一种不同于单独的质性或量化研究的多层次研究。

质性研究和后现代领域(Denzin & Lincoln,2005; Howe,2004; Sale,Lohfeld,& Brazil,2002)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批评涉及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依次被混合方法研究领域论述过(Creswell,Shope,Plano-Clark,& Green,2006; Teddlie et al.,2008)。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对于混合方法研究将质性方法降为量化方法附属地位的担忧。正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讲的,我们明确地表达了对于质性方法做出的巨大贡献的尊重,并且将大部分真正的混合研究看成两种方法的全面结合。幸运的是,最近的文献(Creswell et al.,2006; Denzin,2008)表明质性方法和混合方法研究领域都涉及了尊重多样化的观点,并发现了拥有许多共同观点的有益话语。

对于混合方法研究有价值的批评包括逻辑上的批评(例如在真正的研究中的实施),这种批评包括对于研究成本的担忧和谁实施研究的担忧(研究团队或单个的调查者)。我们相信在任何特定的研究中,是使用质性、量化还是混合方法的研究方式取决于所要解决的研究问题,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单独使用质性或量化方式得到最有效的解决。混合方法研究技巧只有在能够充分地解决问题时才应该使用,因为混合方式相对于单独使用质性或量化方式来说成本更高。

混合研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这对于那些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契约式工作的博士生和研究员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使用混合方法研究来获得合同的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要提供研究所需要的精确预算,特别是涉及时间消耗的民族志方面的质性成分。那些低估完成全部设计所需的时间与资金花费的混合方法研究项目将有可能成为轻质性的研究,从而不能交付所许诺的内容。

至于谁实施研究,当前存在的担忧是认为"最小胜任力模式或方法论的"双语制度是肤浅的,甚至是无效的(Denzin,2008,p.322)。混合方法教学不属于这一章的讨论范围,但是在这个领域存在着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文献(Christ,2009,2010; Creswell,Tashakkori,Jensen,& Shapley,2003; Tashakkori & Teddlie,2003b),包括当前所教的混合方法课程的详情以及他们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的(Christ,2010)。舒尔哈和威尔逊(Shulha & Wilson,2003)描述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合作方式,关于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在一些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例如 Day,Sammons,& Qu,2008)。

在"方法论鉴赏力(methodological connoisseurship)"的讨论中,我们指出混合方法论者有见识地(或直觉式地)选择了可以获得的最佳技巧来回答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经验和判断在不同的方法中是如何发展的,特别是在质性研究领域?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来回答,但是我们相信课程与田野经验的结合在通往方法论鉴赏力的旅程中十分必要。田野经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倡导混合方法论专业人员与他们的研究生之间的积极顾问关系。这种顾问关系包括研究项目中的田野经验和学生学位论文中的田野经验,前者中的专家是主要的调查者,后者中的学生被要求进行广泛的质性和量化研究从而回答所研究问题的不同部分。我们一直就任学位论文委员会成员,看到很多学生成功地完成了混合方法的研究项目,并且开始了通往成为方法论鉴赏家的旅程(Schulenburg,2007;Ivankova,Creswell,& Stick,2007)。

关于混合方法研究的另一个批评是担心该领域文章的内容质量。里奇(Leech,2010)访谈了几位该领域早期的研究者,他们认为作者在文章中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表达在当前混合方法研究文献中有哪些适合他们的研究;(2)提出他们自己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定义;(3)解释在他们的研究中混合方法应用的位置以及是如何应用的;(4)明确地描述他们的哲学取向。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呈现了一个最初的"地图"来描述混合方法研究的子领域,从而帮助学者们定位他们在该领域中的位置。约翰逊(Johnson et al.,2007)提供的混合方法研究的多样化定义应该有助于学者们描述他们自己的观点,同时各种不同的设计类型学在研究者如何描述研究中的方法混合方面也提供了选择方案。此外,他们还明确地描述了至少三个该领域的哲学取向(实用主义、与价值论假设相关的框架、辩证观)以及其他新出现的替代形式(例如批判实在论),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备选的哲学观。

最后,弗莱什沃特(Freshwater,2007)、格林(Greene,2007)、格林和霍尔(Greene & Hall,2010)等人担心混合方法研究过早地在社会研究上形成固定的

统一看法或共识,认为这会排斥研究者对于多样化方法的考虑和尊重。例如弗莱什沃特(Freshwater,2007,p.141)批评了对于融合与连贯的崇拜,他认为这种崇拜已经“流行于护理学与健康医疗文献中了”。这种担心类似于史密斯和赫舒休斯(Smith & Heshusius,1986)对于为了停止质—量争论而拒绝对话的忧虑。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担忧,因为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个特征就是“走向权衡与妥协的趋势”,但是我们并没有将混合方法研究视作一种压抑多样化观点的、静止的、统一的社会研究方式。

我们确信混合方法研究会导致人们在各个研究层次上颂扬多样化,这种自信可能来自我们在编辑两卷《社会与行为研究中的混合方法手册》中所积累的经验,这种经验为我们提供了:

- 针对混合方法研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和概念模型。
- 在实施综合研究的各个方面所使用的日益多样化的方法论工具,特别是与数据分析和推论过程相关的工具。
- 在具体的研究进程中,对混合方法研究进行多样化的跨学科运用。

我们将混合方法研究的内在多样性看作是其日常意义的延伸与拓展。日常问题的解决者能同时或先后使用多种方法,考察决策中的多样化证据以及质疑他们的看法、结论和决策的可靠性。尽管混合方法研究者(前面描述的方法论鉴赏者)使用不同类型的数据、更加复杂的分析方法和更加严格的证据与推论标准,他们仍然遵循相信多样化证据来源的一般路线。

十年之后我们将在哪里?

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仅仅才 15 至 20 年时间的领域来说。因此接下来的评论是基于我们对这个领域过去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最好猜测,同时我们也承认未来的历史事件会从根本上改变混合方法设计的发展历程。

1.人们会逐渐把实用主义作为与混合方法设计有关的哲学取向,正像建构主义与质性研究相联系、后实证主义与量化研究相联系一样。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由于与混合方法研究有关,而将得到更加准确的定义。其他的哲学观点将会继续与实用主义一起存在并作为混合方法研究的基础,因为大部分混合方法论者相信范式多元主义,这将为更多人所接受。另外,对于理论和概念性问题的讨论会相对减少。

2.将会出现一组通用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并且流行于教科书中。这些设计包括“签名”设计和其他出现的设计。关于哪种类型学会成为这种原型设计的通用形式方面的争论将不断增加。在未来,人们不会过多地强调混合方法研究中的设计问题。

3.分析问题将会更加重要,这主要是由混合方法数据的计算机分析技术进步所引起的(Bazeley,2009,2010)。在混合方法研究内,数据往往"不再理解为文字或数字,而更多是可转移的信息单元"(Teddlie & Tashakkori,2009,p.283)。混合方法论将会形成一套被广泛接受的混合方法数据分析原则,这些原则会取代当前存在的类型学。这些混合数据分析原则的发展对于混合方法继续作为一个单独的方法论运动是十分关键的。

4.整个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将继续采用混合方法研究。在任何特定的学科中,运用混合方法的形式将取决于这些领域目前的概念和方法论取向。混合方法论者所面临的挑战将继续发展并且保持一个跨越核心界限的"核心身份"(例如一套普遍理解的方法论原则)。

5.混合方法研究的另一种未来是为人文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从而更具有包容性和以研究问题为导向。这将会导致较少的项目会被确定为质性或量化的,更多的会被称为"研究项目"(不会贴上混合方法研究的标签)。除非混合方法论者发展出被普遍理解的方法论原则并获得认同,否则它可能会被纳入这种研究方法论的折中性混合中。

注 释

1.邓津和林肯(Denzin & Lincoln,2005,p.4)把质性研究者比作是摆弄修理的人(bricoleurs),他们会创造性地运用各种质性方法实践。

2.设计质量描述的是研究者采用最适当的程序回答研究问题并能有效执行它们的程度。它包含设计的合适性、诚信度、组内设计的一致性和分析的充分性(Tashakkori & Teddie, 2008)。

3.我们并不认为质性和量化方法的两分法是建立在研究问题类型的基础之上。在质性和量化研究中我们都能发现探索性和验证性的研究问题。

4.逆推逻辑(abductive logic)是第三种逻辑类型,当研究者观察到一个让人惊讶的事件,并尝试发现是什么引起这个事件时,逆推逻辑就会出现(如, Erzberger & Kelle, 2003; Peirce, 1974)。这是一个整合假设的过程,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现让人惊讶的事情。

5.质化过程和量化过程指在混合方法研究中转化单一质性或单一量化研究的方法技术。一些质性领域的研究者(如后建构主义学者)不太愿意使用这些技术。

6.摩根(Morgan,2007,p.68)在对形而上学的范式进行批评的同时,他也承认其贡献,即从只机械地关注方法转向更广泛的哲学和概念问题。

7.这些言论使得摩根(Morgan,2007,p.68)出现了选择性的立场,他提倡实用主义的方法(pragmatic approach)关注"把方法论作为一个领域,与抽象的认识论和方法的机制等级联系起来"。摩根的方法强调诸如外展性、主观性和可转移性的问题,这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两分法(如演绎/归纳)。

8.马克斯威尔和卢米斯(Maxwell & Loomis, 2003)针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设计提出了系统的观点,其实质是非类型学:设计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模式,包含5部分(如目的、概念框架、研究问题、方法和效度)。

参考文献

Adamson, J. (2004). [Review of the book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3*(6), 1414-1415.

Bazeley, P. (2003). Computerized data analysis for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385-422). Thousand Oaks, CA: Sage.

Bazeley, P. (2009). Integrating data analys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3), 203-207.

Bazeley, P. (2010). Computer assisted integration of mixed methods data sources and analysi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431-467). Thousand Oaks, CA: Sage.

Biesta, G. (2010).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9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Bryman, A. (2006). Paradigm peace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9*(2), 111-126.

Campbell, D. T., & Fiske, D. W. (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6*, 81-105.

Caracelli, V. J., & Greene, J. C. (1993). Data analysis strategies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5*(2), 195-207.

Christ, T. W. (2009). Designing, teaching, and evaluating two complementary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urse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4), 292-325.

Christ, T. W. (2010). Teaching mixed methods and action research: Pedagogical, practical, and evaluative consideration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643-676).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2009). Mapping the field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2), 95-108.

Creswell, J. W. (2010). Mapping the developing landscape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45-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Shope, R., Plano-Clark, V., & Green, D. (2006). How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extends mixed methods research.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1), 1-11.

Creswell, J., Tashakkori, A., Jensen, K., & Shapley, K. (2003). Teach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Practic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619-63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y, C., Sammons, P., & Qu, Q. (2008).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in research on teachers' lives, work, and effectiveness: From integration to synerg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7* (6), 330-342.

Denscombe, M. (200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mixed methods approa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 270-283.

Denzin, N. K. (1978).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Denzin, N. K. (2008). The new paradigm dialogs and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1*, 315-325.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05). Introduction: The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1-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Eisner, E. W. (1979). The use of qualitative forms of evaluation for improving educational practice.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6), 11-19.

Eisner, E. W. (1998). *The enlightened eye: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Erzberger, C., & Kelle, U. (2003). Making inferences in mixed methods: The rules of integration.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457-490). Thousand Oaks, CA: Sage.

Freshwater, D. (2007). Read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ntexts for criticism.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34-146.

Greene, J. C. (2007). *Mixing methods in social inquir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Greene, J. C. (2008). Is mixed methods social inquiry a distinctive methodology?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1), 7-22.

Greene, J. C., & Caracelli, V. J. (2003). Making paradigmatic sense of mixed-method practice.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91-110). Thousand Oaks, CA: Sage.

Greene, J. C., Caracelli, V. J., & Graham, W. F. (1989).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1*, 255-274.

Greene, J. C., & Hall, J. (2010). Dialectics and pragmatism: Being of consequence.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119-143).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1990). Carrying on the dialog. In E. G. Guba (Ed.), *The paradigm dialog* (pp. 368-378).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2005).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191-2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mmersley, M. (199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loyalty versus methodological eclecticism. In J. T. E.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59-174). Leicester, UK: BPS Books.

Hesse-Biber, S. (2010). Feminist approaches to mixed methods research: Linking theory and praxi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169-1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we, K. R. (1988). Against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incompatibility thesis or dogmas die hard.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7*, 10-16.

Howe, K. R. (2004). A critique of experimentalism. *Qualitative Inquiry*, *10*(1), 42-61.

Ivankova, N. V., Creswell, J. W., & Stick, S. (2006). Using mixed methods sequential explanatory design: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Field Methods*, *18*(1), 3-20.

Johnson, R. B. (2009). Comments on Howe: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8*, 449-457.

Johnson, R. B., & Gray, R. (2010). A history of philosophic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for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69-94). Thousand Oaks, CA: Sage.

Johnson, R. B., & Onwuegbuzie, A. (2004).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3*(7), 14-26.

Johnson, R. B., Onwuegbuzie, A. J., & Turner, L. A. (2007).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2), 112-133.

Krathwohl, D. R. (2004). *Methods of educ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2nd ed.).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ch, N. L. (2010). Interviews with the early developer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253-2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Leech, N. L., & Onwuegbuzie, A. J. (2009). A typology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s. *Quality and Quantity*, *43*, 265-275.

Li, S., Marquart, J. M., & Zercher, C. (2000). Conceptual issues and analytic strategies in mixed-method studies of preschool inclusion.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23*, 116-132.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Maxcy, S. (2003). Pragmatic thread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search for multiple modes of inquiry and the end of the philosophy of formalism.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51-90).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xwell, J. A. (2004). Causal explan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inquiry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3* (2), 3-11.

Maxwell, J. A., & Loomis, D. (2003). Mixed methods desig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241-2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xwell, J. A., & Mittapalli, K. (2010). Realism as a stance for mixed method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145-167).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rtens, D. M. (2007). Transformative paradigm: Mixed methods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 3, 212-225.

Mertens, D. M., Bledsoe, K. L., Sullivan, M., & Wilson, A. (2010). Utilization of mixed methods for transformative purpose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193-214). Thousand Oaks,CA: Sage.

Miles, M. B., & Huberman, M. A. (198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for new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iles, M. B., & Huberman, M. A.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gan, D. (2007). 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1, 48-76.

Morse, J. M. (1991).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Nursing Research*, *40*(2), 120-123.

Morse, J. M. (2003). Principles of mixed methods and multimethod research design.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189-208).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steller, F., & Boruch, R. (Eds.). (2002). *Evidence matters: Randomized trials in education research.*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Nastasi, B. K., Hitchcock, J. H., & Brown, L. (2010). An inclusive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mixed methods design

typologies: Moving toward fully integrated synergistic research model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305-338). Thousand Oaks, CA: Sage.

Newman, I., Ridenour, C., Newman, C., & DeMarco, G. M. P., Jr. (2003). A typology of research purpose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167-188). Thousand Oaks, CA: Sage.

Onwuegbuzie, A. J. (2003). Effect siz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olegomenon. *Quality & Qua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thodology*, *37*, 393-409.

Onwuegbuzie, A., & Combs, J. (2010). Emergent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A synthesi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397-430). Thousand Oaks, CA: Sage.

Onwuegbuzie, A. J., Johnson, R. B., & Collins, K. M. T. (2007). Conducting mixed analysis: A general typ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 *1*(1), 4-17.

Onwuegbuzie, A. J., & Teddlie, C. (2003).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data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351-38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on, M. Q. (198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on, M. Q.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atton, M. Q. (2002).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eirce, C. S. (1974). *Collected papers* (C. Hartshore, P. Weiss, & A. Burks, 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ichardt, C. S., & Cook, T. D. (1979). Beyond qualitative *versus*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T. D. Cook & C. S. Reichardt (E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rogram evaluation* (pp. 7-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denour, C. S., & Newman, I. (2008). *Mixed method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interactive continuu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Rossman, G., & Wilson, B. (1985). Numbers and words: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a single large scale evaluation study. *Evaluation Review*, *9*, 627-643.

Sale, J., Lohfeld, L., & Brazil, K. (2002). Revisiting 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ebate: Implications for mixed-methods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36*, 43-53.

Sandelowski, M., Voils, C. I., & Knafl, G. (2009). On quantitizing.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3), 208-222.

Schulenberg, J. L. (2007). Analyzing police decision-making: Assessing the application of a mixed-method/mixed-model research desig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0*, 99-119.

Shadish, W., Cook, T., & Campbell, D. (2002). *Experimental and quasi- 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general causal infer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havelson, R. J., & Towne, L. (Eds.). (2002).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ational Academy Press.

Shulha, L., & Wilson, R. (2003). Collaborative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639-6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Smith, J. K., & Heshusius, L. (1986). Closing down the conversation: The end of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 amo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5*, 4-12.

Song, M., Sandelowski, M., & Happ, M. B. (2010). Current practice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intervention studie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SAGE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2nd ed., pp. 725-747).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Creswell, J. (2008). Envisioning the future stewards of the social-behavioral research enterprise.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2*(4), 291-295.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Eds.). (2003a).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3b). Issues and dilemmas in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course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US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6*, 61-77.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3c).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From data triangulation to mixed model design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671-702).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8). Quality of inference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alling for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In M. M. Bergman (Ed.), *Advances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pp. 101-119). London: Sage.

Teddlie, C., & Johnson, B. (2009). Methodological thought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 Teddlie & A. Tashakkori (Eds.), *The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echniqu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p. 40-61).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dlie, C., & Stringfield, S. (1993). *Schools make a difference: Lessons learned from a 10-year study of school effects.*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3). Major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use of mixed metho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3-50).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dlie, C., & Tashakkori, A. (2009). *The foundations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echnique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dlie, C., Tashakkori, A., & Johnson, B. (2008). Emergent techniques in the gathering and analysis of mixed methods data. In S. Hesse- Biber & P. Leavy (Eds.),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pp. 389-413). New York: Guilford.

Yanchar, S. C., & Williams, D. D. (2006). Reconsidering the compatibility thesis and eclecticism: Five proposed guidelines for method us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5*(9), 3-12.

Yin, R. K. (200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17 个案研究

CASE STUDY

⊙本特·弗莱杰格(Bent Flyvbjerg)

巴战龙 陈学金 译　朱志勇 校

> 在一定情况下,行为都有其特定界限。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缺乏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比那些富有理论知识的人的行为更加有效(如果缺乏理论的人富有经验,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假如有人知道“轻肉食物”更易消化、更加健康,但不知道哪些食物属于“轻肉”,与一个只知道鸡肉有益健康的人相比,他将不太可能获得更好的健康状况。
>
> ——Aristotle

什么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的定义众多,其中一些有益处,另一些则没用。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2009)将个案研究简明定义如下:

> 个案研究:对某个特定单位(如一个人或社区)进行深入分析,并强调与环境相关的扩展性因素。

根据这个定义,个案研究聚焦于某“特定单位”,斯泰克(Stake,2008,pp.119-120)称其为“具体的运作”或“有边界的系统”。套用拉津(Ragin,1992,p.217)的巧妙用语,定义个案研究的关键在于个体单位的选择和边界的设置。因此,当你决定做个案研究时,与其说是个方法论的选择,不如说是在选择要研究什么。研究特定单位的方法繁多,质性或量化的,分析或阐释的,或混合方法。这不是由是否做个案研究决定的,而是由对研究单位边界的划分决定的。第二,该定义规定了个案研究是“深入的”。因此,就深度而言,相比跨单位的研究分析,个案研究包括更多细节,更具丰富性、完整性和多样性。第三,个案研究强调“扩展性因素”。这意味着,一个个案通常会随时间发展而不断演变,如同一连串发生在“此时此地”具体的相关事件,构成了一个被视作整体的个案。最后,个案研究的重点是“与环境相关”,即情境。个案研究对特定单位边界的划分,决定了何者可

算作个案本身，以及何者可成为个案的情境。

与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在线词典对个案研究的基本定义相反，企鹅出版社的《社会学词典》(Abercrombie, Hill, & Turner, 1984, p.34)在1994年和2006年的版本中对个案研究做的如下定义，几十年来饱受质疑却又不幸地被普遍接受：

> 个案研究：对某一类现象中的单个实例进行详细调查，无法为更广泛的类别提供可靠信息，但它在调查初始阶段的作用却不可小视，因为它提出的假设可能会被更多个案进行系统验证。

该定义代表了对个案研究的传统看法，即便不是什么低级错误，也由于其明显的误解而显得过于简单。该定义推动了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个案研究本身几乎不算一种方法论，而最好被视为从属于大样本调查。尽管个案研究"是对单个实例的详细调查"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个案研究"无法提供关于更广泛的该类现象的可靠信息"这一观点又是错误的。定义中认为个案研究可以用于在"调查的初始阶段"提出假设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将个案研究仅仅视作大范围调查研究、系统验证假设、构建理论做准备的方法又是错误的。企鹅出版社的《社会学词典》的定义将个案研究和大样本、统计学研究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很不幸地阻碍了这两种方法论之间的互补关系。

吉尔林(Gerring, 2004, p.342)曾恰当地指出，很多试图阐明"个案研究"含义的学者最终都陷入了定义上的困境，而每当人们想扫除定义的混乱时，又只会让局面更加糟糕。因此如果我们一定需要一个个案研究的定义，最好是保持如上述韦伯斯特辞典所作出的那种共识性的定义，而不是像企鹅出版社的《社会学词典》那样充满学术争议的定义。

个案研究的悖论

个案研究在学术史上随处可见，它们在当今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书籍和文章中也占了很大比例。例如，乔治和本尼特(George & Bennett, 2005, pp.4-5)指出，近年来政治学的顶级期刊中，几乎一半的文章使用了个案研究。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大部分知识都源自个案研究，各学科的很多经典也是个案研究。

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我们发现，在个案研究被广泛使用并创造经典著作的同时，个案研究作为方法论却在学术界被普遍地轻视，或者被简单地忽视。例如，美国30个一流的政治学研究生项目中，只有两个项目规定了富有专业精神的个案研究或质性方法的研究生课程，整整三分之一的项目甚至不提供这样的课程。相反，30个项目都提供定量研究方法课程，而且都规定要有此类方法的训练，还经常提供好几门课(George & Bennett, 2005, p.10)。关于个案研究被广泛使用而又低度认可的悖论，吉尔林(Gerring, 2004, p.341)评论道，个案研究正挣

扎于"稀奇古怪的方法论困境",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一方法知之甚少。

接下来,我们将试图解决吉尔林的悖论,为此,我们要先识别出五个削弱了个案研究信度和使用的误区,并帮助个案研究获得更广泛的运用和认可。这五个误区可以归结如下:

误区一	普遍的、理论的知识比具体的个案知识更有价值
误区二	人们不能基于一个独特的个案进行概括;因此个案研究不能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误区三	个案研究对提出假设大有裨益,即在整个研究过程的第一阶段;而在检验假设、构建理论时则其他方法更适用
误区四	个案研究存有对证实的偏爱,即倾向于证实研究者的先入之见
误区五	基于特定的个案研究,很难概括和发展出普遍的命题和理论

这五个误区基本上构成了人们或者学术正统对个案研究的成见。我们发现,理论的信度和效度备受争议;换句话说,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的地位备受争议。接下来,我们将逐一纠正这五个误区,从而为在社会科学中正确使用个案研究方法扫清障碍。

误区 1

普遍的、理论的知识比具体的个案知识更有价值。

为了理解为什么对个案研究的成见有问题,我们需要把握个案和理论在人类学习中的作用。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个案研究创造了具体的、情境依赖的(context-dependent)知识,而关于人类学习的研究显示这种知识对一个人从受规则约束的初学者成长为技艺高超的行家;第二,对人类事物的研究似乎只存在与环境相关的知识,因此现在社会科学排除了完全模仿自然科学建立认知理论——那种解释性、预测性的理论——的可能性。这两个观点背后的完整论据可以在我 2001 年的著作中找到(Flyvbjerg,2001,第 2-4 章)。由于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能给出论点概要。然而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两点是正确的,就会对个案研究在研究和教学中的传统观点产生激进后果,那么这个观点就有可能又有问题了。

对人类学习的现象学研究表明,在成年人的学习过程中存在质的飞跃,从一个被规则制约、使用理性分析的初学者,成长为布迪厄(Bourdieu,1977)所说的灵活使用默会技能的"名家大师",抑或 H.德里弗斯和 S.德里弗斯(Dreyfus & Dreyfus,1986)所说的"真正有人情味的专家"。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很多人是日常社会交往、专门技术和智力技能方面的专家,比如送礼物、骑自行车或者阐释电视屏幕上的画面,然而对于更加专业的技能,如下象棋、谱写交响乐或者开飞

机,却很少有人达到真正的专家水平。

然而,专家的共性在于,他们运用的精湛知识是基于对自己擅长领域的数千个具体个案的了解。情境依赖的知识和经验正是专家活动的核心。此类知识和专业技能也是个案研究作为研究和教学方法,或者更广而言之的学习方法的核心。因此,学习过程的现象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或类似方法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个案的经验,人们才能从初学者成长为专家。如果人们只接受情境独立的(context-independent)知识和规则的训练,也就是教科书上的那类知识,他们就将一直停留在初学者的学习阶段。这就是分析理性的局限;对专业领域中诸如学生、研究者或实践者演练的最佳成果而言,这种训练是远远不够的。

在教学情境中,精选的个案研究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能力,而情境独立的事实和规则却只能让学生停留在初学者水平。只有少数高等教育机构采用个案研究的成果,哈佛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在该校,专业学院的教学和研究被广泛典型化是基于理解了个案知识是人类学习的中心(Christensen & Hansen,1987;Cragg,1940)。

这并不是说基于规则的知识不应被重视;相反,此类知识对于每个领域,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将基于规则的知识作为学习的最高目标就本末倒置了。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学习过程的最高水平是获得精湛的技能和真正的专业知识,这种水平只能通过一个人亲自使用相关技能的经验才能达到。因此,除了教学中使用个案和其他经验性方法,老师们最好可以让学生参加专业项目,帮助他们获得真正的实际经验,例如通过做实习生、暑期打工,等等。

对于研究者而言,个案研究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境,并蕴含大量珍贵细节,具有以下两方面重要意义。第一,个案研究有利于发展关于现实的细致入微的观点,包括那些由于尚处于学习过程初级阶段的、被简单的规则控制从而不能被有意义地理解的那些有关人类行为的观点,抑或理论。第二,个案对研究者培养自身研究技能的学习过程至关重要。如果研究者希望自己的技能达到高水平,那么具体的、情境依赖的经验是学习任何其他专业技能的核心。具体的经验可以从持续的、接近现实的研究和研究对象的反馈中获得。远离研究对象,以及缺少反馈,很容易让整个学习过程陷入僵化,走入研究的死胡同,研究的影响和效果就会模糊不清、无法检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倾向。

与学习过程相关的第二点是,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预测性的理论。社会科学从未成功构建出普遍的、情境独立的理论,因此除了提供具体的、情境依赖的知识之外再无其他。而个案研究特别适合创造这类知识。坎贝尔(Campbell,1975,p.179)在其后期的作品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是他早前曾尖锐地批判了个案研究,认为"这些研究完全缺乏控制,几乎没有科学价值"(Campbell & Stanley,1966,pp.6-7)。如今他解释说,他的研究"完全动摇了我早期对个案研究教条化的轻视态度"。坎贝尔运用了类似于人类学习的现象学逻辑解释道:

> 毕竟,人类通常来说是很有能力的智者,并且,质性的、常识性的认知并没有被量化的认知所取代……这并不是说通过自然观察得到的常识就是客观的、可靠的或是没有偏见的。但这是我们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尽管它喧闹嘈杂、不一定可靠,并带有一定偏见。(Campbell,1975,pp.179,191)

坎贝尔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了对个案研究价值的观点的研究者。伊森克(Eysenck,1976,p.9)最初认为,个案研究仅仅是描述奇闻轶事的一种方法,后来意识到"有时我们必须睁大眼睛仔细看待独特的个案——不是希望能证明些什么,而是希望能从中学习!"因为缺乏"硬"的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想最终证实很难,而学习却是肯定可能的。最近,拉津、贝克尔和他们的同事在解释什么是个案研究及其在社会探究中的作用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Ragin & Becker,1992)。

至于预测性的理论、普世性和科学信念,迄今为止社会科学还没有提出过。本质上社会科学只有具体的个案和情境依赖的知识。因此,个案研究的第一个误区——普遍的(情境独立的)理论知识比具体的(情境依赖的)个案知识更有价值——可以做如下修改:

> 有关人类事务的研究中没有预测性的理论和普适性。因此,具体的个案知识比徒劳地寻求预测性理论和普适性更有价值。

误区 2

人们不能基于一个独特的个案进行概括;因此个案研究不能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人们不能基于一个特定个案进行概括的观点,经常被认为是对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的毁灭性打击。个案研究的第二个误区是在社会科学范围内支持自然科学理想的典型观点,甚至那些与自然科学理想不正式相关的研究者们也会有这样的观点。例如,吉登斯的观点:

> 主要适合于诠释学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视概括,是因为它阐明了行动者知识渊博的本质,以及他们在各种不同情境下的行动原因。一些民族志研究……比如,人类学田野工作中传统的小规模社区研究,本身不是概括性研究,但如果进行一定数量的同样研究,就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概括性研究,我们就可以正当合理地作出关于他们典型性的论断。(Giddens,1984,p.328)

用吉登斯所描述的那种方法进行概括是正确的,通常也是合适的、有价值的。但正如不能从单个个案中进行概括的结论是错误的一样,断言这是唯一方法也可能是错误的。这取决于所谈及的个案,以及选取个案的方法。这一点对自然科学和对人类事务研究同样适用(Platt,1992;Ragin & Becker,1992)。

例如，伽利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重力理论就不是基于“大范围”的观察，也没有“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观察”。他的拒斥主要包括一个概念性实验和之后一个操作性实验。这些凭借后见之明的实验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关于重力的观点在被推翻之前，曾在近 2 000 年的科学探索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伽利略的实验性思考是这样的：如果两个相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相同高度的地方被扔下，它们将有相同的落体速度，并同时着地。如果两个物体被捆绑成一个物体，该物体将有两倍的重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会比两个分开的物体下落更快。伽利略发现这个结论与常识相悖。唯一可以避免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排除重量——这一自由落体加速度中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伽利略所做的。科学领域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讨论伽利略是否真的在比萨斜塔做了这个著名的实验，抑或这个实验根本就是虚构的。无论如何，伽利略的经验主义并没有包含那些坎贝尔和吉登斯早期所要求的大型随机抽样实验，没有随机选择不同风速条件下、不同高度落下的物体，等等。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单独的实验，如果最终做了实验的话，这其实也是一个个案研究（关于个案研究、实验和概括化之间的关系，参见 Bailey，1992；Griffin，Botsko，Wahl，& Isaac，1991；Lee，1989；Wilson，1987）。然而，伽利略的观点继续遭受质疑，直到半个世纪后空气泵的发明让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终被否定。空气泵使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终极实验成为可能：在真空管内，一枚硬币或一个铅块可以以与羽毛相同的速度下落。这个实验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就不再被接受了。我们的讨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是通过一个独特的个案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这个个案聪明地选择了有极端对比效果的金属和羽毛。有人称其为“关键个案（critical case）”：如果伽利略的理论在这个情形下成立，那么所有或大部分的材料应该也都可以。而随机和大样本则不属于这种情况。大多数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处理此类问题时都不会使用随机样本的方法。

正如个案研究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占据中心位置，谨慎选择实验、个案和经验对牛顿、爱因斯坦和玻尔的物理学发现也很关键。同样，在社会科学中，策略性地选择个案也会大大增加个案研究的可推广性（generalizability）。在经典的“富裕工人”研究中（John Goldthorpe、David Lockwood、Frank Beckhofer、Jennifer Platt，1968—1969），研究者慎重地寻找尽可能有利于论点的个案，他们的论点是：工人阶级已经达到中产阶级地位，并能融入主流社会而没有任何身份认同危机和其他相关冲突（Wieviorka，1992）。如果连有利的个案都不支持该论点，那么在其他一般个案中该论点可能也无法成立。他们选择了卢顿作为个案，一个伦敦附近的繁华的工业中心，有很多以高工资和稳定社会地位闻名的公司——这是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沃土，研究者们集中的田野工作发现就算在这里也流行着自发的工人阶级文化，这对阶级认同的论点给予了一般性支持。接下来我们将更加系统地讨论这种选择样本的策略。

关于个案研究、大样本和研究发现之间的关系，贝弗里奇（Beveridge，1951；转引自 Kuper & Kuper，1985）早在社会学科的计量革命之前就注意到，“更多的

发现源于详尽认真的观察(即单个的个案),而不是源于那些应用于大群体的统计资料"。这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总是合适或作用重大,或者大样本的随机抽样就没有价值。方法的选择当然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和它的背景。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将基于大样本或个案组得出的形式上的概括化看作科学过程的主要来源,显然有些过分夸大。布劳格(Blaug,1980),一个自称拥护假设-演绎科学模型的经济学家,证明了尽管经济学家一般口头上都承认假设-演绎模型和概括化,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很少践行他们的宣称。托马斯·库恩指出,一般而言,科学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是研究者们拥有广泛的开展科学工作的实践技能。概括化只是众多技能中的一种。"科学"在日耳曼语中的字面意思是"获得知识(wissen-schaft)"。形式上的概括化只是人们获取和积累知识的一种途径。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不是通过形式上的概括化得到的知识就不能进入某指定领域或社会的知识积累过程。即使没有形式上的概括化,知识依然可以转移。毫无概括企图的、纯现象学描述的个案在知识积累进程中当然也有其价值,甚至经常开辟出科学革新的新路子。这并不是在批判形式上的概括化所做的努力,因为它也是科学发展中重要的、有效的方法。我们只是在强调将形式上的概括化视为科学探究唯一合法手段的局限性。

关于个案研究在从检验假设到试图概括中的角色,埃克斯坦提出了折中观点:

> 比较研究和个案研究是最终检验理论的非此即彼的手段,如何选择主要受制于随意的或实践的,而不是逻辑的、周全考虑的……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观点:个案研究容易引发问题(problem-prone)因而是不可信的,比较研究由于不容易引发问题(problem-free)而应值得推崇。(Eckstein,1975,pp.116,131)

此处埃克斯坦使用"硬"意义上的术语"理论",即包含解释和预测;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检验"软"意义上的"理论",即检验命题或假设,因此埃克斯坦比我更加强烈地反对个案研究不能用于检验理论或概括化的观点。埃克斯坦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存在预测性的理论,那么个案研究也可以和其他方法一样用来检验这些理论。

最近,乔治和本尼特(George & Bennett,2005)指出了个案研究与理论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通过异常个案研究,一如沃尔顿(Walton,1992,p.129)也同样观察到的,"个案研究可能会产生最好的理论"。但是,埃克斯坦已注意到,自己所在的政治学领域明显缺乏真正的理论,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 想将理论训练有素地应用于个案——如果真的要求"训练有素地"应用,即旨在表明某有效理论阐释了一个特定个案而排除了其他——就要求人们更加严格地陈述理论。如前所述,不幸的是,这在政治研究中很罕见。原因之一是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Eckstein,1975,pp.103-104)

个案研究由于使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称之为“证伪”的方法(它构成了社会科学中批判的反身性理论),因而成为概括的典范方法。证伪是检验某科学命题能否被接受的最严谨方法之一:哪怕只有一个观察结果与命题不符,该命题就是无效的,必须被修正或拒绝。波普尔曾用至今仍著名的“所有天鹅都是白的”的例子指出,只要有一个人看见一只黑天鹅,这个异常个案就可以证伪这个命题,以此获得总体意义并激发更深入的调查和理论构建。个案研究尤其适合识别“黑天鹅”,因为它用深入的方法,可以仔细证明那些看上去的“白”天鹅其实是“黑”的。异常个案和证伪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源泉,它们指向新概念、新变量和新的因果机制的发展,从而能够解释异常个案以及其他类似的个案。

之后讨论个案研究的第四个误区时我们还会提到“证伪”。现在,对第二个误区,即“人们不能基于一个特定个案进行归纳概括;因此个案研究不能为科学发展做出贡献”,做如下修正:

> 人们经常可以基于单个个案来进行概括,个案研究作为其他方法的补充或替代,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把形式上的概括化看作科学发展的源泉则被夸大了,而“个案的力量”和可迁移性却被小觑了。

误区 3

> 个案研究对提出假设大有裨益;而在检验假设、构建理论时则其他方法更适用。

正如本章开篇中企鹅出版社的《社会学词典》对个案研究的定义所示,个案研究的第三个误区是强调个案研究只在整个研究进程的第一阶段,即形成假设阶段有用,而随后的假设检验和理论构建阶段则最好使用其他方法。这个误区来源于上一个不能从单个个案进行普遍性推广的误区。也正因为第二个误区在上文已被修正,现在我们可以这样修正第三个误区:

> 个案研究对提出和检验假设都有用,但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研究活动。

一直抵制该领域成见的埃克斯坦甚至进一步指出,个案研究用于检验假设比用于形成假设更好。埃克斯坦(Eckstein,1975,p.80)强调,个案研究“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有其价值,但是它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最有价值的阶段——那就是检验候选理论的阶段——却被人赋予了最少的价值”。后来,乔治和本尼特(George & Bennett,2005,pp.6-9)肯定并拓展了埃克斯坦的观点,他们发现个案研究特别适合发展理论,因为相比其他方法,个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能更好地完成下列任务:

- 链接因与果的过程追踪(参见文本框 17.1)

- 对假设的因果机制进行详细探索
- 针对历史性解释的发展和检验
- 理解概念对情境的敏感性
- 根据异常个案的灵感,形成新的假设和研究问题

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甚至都开始用个案研究方法来测试他们的理论和假设了,这应该可以缓和数十年来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在个案研究这一问题上的敌对关系(Bates,Greif,Levi,Rosenthal,& Weingast,1998;Flyvbjerg,2006)。

文本框 17.1　通过过程追踪来证伪诺贝尔奖理论

几年前,《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与我联系,请我为由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评论。这位编辑对于卡内曼获得诺贝尔奖感到非常困惑,卡内曼获奖的理论认为,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制定可以解释天生的乐观主义所执行的决策中的失败(Lovallo & Kahneman,2003)。然而,我和我的团队从策略性曲解的角度解释了相似的现象,即说谎是人们行为的一部分(Flyvbjerg,Holm,& Buhl,2002)。这位编辑问,谁是正确的呢?乐观主义是一种无意识地自欺欺人,然而,谎言却是有意识地欺骗他人。因此,问题最后便归结为引起失败的(我们大多时候都认同的)欺骗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和卡内曼倚重的研究欺骗的统计学方法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为了理解是否存在意图,现在有必要进入人们的头脑进行全程追踪。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和访谈,我和我的团队证实了,事实上,欺骗通常是有意的,尤其是在政治或组织压力之下作出的重大决定。因此,我们证伪了乐观主义作为执行失败的普遍解释,并且建立了一种将乐观主义和策略性的曲解结合起来的全新的解释失败的精细理论。(Flyvbjerg,2007)

假设检验直接关系到"可推广性"问题,反过来,这个问题又关系到个案的选择。在这里,个案研究可以通过策略性地选择个案提高可推广性(更多的个案选择方法,参见 Ragin,1992;Rosch,1978)。当目标是获取最大可能数量的针对特定问题和现象的信息时,有代表性的个案或随机抽样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策略。因为典型的或普通的个案通常信息量都不是最丰富的。非典型的或极端个案常常能够显示出更丰富的信息,因为它们能够激活研究情境中更多的行动者(actors)和基本机制。另外,从理解导向和行动导向的视角来看,厘清特定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比描述问题的现象以及它出现的频率更为重要。强调典型性的随机抽样几乎不能够产生这种洞察力;为了效度而选择较少的个案更为合适。

表 17.1 总结了各种形式的抽样形式。极端的、异常的个案很适合通过引人注目的方式得出一个观点,它常常出现在著名的个案研究中,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狼人"和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异常的个案通常也更加适合理论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现有理论的局限性,以便发展新的概念、变量和理论,这些理论将会顾及那些此前被视为局外的因素。

表 17.1　样本和个案的选择策略

选择类型	目　的
A.随机选择	为了避免系统性偏差。样本的大小决定了概括化

续表

选择类型	目　的
1.随机抽样	为了使样本具有代表性,允许对总体的概括化。
2.分层抽样	从在总体中特别挑选的亚组中进行概括。
B.信息导向的选择	从小样本和单个个案中获得信息效用最大化,个案的选择基于对信息内容的预期。
1.极端或异常个案	在异常个案中获取信息,它可能更加具有问题性或者能够更好地靠近定义。理解现有理论的局限性,以便发展新的概念、变量、理论来描述这种异常的个案。
2.最大变异个案	获得个案在不同情况下的过程、结果等的显著性;例如,三到四个在同一维度上很不同的个案:大小、组织形式、位置、预算等。
3.关键个案	获取允许对该类型进行逻辑推理的信息,“如果对这个个案是(不是)有效的,那么它适用于所有(或无一)个案”。
4.范式个案	发展一种隐喻或者建立就这个个案所关注领域的学派。

相反,关键个案可以被定义为与普遍问题相关的有战略重要性的个案。前面提到的铅球和羽毛的策略性的选择就是一个关键个案,为的是测试不同物体是否以相同的速度下落。这种对于材料的精心挑选,为系统阐述一类概括化提供了可能性,它也是关键个案的特征,此类概括化即“如果它对这个个案是有效的,那么它对所有(或许多)个案都是有效的”。其否定形式的概括化将是,“如果对这种个案是无效的,那么对任何一种(或几乎无一)个案都是无效的”(参看文本框 17.2)。

文本框 17.2　脑损伤的关键个案

一家职业医疗诊所想要调查那些在有机溶剂环境中工作的人们是否遭受脑损伤。诊所并不需要从其周围全部的有机溶剂企业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样本,而只需要策略性地选定单个工作车间,并且所有关于清洁、空气质量等安全规定在这个车间都被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个被选作典型的企业就成了一个关键个案:如果在这样一个特殊实验室发现脑损伤与有机溶剂之间存在关联,相同的问题就有可能存在于那些不太在乎安全规定的企业。通过这种策略性的选择,研究者在探究特定问题方面既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资金,并且从该关键个案中可能概括出以下几点:“如果对这个个案是有效的,那么对全部(或许多)个案都是有效的。”否定形式的概括为,“如果对这个个案是无效的,那么对任一(或几乎无一)个案都是无效的。”在这个例子中,职业医疗诊所在典型企业中发现脑损伤与有机溶剂存在关联,并且得出结论——需要辖区内所有企业处理这个问题。

如何识别关键个案?这个问题比关键个案由什么构成更加难以回答。选定一个关键个案需要经验,并没有定能识别关键个案的普适方法论原则。仅能提供的一般建议就是,当寻找关键个案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最可能的”或

者“最不可能的”个案,换言之,这些个案可以明显地证明或者无可辩驳地证伪命题和假设。“最不可能的”一个典型个案就是米歇尔斯(Michels,1962)所做的关于组织中寡头统治的经典研究。通过选取一个具有强烈民主理想的横向结构的草根组织——此类组织最不可能存在寡头统治——米歇尔斯可以检验寡头统治的普适性论题,即“如果这个组织是寡头统治的,那么其他组织就更是如此了”。一个对应“最可能的”典型个案是怀特(Whyte,1943)在波士顿附近的贫民窟所做的研究,按照已有的理论,这里应该表现出社会的无组织性,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

“最可能的”类型的个案很适合于命题的证伪,而“最不可能的”个案很适合于命题的证实。我们还应注意,一个命题的“最可能的”个案也是其反命题的“最不可能的”个案。例如,怀特所研究的贫民窟也可以被看作社会组织的普适性假设下的“最不可能的”个案。因此,判断一个个案是“最可能的”还是“最不可能的”与研究的设计相关,也与实际个案的特殊性质相关。

个案选择的最后一个策略就是范式个案的选择。托马斯·库恩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家们的基本技巧或背景实践,他们按照“范例”被组织起来,这些范例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被科学史专家研究。类似地,像克利福德·格尔茨和米歇尔·福柯这样的学者曾经常围绕着特定的文化范式组织他们的研究:格尔茨的范式蕴含于巴厘岛人斗鸡时的“深度游戏”之中,而对福柯来说,欧洲的监狱和“全景敞视监狱”则是样板。这两个例子都是范式个案的样板,也就是说,这些个案突显了更多所研究社会的普遍特征。库恩阐明科学范式不能表述为规则或理论。没有哪一个预测性理论是关于预测性理论如何产生的。一个科学的活动是否被承认或被拒斥为好的科学,取决于它与一个或更多个案,即好的科学研究的实践原型的相似程度。科学家如何做研究的范式个案准确地说就是这样的一种原型。它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点,也可以作为一个思想学派建立的核心。

像对待关键个案那样,我们可以问,“如何识别范式个案?”“如何断定既有的个案是否具有隐喻和原型价值?这些问题甚至比针对关键个案更难回答,这正是因为范式个案超越了任一基于规则的类型标准。没有针对范式个案的标准,因为它本身设立有标准。德里弗斯(Hubert Dreyfus)和德里弗斯(Stuart Dreyfus)视范式个案和个案研究为人类学习的核心。在对休伯特·德里弗斯(Hubert Dreyfus)的访谈中(作者的档案),我因此问他什么构成范式个案以及它如何能够被识别。德里弗斯回答道:

> 海德格尔(Marrin Heidegger)说,你识别出一个范式个案是因为它闪闪发光,但是我想这没有太多的帮助。你不得不凭借直觉。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判断塞尚的某幅作品好些或差些。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存在什么规则使塞尚成为一个现代画家的典型范例……这在民主社会是一个大问题,民众本应该去为他们的直觉辩护。而事实上,没有人真的能够为自己的直觉辩护。因此你不得不寻找原因,但是它们又不是真正的原因。

有人可能同意德里弗斯的观点,认为直觉是识别范式个案的关键,但可能并

不认为不得不去为自己的直觉辩护是一个问题。对科学实践的常人方法学研究已经证明,科学的各式各样的实践依赖于想当然的程序,而这些程序很大程度上来自直觉。尽管如此,那些来自直觉的决定还是可靠的,这么说是因为其他实践者也会直觉如此,即使不立刻直觉如此,也经常能够解释得通。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范式个案的选择上。我们可以基于想当然的、直觉的程序选择一个个案,但是我们也需要对这种选择作出解释。对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来说,这种解释必须是切合实际的。这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学术研究、自然科学或其他方面的一个普遍特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科学范式个案研究选择所独有的特征。譬如,有人通过陈述其对某项研究直觉的想法通常是不足以使这项研究基金的申请获得批准的。一个研究理事会的理想运行是这样的:即使研究者的直觉可能是正确的,研究者也要对他(或她)的直觉选择提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要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项目,然后理事会以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批准这个项目。

总是或经常预判某个个案——比如格尔茨的巴厘岛斗鸡个案——能够成为典型范式个案是不可能的。除了个案选择的策略之外,个案研究的实施也必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这项研究以后会引起学术共同体、被研究对象,甚至更广泛的公众的注意和反馈。个案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提出的有效性的主张,以及在针对这项研究是否有价值的对话中所赢得的荣誉与地位。像其他的优秀工匠一样,研究者能够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借助他们的经验和直觉去鉴定在某种范式下的一个个案是否有意义,能否为这个选择的个案提供能够被广泛接受的理由。

必须提及的是,关于个案选择的各种策略并非是相互排斥的。例如,一个个案可能同时是极端个案、关键个案和范式个案。对该个案的阐释可以提供独特的丰富信息,因为将个案视为或阐释为不同的类型而获得的视角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最后要说的是,一个最初被研究者认为属于某种类型的个案也可能在经过仔细的研究后而变成另一种类型(参看文本框 17.3)。

文本框 17.3　在不知不觉中,关键个案转变为极端个案

当打算在丹麦奥尔堡做一个关于城市政策与规划中的理性和权力的个案研究时,我曾写道(Flyvbjerg,1998a),我努力按照如下的想法将这项研究设计成一个"最可能的"关键个案:在奥尔堡城市政策和规划中,如果理性屈服于权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至少在丹麦是这样,因为奥尔堡的政策与规划中有比其他地方更强烈的理性范式。最后,我认识到这个逻辑是有缺陷的。因为我对奥尔堡当地权力关系的研究表明最有影响的一个"权力面"是工商会,它的影响大大强于来自其他方面的力量。这一问题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是因为对当地权力关系的研究比对当地规划的研究少很多。因此不知不觉地,我将关键个案的研究转变为一项极端个案研究,因为在奥尔堡理性和权力通常都很强。我的研究因此变成一个在城市的政策和规划领域中,当强理性遇到强权力时会发生什么的研究。但是,我碰巧把奥尔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来研究,而我并非是有意选择它的。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经历,特别是在当我意识到我没有做成一个关键个案研究之后的几个月里;直到我明白这并不全是损失,因为我也有其他收获。我认为,作为一个涉足新领域的个案研究者,必须对这样的事情有所准备。

误区 4

> 个案研究存有对证实的偏爱,即倾向于证实研究者的先入之见。

个案研究的第四个误区就是认为个案研究偏爱证实,认为个案研究有证实研究者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倾向,因此,个案研究的科学价值受到了质疑。例如,迪亚蒙德(Diamond,1996,p.6)就持有这种观点。他指出个案研究有他所称的"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应用"科学的方法",迪亚蒙德认为作为方法的有用之处在于"要像收集资料那样,抑制某人带着前见对事实进行阐释的倾向"。

培根(Bacon,1853,p.vlvi)认为这种对证实的偏爱不仅是一个特有的与个案研究相关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培根这样写道:

> 出于其特有的本质,人类很容易将事物理解得比他们实际上发现的更有秩序也更平等。当任意一个命题产生之后,人类的理解就会促使其他东西为其增添新的支持和确认。认定一件事情比否定它更容易让人类激动与兴奋,但这是一个特有的永恒的错误。

在这里,培根确实触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所有研究者无论如何都需要处理的问题。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描绘了他为了避免对证实的偏爱而发展的方法(Barlow,1958,p.123):

> 我曾……在很多年间遵守一个黄金准则,也就是,每当发现有和我的整体结论相反的公开的事实、新的观察或者我突然产生的想法,我必须立刻记下它;因为我通过经验发现这些事实和想法比那些我赞同的观点更易于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由于这个习惯,很少有我未曾想到或试图回答的反对观点被提出过。

对于证实的偏爱是普遍的,但是还有断言认为个案研究与其他质性方法的缺陷在于: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它们为研究者的主观性和随意判断留下了更多空间,经常被认为没有量化的、假设-演绎研究方法那样严格。即使这种批评是有益的,因为它使我们对这样一个问题敏感起来,经验丰富的个案研究者则将这种批评视为缺少个案研究的相关知识的一种表现。坎贝尔和其他的研究者已经表明这种批评就是谬误,因为个案研究有其自己严格的、不同的确证方法,并不比量化方法缺少严格性。个案研究的优势是它能让研究者"紧贴"现实生活情境,直接检验理论与实际中呈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

按照坎贝尔、拉津、格尔茨、弗莱杰格等人的观点,从事过精密的、深度的个案研究的研究者通常都会报告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假定、概念和假设是错误的,以及个案材料迫使他们修正假设的要点。个案研究迫使研究者接受上述类型的曲解。拉津(Ragin,1992,p.225)称之为"小样本研究的特征(special feature of small-N research)",并且继续解释,批评单个案研究不如多个案研究的观点是

被误导的观点，因为甚至单个案研究“在多数研究中也是复合的，因为观念和事实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

格尔茨(Geertz,1995,p.119)指出在大多数深度个案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中，“田野”自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规训力量(powerful disciplinary force)：是武断的、苛求的，甚至压制的”。任何这样的力量，可以被低估，但却不能被规避。格尔茨说“这种力量是持续的”。格尔茨所说的这种普遍现象可以简单地通过检视个案研究就能被发现(例如 Eckstein,1975;Campbell,1975;Wieviorka,1992)。坎贝尔(Campbell,1975,pp.181-182)在下面的文字中讨论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 在一位警觉的、熟知当地社会的社会科学家所做的个案研究中，他用来解释关键差异的理论同时也产生出对这种文化诸多方面的预测或者期待，除非这些预测和期待也能被证实，否则他不会停留在这些理论上面……社会科学家的经验可以证实这种观点。甚至在一个质性的单个案研究中，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也经常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那些对单个案研究的讽刺……是正确的话，这样一个结果是不可能出现的——代之以一种主观上令人信服的解释的过于饱和。

按照以上引述的经验，个案研究以证伪而非证实为特征。而且，对于所有的研究方法来说，主观主义的问题和对证实的偏爱都是存在的，而不仅仅对于个案研究和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来说是这样。例如，武断的主观主义的要素，在量化或结构性调查的分类和变量选择中将是有意义的，正如在大样本个案中使用结构性问卷。以下几种可能性是很大的：(1) 由于没有在研究中彻底纠正，这种主观主义仍然存在；(2)这种主观主义可能影响结果，十分简单，因为量化的/结构性的研究者没有像个案研究者那样走进研究的现实，因此它们通过研究对象的“反馈(talking back)”被修正的可能性就较小。乔治和本尼特(George & Bennett,2005,p.20)将个案研究这种一切皆重要的(all-important)特征描述如下：

> 当一个个案研究者问一个研究参与者“当你做 Y 时是否想 X”，获得的回答是，“不，我正在思考 Z”，如果研究者并未曾想到将 Z 作为一个有因果关系的变量，她必须要去了解一个新变量了。

统计学方法可以鉴别能够导致新假设的异常个案，但是单独使用这些方法缺少实际鉴别新假设的手段。所有使用已有数据库的研究或者通过事先制定标准化问题的问卷收集数据的研究都是这样的。除非统计学研究者自己做档案工作、访谈，或者用开放式问题进行面对面调查——就像个案研究者那样——否则他们没有办法识别遗漏的变量(George & Bennett,2005,p.21)。按照拉津所说(Ragin,1992,p.225;也可参见 Ragin,1987,pp.164-171)：

> 这种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小样本的质性研究总能处在理论发展的前沿。当样本量变大时，就不太有机会能修订个案的范围了(即个案的边界)。在分析伊始，个案就被分解成变量了，并且几乎全部的思想对话和证据都通

过变量来表达。这个讨论的一种含义是,如果大样本能够对样本的多样化和潜在的异质性敏感的话,大样本的研究就会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里,大样本和单个个案之间的差别可以按照上文讨论的人类学习的现象学来理解。如果一个人认为研究工作的目标是理解和学习被研究的现象,那么研究就仅是学习的一种形式。如果一个人认为研究类似于其他的学习过程,能够通过人类学习的现象学来描述,那么非常清楚的是,最高级的理解方式是研究者将自身置于研究的情境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才能理解社会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与此相关的是,吉登斯认为对社会活动的有效描述假设研究者拥有必需技能去参与所描述的活动:

> 我已经接受这样的观点并认为它是正确的:对社会活动进行描述的条件在原则上是能够参与该活动。这就涉及观察者和参与者所共享的"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他们的行动构成和重构了社会世界。(Giddens,1982,p.15)

从这种观点来看,个案研究所具有的对现实的接近,以及由此产生的研究者的学习过程经常成为进一步理解现实的一种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境中有人开始理解贝弗里奇的结论:更多地发现根植于精深的个案观察,而非在大群体中使用统计学。在学习过程的终点上,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个案研究者通常将研究结束于对已有概念和理论的抛弃。这种活动简直就是学习和获得新洞见的核心要素。一个研究者从初学者转变为专家的过程就是理解的形式不断从简单转向复杂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第四个误区——个案研究被假定存有对证实的偏爱,被认为倾向于证实研究者先入之见——应该被修订如下:

> 个案研究并不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偏爱证实研究者的先入之见。恰恰相反,经验证明,个案研究对证伪既有观念的偏爱,甚于对证实的偏爱。

误区 5

基于特定的个案研究,很难概括和发展出普遍的命题和理论。

个案研究经常包含一种大量的叙述元素,当今谈论社会科学中的叙事问题,则有可能陷入一种可怕的绝境(想对叙事探究有一个适当的概观,参看本手册第25章)。当话语理论的特定部分将所有文本界定为叙事,并将所有的事物看作文本之后,好像什么都是叙事了。但是如果某个事物是所有事物,那么也许它什么都不是了,因此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界定。尽管如此,当思考个案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时候,完全避免叙事这个主题是非常困难的。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当我想到叙事时,我没有想到话语理论,而是想到了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这个爵士乐的标志性人物。当被问及他如何在长达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创作经典时,他答道:"我首先写了一个开头,然后写中间,最后写结尾。"叙事暗示着有关情节的问题,那就是一系列的事件以及它们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而戴维斯从最微小处开始。很显然,情节和叙事可以按照许多方式展开。但是如果你写戴维斯所讲的这种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经典叙述类型,你首先要努力吸引读者的注意,通常要通过诱饵,也就是一种特别吸引人的事件,或引出主体故事的问题。然后,你呈现问题、所涉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地,你把读者带到一个没有退路的情节中,其中的主要角色——在个案研究中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社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公司——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处理即将发生的问题,并在此意义上被检验。在这个阶段,通常会有冲突并且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冲突得以解决或者至少得到解释,重新恢复和谐,这些在社会科学叙事中可能被视为恰当的成果。

对于麦金太尔(MacIntyre,1984,pp.214,216)来说,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历史观作为一种行动观念,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观念。其他的观察者指出,叙事似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现代还是古代,它也许是赋予我们经验以意义的最基本的形式(Mattingly,1991,p.237;Novak,1975,p.175;参见 Abbott,1992;Arendt, 1958; Bal, 1997; Carr, 1986; Fehn, Hoestery, & Tatar, 1992; Rasmussen, 1995;Ricoeur,1984)。因此,叙事似乎不仅是讲故事的人的创造物,而且也是人类思维中的天生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我们通常通过构建叙事来理解世界的意义。

然而,人类对叙事的偏好也包含一种危险,就是所谓的"叙事谬误"。这种谬误包含人类对简化数据和信息的偏好,其方法是过度阐释和把故事压缩成错综复杂的资料集合(Taleb,2010,p.63)。与记起许多"无意义的"资料相比,"有意义的"故事更容易让人记起来并作出决定。因此,我们将意义放进事实中编织故事,即使有些时候是不当的。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就是,想想令人鼓舞的互联网是如何引领"新经济"的,其中的生产力已经与股票价值脱离了关系;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精灵神话。这样的故事很容易理解和上演——对于市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来说——但是它们是谬误的,就其本身而论,它们是危险的。在社会科学中,避免叙事谬误的手段与避免其他错误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在资料收集和使用过程中,经常对资料的效度和信度进行系统的检核。

基于深描的厚重叙事可以提供某些保护以防止叙事谬误。这种叙事通常逼近真实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相应的,它们可能是难以或不可能概括出简洁的公式、普遍的命题和理论(Benhabib, 1990; Mitchell & Charmaz, 1996; Roth, 1989;Rouse,1990;White,1990)。这容易被个案研究的批评者视为缺点。但是,对于个案研究者来说,叙事特别"深厚"和难于总结不是问题。与此相反,它们经常是揭露一个特别深刻问题的标志。因此问题则变成了一直被批评者视为理想的总结和概括是否可取。尼采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是非常清楚的,"首先,"他说关于做科学研究,"有人不要试图去剥夺它的丰富的歧义性"(Nietzsche,

1974,p.335,para.373)。

佩蒂(Peattie,2001,p.260)明确地反对对深度个案研究进行总结:“当研究者试图从许多宏大却相互排斥的概念中总结时,个案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即情境性的和穿透实质的力量都丢失了。”在佩蒂看来,与实际的“发现”和高水平的理论的概括化相比,深度个案研究对从业者更加有用,对社会理论来说也更加有趣。

与概括相反,“终结(closing)”一个个案研究就是使它保持开放。有两种策略在确保开放方面特别有效。首先,在详细报道他们的个案研究时,作者们要远离全能的叙述者和概括者的角色。相反,他们可以选择从故事本身的多样性来讲述故事,允许故事从多边、复杂以及来自个案中行动者们告知研究者的时而冲突的故事中展开。第二,个案研究的作者应避免将他们的研究与任一学术专业化的理论相联系。相反,他们可以选择将个案与更宽广的、超越专业化的哲学立场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作者为不同背景的读者留下空间思考这个个案是一个针对何者的个案的问题,从而得出不同的阐释和多样化的结论。目标并不是将个案研究打造成四海皆准(all things to all people),而是要因人而异(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在这里,从如此多的方面描述个案是有用的——就像生活本身那样——不同的读者可以被个案中不同的事情吸引或者排斥。读者未被引向任何一种理论路径,也未被强加上一种真理就在该路径的终点的印象。读者将不得不从个案中探索他们自己的路径和真理。因此,除了故事中人物和故事叙述者的阐释之外,读者被邀请去判断故事的意义和审视来自故事人物和叙述者的阐释,这都是为了回答个案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个案是一个针对何者的个案?”

像这样写作的个案故事既不能被简单叙述,也不能被概括为几个主要结论。个案故事本身就是一种结果。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虚拟的现实”,为的是读者愿意进入现实和彻底地探索现实,它的回报就是对不能从理论中获取的身边周遭的问题敏感起来。学生可以从这种现实中完全地放松下来,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可洞察真实生活实践的训练场,而这是学术训练所不能经常提供的。

如果重新回到人类学习的现象学,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个案研究来说总结概括并非一直是有用的,并且有时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初学者水平的知识恰恰由那些具有理论特征的简化的公式所组成,而真正的专家知识是建立在对上千个个案的亲密体验,以及区分这些个案的情形、细微差别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并未将这些个案浓缩为某种规则或标准个案。这个问题与缺乏启发性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专家系统去接近名家大师级的专家水平的情况相类似,甚至是在当这个系统与制定其规则的专家相比较的时候。这是因为专家并非使用规则而是使用各种丰富的个案经验。这才是真正的专业技能。专家系统的规则仅仅因为系统需要而被提出;规则具有专家系统的特征,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专家。

同样,有人可能会说,当研究者将他们的研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时候,规则

制定就出现了,这是研究文化的、研究者的以及理论化活动的特征。但这些规则不一定是由布迪厄的"名家大师级的社会行动者"组成的研究现实的一部分(Bourdieu,1977,pp.8,15)。在概括过程中有些本质的东西可能丢失了——意即理解名家大师级社会表演的可能性,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它不可能被提取成理论规则——他们所害怕失去的,这些东西使个案研究者对于概括他们的研究非常谨慎。个案研究者因此对祛除现象学细节以支持概念的封闭性持怀疑态度。

维特根斯坦分享了他这个怀疑论。按照加斯金和杰克逊的观点,维特根斯坦使用如下的隐喻描述他在哲学中使用的个案研究方法:

> 在教你们哲学时,我就像一个导游指引你如何找到你环游伦敦的路线。我必须带你穿过这个城市,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尤斯顿到堤岸,从皮卡迪利大街到大理石拱门。在我带你从各个方向穿游这个城市很多次之后,我们将经过任意给定的街道很多次——每一次穿过街道都作为一个不同旅行的一部分。最后你会非常了解伦敦;你能像一个伦敦人那样找到你要走的路线。当然,一个好的导游会带你更多穿行重要的街道,而较少带你走小巷;一个糟糕的导游则与此相反。在哲学上我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导游。(Gasking & Jackson,1967,p.51)

这种方法意味着要直接探索一手现象,而不是阅读现象的梗概介绍。对现实中实践的研究要在研究它们的规则之前进行,并且只学习那些接收公众审查的实践部分也是不令人满意的。戈夫曼(Goffman,1963)所说的社会现象的"后台",亦如维特根斯坦谈论的小巷,也要予以深究。

关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介入问题,艾伯特(Abbott,1992,p.79)已经正确地观察到:一个按照典型个案叙述的社会科学表达将提供"远比呈现社会科学变量更好的政策干预路径"。麦金太尔(MacIntyre,1984,p.216)同样说道,"我只能回答'我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能回答之前的这个问题'我能发现我自己在一个什么故事里?'"。同样的,马丁利(Mattingly,1991,p.237)指出叙事不仅为我们已有的经验赋予有意义的形式,它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望未来的机会,这帮助我们预测那些我们还未经历的情况,让我们可以想象不同的未来。叙事探究不会——事实上不可能——从一个明确的理论假设开始。相反,叙事研究开始于对特定现象的兴趣,这种现象能以叙事的方式被最好地理解。然后叙事研究从参与者、研究者和其他人的视角对这种现象作出描述和阐释。

拉波夫和沃勒茨基(Labov & Waletzky,1966,pp.37-39)写道,当一个优秀的叙事结束时,"一个旁观者说'那又怎么样?'将是无法接受的"。每一个优秀的叙事者都不断地避开这类问题。一个缺乏寓意的叙事可以独立地、简单地叙述,但并非毫无意义。并且,一个仅有某种简单寓意的叙事被认为是不成功的。一个成功的叙事根本不允许这个问题被提出来。在该问题被问及之前,故事已经提供了答案。故事本身就是答案(Nehamas,1985,pp.163-164)。

对第五个误区——从具体个案研究中概括普遍命题和理论经常是困难的——的修正如下文所示:

> 从个案研究中概括常常是困难的,这是正确的,尤其就个案过程而言。而就个案研究的结果而言,就不那么正确了。但是,个案研究中的概括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研究现实的属性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作为方法的个案研究造成的。对个案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常常是不可取的。优秀的研究应该以完整的叙事被阅读。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尽管对一些个案研究进行概括是困难的或者不可取的,但是个案研究肯定能有助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例如,在第二种和第三种误区中,可以使用这种原则去检验上面描述过的命题。

个案研究的当前趋势

本章以指出个案研究中的悖论为开端,也就是说,即使个案研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且产出了许多经典作品,作为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在广大的主流学术圈中,仍然被普遍地轻视,或者说被简单地忽视。这种情形已被证明存在了很长时间。

但是,就像乔治和本尼特(George & Bennett,2005,pp.4-5)所指出的那样,最近发生了某种立场在松动的迹象。一种协同互补的研究方法正在走俏,学者开始认识到不同方法论的方法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并且实质上是互补的。由于受过量化的和质性的双重研究方法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已经涌现,所以旧式的量化和质性这种对抗性的划分正在失去影响。对于这些新一代的学者来说,研究是问题驱动的,而不是方法驱动的,这意味着研究方法是用来为手头的研究问题提供帮助的。将量化和质性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多半会使研究工作做到最好。最后,一些最雄心勃勃的宣称——认为量化的革命将会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能去解释和预测,已经大大减少了,并在为那些关于社会科学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更为现实和平衡的观点让出空间。本手册部分章节是关于混合方法的,第15、16章,都是很好地表明这种立场的松动和更加平衡的态度。

如果社会科学中量化革命的时代被称为实证主义式的,情况常常如此,那么今天我们就处在后实证主义式的时代,也可能是后范式的时代(Schram,2006)。我致力于发展一种适合于这种特别时代的社会科学,其核心即我所称为的"实践的社会科学(phronetic social science)",此名源自古希腊哲学术语中的实践性智慧或常识,即实践智慧(phronesis)(Flyvbjerg,2001;Schram & Caterino,2006)。这就是新社会科学所是:常识性的。放弃不可能获胜的战争是一个基本常识,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之间的战争,或者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战争就是这

样的争斗。最终承认个案研究和统计学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补充的也是一个常识（详见文本框 17.4）。

个案研究与统计学方法的互补性可以被概括为表 17.2。个案研究的主要优势是深度——详细的、丰富的、完整的，以及个案内部的差异——而对于统计学方法来说主要优势是广度。如果你想彻底地理解一个现象——比如说，家庭中儿童忽视或者城市更新改造中的成本超支问题——其成因是什么，如何去防止它，等等，你需要做个案研究。如果你想理解这种现象是怎样传播的，它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不同人群中的变化情况，达到何种统计学的显著性水平，你不得不做统计学研究。如果你想对两个方面都进行研究，这是可取的，如果你想深刻解释这种现象，那么你需要既做个案研究又做统计学调查分析。这两种方法的互补是如此简单、如此漂亮。

文本框 17.4　在行动中互补：从个案研究到统计学方法，然后再折回

我目前对大型项目的研究最初是被两个事件激发的：一是英伦海峡海底隧道，这一隧道连接英国和法国；二是连接斯堪的纳维亚与欧洲大陆的丹麦大贝尔特海峡隧道。这是欧洲两个最长的水下铁路隧道，每个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海底隧道建设开始不久之后，成本开始逐步升级，在 1994 年隧道开放时，实际的成本受到质疑，导致工程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这仅仅是英国和法国不够幸运吗？或者是丹麦人在大贝尔特海峡隧道做得更好吗？未必。成本超支仍是较大的，实际达到了 120%，在 1997 年通车之前，隧道陷入了财政困境，进度滞后计划多年。我对这两个大型项目进行个案研究的目的在于记录和分析在它们计划和执行之中出现的明显的失能（Flyvbjerg，Bruzelius，& Rothengatter，2003）。这项研究也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成本超支和可行性而言，英伦海峡海底隧道和大贝尔特海峡隧道是否只是例外（outliers），或者对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说，极端缺乏财政预算能力是否是常见的。在搜索全世界的图书馆和请教同事时，我发现没有研究用一种有效的统计学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决定和我的研究小组做这项研究，并且现在我从个案研究转向统计学的方法。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很高水平的统计学显著性上，英伦海峡海底隧道和大贝尔特海峡隧道不是例外，而是正常的（normal）；十分之九的工程项目都会成本超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我们及时拓展资料时，我们发现在可以找到的 70 年的资料中，在获得正确的成本估算和保持预算不变方面并没有改进的迹象。对于成本低估和超支上的相同的明显错误延续了几十年之久。我们开始争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重复犯几十年的错误是否真的是一个错误，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在发生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到个案研究和全程追踪（参见表 17.1）。我们发现成本超支和缺乏可行性，不能被很好地解释为简单的错误，而是要通过一些更阴险和不择手段的东西来解释，就是说，在评估阶段，项目的推进者为了使工程立项和建设会在成本和效益方面做一些策略性的虚假陈述。从最开始对英伦海峡海底隧道和大贝尔特海峡隧道结局的基于个案的好奇——从个案研究又转到统计学研究，然后再转回来——我的团队和我在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和管理中发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欺骗文化（Flyvbjerg，2007）。从这项研究衍生出的一个新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团队正在调查那些十分之一完全按照预算成功的项目——我们的统计学研究中所记录的——是否可以复制还是仅仅是由好运所致。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个案研究，现在将成功作为异常个案加以研究。

表 17.2 个案研究与统计学方法的互补性

	个案研究	统计学方法
优 势	深度 高概念效度 对情境和过程的理解 理解现象的成因、相关原因和结果 激发新的假说和新的研究问题	广度 理解一种现象在某一人群中的普遍程度 对个案人群的相关性进行测量 构建概率的置信水平
弱 势	选择的偏爱可能夸大或低估关系 对现象所在人群中发生之事理解力弱 统计学显著性往往不知道或不清楚	概念的延伸,通过分组将不同的个案集中成为较大的样本 对情境、过程和因果机制的理解力弱 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 激发新的假设的技巧差

当你思考这个问题时,你会惊讶于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在文献中、在大学院系部中表现出来的分离和对立,其持续的时间和它们已有的时间一样长。这就是当部落主义和权力取代了理性来统治学术殿堂时所发生的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它也证明专业学者也是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这种分离并不是合乎逻辑的结果,研究生和学者们为了做研究并且做好研究而需要知道这些,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的斗争问题上,优秀的社会科学反对一种非此即彼的观念而支持两全其美。《国际社会与行为科学大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的说法是对的,它指出个案研究和统计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比单独使用将会取得更大的科学进步"(Smelser & Baltes,2001,p.1513)。

这就是说,尽管如此还应该加上,对于个案研究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平衡仍然存在偏差,在社会科学中仍然有很多人支持后者,以至在大多数学科中个案研究处于一个弱势地位。因此,目前必须继续下功夫,在方法论上澄清个案研究以及它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驱散方法论上的阴霾,个案研究已经被这种阴霾笼罩得太久了。本章即做这样一种澄清的工作。

参考文献

Abbott, A. (1992). What do cases do? Some notes on activity in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53-8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bercrombie, N., Hill, S., & Turner, B. S. (1984).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Arendt, 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con, F. (1853). Novum organum. In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works of Lord Bacon (Vol. 1). London: H. G. Bohn.

Bailey, M. T. (1992). Do physicists use case studies? Though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2*(1), 47-54.

Bal, M.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Barlow, N. (Ed.). (1958).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Norton.

Barzelay, M. (1993). The single case study as intellectually ambitious inquiry.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 (3), 305-318.

Bates, R., Greif, A., Levi, M., Rosenthal, J.-L., & Weingast, B. (1998).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 (1990). Hannah Arendt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 *57*(1), 167-196.

Beveridge, W. I. B. (1951).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London: Heinemann.

Blaug, M. (1980).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D. T. (1975). Degrees of freedom and the case stud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8* (1), 178-191.

Campbell, D. T., & Stanley, J. C. (1966).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Carr, 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ristensen, C. R., & Hansen, A. J. (Eds.). (1987). *Teaching and the case method.*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ragg, C. I. (1940). Because wisdom can't be told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Reprint 451-005).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1-6.

Diamond, J. (1996, November 14). The roots of radicalis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 4-6.

Dreyfus, H., & Dreyfus, S. (with Athanasiou, T.). (1986).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Eckstein, H.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F. J. Greenstein & 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7, pp. 79-137).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Eysenck, H. J. (1976). Introduction. In H. J. Eysenck (Ed.), *Case studies in behaviour therap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ehn, A., Hoestery, I., & Tatar, M. (Eds.). (1992). *Neverending stories: Toward a critical narrat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lyvbjerg, B. (2001).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Why social inquiry fails and how it can succeed aga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lyvbjerg, B. (2006). A perestroikan straw man answers back: David Laitin and phronetic political science. In S. F. Schram & B. Caterino (Eds.), *Making political science matter: Debating knowledge, research, and method* (pp. 56-85).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Flyvbjerg, B. (2007). Policy and planning for large-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roblems, causes, cur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34*(4), 578-597.

Flyvbjerg, B., Bruzelius, N., & Rothengatter, W. (2003). *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lyvbjerg, B., Holm, M. K. S., & Buhl, S. L. (2002). Underestimating costs in public works projects: Error or li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8*(3), 279-295.

Gasking, D. A. T., & Jackson, A. C. (1967). Wittgenstein as a teacher. In K. T. Fann (Ed.), *Ludwig Wittgenstein: 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 (pp. 49-55). Sussex, UK: Harvester Press.

Geertz, C.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erring, J. (2004).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2), 341-354.

Giddens, A. (1982).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Goldthorpe, J. H., Lockwood, D., Beckhofer, F., & Platt, J. (1968-1969). *The affluent worker* (Vols. 1-3).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iffin, L. J., Botsko, C., Wahl, A.-M., & Isaac, L. W. (1991). Theoretical generality, case particularit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rade un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C. C. Ragin (Ed.),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pp. 110-136).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 J. Brill.

Kuper, A., & Kuper, J. (Eds.). (1985).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abov, W., & Waletzky, J. (1966).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pp. 12-44). Seattle, WA: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Landman, T. (in press). Phrone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In B. Flyvbjerg, T. Landman, & S. Schram (Eds.), *Real social science: Applied phrone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 A. S. (1989). Case studie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Human Relations*, *42*(2), 117-137.

Lovallo, D., & Kahneman, D. (2003, July). Delusions of success: How optimism undermines executives' decis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6-63.

MacIntyre, A.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2nd e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Mattingly, C. (1991).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practical actions: Two learning experiments in reflective storytelling. In D. A. Schön (Ed.), *The reflective turn: Case studies in and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pp. 235-257).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2009). *Case study*.

Michels, R. (1962). *Political parties: A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Collier.

Mitchell, R. G., Jr., & Charmaz, K. (1996). Telling tales, writing stories: Postmodernist visions and realist image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5*(1), 144-166.

Nehamas, A. (1985).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etzsche, F. (1974). *The gay science*. New York: Vintage.

Novak, M. (1975). "Story" and experience. In J. B. Wiggins (Ed.), *Religion as stor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eattie, L. (2001). Theorizing planning: Some comments on Flyvbjerg's *Rationality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6*(3), 257-262.

Platt, F. (1992). "Case study" in American methodological thought. *Current Sociology*, *40*(1), 17-48.

Ragin, C.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agin, C. C. (1992). "Casing"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quiry.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217-22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gin, C. C., & Becker, H. S. (Eds.). (1992).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smussen, D. (1995). Rethinking subjectiv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self.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1*(5-6), 159-172.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sch, E.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 Rosch & B. B.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pp. 27-48).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Roth, P. A. (1989). How narratives explain. *Social Research*, *56*(2), 449-478.

Rouse, J. (1990). The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Inquiry*, *33*(2), 179-196.

Schram, S. F. (2006). Return to politics: Perestroika, phronesis, and post-paradigmatic political science. In S. F. Schram & B. Caterino (Eds.), *Making political science matter: Debating knowledge, research, and method* (pp. 17-32).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chram, S. F., & Caterino, B. (Eds.). (2006). *Making political science matter: Debating knowledge, research, and method.*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melser, N. J., & Baltes, P. B. (Eds.). (2001).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Elmsford, NY: Pergamon.

Stake, R.E. (2008).Qualitative case studies.In N. K.Denzin & Y.S.Lincoln (Eds.), *Strategies of qualitative inquiry* (3rd ed., pp. 119-150). Thousand Oaks, CA: Sage.

Taleb, N. N. (2007).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

Walton, J. (1992). Making the theoretical case.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121-13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ite, H. (1990).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hyte, W. F. (1943).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eviorka, M. (1992). Case studies: History or sociology? In C. C. Ragin & H. S. Becker (Eds.),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pp. 159-17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B. (1987). Single-case experimental designs in 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Neuropsychology*, *9*(5), 527-544.

18 表演民族志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朱迪思·哈默拉(Judith Hamera)

韩倩 崔雪娟 译 朱志勇 校

我的学生们都不太理解 Sandy Sem[1] 对其父母幸存者身份的反应,也不理解她对这种身份和老师布置的课堂作业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反应。Sandy 的父母是 1975 年到 1979 年间发生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地区那场大屠杀(Khmer Rouge)的幸存者。在以难民身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长滩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场暴行的经历还时常困扰着他们。我对这个家庭所跳的高棉地区传统舞蹈进行了分析,据我观察(Hamera,2007,pp.138-171),她的父母并不愿意分享他们遭受折磨的细节,甚至也不愿多说他们的生活,而且 Sandy 也不愿意给他们施加压力。我的课堂文化推崇回忆录和自我披露,学生们对自身文化的起源和家庭传统感到骄傲,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深深地、也许是不假思索地认为见证既是个人救赎,也是社会救赎,因此我的课堂很难认可桑迪的逻辑,这在我与学生们分享的田野记录中有清晰的表达:

> Sandy:我们学校有一些项目,主要是谈论自己的文化和家庭——比如祖母、祖父或者其他什么人。然而,你不能直接问他们(桑迪的父母),特别是他(桑迪的爸爸),因为他会发火,而且老师——是的——她会相信的。好吧,我打算加入并且说"我的家庭来自柬埔寨,所有的人都在战争中或者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死掉了,但是没人提起过",可以吗? 于是我就这么编了。

她怎么会"就这么编了"? 怎么会不希望催促父母"讲出实情"? 难道他们和桑迪没有责任去了解并分享她是从哪里来的? 其他人如何看待这些"编造的事"? 而且让其他人知道是重要的,对吗? 为什么我,一位声称致力于严谨调查的教授,没有强迫这个家庭"向权势诉说实情"?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的批判性学者应该做的吗?

尽管我们做了尝试,但是关于为何 Sandy 的反应可能是有用的,或者说是有必要的或"正确的",我们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我问自己,如果把 Sandy 的情况转换成空间,会是怎样的? 她会看向观众吗? 她的观众是谁? 她有观众吗? 她的父母在哪里? 还有其他人在旁边吗? 他们又在哪里? 课桌被移走了,文字和概

念的空间展现开来。Sandy 的位置上出现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两个。其中一个面向观众坐着，低头看着一个打开的笔记本的空白页。“民族志学者”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站在一旁，“老师”拿着成绩簿站在另一边。另一个 Sandy 与第一个 Sandy 背对背坐着，看向相反的方向。从那个方向，在仿佛朝着消失点慢慢消退的对角线上，站着 Sandy 的“父母”，他们背靠着背，除了偶尔的声响（精疲力竭的叹息还有仿佛遭受疼痛的急促呼吸声），剩下的只有静默。在更远处站着的是“其他人”和“祖先们”，他们在移动，有时是紧紧相邻围成一个密集的圈子，有时是随意地穿过空间。他们在喃喃自语，几乎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在喃喃低语之中，有无可言语的痛苦和顺从的发音，还有不太清晰的笔记本和成绩簿，这就是 Sandy 的反应逻辑。“其他人”和“祖先们”离得太远而听不到，“民族志学者”和“老师”在另一个方向过于远离而理解不了。Sandy 的逻辑源于对情境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包括言语情境以及更重要的非言语情境，即情感能量在她的家中、她父母的生活中以及他们的过往中的传播。Sandy 协调了她个人、家庭及先前文化之中时间和空间的冲突（“此时此地”和“当时当地”），并且做出决定，我的学生若要领会，只能以他们所知的最好的方式参与和融入环境中情感能量的传播。

他们也开始理解她对老师要求她为“展示与讲述”课讲讲她的家庭而做的战略抵制了，不管设想得多好，这种课程都处于更大的关于证词的政治和商业范畴之中。“事实”，尤其是被剥夺者的事实，可以并且如此容易地由一种无孔不入的企业媒体文化来指派，这种文化把披露作为一种商品：不论是简单地追求轰动效应，把“族群肤色”作为话语的点缀，还是为容易伤感但无政治意义的同情而辩解。这就是麦肯齐（McKenzie，2001b）曾非常适宜地认定的“表演或其他”的要求的一种形式。在这种情境下，沉默和借口对个人来说是谨慎的，对社会也是富有成效和有用的，甚至也通过要求尊重而授权给桑迪，这种尊重产生于她和他们的批判性表演介入，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这种介入是共同的，尽管它并不完美，也不平衡。他们明白自己早期的诠释是简单的。一个学生观察到，这就是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谓的非假装的表演。

表演民族志：一种调查策略

这个例子表明了表演民族志作为教学法的运用，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事实上，表演民族志作为教学工具是非常重要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是强有力的概念和方法论工具（Alexander，2006； Denzin，2003，2006）。它揭示了“权力、政治和诗学”（Madison，2008，p.392）三者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也挑战研究者通过对这些互动的阐述而进行有意义的介入：这些介入会产生新的理解，并强调这些理解会促成更公正的环境。[2]

表演民族志为研究者探究文化的表现要素提供了词汇；它使研究者聚焦于

具体化,并将其作为文化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研究者提供了阐释学术参与的工具并承诺对"实践中/作为实践"的理论进行批判和干涉。在某些情况下,表演民族志将表演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表演民族志运用表演的理念对现象进行梳理,而人们通常不会用这些术语思考这些现象。一些表演民族志学者以解释和(或)出版的形式呈现他们的研究,正如我的课堂对"Sandy Sem"所做的那样。一些学者运用表述的写作方法将研究动态付诸文字。这些选择是相辅相成而非互相排斥的,这从前面讨论中展示的案例可以看出,麦迪逊(D.Soyini Madison)的个案研究《水仪式》(*Water Rites*,Madison,2006c)更是如此。

本章介绍了表演民族志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论、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也考察了具有争议的新方向。本章不可避免地具有选择性和局限性。表演民族志方法本身对推定的"完结"存有质疑,它更倾向贝克汀(Bakhtin,1984)提出的"不可完成的(unfinalizeable)",意指永远不可能存在最终的决断,只可能存在次末的结论。除了这种理论承担之外,转向表演民族志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绝对数量证明了它在制度上的未完成性和生命力。这种研究定位既是跨学科的,也是多学科的。跨学科是因为它依赖多个研究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间建立联系,比如传播学和戏剧研究,音乐和民俗学等。多学科是因为许多学科都需要表演民族志并对其做出贡献,如人类学、传播学、舞蹈学、民族音乐学、民俗学、表演研究和戏剧研究。它几乎涵盖了人文和质性社会科学的所有学术形式,而其中许多本身就是跨学科的。表演民族志的跨学科和多学科性是出于表演本身的需要。柏拉图认为这是表演的弱点之一,它无法圈定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并将其作为自己独有的领地。另一方面,戏剧和表演艺术都认为创作(poiesis)需要众多专业领域的知识整合(专业知识)、全方位的理解(体现的知识)、批判(政治介入的理性知识)和实用主义知识(专门技能)。

表演民族志的制度处境是关联的,在学科间模棱两可,这与它的实践性一致。这种关联性将方法和方法论捆绑在一起。表演民族志的关联性也要求梳理具体实践和外部情境之间复杂的关系,这需要广泛的解释。它既包括一个田野地点(field site)规范的"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也包括渗透于其中的不同的权力和特权、构成其组织的历史关联,以及为了形塑其能否被言说、被扮演和被理解而出现的比喻。表演民族志学者探索的是一种产生情境的相互启发的关系:准确地说,是"Sem 们"的生活中充满的"此地/此刻"和"彼地/彼时"之间的震荡。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此刻",也不存在能够完全脱离全球人口、资源和资本流动的"本地"(参阅 Alexander,2008 作为例子)。

与康克古德(Conquergood,2006b)提出的修辞的反身性一致,通常来讲,表演民族志具有明确的批判性,我的观点亦是如此。也就是说,表演民族志作为一种调查方法,与麦迪逊提出的"批判理论的'做法'或'表演'"(Madison,2005,p.15)具有内在相通性。[3] 首先,它假定理论和方法间存在一致性,而不是彼此分离。方法论中有大量的理论承担,而理论通过方法论得以体现。麦迪逊强调"做"批判理论,重视实践中批判理论的行动导向。"做"产生行动,再加上"批

判”,这种行动具有活化作用和能动性,它搅乱和挑战常规意义并倡导变革(Denzin,2003,2006; Madison,2008)。将表演民族志架构为“批判理论的实践”,是向界定了这种研究的“知识分子反抗”传统的致敬和继承,这一传统致力于不断质询那些被视为常规的观点(Madison,2005,p.13)。“实践”批判理论的意思是探索我们的研究地点、我们的方法和动机、我们进行学术陈述的策略以及我们自己享有特权的结构。它意味着要反复而明确地询问:谁从中受益? 谁做决定? 谁决定了做决定的人? 必须是这样吗? 其他的选择是什么? 正如多兰(Dolan,2005)、威廉斯(Williams,1981)及其他研究者观察发现的,表演具有理想化的元素,这也是表演民族志的批判课题所具有的:不是不近人情,不是空想主义,而是一步一步地,引向那些“可能”和“如果”(Dolan,p.13)。对于公正、公民参与、生成的公众话语以及变革的政治活动,表演的虚拟性能够使民族志学者去探究它们是什么,也能够使他们想象、激发和开创它们可能是什么。

方法论基础

我们通常认为基础设施虽然几乎是被忽略的,但是它使可行的社区可能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道路、手机和数据网络以及公共设施。这些是基本的公共产品。当由于疏忽导致基础设施崩溃,或者被私有化为少数人谋利的时候,社会交换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表演民族志也有知识基础:关键词、人物构成以及关键问题,它们也使社区成为可能。[4] 学者们通常会利用其中部分或者全部,并根据其研究路径选择不同的进出点。在表演民族志这类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实践中,概念基础提供了一个具有多元性、质疑性和共享性的领域。它在不断变化,但却是我们所依赖的共有的知识遗产,同时,我们对自己所做研究的界定和改善也为其做出贡献。

关键词

威廉斯(Williams,1983)运用了非常著名的“关键词”概念,用以探究社会、历史和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并与“文化”“工业”和“民主”等术语联系起来。这些“历史语义学”(p.23)揭示出这类词汇的易变性和政治效用,同时也尝试捕捉他们的意义。表演民族志有它自己的一套关键词,上文讨论过的“批判”无疑是其中之一。在表演民族志中,定义和伦理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定义指向必要的伦理澄清,而伦理形塑了定义。研究者有责任使其参与符合伦理并具有严谨性,关键词的定义能够使这一职责具有操作性。本章无意对表演民族志中所有重要的关键词进行全面调查,但是其中四个词对于理解该方法的概念框架和解释标准至关重要,它们描述了伦理的和生成的研究具有的特征,这四个关键词是表演、民族志、表演性和美学。

表演是“活动中的”富有弹性的术语(Conquergood,1995)。我在《开放艺术》

(*Opening Arts*, Hamera,2006b)中将它定义为既是一项活动,又是一个阐释文化的表象和具象元素的探索工具(p.5)。表演运用物质、情感和想象力进行创造和实践。将表演作为一种调查方法,研究者需要集中关注事件的外延和感知因素:它看起来、听起来、闻起来是怎样的?随着时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也包括对事件的情感动态做出解释:哪些情绪看起来是“被允许”的和受到鼓励的?哪些是沉默的?怎样能够使它们被表达出来并得到包容?情感和表演如何交互产生意义?作为调查策略的表演也要求研究者将其调查场所定位于更大的情境中,和历史、政治、智识和美学进行持续对话。它要求走进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文化工作,在其最精确的感知中充满想象力:这种文化是社区内部或社区之间的共同创造;它富有表现力和意义;它镶嵌于时间和空间的细节中,甚至可以产生自己独特的时空观。

表演民族志学者们首先聚焦于文化的表述维度,然后追溯特定表述的社会力量和修辞力度,其中包括那些描述了研究行动自身特征的表述,从而拓展了对“表演”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现场事件和媒介化事件都是表演。不管是强烈地有意识地向观众传达信号的剧场化表达,还是那些平凡的、几乎被忽视的日常生活实践,都是表演(Bauman,1977; Berger & del Negro,2004; Hamera,2006b,pp. 12-21; Hamera,2007)。Sandy Sem 的故事表明,沉默也是一种表演。国家权力的仪式(如行刑、民防操练、民俗活动的安排)和对国家权力的抵抗(如城市叛乱)都是表演(Afary,2009;Alexander Craft,2008; Conquergood,2002a; Davis,2007)。人际沟通也是一种表演(Hawes,2006)。

民族志,一种“参与式观察”,在进行表述时和“表演”具有相通之处。传统的民族志学者会自问:“本研究的对话者是怎样对其行为进行表述的?为什么会这样表述?”而表演民族志学者的提问更具有层次和批判性,他们不仅对研究场所内的表述进行审视,也会考察关于研究场所本身的表述。表演民族志要求对表述的政治性保持明确的关注,而不只是常规的准确记录和解释。它鼓励使用在写作中早已习以为常的“图表”。正如以下交织的学术系谱所显示的,这比想象中的文本和表演之间的二分法要复杂得多。当然,“表演”使“民族志”意识到具体化和关系结构的政治性既是代表田野调查的核心,也是参与其中的核心。“表演”对“民族志”进行限定,正如“批判的”“女性主义的”和“本土的”等其他修饰词一样。这既要求考虑调查的主体(作为社会生活要素的表现性文化),也要考虑在文字和舞台上的调查实践。

表演性是“表演”进行创造和实践的一种方式。表演性的表述在表达过程中,就对世界产生了干涉。通过它们的重复,这些表述稳固了话语的力量,相应地,权威和惯例又进一步加强这种力量。巴特勒(Butler,1993) 重构了奥斯汀(J. L. Austin)的设想,描述了身份认同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稳定特征。她认为,这种稳定并非源自那套基本的、不变的、先天的特征。相反,它是通过重复产生的效果。表演理论家已经运用表演性将认同的多种维度以及限制或开启特种重复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紧迫需要进行了理论化。迪亚蒙德(Diamond,1996)描述了在

从表演性的理论概念转向对某个具体行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方法论所具有的有效性："一项表演一旦具有表演性，那么具体化、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质询、情感和政治影响等问题，都具有了可讨论性和中断性"（p.5）。当学者们对表演性的修辞力度，以及它们在锻造公共一致性或嵌入相关的甚至内心的不安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质疑时，他们是在探究并促使这些中断的产生（Alexander，2006；Dolan，2005；Hamera，2007；Johnson，2003；Muñoz，2006；Pollock，2006，2007）。

美学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隐性的社会契约，它形塑了表演和表演性重复如何被感知和理解。下文讨论的学术谱系表明，表演民族志研究者深深扎根于创造性的艺术和批判，这意味着美学是其概念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绝不会脱离情境。它们通常需要一个修饰词：如"女性主义""黑人""舞蹈""白色欧洲中心论""酷儿理论"和"15 世纪"，等等。

美学通常会沦为在所谓的"美术"领域对形式性质的研究，但事实上，美学具有深刻且深远的公共性和政治性，而且绝不仅仅是与精英相关。美学的性质和预设内在于文化的产出和消费，它们将社区成员联系在一起，是具有表现性的通货。政治充满了美学评判，包括什么可以称为"美"或者"创新"，以及什么样的组织可以获得授权来制订并执行这些判断。无论是研究情境中的对话者，还是舞台或者文字中的研究者本身，美学都有助于我们对其做出决策。

表演民族志学者并不认为美学是"艺术"特有的属性。美学离不开生活体验，也离不开建构意义的创造性工作。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研究过程本身都是受到审美习惯的安排。物理学家和表演民族志学者都谈论"美的理论"，这表明美学是重要的知识准则，尽管"美"这个词在不同情境中的意义各不相同。在表演民族志中，将美学作为各种进行解释和表达的策略是有用的。这些策略会面对质询、部署或反对。研究者必须考虑采取每种策略所带来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多么隐晦，她都有必要了解其研究地点中独特的约定、审美标准、流派，以及技术流通。因此需要有精确性和审美意识，并将审美意识作为严谨的民族志研究中重要的解释准则。伯格（Berger，1999）对美国所谓的"铁锈地带"城市的重金属、爵士乐和摇滚音乐进行了研究，他写道：

> 例如，观察到一段音乐充满了大量的攻击性，这只是我们描述参与者体验的起点；仅仅在解释中加入了情境和身体的维度是不够的……美国基督徒金属乐队正义的愤怒和英国硬核乐队令人厌恶愤怒是不一样的……（pp. 251-252）

伯格指出，风格的精细差异对音乐家们来说具有深刻意义，这为他们的音乐语法（syntax）提供了艰苦的来源。美学在这里关系重大。它们为音乐家和研究者架构起对公共身份的沟通和洞见。美学推动了这种民族志的分析，并且在这些群体的音乐中、在对田野的持续浸入和跨社区的多位对比中，对技术基础进行了大量的深描。

美学也对表演民族志学者如何开展工作进行组织安排。他们是否在努力使观众移情于研究的对话者?或者通过疏远来刺激观众,将他们转变为观演者。[5]下文《水仪式》(Madison,2006c)的分析阐明了,正如金属、爵士和摇滚音乐的动力、韵律和质感对于伯格音乐家的重要性那样,精心的塑造表演中的研究和作为表演的研究,对其社会力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谱系学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表演民族志的优势和复杂性在于,可以通过从其复杂的谱系中选择案例获得富有成果的调查。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回顾性地恢复一些实现表演民族志核心承诺和实践的工作,而不用附属于具体的学科。某些情况下,它涉及在多学科中识别表演的向心力:人类学、民俗学、口述文学、言语交际、戏剧及其他。下文讨论的谱系不是完全线性的。它并不是关于谁"招致"了谁的一张列表。在人类学范畴对表演、民族志和美学进行的讨论,并不会促使从事口译和交流的学者对这些术语进行探索。这是一个交织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关键词和策略之间的关系存在于彼此的对话之中,这种状况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下文小标题中的"从(from)"并不意味着最终会达到方法论的共识,它只是在某个学科方面开启了持续对话的起点。

从人类学角度

赫斯顿(Hurston,1990)的著作《骡子和男人》(*Mules and Man*)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表演民族志的案例。在其研究介绍中,赫斯顿将南方黑人民俗文化描述成"像紧身衣一样适合我,穿上后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p.1)。她相信,"人类学的视角"赋予她驾驭参与式观察的能力,但事实上,她的研究恰恰违背了以视角为中心的隐喻这一出发点。相反,赫斯顿通过我们现在所说的"口述文学"来呈现"讲述的和听到的"(Madison,1998; Pollock,1990)。提安哥(Wa Thiong,1998,2007)曾明确表示,"口述文学"描述的是演讲、写作、音乐、舞蹈,甚至电影间的相互贯通,目的是抵制对文本和表演之间进行简单的二分法。作为一个导演/编舞、小说家、剧作家和人类学家,赫斯顿非常敏锐地适应了她所搜集到的故事的戏剧风格。她细心关注那些激发了"表演突破"的情境和交流(Hymes,1981),她记录的不仅是界限明晰的"民俗故事",也包括这些故事在拓展适应广泛的社会表演时所具有的灵活性:比如戏弄、讲笑话和"古老的谎言"等。此外,使用"第四道墙"的文学和戏剧手法来释放间接引语,她与读者分享了她的研究实践中明确的戏剧风格,使读者感受到声音、节奏以及事件的完整脉络,甚至连她的脚注都在模仿来自研究现场的声音,这样就模糊了研究者/写作与被研究者/诉说之间的界限,成为这种最"文本化"的口述文学。

特纳(Turner,1982)也对表演民族志的这种兼容并包的特征感兴趣。他将表演本身描述为一种"阈限的"体验:在现实与幻想的交互之间模棱两可,既不仅仅是现实,又不仅仅是幻想。对特纳来说,表演是本质的。自柏拉图之后的西方认

识论受限于反戏剧的偏见,特纳对这种偏见发起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挑战,他坚称,表演造就社会生活,而非杜撰社会生活。通过与导演、表演理论家谢克纳(Schechner,1985)亲密共事,特纳将表演范式应用到民族志领域。谢克纳将表演民族志明确定位于“戏剧和人类学之间”。这种定位的关键在于,他使用了精神分析学家温尼考特(D.W.Winnicott)提出的“过渡对象(transitional object)”的概念来界定民族志研究者和表演者共享的阈限。正如表演者不是角色本身一样,民族志学者也不是“本地人”。然而,她既非本地人,也非表演的角色。这种阈限——这种极限的状态,在智识上是多产的,它鼓励自我反省,承认身份不是不变的,而是具有流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同时,它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开启了概念空间,使文化进程的理论化具有创造力甚至诗意。

从口语解读和交流的角度

对文学的口头阐释起源于雄辩术运动,它的基础是假设表演是一种具体的解释工具:一种超越描述达到实施的“做”分析的方式。这种表演遵守的核心是培根(Bacon,1979) 所谓的“他者的感知”(sense of the other)。这种观点认为,由详细分析构成的具体化的表演能够对文学文本中存在的多维差异产生批判的洞见。康克古德借鉴并激化了口头阐释,用以改变表演民族志,这种表演民族志要求超越田野相遇和页面留白的界限,达到“身体到身体性(body-to-bodyness)”(Olomo/Jones, 2006, p. 341)。在其经典文章《反思民族志》(Rethinking Ethnography)中,康克古德(Conquergood,1991/2006b) 明确提出了“回归身体(return to the body)”的重要性。他对“赫蒙族难民营”(1988)和“芝加哥街头帮派”(1997)的田野调查凸显了文化的肉身性:它作为一套行为与历史和政治共舞时所具有的过程性。这种观点认为研究方法并不是独立的经验门类,它们也是实践。康克古德使民族志从描述转向实践,从写作转向表演文化。基于表演的研究显示出对真正的“基础研究”的遵循(Conquergood,2002b)。康克古德(Conquergood,1991/2006b) 主张并且巧妙示范了修辞的自反性,他对文化和权力的相互关系提出一些令人振奋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扩展至“田野”的保护区之外,纳入了学术产品的类型。影响最深的是,康克古德坚持将表演看作知识生产的工具,这对以文本为中心的学术界和基于文本的知识产生了巨大的挑战,而后者经常剥夺在其自身经济之外的人们的公民权。他赞同以表演为基础的方法“使实践性知识(知道如何做)、陈述性知识(知道是什么)以及政治领悟(知道谁、何时、何地)三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复兴”(Conquergood,2002b,p.153)。麦迪逊在其对表演民族志进行生成性的重铸中,将所有这些贡献总结为共同表演:

> 共同表演是一种对话式的表演,它意味着当你怀着一系列渴望和向往去体验你的研究对象时,你不仅要做他们所做的,还要在知识和关系层面投入到他们产生象征意义的实践中。对于康克古德来说,共同表演是一种“相处”,是一份坚定的承诺。(Madison,2005,p.168)

道德地图

康克古德(Conquergood,1982)为检验表演民族志的道德陷阱提供了明确的方式。民族志的目标是共同表演,通过坚持摆出一系列像下文的"关键问题"那样的干扰性问题,借助对话得以实现目标。这些问题是在田野里、舞台上和文字上对美学的专业理解和深描;是自我反思;是对"实践"批判理论的承诺,帮助研究者避免四种根本的道德错误。监护人的出风头癖是美学的一种错误:混淆了展示异国情调的欲望和对行为表现的真正作用方式的严谨理解。"展示和讲述"推动"Sandy Sem"用沉默进行反抗就是这样的例子。监护人的诈骗会破坏"共同表演"的基本联系。在这里,研究现场和谈话双方都是原始资料,需要作为研究者推定的自主"精神"的产出和一种知识产权被记录下来。狂热者的迷恋标志着严格地"做"批判理论的失败。前两种错误将研究对话双方视为展示的物品,或者是为了自我加工和自我推销的原始材料,而这种错误将所有的分歧纳入对简单的不同于或类似于自我的空想庆祝中。它忽视了那些不可被简化的差异,在表面上掩盖或者放过困难的议题。犬儒主义者的逃避坚持认为差异是模糊的,并且民族志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距离问题是无法克服的。这是一个异化的和疏远的立场,是一种终极的无力感,丧失了对表演的理想化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对于持续努力实践批判理论异常重要。

借助于人类学和口头解读的传统,研究表演的学者们一直纠缠于"表演""民族志""表演性""美学"之间相互启发的方式。他们会一直就表演的作用方式进行提问,对"物质性和文本性是田野或学术调查中互相排斥的表现模式"这一假设提出挑战。舞蹈实践是一个非常多产的领域:它们是限定的案例,因为它们常会被简化为不可译的化身。在我对洛杉矶的舞蹈团体的研究中(Hamera,2007),我提出舞蹈陷入了语言的包围之中:陷入在那些培养下一代的故事和演示中;陷入在那些描述了一个动作看起来或感觉如何的大量不精确的隐喻中;陷入在那些使舞蹈成为可能或对其进行限制的制度文本中(法律、教学大纲、宣传材料以及口头宣传)。对我而言,对舞蹈如何建构不同群体进行分析,意味着既要进行倾听和写作,也要和对话者共舞。对"共舞"和"写作"的遵循也开启了挑战有关表演类型的霸权假设的机会。芭蕾和现代舞都被认可为精英的"高雅艺术",这与大部分创造了这些舞蹈的艺术家所处的物质环境并不一致。与业余爱好者和专业舞蹈家一起训练使我看到了这些技术的另一面:它们是大量表演者聚集的家园,这种相聚有时是短暂的,有时长达数十年,表演者受制于严格的共同仪式,他们既团结一致又存有差异。

关键问题

表演民族志的实施没有现成的处方。不同的研究现场、不同研究者呈现的特质以及不同的地点和历史定位等复杂性要求每项研究都经历独特的协商。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再造好的研究实践。从研究过程中为表演民族志学者提炼出

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提醒我们肩负的美学、伦理和知识的责任。通过观察,麦迪逊将表演的流行性标记为一种研究模式,"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每个人都正在或尝试着用表演的语言进行思考、讲述和写作"(Madison,2006b,p.243)。学科和话语的这种多元化能够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常规产生具有创造性和生成性的角逐,但是表演民族志并非一个没有责任感和历史感的游乐场。相反,表演具有适应性和多学科的定位,要求研究者就其研究设计回答一些基本问题,以明确其概念承诺。这体现了现场研究在方法论和伦理上的同等意义:通过人口统计学和话语的细节,对表演如何开发一个具体的研究场所进行周密的解释。像现场调研那样,这些问题为研究者确定方向,使其脱离自己单一的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向,转向对于"公开宣称表演"的意义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Jackson,2004)。回答这些问题揭示出表演民族志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具有相关性:在研究者面对其他使用相似词汇的方法论者个体时,它会对研究者进行定位。

1.在我的研究现场中,表演是如何出现的?因为表演这个术语既可以指事件,也可以指一种启发式工具,所以它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的运用要求批判性的反思和精确。它是通过其自觉的戏剧性进行自我宣称吗?我用"表演"这个术语解释的是表现力还是表现技巧?二者皆是或者二者皆非?本研究的对话者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表演吗?或者我使用这个术语是为了将他们行为的力量展示给本研究的观众?"表演"为作为研究者的我提供了什么概念许可?它有什么危险性?我对这个术语持有什么偏见?我是否在假设表演具有内在的创造性、派生性、鲜活性、顽固性和反抗性?

2.我的表演处于怎样的时间和空间中?这些时空怎样与历史、其他地点和其他机构进行交汇?什么样的全球矩阵建构了我的研究现场的"本地性"?哪些历史矩阵加强了"此地此刻"?

3.当我使用"表演"这个词,并且对我自己潜在于这种使用背后的假设进行反思时,不管有多么含蓄,我参与的是哪些学术对话?参与这些学术对话会产生什么义务?我是否需要理解特定的技术、词汇或者文献?我对"表演"的使用如何能够有益于、挑战或者推翻这些对话的转变?

4.我是如何将研究行为本身定义为一种表演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表明"有能力执行",这是该术语的技术官僚主义的定义。我是如何与我的对话者进行约定的?是作为共同表演者?作为"临时演员"还是"道具"?在他们所有的感知和社会复杂性中,我如何呈现与我的对话者之间的交换?我是在何种程度上对表演进行转译的?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或是口头和非口头的交流模式转换,也是在呈现模式之间的转换,尤其是在物质性和文本固定性方面?在将整个研究作为美学的、伦理的、政治的和修辞的元素,决定和责任方面,我是如何进行理解和联系的?

5.我的研究如何以及在哪里产生有意义的干预?我的研究改变了什么?它起到了什么好的作用?对谁发挥了好的作用?这种研究情境中的"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为谁服务?我如何与研究中呈现的对话者分享我的研究?他们是怎

么被影响的?我希望观众看到我的研究后做些什么?

这五个系列的问题捕捉了方法核心的过程动态。更进一步说,它们提供了解释的注意事项:它们提醒我们要对被广泛解释的研究群体负责任。[6] 它们邀请研究者用自己的学识去反思"表演"的传播方式。

水仪式:个案研究

由麦迪逊(Madison,2006c)构思和指导,并由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学生们表演的《水仪式》,作为一个典范,它表明了以下三者如何被运用于表演民族志:具有深刻伦理性和共同表演性的表现策略、对私有化政治进行批判性干预的承诺,以及规律地运用美学。这种多媒体成果依赖于形式和内容的流动性。正如致力于作为公共产品的水的形象一样,研究成果在不同的体裁之间流动:回忆录和个人叙事、乐章、民族志田野日志、声音、投影(包括由技术管理的 PPT 幻灯片和纪实照片)和独幕剧(通常具有高度政治性和讽刺性的短剧)。[7] 这样产生的就是一个参与式表演民族志的典范。它本身是水的仪式,这里的"仪式(rite)"和"权利(right)"谐音,它既是巩固了共同人性的仪式,也是这种不可妥协的状态所要求的权利。它要求观众关注水的政治性,关注人类消费和机构收益,关注他们自己关于水的记忆、消费和理所当然的态度,关注那些必须要做出的改变。[8] 虽然对《水仪式》的全面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对其中三个关键时刻进行简要的探讨,能够展示出表演民族志作为一种重要方法所具有的美学诗意。

自由流动和限制是水政治的双面特征,《水仪式》开始于在二者之间建立紧密连接,并将这种连接打造成关乎个体和全球的紧急事件。

记录 1

日记:1998 年 10 月 12 日,西非,加纳,勒贡-阿克拉,加纳大学。

我家里没有水了——水管是干涸的。家里的储水器也没有水了。整个勒贡地区都没有水了。我找不到水,这让我很害怕。之前有人警告我们说水管要干涸了,但我没想到缺水的状况会持续这么久。怎么能没有水呢?

记录 2

日记:2006 年 1 月,英国,伦敦。

这些都是事实:超过 10 亿人口无法获得或负担不起干净的水源,大约 20 亿人口无法得到卫生保障……

记录 1

(Kweku)说他会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找水……他告诉我他知道在哪可以找到足够的水来装满储水器。我只是希望他能快点来到这里。没有水太吓人

了……太不可思议,太可怕了。我担心这里的学生是怎么想办法面对的?

记录2

在加纳城区,只有40%的人口能用上自来水,78%的城区贫民没有自来水。

尽管上述记录展现了麦迪逊的研究和经历,但它们并不仅仅是民族志权威学者的数据。他们记录了个人影响、人口统计学背景以及更大的全球水资源政治现实之间的相互贯通。请注意所记录的论述本身作为一股话语流,是如何在不同的媒介和地点移动的。"日记"指向固定的、书面的影响,它融入言语之中,而言语又挣扎着漂浮在不断上涨的原始焦虑之潮中:"怎么能没有水?"省略号和重复强调了这种焦虑,也表明语言无法完全表达这种焦虑:"没有水太吓人了……太不可思议,太可怕了。"同样,言语也溶解在加纳大学(西非,加纳,勒贡-阿克拉)和英国伦敦之间的距离之中。第一个地方向我们展示了第二个地方制定的某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第二个地方,不像第一个地方那样由于政策导致了紧急状况,它为阐释和拓展这些经验提供了"事实"。对于享有特权的西方学科而言,作品和信息可以跨越国界和体裁自由流动。然而对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而言,维持生命的水却无法自由流动。

在《水仪式》中,个体和事实是相互激发的话语寄存器,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水仪式》既要展示,也要讲述。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对空的塑料水瓶的使用。大量的瓶子组成了"河流"和"护城河",它们聚集在一起但又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们提供了贯穿整个表演的视觉一致性,因为它们不断地使观众想起私人用水的社会成本。空瓶子撞击地面的声音、瓶子的透明度和滚动方式,在听觉、视觉和触觉上使流动和限制变得有形。通过个体表演者对水的回忆以及私有化和利益的全球网络,将表演组织在一起的戏剧"刺点"表明了在麦迪逊的民族志工作中流通的水具有多方面的相关性。

> 水声响起,"驴子和取水的情景"被投射到两边的屏幕上。随着取水情景的投射,水的声音达到最高,此时,演员们从舞台上升起,仿佛他们正在从水中穿过一样。他们把盒子留在舞台上,仿佛受到了水的反作用力,演员们升起来,开始在水瓶中寻找他们想要的那个特殊的瓶子。他们辨别不同的瓶子,检查瓶子的大小和形状,直到找到他们想要的那个。当每个演员都找到了那个"对的"水瓶,他们会逆水而上,到达地面,然后抱着水瓶,背对着观众,像婴儿的姿势那样半躺着。
>
> 水声渐渐消失,但仍清晰可辨。

这个看起来似乎很小的非语言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水仪式。水的力量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包括那些记录了不屈不挠、身体遭受摧残的劳动者取水的场景、湍急的水流发出的咆哮声以及表演者在水中逆流而上的挣扎。与这种力量并列的是浅薄的品牌选择,这是一种通过特权获得"特殊"(干净、安全)的"取水"方式。即使沦为装在瓶子里的附属物,水的声音仍然清晰可辨。如何理解表演者

婴儿般的姿势？也许他们是在暗指私有化和环境破坏的意识形态使消费者被"婴儿化",从而选择不去质疑"谁决定了谁可以得到水？谁决定了做决定的人?"也许他们是在提醒观众,我们都是从水中来的,我们在胎儿和进化的时期都是生活在水的世界。也许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在全球化资本和机构运作的逆流中游得更远。

《水仪式》既描述了枯竭,也描述了激活,这是来自西非、南非、印度和玻利维亚的解释。这些解释具有双重影响。在亚米德(Ahmed,2004)的定义中,它们是有影响的:它们是一种文化政治形式,具有社会性和修辞性,而非个体性和本质性。同时,它们也需要来自观众的影响,一种不是由于痛苦或单独的个体移情而产生的影响。当地和国际的水资源活动积极分子和社团代表决定必须做哪些事情,有时通过否定来做决定。但是某种挑衅却促使观众超越了对表演和变革的工具化理解,对他们获取事实和全球流动的特权分配发起挑战,正如上文讨论的表演开场所产生的效果那样。

> Madeline
>
> 偶尔,你们中的一个人……会抱怨,或者有人会冲着我们大喊大叫,"你为什么不听啊?"然后我会以我经常采取的方式予以回应。你既不是一个乞丐,也不是一个选择者。如果你认为这样有问题,那就离开这条街,脱掉你的麻质衣服还有印着挑衅话语的T恤衫,离开你的教室,你曾在那里反复讨论全球系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别再大放厥词,也别再想着靠着渺小的自我就可以改变任何事情。特别是你,生下来就是个大块头,而且享有特权和金钱,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摩擦,也不管你用多少文身掩盖,你都不能摆脱"美国"这个标签。除了庆祝你的渺小,你一无所成。于我而言,唯一要说的是对你的一点忠告。做一个选择者——或许你会成为比我更好的倾听者……或许你会重写指南。在这之前,恐怕我无法帮你。

谁是Madeline?是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人物吗?是享有特权和影响力,并感觉到所谓的"同情心疲劳"的那一类人吗?是观众们听说过但不认同的那种拥有话语权的内部人士吗?不管她是谁,她都要求观众履行他们的承诺。这是一个号召,要超越斯皮瓦克(Spivak,1990)授权的"忘却你的特权"(p.42)。它也是一种要求,要承认我们自己的共谋,审视内心,批判地干预它的部署,并在这种尝试中负起责任(Alexander Craft, McNeal, Mwangola, & Zabriskie,2007,p.56)。

《水仪式》表明了表演民族志不仅对水的私有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描述,它也对这些问题进行干预。通过这样做,它提供了对新兴研究至关重要的策略、主题和承诺:使民族志的话语小说化、探索对象的表述潜力以及探讨那些连接了现在和过去、本地与全球的解不开的关系。

表演民族志的新兴范式和方向

表演民族志存在很多的可能性。作为具有分析性、政治性以及代表性的工具，表演民族志的潜能吸引了许多学者，并为其探索表演性文化、具体化、美学以及做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机遇。这种创新工作既具有回顾性，又具有前瞻性。它探寻新的谱系、表演和表述行为的新模式以及新的学术表达形式。

表演民族志出现了历史取向的新路径，该路径涉及表演和档案的交叉。一些学者对这种交叉感兴趣，他们借鉴了泰勒（Taylor，2003）的观点及其对"档案"和"剧目"的构想。档案"以文件、地图、文学文本、信件、考古遗址、骨头、视频影像、CD等形式存在，一般来说，所有这些形式都不易改变"（p.19），而剧目"存在于具体的记忆之中：表演、手势、口头表达、舞蹈、歌唱等，简而言之，所有这些行为通常都被视为转瞬即逝的和不可重现的知识"（p.20）。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将二者分离开来，泰勒并不想继续这种错误，而是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深刻的相互贯通性：二者都借助媒介，都具有高度选择性和引用性。它们都是"记忆的资源"（Roach，1996，p.26）。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档案和剧目在表演民族志中的相互激励，舞蹈研究就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示例。

在《为民族编舞》（*Choreographing the Folk*）中，克劳特（Kraut，2008）探讨了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导演和编舞的作品，对她的音乐作品《大日子》（*The Great Day*）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尤其是其中作为核心特征的巴哈马火舞。克劳特讨论了赫斯顿在表演和辅助资料中对民间习语的运用，这些辅助资料包括宣传刊物以及她与赞助人和同事的通信。非常有意思的是，赫斯顿的民谣理论在舞台上的行动表达方式与她在书面中的文字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对于赫斯顿和她的赞助人以及合作者之间有时充满忧虑的沟通、她在刻画非裔美国人本土舞蹈的不同流派时的尝试，以及她自己关于美学/民族志的论断，克劳特都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表演民族志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被框定为"民间"的作品，适合20世纪30年代那种高度种族化的娱乐市场。与表演民族志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特质一样，不管是对于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人的研究，还是对于表演和舞蹈研究，克劳特的书都做出了贡献。此外，它恢复了舞蹈在表演民族志历史中的作用，并刻画了表演民族志学者在将其调研成果带到舞台时所走的饱受争议的商业化之路。

表演民族志对表演概念的使用方式看似违背常理，却也能带来新的启发。例如，商品化的过程、物品的流通以及由它们构建的想象共同体都可以被视为表演。通过表演对物品和社会进程进行审视，并非不需要把"具体化"作为重要考量。相反，它将焦点扩展到通过具体的市场和愿望去使用、口述或上演具体化的方式上。提安哥（Wa Thiong，1999）观察到，"空间、建筑和雕塑都可以表演"，当空间和物品充满了异国情调、差异和适销性时，表演的理念就能够阐明权力和乐

趣的流动,这些流动界定了商品的状况。

美国原住民艺术流派提供的许多案例是非常有力的证明。在这里,表演民族志学者考察了这些对象在特定语境下的传播,并对增强消费的复杂的乐趣和幻想进行了梳理。我曾指出(Hamera,2006a,2006c),就纳瓦霍人的民间艺术而言,它既重现了那些无形的、被假设"消失了的"原住民,又将其凝固在某些形式中,虽然这些形式从表面上可以被看作同质化的"民间"的天真的、无关政治的和永恒的产品,但是仍然要感谢这些表面的特征。更进一步说,对于收藏者而言,艺术品的作用相当于一场展示其收纳和鉴赏水平的永恒表演,它脱离了收藏者相对于艺术家的特权地位,摆脱了非印第安人渴望和设计印第安物品这一段时常被认为是肮脏的历史,并认可充满多元文化美感的"好眼光"。同时,对物品的消费,尤其是那些具有"真实性"特征的物品,能够将收藏者代入本土文化之中。

最后,也许最具争议的是,表演民族志可能将表演和美学编织成"小说化"的作品。"小说化"一词来自贝克汀(Mikhail Bakhtin)关于小说的社会情境的观点。鲍曼(Bowman,1995)将"小说化"操作化为:

> 参与某种口头、文本和符号的"暴政"的意愿,这种"暴政"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贝克汀所说的"语义上的某种开放性",它能够动摇那些关于表演/文本关系、表演过程以及表演/观众关系的权威观念。尽管一部小说作品可能有其偏爱的意义、价值或者政治文化议程,但是它也包含与其偏好相冲突的观念和价值。(p.15)

正如《水仪式》展示的那样,通过融合多重相互冲突的声音(本土积极分子、记录者、"Madeline"、不屑的嬉皮士)和多种媒介(图像、声音、动作、短剧和个人叙事),表演民族志学者使舞台小说化。有时候,这些声音和媒介彼此互相强化,但也时常会产生冲突和问题,它们把解释的责任转嫁给观众,希望观众会成为"比自己更好的倾听者"(见上文的"Madeline")。它们甚至会更进一步,使舞台小说化的过程"民族志化",并详述改编的政治性和表演本身(参阅 Goldman,2006)。

小说化可以被应用于整个民族志课题本身,它拓展了传统的人类学"英雄",对孤独的作者身份这一规范发起挑战。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小说化的作者身份和方法论概念化为一种棉被:不是把所有差异都归为统一整体,而是将有时相互冲突的美学和使命缝合在一起。正如克莱夫特(Alexander Craft et al.,2007)观察到的,协同干预并不总是能够与思想无缝对接。

> 我的一个缝被子的姐妹拿起一块布料,并把它放到她的被单中。我扮了个鬼脸。她面前堆着那么多更好看的布料,我想知道她为什么选那一块。我抬起头问她,此时我看到她的视线停留在我手中的布料上,她像我那样皱了皱眉头又松开。我们交汇彼此的目光,相视一笑,然后开开玩笑,继续工作。(p.78)

克莱夫特的"缝被子的姐妹"都是民族志表演者,她们跨越重重界限聚集在

一起,对黑人女性主义的表演民族志进行宣言。这种表演民族志的使命是在文化实践中,把性别和黑色皮肤的传统认识作为文化实践并使其小说化,其途径包括审视"非洲话语中的黑人形态、黑人话语中的非洲形态和二者之间的所有混乱状态"(Alexander Craft et al.,2007,p.62),以及"关注差距"(p.70)。

小说化可以走得更远:可以通过真实的小说与田野调查进行交流。威斯韦思沃兰(Visweswaran,1994)提醒我们,这一行动并不像它最早出现的那样让人担忧。小说和民族志永远都不会是完全分离的话语;它们都取决于手法、比喻以及对另一方进行界定的主张。确实,甚至于我在本文对"Sandy Sem"的使用,也可以被理解为在民族志中插入小说,我用引号表明这是一个假名,也暗示"事实"绝非简单明了或完全可知。然而,将民族志文本小说化不会促使研究者脱离政治、伦理以及严谨的范畴。她仍然必须解决上文讨论的关键问题,仍需要致力于"做"批判理论。也许没人能像马提尼克小说家夏穆瓦佐那样很好地担起这一责任,他最出名的是其获奖作品《德士古》(*Texaco*)。他早期的小说《出色的索里波》(*Solibo Magnificent*, Chamoiseau,1997)是一部完全小说化的民族志,它对于口头文学、对于表演能否改变什么,以及对于作者所在的岛国上的后殖民政治的复杂性都非常敏感,并以此而著称。这部出色而深刻的小说包含了给予民族志学者、叙述者和写作者的警示。夏穆瓦佐的名字被讲故事大师 Solibo 开玩笑地重新解释为"Oiseau de Cham"(暗指圣经中诺亚的长子闪,以及字面意思"田野里的鸟"),这让他想起了人类学事业的极限,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文化表演及其丰富的且不可简化的物质性的人类学。

> Solibo 曾告诉我:"Oiseau de Cham,你用笔写。很好,Solibo,我用嘴说。你看到距离了吗?……你想在写作中捕捉文字。我看到你尝试着加入韵律,也看到你多么想抓住文字,让它们朗朗上口。你对我说:老爹,我做的对吗?我说:写下来不如用言语表达出来,这不是文字的问题,你本应该用嘴讲出来的。写作就是把贝壳从海里捡出来并且大喊:这就是贝壳!文字的回答是:大海在哪儿?但是那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在往前走,你待着不动。我早就说出来了,但你还在写,表明你使用了文字。你越过距离,向我伸出手。这都非常好,但是你只是感受到了距离。"(pp.28-29)

夏穆瓦佐提醒我们,作为表演民族志学者,我们都跨越了距离,这种距离使线性语言,不论是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与经验的变迁相分离。有时,对于我们遇到的表演,不论我们是将其讲出来、写下来、跳出来,还是画出来,通过使民族志小说化来感受那种距离,是我们能做得最好的。

这些案例展现了表演民族志研究的新方向,它们之间的共同主题是从起点对这种方法进行描述。它们深入地关注跨国界的民族国家之间或者其内部地区的相互渗透(新殖民主义的日常政治;幻想通过纳瓦霍民间艺术参与到土著人之中)。无论是作为"民间"的虚拟社区,还是作为民族志学者的姊妹会,也无论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关系是团结一致还是各自为政,它们都对形成社群的结构进

行了审视(Alexander Craft et al.,2007; Chamoiseau,1997; Hamera,2006a,2006c; Kraut,2008)。差异的多重维度,以及存在于表演之间和表演内部的差异的相互交织,是明确的共同因素。

结 论

上文概括的主题,尤其是差异、连接和跨国主义,加上批判地致力于对压迫结构的质询,这些都已经成为后"9·11"情境中的新的当务之急。正如邓津和加迪纳(Denzin & Giardina,2007)所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境促使艺术家和学者"尝试着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寻找尊重文化、普世人权和神圣的非暴力的真理体制;以及寻找批判的方法论,以保护、抵抗和帮助我们更激进地描绘和想象自由的乌托邦世界"(p.10)。表演民族志是这样一个方法,它体现了批判的干预,这些干预不仅存在于个人之中,也存在于书本和屏幕上,然而,我们也必须要不断地抵制诱惑,不能将所有的表演与乌托邦世界混为一谈。正如麦肯齐(McKenzie,2001a)提醒我们的那样,表演本身是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代理人。在邓津和加迪纳心中,"Jenny Sem" 和 Solibo Magnificent 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要去解读和描述在研究场域中那些能说的、必须说的、不能说的以及不会说的。我们接受这个挑战,因为表演的力量,像范式和共享的物质性那样,给予我们极端的希望——创制的行为将会有效干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干预世界本身。

注 释

1."Sem"和"Sandy"都是假名。就像该案例表明的那样,Sem 一家的经历使他们设置了保密阈值,我永远不能完全跨越它。对于这些动态的充分讨论,请参阅:Hamera,2007。
2.麦迪逊的构想与康克古德(Conquergood,2002b)关于表演研究的描述产生共鸣。康克吉德认为,表演本身由创造力(艺术)、交流(分析)和公民身份(行动主义)构成。
3.批判理论研究的是嵌入特定历史中的社会形态问题,它的目标是梳理权力的复杂作用,从而寻求更加公正和解放的秩序。一般来说,"批判理论"包括批判种族理论、残疾研究、女性主义、本土知识、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对支配结构和实践进行质疑的方法。作为具体文献支撑的"批判理论",被法兰克福学派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形式。关于批判理论是如何广泛应用于表演研究的案例,请参阅:Madison & Hamera,2006, pp. 1-64。
4.我在此处关于基础设施的观点和杰克逊(Jackson,2005)的"基建回忆"产生强烈的共鸣,"基建回忆"是一个用富有成效的方式将美学(稍后将会讨论)和物质性连接起来的构想。它对于理解表演和档案(本文最后一部分会提到)的新型关系尤为有用。
5."观演者(spect-actors)"是鲍尔(Boal,1979)用于描述积极的观众的术语:他们被驱使着介入到剧场的体验中去指出不公正的状况,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对表演及扩展的现状进行消费、看表演。激活观演者是他的《被压迫者剧场》(*Theatre of the Oppressed*)的重要组成部分。

6.杰克逊的著作提供了关于表演的制度化的珍贵历史,这是重要的背景知识,有助于充分理解它在学科间的流通,以及它的多学科的借鉴、假设和话语。

7.参阅珀洛克(Pollock,2006)为这些问题补充的特质:国际性、沉浸式、合并化、整合性和干涉主义。

8.Luis Valdez 将独幕剧(acto)发展为他在农民剧社(El Teatro Campesino)和农业工人联合会工作的一部分。若要更多地了解这种形式,请参阅他的《独幕剧》(1971)和 Eugène van Erven 的作品《激进的民众剧场》(*Radical People's Theatre*,1988),pp. 43-53。

参考文献

Afary, K. (2009). *Performance and activism: Grassroots discourse after the Los Angeles rebellion of* 1992.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Ahmed, S.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Alexander, B. K. (2006). *Performing Black masculinity: Race, culture, and queer identity*.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Alexander, B. K. (2008). Queer(y)ing the postcolonial through the West(ern).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Eds.),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pp. 101-131). Thousand Oaks, CA: Sage.

Alexander Craft, R. (2008). "Una raza, dos etnias": The politics of be(com)ing/performing "Afropanameño."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thnic Studies*, *3*(2), 123-149.

Alexander Craft, R., McNeal, M., Mwangola, M., & Zabriskie, Q. M. (2007). The quilt: Towards a twenty-first-century Black feminist ethnography. *Performance Research*, *12*(3), 54-83.

Bacon, W. (1979). *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3r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Bakhtin,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Ed. &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uman, R. (1977).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Berger, H. M. (1999). *Metal, rock, and jazz: Perception and the phenomenology of musical experience*.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H. M., & del Negro, G. (2004).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Essays in the study of folklore, music, and popular cultur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Boal, A. (1979).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C. A. McBride & M. O. L. McBride, Tran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Bowman, M. S. (1995). "Novelizing" the stage: Chamber theatre after Breen and Bakhtin.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5*(1), 1-23.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Chamoiseau, P. (1997). *Solibo magnificent* (R. M. Réjouis & V. Vinkurov, Trans.). New York: Vintage.

Conquergood, D. (1982).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2), 1-13.

Conquergood, D. (1988). Health theatre in a Hmong refugee camp. *TDR: The Drama Review*, *32*(3), 174-208.

Conquergood, D. (1995). Of caravans and carnivals: Performance studies in motion. *TDR: The Drama Review*, *39*(4), 137-141.

Conquergood, D. (1997). Street literacy. In J. Flood, S. B. Heath, & D. Lapp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 literacy through the communicative and visual arts* (pp. 334-375). New York: Macmillan.

Conquergood, D. (2002a). Lethal theatre: Performance,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atre Journal*, *54*(3), 339-367.

Conquergood, D. (2002b). Performance studies: Interventions and radical research. *TDR: The Drama Review*, *46*(2), 145-156.

Conquergood, D. (2006a). Rethinking elocution: The trope of the talking book and other figures of speech. In J. Hamera (Ed.), *Opening acts: Performance in/a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141-160).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quergood, D. (2006b). Rethinking ethnography.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351-3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1)

Davis, T. (2007). *Stages of emergency: Cold war nuclear civil defens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2003).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2006).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performance pedagogy: Toward a pedagogy of hope.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325-338).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Giardina, M. D. (2007). Int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after 9/11.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Contesting empire, globalizing dissent: Cultural studies after 9/11* (pp. 1-19). Boulder, CO: Paradigm.

Diamond, E. (1996). *Performance and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Dolan, J. (2005). *Utopia in performance: Finding hope at the theat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Edwards, P. (1999). Unstoried: Teaching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Theatre Annual*, *52*, 1-147.

Goldman, D. (2006). Ethnography and the politics of adaptation: Leon Forrest's *Divine Days.*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366-384).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mera, J. (2006a). Disruption, continuity, and the social lives of things: Navajo folk art and/as performance. *TDR: The Drama Review*, *46*(4), 146-160.

Hamera, J. (Ed.). (2006b). *Opening acts: Performance in/a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mera, J. (2006c). Performance, performativity, and cultural poiesis in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46-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mera, J. (2007). *Dancing communities: Performanc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in the global city.*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Hawes, L. C. (2006). Becoming otherwise: Conversational 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In J. Hamera (Ed.), *Opening acts: Performance in/a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23-48). Thousand Oaks, CA: Sage.

Hurston, Z. N. (1990). *Mules and men.* New York: Harper & Row.

Hymes, D. (1981). "*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 *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Jackson, S. (2004). *Professing performance: Theatre in the academy from philology to performativ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ckson, S. (2005). *Touchable stori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infrastructural memory. In D. Pollock (Ed.), *Remembering: Oral history performance* (pp. 46-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Jackson, S. (2009). Rhetoric in ruins: Performing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Performance Research*, *14*(1), 4-15.

Johnson, E. P. (2003). *Appropriating blackness: 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Kraut, A. (2008). *Choreographing the folk: The dance stagings of Zora Neale Hurst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dison, D. S. (1998). That was my occupation: Oral narrative, performance, and Black feminist thought. In D. Pollock (Ed.), *Exceptional*

spaces: Essays in performance and history (pp. 319-34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adison, D. S. (2005). *Critical ethnography: Methods, ethics, and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dison, D. S. (2006a). The dialogic performative in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26*(4), 320-324.

Madison, D. S. (2006b). Performing theory/embodied writing. In J. Hamera (Ed.), *Opening acts: Performance in/a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243-265).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dison, D. S. (2006c, March 2-6). *Water rites* [Multimedia perform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Madison, D. S. (2008). Narrative poetics and performative interventions.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Eds.),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pp. 391-4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dison, D. S., & Hamera, J. (Eds.). (2006).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cKenzie, J. (2001a). Performance and global transference. *TDR: The Drama Review*, *45*(3), 5-7.

McKenzie, J. (2001b). *Perform or else: From discipline to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Muñoz, J. E. (2006). Stages: Queers, punks, and the utopian performative.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9-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Olomo, O. O. O./Jones, J. L. (2006). Performance and ethnography, performing ethnography,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In D. S. Madison & J. Hamera (Eds.), *Handbook of performance studies* (pp. 339-345). Thousand Oaks, CA: Sage.

Pollock, D. (1990). Telling the told: Performing like a famil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18*(2), 1-35.

Pollock, D. (2006). Marking new directions in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26*(4), 325-320.

Pollock, D. (2007). The performative "I."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7*(3), 239-255.

Roach, J. (1996). *Cities of the dead: Circum-Atlant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chechner, R. (1985). *Between theatre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pivak, G. C.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D. (2003). *The archive and the repertoire: Perform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merica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 (1982). *From ritual to theatre.* New York: PAJ.

Valdez, L. (1971). *Actos.* San Juan Bautista, CA, Cucuracha Press.

Van Erven, E. (1988). *Radical people's theat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Visweswaran, K. (1994).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a Thiong'o, N. (1998). Oral power and Europhone glory: Orature, literature, and stolen legacies. In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art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pp. 103-128). Oxford, UK: Clarendon.

Wa Thiong'o, N. (1999).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An interview by Charles Cantalupo. *Left Curve*, *23.* Available at http://www.leftcurve.org/LC23webPages/ngugu.html

Wa Thiong'o, N. (2007). Notes toward a performance theory of orature. *Performance Research*, *12*(3), 4-7.

Williams, R. (1981).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London: Verso.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用回忆录和非虚构文学编织叙事民族志

BRAIDING NARRATIVE ETHNOGRAPHY WITH MEMOIR AND CREATIVE NONFICTION

⊙ 巴巴拉·泰德洛克(Barbara Tedlock)

韩 倩 译　朱志勇 校

在彼处看着、听着、沉思着,在此处梦想、回忆、铭记着。多年来,我记录了很多故事,有的故事潜伏于我和玛雅妇女的对话中,那时她刚从集市回来,篮子里的火鸡还在急促地"咯咯"大叫;有的是慢悠悠地环行在曼哈顿岛的路上和约鲁巴妇女分享一个粉红色可乐果时迸发出来;有的是从普韦布洛祖尼人木制火炉上的五加仑红椒鹿肉上冒出来;有的是在摆设着红色和金色的漆式木箱、中式青铜镜、驯鹿手鼓和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酒香的蒙古包中充盈着。一个人如何记录如此光怪陆离的事实?磁带、视频、笔记、草图、地图和照片都急不可耐地要求保存。但是,自从我不再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沿着某条特定路径探寻,而是转向在多种替代路径中螺旋前进,这一切都令我更加着迷。

写作唤起其他写作,镜像反射其他自我。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画作《宫女》(*Las Meninas*),又名《侍女》(*The Ladies in Waiting*),捕捉了皇室成员的一个瞬间,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人玛格利特(Margarita)向外凝视,暗示我们这些看画的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在画中,玛格利特右后方的墙上挂着一面镜子,映射出她的父母,我们都认为他们就是国王和王后。在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存放这幅画作的小房间里挂着一面真实的镜子,它增强了这种幻象,我们看到自己被反射到空洞的画布中心。这在自我和他者、内在和外在、思想和情感、真实和幻想之间创造出异常的第三空间。我们通过创造一个魔幻的神圣空间来鼓励互动,每个时刻都在互动中成为双重时刻,成为悬置于我们意识之中的历史和回忆。这种双重意识具有冷静的好奇、客观的自信、文化的完整、种族的纯化、理性的本质主义和异国情调,它否定了线性历史的控制。

画笔和相机的持有者追寻的并不是外在于自我的真正存在的现实,而是映像的现实。正如南印度小说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戈什(Amitav.Ghosh)所说,真正的生活只能被理解为写作剧场中的表演,写作创造出其描述的存在。因此,为何不承认我们正忙于产出书面的牢骚呢?我们用"画笔和相机"记录的现实创造了一个使人与人相见、相交并融合视域的接触地带。在后现代社会,我们赞美麦当娜和布兰妮等大众明星,她们的手上有阿拉伯指甲花彩绘,前额有印度眉心贴,这

些都位于六个脉轮上,是隐秘的智慧之所在。这些远离了本位的文化图腾产生了深刻的陌生感。

田野民族志学者,就像街头摄影师那样,在平凡的日子中寻找奇迹:就像镶嵌在灰紫色雷暴之中的柠檬黄花朵那样。辛(Raghubir Singh)是印度最著名的民族志摄影家之一,他在持续的生活行为中唤起生命的澎湃。在《彩色之河》(*River of Colour*, Singh, 1998)这部作品里,他对照片进行细致但严苛的整理,展示出他和主题的约定。他的丰富记录展示了文化的浸入,这种浸入存在于持续的日常生活体验之中:在清晨的阳光中,牛粪饼正在被晒干,人们聚集在村子的井边,一只"衣衫褴褛"的孔雀啄食着小米粒,孩子们玩着弹弓,他们的父亲正推着小推车并给运输箱贴标签。殖民者摄影师记录的是加尔各答贫民窟里饱受摧残的生活,而他却不同,他的照片调皮地捕捉到乡村生活反射出的色彩和诗意。如果本杰明之前看过辛的照片,他可能就会注意到他捕捉到了"孩子眼中的颜色"(Benjamin, 1996, p.50)既具有神奇性,又具有动物性。成人和孩子、他们和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而是在相同的世界中过着不同的生活,并在文化的共同参与、团结和友谊中品尝着别样的生活方式。

后现代狂人:新闻和民族志

Gonzo 是南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俚语,指的是经历了马拉松式的通宵饮酒之后,最后那个屹立不倒的人。Gonzo 也是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在 20 世纪 60 年代风靡一时,它的作者詹姆斯·布克尔(James Booker)是新奥尔良旋律和布鲁斯音乐中一个耀眼的键盘手,他以生金属音乐设计和海洛因成瘾而出名。卡多苏(Bill Cardoso)是《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他发明了"疯狂新闻业(Gonzo Journalism)"这个概念,并将其运用于汉特·汤普森(Hunter Thompson)著名的文章《肯塔基赛马的颓废和堕落》(The Kentucky Derby Is Decadent and Depraved, 1970/1979)之中。汤普森并没有描述和赞誉当年德比赛马的赢家,而是专注于自己在庞大的醉酒混乱的人群中感到多么地无聊和恐惧。

疯狂民族志,就像疯狂新闻业那样,是一种后现代的记录风格,它鼓励将参与式观察和转换意识状态的理性进行混合。这样,通过参与到充满生机的未知表演空间,他们唤起团结并刻画真实。其中一个例子是文化人类学者布鲁斯·格林达尔(Bruce Grindal)对非洲仪式的召唤。在加纳进行田野工作期间,他目睹了一次死亡占卜,尸体盘着腿坐在一张牛皮上,背靠着化合物构成的墙。接着,一个唱着赞歌的人围着他又唱又跳,直到:

> 刚开始,我看到 Goka【唱赞歌的人】和尸体绑在一起,歌声此起彼伏,伴着铁锄头的敲打,脚和身体在移动着。接着,我看到尸体配合着 Goka 的动作而颤抖并偶尔悸动。起初我认为我的大脑和眼睛在搞恶作剧,所以当第

一次经历这些时,我说不清楚。但是这次经历始于预感和恐惧,就好像我知道即将发生一些无法想象的事。这种预感让我无法呼吸并大口喘气。配合着强烈的视觉意识,我的胃里一阵翻涌和紧绷。

我当时看到的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感知。尸体和 Goka 都散发出光芒,那光芒转瞬即逝,我都说不出它们到底源自哪里。Goka 的手敲打铁锄头,唾沫从他口中飞溅,突然之间,光芒像火花一样消失了。

接下来,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我的下巴绷得紧紧的,头骨被震了一下,就好像脑袋从脊柱上折断了。突然间,一束可怕而美丽的光线映入我的眼帘。从 Goka 无比精巧的手指和嘴巴中散发出纤维状光束,照射在逝者的头部、手指和脚趾上。尸体由痉挛而晃动,然后它的双脚在狂乱地旋转和跳舞。我定睛观看,胃里的抽搐不仅和眼睛有关,还有身处于这个能量漩涡的我的整个存在。化合物的地面和墙壁好像都拥有了生命,它们散发出光线和能量,把舞者引向不同的方向。接着,最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死者房顶的讯息鼓发出强烈的亮光,把舞者吸引到屋顶。尸体捡起鼓槌开始敲打。(Grindal,1983,p.68)

接下来是激昂的民族志记录,它将魔幻现实主义和表演者"原原本本进行讲述"的强硬叙述线结合在一起。在这里,作者积极参与到故事中,他如此着迷于倾听自己的声音和他人讲述的故事,以至于不能将自己和叙述分离。与民族志记录最接近的是文献电视片,有不用剧本的幽默情景剧、观点广播和日本搞笑系列,又名"疯狂电视"。这些以及其他类型在表演者和听众之间创造了一个接触地带,这个地带是一个真正现实但神圣的表演空间,其外在表现是用魔幻的方式认知和存在于世界之中。

在过去的殖民体系中,田野工作产生了两类独立的事物:可报告的非参与式观察和非报告的完全参与。当民族志学者同意这种分裂时,他们培养的就是默契而非友谊,怜悯而非同情,尊重而非信念,理解而非团结,以及钦佩而非热爱。我们是这么做的,我很担心,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培养了友谊、同情、信念、团结和热爱,我们就有可能完全失去历史和回忆,以及团结和客观之间的结合,并"走向本土化"。我们的部落长者大概会使我们害怕相信。

打破这个僵局的方法之一是孤注一掷,并且像澳大利亚人喜欢说的那样,"疯了",意思就是"疯狂"。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是披头士乐队的主音吉他手,他在 1982 年发行了唱片《疯了》,但当时这张唱片未获成功。他的儿子丹尼(Dhani)在 2004 年对这张唱片重新灌录并发行,之后获得了大量的国际听众。很显然,失败与成功之间只是时机问题。民族志也是这样的。在此我想到了我的同学奈伯(Timothy Knab),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墨西哥奎察兰的纳瓦特尔语进行语言学研究。在研究期间,他被诱惑了,并最终成了一群萨满教巫医的学徒。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他没能为自己的书找到出版商,直到弗兰希斯科(Harper San Francisco)冒险把它作为非虚构文学创作进行

发布，书名是《女巫的战争：走入当代阿兹特克人的下层社会》（*The War of Witches：A Journal into the Under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Aztecs*）。

奈伯在其深刻的回忆民族志中坦露了他如何学习用文化重组的方式倾听和讲述故事和梦想。后来，他（Knab，2004）采用叙事民族志的风格，在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对其中大部分信息进行重新出版，书名是《大地与天空的对话：梦想、灵魂、治愈和阿兹特克的现代下层社会》（*The Dialogue of Earth and Sky：Dreams，Souls，Curing，and the Modern Aztec Underworld*）。从原本是语言学家对一门正在消逝的语言的研究，到对于一种鲜活文化的学徒之作，这些书表明了整个过程的逐步推进。这些书还揭示出一个游荡者对于表演和主权的怪异混合，他既要居住在异域的文化环境中，又要对其进行写作。

游荡的思想和变化

在远离家园的地方进行记录式田野工作会带来全新的体验，这种经历既美妙又令人惊奇，可能会导致对现实的顿悟或突然重新感知。从而理解了个人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人。如果一个人避免了民族优越感的排斥或陌生事物的肤浅同化，那么他就可能在第三空间的内外重组概念。这个空间能够容纳多个个体，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认同，他们进行互动并在保留某些特质的同时发生改变。当一个民族志学者拒绝占据或征服第三空间，那么就会出现游荡的思想，根据变化生成重叠的对话，这种思想不会造成二元对立的分离。

形成指的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其基础是一个人在长期旅居国外期间经历的多次动态互动。出生于立陶宛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Levínas，1969）将旅行想象成回归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和他者在一起的经历不会使旅行者的态度发生实质性改变。一位旅行民族志学者的课题取决于在不牺牲差异性的情况下将他者转入相同的逻辑。列维纳斯的老师胡塞尔的理论认为，意识的特征是意向性，即一种拥有外部对象以及内外精神体系的倾向性。列维纳斯反对这种将意向性作为强力形式的概念，并指出意识希望通过世界的具体化来征服世界。他和德里达一样，反对他者（the Other）必须变成同者（the Same）的概念，相反，还有仍然不为人知的形而上学的因素，尽管它急切地想被听到，但是永远不能被理解。福柯（Foucault，1977）告诫我们要更喜欢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随大流以及转向固定体系的安排。

后来，德勒兹和加塔里（Deleuze & Guattari，1987）在《千高原》（*Thousand Plateaus*）中论述到，对根茎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的“形成”是真实的。在他们的哲学中，一个根茎，即形成缠绕的球形体的根状植物茎，是认识论的一个隐喻，意指同时向四面八方蔓延。一个根茎可以被简化为既不是一个，也不是许多；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总是在生长的中间。无阶层的根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

游牧空间,个体在这个空间中被新的体验和认同所形塑,这些体验和认同可能导致双重意识的发展。这种游牧状态的存在超越了一致认同,并且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独特的差异性(Deleuze & Guattari,1986)。

双重意识

双重意识这一概念最初由黑格尔(Hegel,1807/1952)引入欧洲哲学界,并通过杜博依斯(Du Bois,1903/1989)的作品进入美国的知识领域。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他描述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双重性。他们生存在相互矛盾的双重身份之中,即"一边是美国人,一边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双方不停地斗争;在黑人体内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单是这种固执的力量就足以使它免于被撕成碎片"(Du Bois,1903,p.215)。最近,双重意识被扩展运用于白人和棕色人种的世界观。白人过着双重种族的生活,一边是一视同仁,一边是种族意识,而棕色人种的生活悬置于白人和其他人种的融合之中(Bonilla-Silva,2003)。

我对双重意识的定义是:一种平衡的身份建构并强调主体的表演性。我们通过不断引用周围社会世界的规则,借助结合了语言和手势的演讲行动产生自我的现实。我的分析依赖于由特纳和特纳(Turner & Turner,1982)倡导的,并由许多其他的民族志学者所实践的经验民族志方法。特纳指出,感受、意愿和思想构成了文化体验的结构。为了帮助他们的学生理解全世界的人们如何体验本土生活的丰富性,他们以教学剧场的形式试验了表演民族志。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设立了工作坊,成员在工作坊中获得了对其他文化的能动理解。他们从自己在中非的田野工作中试验了社会剧,并鼓励其他民族志学者在其田野中表演戏剧。沃伦斯(Walens,2001)是置身于西北岸土著美洲人的民族志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回忆录《食人族的盛宴》(*Feasting With Cannibals*)撰写、叙述并表演了一套仪式。

经验民族志学者进入并部分适应其研究的世界。在田野研究期间,他们可能变成演员并将自己编织进当地的文化中。王(Wong,2008)是一位日裔美籍民族志学者,也是日本的民族音乐学家,她认为田野既无处不在,又无路可行,因此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内人。虽然民族音乐学家似乎尤为适应表演取向,但是他们也能适应其他领域的文化。正如法国民族志学者法雷-萨达(Favret-Saada,1980)在其回忆录《致命的言语》(*Deadly Words:Witchcraft in the Bocage*)中所观察的那样:波卡基的巫术"理解这种话语(巫术)的意义,除了实践之外再无他法,成为自己的知情人,穿透自身的健忘,并且尝试和明确表明个人不可言说的部分"(p.22)。

表演民族志

民族志研究包括对人类经历的审视、反思和形塑。在脆弱和团结中，在与他人一起工作和交谈的同时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当今的人文科学尤为重要(Tedlock,2009)。将回忆中的参与式体验与表演呈现结合起来的社会实践不断涌现。表演民族志鼓励为个人身份和社会现实的探究、叙述、颂扬、写作和重写寻找替代策略。辛格(Singer,1972)的文化表演，特纳和特纳(Turner & Turner,1982)的表演民族志，以及谢克纳(Schechner,1989)的跨文化表演都属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的“表演转向”(Conquergood,1989)。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早期，特纳和特纳以及康克古德(Dwight Conquergood)帮助民族志学者从解释研究转向表演研究。康克古德呈现了他在泰国和加沙地带的难民营里、在芝加哥的赫蒙族难民中以及在得克萨斯和印第安纳的政府执行死刑期间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Conquergood,1985,1992,1998,2002)。他和一些人认为，社会仪式从其再现的传统中获得意义和情感共鸣，但它们绝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在传统之间回荡(Schechner,1985,pp.36-37)。这些学者提倡作为“边缘学科”的表演，通过重视显现的民族志研究来扩展文本的意义。

表演民族志创造出一种模拟平行或交替案例，从中想象并目睹主观性。这样做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点，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参与式观察”或陈述生活世界。最近一些民族志学者的研究和实践的中心是表演文化研究的批判教育学和开明政治学(Alexander,1999,2002; Allen & Garner,1995; Denzin,2003; Kondo,1997; Laughlin,1995; Madison,2005)。这些研究采用的形式包括对话、表演式书写、动作以及直接包括了布景、表演者和观众的表演(Garoian,1999; Schutz,2001)。

表演性和文化记忆

表演性描述了话语的重复动力，用以创造和生成其管理和约束的现象。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奥斯汀(Austin,1962,1970)的言语-行为理论。“我承诺”“我发誓”和“我愿意”之类的言论不只是进行描述，还要使其变成现实。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巴特勒(Butler,1990,1997)扩展了这一概念，他将性别、异性恋和同性恋理论化为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因此，是一个人做了什么，而不仅表述为一个人是什么。

20世纪60年代的加州，在大规模反对越战的抗议中，一些流行剧团，例如“面包傀儡剧团”和“农民剧社”(又称“农业工人剧社”)等在全州各地表演。这些进步团体为大众表演免费的街头戏剧。每次表演结束后，面包傀儡剧团的表

演者都会为观众奉上新鲜的自制面包,并配上浓重的蒜香酱,以此缔造共同体。农民剧社的成员站在卡车的平台上,这些车停泊在加州德拉诺市外面的葡萄园里。大多数剧社成员是墨西哥民工,他们演绎着自己和观众生活中的故事。Luis Valdez 是旧金山默剧团的一员,在农场工人联合会为反对嘉露葡萄园而举行的罢工中,他通过为罢工工人创作短剧来支持罢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展现了奇卡诺人的认同(Montejano,1999)。

奇卡诺人的表演文化既有大众演出的戏剧风格,又具有历史事件的表演性,例如 Reies Lopez Tijerina 在 1967 年袭击新墨西哥州铁拉阿马里亚市的法院等事件。就像 Pancho Villa 在 1916 年袭击新墨西哥州哥伦比亚市那样,Reies Tijerina 再次宣称墨西哥裔美国人对美国西南部的所有权。Villa 巧妙地躲避北美部队成为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并在 Tijerina 后来逃离美国当局后被反复提及:

> (Tijerina)和一小股追随者立即成为新墨西哥历史上最大的追捕目标。国民警卫队、北部各县的州警察、当地的治安长官和民间武装队、吉卡里拉阿帕切警察和家畜巡检员们都加入了搜寻。他们配备了两辆轻弹药坦克、咔哒咔哒的直升机、嗡嗡作响的观察机、一辆医院厢车和巡查的吉普车,在每一个村庄、水沟和牧场搜索发起"大胆的光天化日下的袭击"的起义者。(Nabokov,1970,p.1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Reies Tijerina 扮演着 Pancho Villa.

> 这种风格的表演使用的策略是墨西哥表演艺术家戈麦兹-佩纳(Guillermo Gómez-Peña)所谓的"反向人类学"。在对哲学家门迭塔(Eduardo Mendieta)进行的访谈中,戈麦兹-佩纳解释说,人类学运用主流文化的权力和知识来研究被边缘化的他者,而在反向人类学中,"我们[被边缘化的他者]占据了一个虚构空间,将主流文化推向边缘,并视其为异域和陌生的。"(Mendieta & Gómez-Peña,2001,p.543)

关于草根参与表演的另一个突出例子是 Sistren 剧团,这是一个牙买加戏剧团体,剧团成员(Sistren,1987)共同撰写和制作了"狮心王加尔:牙买加女性的人生故事(*Lionheart Gal: Life Stories of Jamaican Women*)"。她们所撰写和表演的关于女性压迫的戏剧都是她们自己所经历的,她们的导演是服务于这个群体的工作人员,而非局外的研究者和导演。Sistren 作为一个集体去记录、转录和编辑大量的人生故事,并在雇农和贫民窟居民的戏剧工作坊中进行公开表演(Sistren,1987,pp.14-16)。

通过暴力、法律和条约剥夺原住民的权利,这在北美有着悠久的历史。面对这些,幸存者创造和表演一些基于本土神话的舞蹈戏剧。正如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所写的那样:

> 鬼魂舞从来都没有消亡,它仍在继续,人们从未停止跳舞。他们可能会赋予它其他的名字,但是在跳舞的时候,他们的心与挚爱的祖先和在最近的

斗争中失去的亲人们又凝聚在一起。在从智利到加拿大的整个美洲，人们从未停止跳舞。他们在当下的舞蹈中与祖先再次结合，他们哭喊着，要求正义并号召人们收复美洲！(Silko,1991,p.1)

当齐佩瓦克里族舞者 Rosalie Jones 在位于新墨西哥州圣达非的美国印第安艺术学院任教时，她开始根据动物的故事编舞。她在 1980 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晨星：印第安美洲人的古典舞蹈剧"的现代舞公司，表演和探索美洲原住民舞蹈文化背后的精神（Magill,1998）。她通过舞蹈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精神实践进行连接和沟通。在一场名为《狼：转化》的蒙面萨满舞中，她编排了奥吉布瓦的创世故事，狼在故事中是先民的同伴。在表演过程中，一位年轻的男性舞者穿戴着狼头和狼皮，蹲伏在观众面前。他缓慢地左右摆头，把狼性和人性连接起来。然后，他扔掉了狼头，却迅速再变成狼。外地的观众叙述到，他们转变了意识，成为积极的见证者而非被动的游客。印第安人在举行神圣仪式时也有类似的反应。

叙事民族志与非虚构文学创作

叙事是为原本随机和断裂的事件和经验施加秩序的重要途径。由于叙事嵌入话语之中并形塑经验，因此讲故事和自我紧密相连。我们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符号化地融入人生故事的情节，这种叙事身份有助于形成自我连续性的主观意识。叙事的乐趣在于它将对于事件发生的认知严丝合缝地转化为讲述。

目前有多种叙事方式：历史、戏剧、传记等非虚构文学创作以及叙事民族志。叙事民族志和非虚构文学创作都有角色、行动和转换观点。它们遵循像故事那样包括起点、中点和结局的叙述弧度，以及戏剧发展的高潮和低点，包括张力和启示的时刻。它们也具有情感弧度，它由内在矛盾构成并与叙事弧度紧密配合。在一个成功的叙事民族志中，通过女英雄面临的重要决定、危险的威胁，以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强大精神批判，我们能够间接地了解她的内在精神生活。

在继续展示叙事民族志和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特征之前，我注意到在社会科学中最近出现了另一种对"叙事民族志"相当不同的理解（Gubrium & Holstein, 2008）。一套方法论概念，包括叙事的来源、环境、嵌入和控制，被主要用于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为此，民族志的行动和产出分崩离析成单一的、高度抽象的修辞领域，并被具体化为将认识论、方法论和分析敏锐结合到一起的"一种新方法"。这样做，几乎抹去了它的书面性。

叙事民族志的书面性植根于生活史和回忆录的交叉中。科拉潘扎诺（Crapanzano,1980）在《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肖像》（*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中既记录了他的研究对象的生活，也记录了与研究对象共事的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演变成彼此相互作用的客体。刚开始图哈米是主角，在写作过程中科拉潘扎诺以次要的角色出现，形成了一个心理丰富的双重肖像。传

记与民族志交往的交织也构成了肯达尔(Kendall,1988)的著作《朝鲜族萨满教徒的生活和艰苦岁月》(*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aman*)。通过回忆和录音记录,肯达尔将自己和她的田野助理描述成同情朝鲜族女萨满教徒的学生。借助于个人和理论的穿插(在印刷标记的部分),我们见证了一个女萨满与一个女性民族志学者、学者的助手以及读者的积极交流。

传记和个人回忆录之间的重叠也构造了贝哈(Behar,1993)的著作《转变的女人》(*Translated Woman*)。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她研究了殖民地女性的诉说,并与许多城镇女性建立联系。之后,她让其中一个研究对象接管了自己的研究,对于此事,她坦承自己虽有担心,但也得到了解脱。她在字里行间用斜体字描述自己的内心感受:"我想起几天前受到的伤害。当时我正坐在半开的门口阅读,一个男孩从我身边跑过,偷看了我一眼,并用听起来恶毒的声音朝我大声喊'外国佬'!"(Behar,1993,p.250)。由于她是古巴籍美国人,因此这种来自西班牙语的侮辱不仅完全在她意料之外,而且让她深受伤害。

这些丰富的主体间性内在心理描述搅乱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边界,而这一边界正是自我研究这一概念的核心。相反,这种形式的边界文化协作的出现,成为民族志互换的新方向,并以非虚构文学创作的形式刻印文化。非虚构文学创作,像叙事民族志那样,是真实而准确的,并且其创作关注文体风格。然而,它的故事是多维的,作者和他人的声音都被编织其中。非虚构文学创作运用场景而非陈列来讲故事,并且正如叙事民族志那样,作者的角色是核心的人物或意识,或两者兼而有之。这种巧妙的情感记录话语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学体裁,充满了抒情诗和叙事小说常用的修辞、隐喻及其他比喻。这种纯粹的文学性使其有别于叙事民族志。

叙事民族志学者偏爱传统叙事技巧,并加入了解释型写作、参数和恰当引用等主要原则。只有一部分非虚构文学创作者运用叙事技巧或引用。而其他人看重的并不是叙事,而是对经历的深刻反思,以及抒情或拼贴的形式。《镜舞》(*Mirror Dance*,Krieger,1983)就是非虚构文学创作中该传统的例证。它通过多重个人意识流讲述了高度文学化的综合性故事。为此,克里格(Susan Krieger)通过解述她的访谈和文本证据来构建解释,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分析评论甚至引用,而如果当初她选择了叙事民族志,则完全可以那样做。其他作者把非虚构文学创作作为同时拒绝匿名和权威的一种写作方式(Eber,1995; Tedlock,1992)。相反,他们的写作追寻勾连、亲密和激情。最近,通过不暴露位置和不揭开伪装的方式,非虚构文学创作被用于探索从事非法工作的人们的真实生活(Nordstrom,2004,2007)。

人文后土

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北极人类学和生态学教授马拉雷(Jean

Malaurie)在55年前开创了名为《人文后土》(*Terre Hamaine*)的文学作品集,回应法国大革命乌托邦式的号召——自由、平等、博爱,他鼓励作者直接从个人经验和承诺开始写作。他说服法国当时第二大出版社 Editions Plon 将他选择的书籍做成一个系列(Balandier,1987)。如今已有超过85个主题的文集在全世界售出1 100多万本。到目前为止最畅销的书是赫里亚斯(Hélias,1975)的《骄傲的马:一个来自毕古莱登地区的布列塔尼人的回忆录》(*Le Cheval d'orgueil:Mémoires d'un Breton du pays bigouden*)。作者最初用布列塔尼语写作,这是一种在布列塔尼地区使用的凯尔特语,后来为了在文集中出版,作者亲自将其译成法语。

《人文后土》中的写作大多属于非虚构文学创作,它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写作中被称为与诗歌、小说和戏剧并行的"第四种文体"。这些文学作品聚焦于人的境况,并见证每位作者的所见、所遇与所思。作为早期的作者之一,民族志及民俗学者杰克逊观察到:"《人文后土》具有伟大的远见,它认为理解通常是在看与被看的人、诉说与描写的人,以及写作与阅读的人之间的协作冒险"(Jackson,1999,p.141)。

该系列中最早的书籍是马拉雷(Malaurie,1955)的北极旅行见闻《最后的图勒国王》(*Les Derniers Rois de Thulé*)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 Strauss,1955)的亚马逊旅行见闻《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在成功发布了这些书籍之后,马拉雷搜寻、翻译并重印了许多他描述为"现实文学"的作品,包括旅行见闻、生活史、回忆录和自传。1956年,他发现并再版了谢阁兰(Segalen,1907/1956)卓著的纪实小说《远古时代》(*Les immémoriaux*)。这位来自法国的海军医生、探险家和研究布列塔尼起源的民族志学者对大洋洲部落文明的灭绝表示担忧。他的作品来源于古代原住民的口述史,并呈现为一系列无恶意的民间传说记述,但却发挥了控诉法国帝国主义和基督教传教士的作用,他们的管理不善、梅毒和毒品几乎摧毁了塔希提岛的本土文化。

马拉雷在第五版《最后的图勒国王》中表露了自己对原住民的尊严、复杂性和人性的情感承诺。多年来,这本书在篇幅与复杂性上稳步扩展,从1955年第一版中文本、插图和地图共328页,发展到1989年最终版的854页。他在考虑翻译《太阳首领:一个霍皮印第安人的自传》(*Sun Chief:The Autobiography of a Hopi Indian*)时再次表明了自己的道德立场。尽管这非凡的人生故事最初由美国民族志学者西蒙斯(Leo Simmons)以个人名义出版,但是马拉雷把西蒙斯的名字从扉页抹去,将合法的作者身份和版税归还给这个人生故事的主人——霍皮印第安人。

该系列中其他受欢迎的书籍包括克拉斯特(Clastres,1972)的《瓜亚奇的印第安人编年史》(*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它以作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南美洲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克拉斯特在巴拉圭与新接触的一群原住民生活在一起,尽管他能够理解他们的语言(因为他讲邻近方言),但是他们拒绝与他交谈。他难以忘怀地描述这种情形,"他们仍是青涩的""几乎没有被我们文明的微风所

染指和污染""这个社会如此健康,以至于不能进入与我以及另一个世界的对话"(Clastres,1972,pp.96-97)。这部作品的英文翻译者、诗人和获奖小说家奥斯特(Palu Auster)指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人经历的真实故事,也是他的一幅肖像,还是"狡猾的小说家"的作品(Auster,1998,pp.7-9)。

马拉雷还节选了艾吉和埃文斯(Agee & Evans,1941)的名著《让我们赞美名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并将其翻译成法语版《1936 年阿拉巴马州的三个佃农家庭》(*Trois familles de métayers on 1936 on Alabama*)。作家艾吉和摄影师埃文斯当时就职于美国联邦农业安全管理局,他们走访了阿拉巴马州的黑尔县,并成为三个白人佃农家庭的亲密朋友。他们用八周的时间记录了这些家庭在大萧条后的生存抗争。全书的内容一部分是记录事实,一部分是文学创作,它们使美国南部黑暗的小屋和废弃的田地跃然于纸上。

还有其他许多作家对该系列做出贡献:Georges Balandier (1957),Margaret Mead (1963),Theodora Kroeber (1968),Guwa Baba 和 Mary Smith (1969),Bruce Jackson (1975),Alexander Alland (1984),Eric Rosny (1981),Colin Turnbull (1987),Robert Murphy (1990),Philippe Descola (1994),Roger Bastide (2000),Darcy Ribeiro (2002),Barbara Glowczewski (2004),以及 Barbara Tedlock (2004)等。这些作品的关键元素包括亲身经历、深刻描述、个性发展、表达观点以及发出声音。这些作者尽量避免使用实验报告式的被动语态(例如"被归结为……")。相反,他们的语态是主动的,使用第一人称并充满激情甚至戏剧性。他们颇具反思性地将自己塑造成个体和历史的见证者。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能是英雄、受害者或证人,因此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具有动机。他们选择的语言形态,包括词序、时态、代词和语素,都强烈地传达了他们的观点,并使其叙述者、主人公和倾听者都具有符合伦理的行为准则。

杰克逊曾指出,这些作者进入他人的世界,逗留片刻,然后重回我们的世界作见证。对于我们而言,他们不仅是用体验报告的方式记录自己走过的道路,而这种记录本身也是一种体验。他们的工作,用马拉雷写给我的信上的话来讲,就是"比纪录片更多的记录"(Jackson,2005,p.15)。换句话讲,比起纪录片,这些作品都更像是文学记录。每部作品都是写作的剧场中一部复杂的、独立的、三维的艺术作品,而非简单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日记条目。



小时候,我在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的草原度过了许多夏天和假期。我的祖母在那里有一个木屋。我们沿着河边的小路一路走过去,祖母会发现许多原生岩石和可食植物,有黑莓、熊果、鹿浆果、紫罗兰、薄荷、蕨菜、繁缕和野生蘑菇等。我们一起坐在巨石上吃着紫罗兰和薄荷,她会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充满了各种人的世界,而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最喜欢岩石人和积云人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的提议治好了鹿人、獾人和熊人。

为了让我这个混血儿记得她的语言，她用奥杰布瓦语解释一些关键词，例如岩石的单数形式是 asin，复数形式是 asiniig，而-iig 这个后缀只能用于有生命的物体，因此这就意味着岩石是活的。她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她曾亲眼看到岩石在挪动并听到他们讲话和唱歌。她有时也会说，"我也许听到并和岩石讲话了呢。"她告诫我只有花费时间在北方独处，使自然界的魔法不被学校教育抹去，这一切才会发生。她是一个圣公会的传道者，也是奥杰布瓦传统的草药医生、助产士和讲述者，她会向我讲解这些灵性之间的异同，基督徒称之为守护天使，而印第安人认为是守护神。她坚信"动物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两种思想对于她来讲几乎是相同的，她劝诫我不要只选其一，相反，我应该行走于这些世界的边缘并保持平衡。"双方的呼唤和爱中都有美和力量。"

成为民族志学者并对大多数北美本土社区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这颇具讽刺意味地使我实现了祖母的期望。如今，当我将自己的故事夹杂于他人的故事进行讲述时，我才意识到许多叙述的传递都是海市蜃楼，我拍摄和描述了具有诱惑性的真实景象，却发现它们依赖于我对生活的想象这一剧场。其他的碎片，像空气中的彩虹，在阴影中蒸发，其他人看到的，并不能够确切地反映我们现在、过去或将来到底是怎样的。我们隐藏的记忆终将追上我们，并像蜘蛛那样编织着我们生活的捕梦网。

参考文献

Agee, J., & Evans, W. (1972). *Louons maintenant les grands hommes: Trois familles de métayers en 1936 en Alabama.*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1941])

Alexander, B. K. (1999). Performing culture in the classroom: An instructional (auto) ethnography.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9*, 307-331.

Alexander, B. K. (2002). Performing culture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in Japan: A critical (auto) ethnographic travelogue. *Theatre Annual: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Studies*, *55*, 1-28.

Alland, A. (1984). *La danse de l'araignée: Un ethnologue Américain chez les Abron (Côte-d'Ivoire).*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When the Spider Danced: Notes From an African Village* [1975])

Allen, C. J., & Garner, N. (1995). Condor qatay: Anthropology in perform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7*(1), 69-82.

Auster, P. (1998). Translator's note. In *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pp. 7-13). New York: Zone Books.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ustin, J. L. (1970).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pp. 233-25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ba, G., & Smith, M. F. (1969). *Baba de Karo: L'autobiographie d'une musulmane haoussa du Nigeria.*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version *Baba of Karo: A Woman of Muslim Hausa* [1954])

Balandier, G. (1957). *L'Afrique ambiquë.*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mbiguous Africa:*

Cultures in Collision [1966])

Balandier, G. (1987). "Terre Humaine" as a literary movement.*Anthropology Today*, *3*, 1-2.

Bastide, R. (2000). *Le condomblé de Bahia* (*Brésil*).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Boston: Beacon.

Benjamin, W. (1996). A child's view of color (1913). In M. Bullock & M. W. Jennings (Eds.),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nilla-Silva, E. (2003). *The double consciousness of Black, White, and Brown folks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GA.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Butler, J. (1997). *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London: Routledge.

Clastres, P. (1972). *Chronique des Indiens Guayaki: Ce que savent les Aché, chasseurs nomads du Paraguay.*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Chronicle of the Guayaki Indians* [1998])

Conquergood, D. (1985). Performing as a moral act: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ethnography of performance. *Literature in Performance*, *5*, 1-13.

Conquergood, D. (1989). Poetics, play, process and power: The performance turn in anthropology.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9*, 81-88.

Conquergood, D. (1992). Fabricating culture: The textile art of Hmong refugee women. In E. C. Fine & J. H. Speer (Ed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identity* (pp. 206-248). Westport, CT: Praeger.

Conquergood, D. (1998). Beyond the text: Toward a performative cultural politics. In S. J. Dailey (Ed.), *The future of performance studies: Visions and revisions* (pp. 25-36). Annandale, V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quergood, D. (2002). Lethal theatre: Performance, punishment, and the death penalty. *Theatre Journal*, *54*, 339-367.

Crapanzano, V. (1980). *Tuha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6). *Nomadology: The war machine.* New York: Semiotext(e).

Deleuze, G., &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enzin, N. K. (2003). *Performance ethnography: Critical pedag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scola, P. (1994). *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 Relations Jivaros, Haute-Amazonie.*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Spears of Twilight: Life and Death With the Last Free Tribe of the Amazon* [1996])

Du Bois, W. E. B. (198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Essays and sketches.* New York: Pengu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Eber, C. (1995). *Women and alcohol in a highland Maya tow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Favret-Saada, J. (1980). *Deadly words: Witchcraft in the Boc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77). Preface (R. Hurley, M. Seem & H. Lane, Trans.). In G. Deleuze &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New York: Viking.

Garoian, C. R. (1999). *Performing pedagogy: Toward an art of poli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lowczewski, B. (2004). *Rêves en colère: La pensée en réseau des aborigènes d'Australie.*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by Editions Plon as *Dreams in Anger* [2004])

Grindal, B. (1983). Into the heart of Sisala experience: Witnessing death divinatio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39*(1), 60-80.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2008). Narrative ethnography. In Ⅳ. Hesse-Biber & P. Leavy (Eds.),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pp. 241-264). New York: Guilford.

Hegel, G. W. F. (1952).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A. V. Miller, Tra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07)

Hélias, P. J. (1975). *Le cheval d'orgueil: Mémoires d'un Breton du pays bigouden.*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Horse of Pride: Life in a Breton Village* [1978])

Jackson, B. (1975). *Leurs prisons: Autobiographies de prisonniers et d'ex-détenus Américains.*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In the Life: Versions of the Criminal Experience* [1972])

Jackson, B. (1999, October). The ethnographic voice. *Il Polo*, 139-141. Available at http://www.acsu.buffalo.edu/~bjackson/ETHNOGRAPHY.HTM

Jackson, B. (2005). "Plus un document qu'un documentaire": The voices of Terre Humaine. In M. Berne & J.-M. Terrace (Eds.), *Terre humaine: Cinquante ans d'une collection* (pp. 14-23).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Kendall, L. (1988). *The life and hard times of a Korean shaman: Of tales and the telling of tal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Knab, T. J. (1995). *The war of the witches: A journey into the underworld of the contemporary Aztecs.* San Francisco: Harper.

Knab, T. J. (2004). *The dialogue of earth and sky: Dreams, souls, curing, and the modern Aztec underworld.*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Kondo, D. K. (1997). *About face: Performing race in fashion and theater.* New York: Routledge.

Krieger, S. (1983). *The mirror dance: Identity in a women's commun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roeber, T. (1968). *Ishi: Testament du dernier Indien sauvage de l'Amérique du Nord.*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from *The Last Testament of a Wild Indian of North America* [1961])

Laughlin, R. M. (1995). "From all for all": A Tzotzil-Tzeltal tragicome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7*, 528-542.

Levínas, E. (1969).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A. Lingis, Tran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Lévi-Strauss, C. (1955).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the same title [1973])

Madison, D. S. (2005). Critical ethnography as street performance: Reflections of home, race, murder, and justi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537-546).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gill, G. L. (1998, August). Rosalie Jones: Guiding light of Daystar— Native American choreographer. *Dance Magazine*, 1-3.

Malaurie, J. (1955). *Les derniers rois de Thulé.*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Last Kings of Thule: With the Polar Eskimos, as They Face Their Destiny* [1982])

Mead, M. (1963). *Moeurs et sexualité en Océanie.*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Manners and Sexuality in Oceania*, combining materials from her earlier books *Coming of Age in Samoa* [1928] and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1935])

Mendieta, E., & Gómez-Peña, G. (2001). A Latino philosopher interviews a Chicano performance artist. *Napantla: Views from South*, *2*(3), 539-554.

Montejano, D. (1999). On the question of inclusion. In D. Montejano (Ed.), *Chicano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xi-xxvi).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Murphy, R. F. (1990). *Vivre à corps perdu: Le témoignage et le combat d'un anthropologue paralysé.*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i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The Body Silent* [1987])

Nabokov, P. (1970). *Tijerina and the courthouse raid.* Berkeley, CA: Ramparts.

Nordstrom, C. (2004). *Shadows of war: Violenc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rofiteer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rdstrom, C. (2007). *Global outlaws: Crime, money, an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beiro, D. (2002). *Carnets indiens: Avec les Indiens Urubus-Kaapor, Brésil.*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version, *Diarios Indios—os Urubus-Kaapor* [1996])

Rosny, E. (1981). *Les yeux de ma chèvre: Sur les pas des maîtres de la nuit en pays Douala (Cameroun).*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Healers in the night* [1985])

Schechner, R. (1985). *Between theater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chechner, R. (1989). Intercultural themes. *Performing Arts Journal, 33/34*, 151-162.

Schutz, A. (2001). Theory as performative pedagogy: Three masks of Hannah Arendt. *Educational Theory, 51*, 127-150.

Segalen, V. (1956). *Les immémoriaux.*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A Lapse of Memory* [1995])

Silko, L. M. (1991). *Almanac of the dea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inger, M. (1972). *When a great tradition modernizes.* New York: Praeger.

Singh, R. (1998). *River of colour: The India of Raghubir Singh.* London: Phaidon.

Sistren (with Ford-Smith, H.). (1987). *Lionheart gal: Life stories of Jamaican women.* Toronto: Sister Vision.

Talayesva, D. (1959). *Soleil Hopi: L' autobiographie d' un Indien Hopi.*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Sun Chief: The Autobiography of a Hopi Indian* [1942])

Tedlock, B.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 69-94.

Tedlock, B. (1992).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ngerous: Encounters with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Viking.

Tedlock, B. (2004). *Rituels et pouvoirs: Les Indiens Zuñis Nouveau-Mexique.*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ngerous: Encounters with the Zuni Indians* [1992])

Tedlock, B. (2009). Writing a storied life: Nomadism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in transcultural ethnography. *Etnofoor, 21* (1), 21-38.

Thompson, H. S. (1970/1979). The Kentucky Derby is decadent and depraved. In *The great shark hunt: Gonzo papers: Vol. 1. Strange tales from a strange time.* New York: Summit Books.

Turnbull, C. M. (1987). *Les Iks: Survivre par la cruauté: Nord-Ouganda.* Paris: Editions Plon, Collection Terre Humaine. (Translated into French from *The Mountain People* [1972])

Turner, V., & Turner, E. (1982). Performing ethnography. *The Drama Review, 26* (2), 33-50.

Walens, S. (2001). *Feasting with cannibals: An essay on Kwakiutl cosmolo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ng, D. (2008). Moving: From performance to performative ethnography and back again. In G. Barz & T. J. Cooley (Eds.), *Shadows in the field: New perspectives for fieldwork in ethnomusicology* (pp. 76-8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诠释实践之建构主义分析 20

THE CONSTRUCTIONIST ANALYTICS OF INTERPRETIVE PRACTICE

⊙ 詹姆斯 A. 霍尔斯坦(James A. Holstein)　亚伯 F. 古布里厄姆(Jaber F. Gubrium)

韩倩 译　朱志勇 校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质性研究的探索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生活现实的社会建构特征(Denzin & Lincoln,2005; Holstein & Gubrium,2008)。它们多以日常生活中意义的互动构建为中心,其主要原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位置并不简单明确地“在那里”,而是会不断变化。日常生活中的事实是在社会行动的形成中被积极构建的。这一原则为质性研究的建构主义视角提供了基础,它既是一场学术运动,也是一个超越具体学科的经验研究视角。

然而,建构主义方法在逐渐流行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不定性。“建构主义”这一术语似乎经常能够被运用于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案。加斯珀和古德温(Jasper & Goodwin,2005)曾不无挖苦地提到,“我们全部是或者大部分是社会建构主义者”(p.3)。但是这种流行正在消退,因为正如林奇(Lynch,2008)指出的那样,这一视角可能由于变得过于多样化和具有弥漫性而不能被充分地定义或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主义有时会失去其概念定位。

另外我们(Holstein & Gubrium,2008)认为,建构主义不是单一的存在,把它作为一种以各种不同的(但共享的)哲学、理论、方法论和经验主义为基础的马赛克式的研究方式,会是更好的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是包罗万象的。我们应该抵制诱惑,不要把建构主义和质性研究中其他当代或后现代模式混为一谈。即使共同关注社会互动的动态,建构主义并不等同于符号互动论、社会现象学,或者民族志研究,其各种衍生理论也不尽相同。

韦恩伯格(Weinberg,2008)认为,有两条主线可以把建构主义思想的马赛克串联起来: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t sensibilities)和反具体化(a resistance to reification)。这两条主线也曾贯穿分析哲学、批判理论、实用主义和解释学派的早期理论(Weinberg,2008)。贝斯特(Best,2008)从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理论中追溯了“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这一术语的起源。他发现,在20世纪早期的人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中,都大量出现过这个术语。同时,很多学者的著作也具有早期建构主义意识(如:Thomas,1931;Mead,1934;Schutz,1962,1964,1967,1970;Blumer,1969)。然而,贝斯特认为,建构主义视角

或这个术语的大规模流行,是随着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1966)合著的《现实的社会构建:论知识社会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而迸发的。

本章概括了诠释实践中建构主义分析的发展,它是建构主义研究的一个特殊分支。我们认为,该探索已经足够具备构成一个公认的、充满活力的研究规划的基本要素。该项目的中心是可识别的社会互动中的当下事实的互动构成。我们使用"分析"这个术语,是因为对该方法建构过程的理解借助于独特的分析话语,即布卢默(Blumer,1969)所指的系统地联系起来的"敏感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它们不仅不会多到涵盖经验,反而能有力地展示其建构主义的鲜明轮廓。毫无疑问,我们对诠释实践的分析不仅仅是描述性的,也是具有理论性的,虽然其概念推理是一致极简的。本章不以历史为目标,也不追求全面。相反,它更关注建构主义研究的独特张力,即自由地,或者有点混杂地借鉴社会现象学、民族志方法学、日常语言哲学以及福柯的话语分析。

概念来源

诠释实践的建构主义分析具有多种来源。几十年来,建构主义研究者尝试记录能动的过程,即建构、管理和维持社会事实。舒茨(Schutz,1962,1964,1967,1970)的社会现象学、卢克曼(Luckmann)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及过程导向的符号互动论(如Blumer,1969;Hewitt,1997; Weigert,1981)都为建构主义思想提供了要素。近年来,民族志方法学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揭示了构成社会秩序的互动过程,为建构主义提供了更具沟通细节的框架(Buckholdt & Gubrium,1979; Garfinkel,1967,2002,2006; Heritage,1984; Holstein,1993; Lynch,1993; Maynard & Clayman,1991; Mehan & Wood,1975; Pollner,1987,1991)[1]。话语建构主义(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Potter & Hepburn,2008)是和会话分析非常相似的话语分析的一个变体,它也尝试考察日常生活中构成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描述、要求、汇报、断言和主张等。

民族志方法学一直关注社会行动和秩序的构成,一系列相关的关注点也随之兴起,反映出对此前被忽视的"什么在何种条件下用何种资源构成"等问题的关注。随着分析经验的积累,以及社会构成环境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连续性,这些传统的、自然主义式的问题恢复了生机。目前对事实构建的分析正在重新关注意义生成和社会秩序所处的宏观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经验主义视野虽然仍然重视社会构成的过程,但是也逐渐被视为我们所谓的"诠释实践(interpretive practice)",即日常生活事实被认识、理解、组织和传达的程序、条件和资源的聚集(Gubrium & Holstein,1997; Holstein,1993; Holstein & Gubrium,2000b)。诠释实践的概念将我们引向社会事实的方式和内容,从经验的视角来看,它既涉及人们的经历和世界被系统建构的方式,也包括渗透和塑造事实构成行动的意义语境

构型和制度生活。对社会建构过程的"方式"和"内容"的日益关注回应了马克思(Marx,1956)的一句名言:人类可以积极地构建自己的世界,但是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独自构建。

这种对情境中的建构行动的关注,不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建构过程,而且凸显了建构过程中反身产生的事实本身。密切关注建构过程的"方式",使我们能够了解日常生活中社会形态的构成机制,但是也可能对这些事实本身的特征和分布产生误导。专门关注社会构成方式的研究经常会忽视社会事实的"内容"。对于定位具体建构事实的"内容""时间"和"地点"这三个重要因素,我们并没有把握好。

民族志方法学的观点

民族志方法学也许是质性研究中以"如何分析"为重点的典型。虽然得益于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和舒茨的社会现象学(Holstein & Gubrium,1994),但是它独辟蹊径,将现象学的理解融入关注实践行动机制的重要研究并解决了秩序问题(Garfinkel,1967; Lynch,2008)。在民族志方法学者看来,社会世界的真实性是通过其成员的互动来实现的,这种互动产生并维持成员生活中可说明的环境[2]。民族志方法学研究者关注的是社会成员究竟如何"进行"社会生活,其主要目的是记录如何具体建构和维持生活世界的实体和表现。他们主要对情境中的行动和叙述的产生过程感兴趣(Maynard,2003)。因此出现探索"在实践中如何实施日常行为"的研究,如性别履行(Garfinkel,1967)、计数(Martin & Lynch,2009)以及传达好消息或坏消息(Maynard,2003)等。

"民族志方法学的无差别"方针促使学者们(Garfinkel & Sacks,1970)暂时搁置以社会世界为优先的探求,而重点研究社会成员如何产生社会秩序意识。诸如犯罪或精神疾病这样的社会现实并不是想当然的自然存在,相反,为了弄清它们对相关成员而言如何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它们的存在。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普通的构成性的工作上,这种工作产生了局部不可怀疑的稳定现实。这种方法拒绝对成员活动的正确性进行任何判断(Lynch,2008)。社会学普遍倾向于从表面正确的社会学观点出发,讽刺和批判常识性的观点,与之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则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成员的实践推理,即社会成员之间能够采取与环境相适应的方法来构建现实世界。波尔纳(Melvin Pollner)将遵循的规则简单概括为:"不要和成员争辩!"(Gubrium & Holstein,2011)

民族志方法学的研究密切关注自然发生的对话和社会互动,并把它们看作研究情境中的组成要素(Atkinson & Drew, 1979; Maynard, 1984, 1989, 2003; Mehan & Wood,1975; Sacks,1972)。根据是否强调了社会互动和实践分析的产生动力或对话的结构,便产生了不同的经验主义方向。民族志研究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在经过局部处理的社会行动和情境上,在这些社会行动和情境中,通过社会互动产生了待研究的客观事实。这类研究认为,当时的谈话内容和当场的

意义结构相关(Gubrium,1992; Holstein,1993; Lynch & Bogen,1996; Miller,1991; Pollner,1987; Wieder,1988)。他们关注的是社会行动和秩序是如何在日常交往中通过对周围情境的详细描述而得以构建,这些情境中的理解和看法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说话内容的意义相连接。这些研究对日常生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分析,既有真实情境的对话片段,又有对互动的民族志说明,形成了系统化的研究成果。从会话分析与社会互动和情境的关联程度来看,它可以用(非福柯式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形式,它或多或少批判性地指向谈话、对话和其他沟通过程如何被用于组织社会行动。这种分析方法生出很多分支,其表现形式是话语建构主义,它与民族志方法学和会话分析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它更关注认识和知识的建构(Potter & Hepburn,2008; Nikander,2008; Potter,1996,1997; Potter & Wetherell,1987;Wodak,2004; Wooffitt,2005)。

强调会话结构的研究关注产生社会行动的对话"机制"。此处的重点是体现社会特征的连续的、逐句的对话或"互动对话"。这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会话分析(Heritage,1984; Sacks,Schegloff,& Jefferson,1974; Silverman,1998; Zimmerman,1988)。这些研究的分析结果对交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该过程中,说话者按照一定的方法和顺序来构建他们对会话实践的关注。尽管对所谓的"情境对话"或"工作对话"的分析在这方面与情境平衡得更好(例如,Drew & Heritage,1992),但是它除了对情境进行简单的引入介绍以外,通常缺少民族志的详细说明,它认为传记式和社交的细节可以被理解成开放的会话机制的结果。正是由于缺少对民族志细节的关注,有些人认为会话分析与民族志方法学之间的联系很小,但是很显然,会话分析与民族志方法学一样对局部和系统的社会行动构建感兴趣(Maynard & Clayman,1991)。

近年来,加芬克尔等学者都详细阐述了他们所谓的"后分析式"民族志方法学,这种方法学更少地倾向于对社会互动的持续结构或机制进行普遍概括(Garfinkel,2002,2006; Lynch,1993; Lynch & Bogen,1996)。该研究方案以高度情境化的能力为中心,该能力构成了日常"工作",尤其是天文学家(Garfinkel,Lynch,& Livingston,1981)、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Lynch,1985)、法医科学家(Lynch,Cole,McNally,& Jenkins,2008)和数学家(Livingston,1986)等的专业领域,其目的是对一定知识和活动限制下的社会实践之"存在的个体性"进行纪实性的描述(Lynch,1993)。在上述活动中,实时型工作的实践细节被看作是它们所产生的知识的"具体化"的特征。要将知识从产生知识的高度具体化的场景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该方法主张最低程度的理论化,尤其是在历史上,它拒绝先验的概念化或类型化,极力主张对具体的和局部的实践进行详细的描述研究,这些实践证明了秩序并使其具有可说明性(Bogen & Lynch,1993)。

尽管会话分析和后分析式民族志方法学成功地展示了社会生产实践的全貌,但是它们各自都忽略了对话、情境和社会互动在概念化过程中的重要平衡,而这种平衡在加芬克尔的早期著作和萨克斯(Sacks,1992)对会话实践具有开创性的报告中都是显而易见的(Silverman,1998)。加芬克尔和萨克斯都未能想象

出会话机制本身也可以产生可识别的社会形式。对社会事实的“构建方式”的关注与对“意义内容”的关注取得了平衡。情境、文化理解及其日常生活的调节作用都被视作与对话和社会互动相互交织在一起。尤其是萨克斯,他将文化理解成实践问题,并把它作为一种用来识别话语和交谈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源泉。不管他们是描述(加芬克尔的)“良好的组织原因”还是(萨克斯的)“成员身份的分类方法”,他们的本意都是要避免将社会实践简化成任何类别的高度局部化或短暂存在的个体性。

民族志方法学最初的一些使命可能已经夭折了,因为会话分析和后分析式民族志方法学越来越将研究对象限制在社会实践及对其进行直接说明的关系上(Pollner,2011a,2011b,2011c)。建构主义分析需要更广阔的研究来延续民族志方法学对互动研究的敏感性,同时将其研究领域延伸至建构性的和被建构的日常生活内容。福柯就是可以为该课题提供有价值的资源的研究者之一。

福柯的启发

如果说民族志方法学是在互动的层面上记录日常生活的完成,那么福柯则是以不同的经验主义范畴研究日常生活。福柯与民族志方法学家差不多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登上分析法的舞台,他研究的是权力/知识体系如何在历史和文化的条件下建构主体及其世界。福柯派将这些体系看作“话语(discourses)”,并强调它们不仅仅是思想的主体、意识形态或其他的符号组成,也是工作态度、说话方式、参考词汇以及社会实践中蕴含的行动过程。福柯(Foucault,1972,p.48)自己的解释是,话语“不仅仅是事物和词语的交集——事物之间的一种模糊网络、一种明显可见的词语链”,相反,话语是“系统形成其所讲的客体(及主体)的实践”(p.49)。即使像监狱之类的建筑设计都显示出某种社会逻辑,这种逻辑指明了解释个人及其所处的客观社会情境的方法(Foucault,1979)。

与民族志方法学认为社会互动具有反身性一样,福柯认为话语的形成也具有反身性,既能构成又能有意义地描述世界及其主体。但是在福柯的分析中,话语建构的“内容(whats)”和模糊技巧的“方式(hows)”同等重要。虽然在分析中倾向于文化“自然主义”,但是福柯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表明主体性实践理解的重要性。如果他认为主体和客体是通过话语建构的,那么他也会同意主体在非故意的情形下,主动形成话语并把它运用在内在生活和社会世界的构建中(Best & Kellner,1991;Foucault,1988)。

福柯特别关注社会场景或组织地点,比如收容所、医院和监狱,它们都是产生话语实践的场所,并将特定主体的话语和生活经历的建构联系起来。像民族志方法学一样,它们都关注话语体系的组织特性,其实践的倾向是认为生活经历及其主观性经常内含并体现于模糊准则中。

有几位评论家曾指出,福柯(Foucault,1980)所指的“权力/知识(或话语)”体系与民族志方法学家所认为的语言使用的建构性权力的形成之间具有共通之

处(Atkinson,1995; Gubrium & Holstein,1997; Heritage,1997; Miller,1997b; Potter,1996;Prior,1997; Silverman,1993)。这种相关性表明,福柯从历史角度分析描述的不同制度或文化场所中的"实践中的话语(discourses in-practice)"可以被视作民族志方法学分析中以不同社会互动形式表现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Holstein & Gubrium,2000b,2003)。本章中,我们使用"实践中的话语"和"话语实践"[3] 这两个术语来强调这种共通性。

虽然民族志方法学家和福柯派从不同的学术传统出发,并且有着不同的经验基础,但是很显然他们都关注社会实践,他们都在研究话语的建构反身性。他们都不认为话语实践或实践中的话语是由外部社会力量或内部动机所产生或解释的,相反,二者都被视作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机制,在特定时间和具体地点中被人认知和实施。对于这两派学者而言,"权力"存在于对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清晰描述,而不是某些人利用特殊资源对其他人的生活施加影响。虽然实践中的话语被表现为"政体/政权"或(在历史和制度上)广泛"约束"和"影响"追随者在其世界的现有行为模式,而话语实践则是在构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过程中体现的,但是两者所指的实践都是在社会中已经完成的或正在进行的行为。

如果说民族志方法学家关注的是社会成员如何利用日常的方法来解释他们的活动和世界,那么福柯(Foucault,1979)则使我们了解可能造成某种结果的相关条件。比如,在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在大多数日常情境下,认为医药和巫术对治病救人同等重要,是很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医学话语的力量尤其来自其"意识到却未被注意到"的能力,以及作为唯一的可能而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能力。

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研究都是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而不是建构传统的理论框架。根据传统的理解,理论主要是解释研究对象的现状。它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比如自杀率为什么会提高,或者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沮丧。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派的研究目的是回答如何用这些特定的词语来理解个人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具有前理论性,其目的都是解释理论的主体首先如何形成,然后如何发展。它们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实践经验的记录。

目前,二者在这一点上仍然类似但不相同。福柯的研究(而且大多数福柯派的研究)是在历史范畴内进行的研究,因此,其考察的经验材料并不包括实时性的对话和社会互动(但也有例外)。福柯将现存社会形式和新形式的"产生"进行对比,发现话语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造成并显示出不同组织领域的现实变化,但是他并没有指出这些变化是通过哪些日常互动方法而实现的(Atkinson,1995;Holstein & Gubrium,2000b)。当然,他详细阐述了新技术的大量出现,比如医学中新的监督制度和现代犯罪司法体系(Foucault,1975,1979),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这些技术在实践中是如何被运用的。换句话说,福柯并没有对日常"方式"进行分析。

相反,民族志方法学家致力于描述实时性的互动过程,在该过程中,社会行

动和秩序是可见的和可说明的，他们在描述时不考虑外在的组成资源、可能性和限制性。民族志方法学的研究几乎都不涉及"是什么"的问题。在具体互动中表明日常与现实的接触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回事，但是要理解这些日常接触可能是由哪些一般性要素构成的，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通过互动对话机制，我们无法得知进行和引导对话是否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也无法得知是否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后果，而这些都是构成实践的重要因素。社会成员在谈论他们所处的世界及其主观性时，也是在描述生活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理论为民族志方法学在分析谈话和社会互动时提供了对话语机会和可能性的敏感性，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产生日常社会秩序的外部模式。

建构主义分析的范畴

诠释实践的建构主义分析受到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学派的共同影响。它充分利用二者研究的主要观点，但是这并不仅是连接所谓的宏观和微观的又一次尝试。人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往往是如何定义先前存在的较大和较小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假设是这些社会形式具有截然不同并且可被识别的类型。在这场争论中产生的问题继续保持了社会体系和社会互动的差异性。

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学派的分析相似，他们关注的是社会建构的话语实践或实践话语中存在着的互动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性。他们的目的是描述社会构成过程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形成的，而不是考虑如何将宏观和微观领域的各个理论联系起来以便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组织。加芬克尔、萨克斯和福柯等理论家及其继承者可能会继续进行各自不同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大可能会相互支持，他们也不会倾向于在那些坚称自己采用与众不同的分析方法的教条式实践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对话。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在制度、文化和社会互动的交叉中开创新的，也许是混合的方法来分析现实构成。

超越民族志方法学

一些使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的会话分析已经改变了方向，它们分析了在制度情境中形成的互动谈话的有序机制，并且更加关注社会生活的"内容"。一些民族志方法学取向的田野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再局限于社会互动的"方式"，而是更广泛地拓展到互动产生的结果，这刚好与社会构成"内容"相呼应。其他形式的话语分析关注的仍然是社会互动情境中使用的话语资源，或是互动产生的各种主体和客体。

比如，对"工作谈话"进行会话分析的研究意在说明在特定的互动体制(Boden & Zimmerman，1991；Drew & Heritage，1992)中反身建构的语言环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形成日常会话"最简单的系统"（Sacks，Schegloff，& Jefferson，

1974)。民族志方法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从不同的方向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想知道社会成员如何通过互动(或现实工作)形成、管理和维持各种制度及其主体性(Atkinson,1995;Dingwall,Eekelaar,& Murray,1983; Emerson,1969; Emerson & Messinger, 1977; Gubrium, 1992; Holstein, 1993, Mehan, 1979; Miller, 1991, 1997a)。福柯的理论也被加以讨论,研究者已经将日常话语实践和实践中的话语联系起来,即记录着局部细节的精神病病例或验尸报告等日常文本如何再现组织性话语(Prior,1997)。还有一些研究使用类似的分析方法,发现了文化和制度情境中的话语如何在互动中形成并产生社会意义和有组织的人际交往实践(Hepburn,1997;Gubrium & Holstein,2001)。

这些努力都以各自的方式思考构成社会现实的方式和内容。但是这在分析上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对“是什么”的问题进行整体分析就去探讨“为什么”的问题,那么对“内容”的把握是武断的。虽然互动谈话的技巧性不强,但正如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所指出的,也并不是怎么样都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分析时过于强调情境或文化的影响,那么最终会成为加芬克尔(Garfinkel,1967)所描述的文化、制度或判断上的“傀儡”。

强调分析的相互影响

为了扩展和丰富民族志方法学的分析范围和变体,研究者已经将其视野延伸至在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文化的内容。目前这种延伸还不具有福柯所追求的历史性,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一点。在我们的建构主义分析中,我们回归“谨慎的”(自觉的)自然主义来讲述日常生活的实践结果(Gubrium, 1993a)。更多鲜明的建构主义者关心“习以为常”的事实,在“方式”和“内容”的问题上达成平衡,加强了对二者的分析力度。这样的分析方法强调的是话语实践和实践中的话语,即民族志方法学和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将二者综合起来。这样做就避免了将社会形式理论化,避免话语实践被想当然地与社会形式的构成联系起来。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既关注制度话语又关注文化话语,以免它们消失于实践推理的局部化描述或互动谈话有序组织的形式中。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对诠释实践的建构主义分析使我们在现实中“持续关注”日常生活,即休斯(Hughes,1984)所说的社会的组织。这种方法使我们关注当社会成员在建立社会生活时,如何有技巧地运用不同的话语。

诠释实践的方式和内容之间的互相影响意味着一种动态关系,而不是亟待解决的张力。我们在分析时应有意地避免偏向话语实践或实践中话语的任何一方。在我们看来,用民族志方法学的术语来讲,建构主义分析的目的在于记录以下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建构日常生活现实感所必需的实践推理和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是产生互动并为诠释互动提供媒介的制度条件、资源和相关会话。用福柯的话来讲,分析的目的在于描述制度话语和构成部分主观性及其经验世界的“起划分作用的实践(dividing practices)”之间的相互作用(Foucault, 1965)。真实世界实践的对应性促使我们平等地对待其表象和实体的形式。

建构主义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诠释实践两方面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既注意技巧过程又注意意义构成和社会秩序的本质条件,有时也含蓄地承诺多层面分析。例如梅纳德(Maynard,1989)指出,传统上大多数民族志学者最常问的问题是"参与者如何看待这件事?"而民族志方法学的话语研究则会问"参与者如何做这件事?"尽管梅纳德自己的工作通常是从第二个问题开始,但是他警示我们不要忽视第一个问题。他解释说,在研究人们如何做事情时,民族志方法学研究倾向于不那么强调影响行动的条件。梅纳德意识到"外部社会结构在进行自身内部构建的同时,也是社会互动的资源"(p.139),因此他认为,民族志研究和话语研究可以为彼此提供信息,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记录"互动结构是如何在作为情境产物的同时,也作为外部原因导致了其他事情的发生"(p.139)的方式。他说,"除了知道人们如何'看待'日常世界,研究者应该努力理解人们如何'发现'并展现这些世界的特征以便于人们可以'看见'这些特征"(p.144)。

梅纳德(Maynard,2003)的后续研究发现,对于话语和互动,会话分析和更自然主义倾向的民族志社会进程研究有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梅纳德自己的工作,像许多有类似背景的会话分析研究那样,探索会话分析的内容和方法与更强调田野研究的民族志方法和观点之间具有的所谓"有限亲密性"(Maynard,2003,第3章)。普遍的建构主义分析对于社会实践的"方式"和"内容"的描述寻求更深刻的"共鸣"(Maynard,2003),尽管它们将很多分歧作为分析的重点或出发点,但是很明显存在着共同的基础。

米汉对此表现了类似的兴趣和关注。他提出了一个话语导向的"建构民族志(constitutive ethnography)"计划,该计划"通过说明世界上的社会事实是如何从建构中产生并具有外在性和束缚性,来同等看待结构和建构活动"(Mehan,1979,p.18)。米汉分析了诠释分析的对比性例子,以描述人们"在制度、文化和历史情境中"进行现实构建的"远景"和"近景"特征。

从类似的民族志方法学和话语分析的立足点出发,希尔弗曼(Silverman,1993)同样关注谈话和社会构建的制度性(Silverman,1985,1997)。为寻求一种同时展示构成和情境影响的质性调查模式,他建议关注谈话的不同制度情境的话语研究,为质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样,米勒(Miller,1994,1997b)曾提出"制度话语的民族志学",用于记录特定环境下的成员在组织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如何使用不同的资源,以及成员的行动如何被环境中可用资源所束缚(Miller,1994,p.280)。对于如何使分析互动成为严密的经验主义分析,他为会话分析和福柯式的话语分析都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无独有偶,史密斯(Smith,1987,1990a,1990b)明确强调从女性主义的观点说明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产生该视角的批判意识。她的分析最初受到民族志方法学的启示,并越来越多受到福柯思想的影响。撇开民族志方法学,她提倡她所称的"话语和日常生活的辩证法"(Smith,1990a,p.202)。

然而,关注话语实践分析和实践话语分析的相互影响不应导致两者的合二

为一,否则会削弱两者研究的经验范畴。将话语实践的分析法缩减为话语实践是有风险的,这样做会漠视制度性差异和文化配置,二者是社会互动的媒介,而并非仅通过社会互动的谈话产生。相反,只是将话语实践视为制度性话语的残余物,就会带来完全排斥本地文化的风险。

分析的交叉

建构主义分析避免综合或整合,它在程序上需要灵活性和技巧性,这是机械的经典著作或公式所不具备的。这种分析过程更像是有技巧的变戏法:有时关注日常生活的方式,有时又关注日常生活的内容。这需要一种新的交叉形式来记录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种摆动式的忽略日常生活的建构和事实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分析的交叉(analytic bracketing)"(Gubrium & Holstein,1997)。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命名,但是这个名称还未被其他建构主义分析广泛使用。

民族志方法学对建构现实方式的关注需要暂时有意地忽视那些事实。民族志方法学者在进行分析之前总是把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信仰放在一边,以便看见日常生活的实践。正是通过这些实践,主体、客体和事件逐渐变得可见、合理和有序。民族志方法学研究正是以此为起点,通过辨识当下具体的互动机制,记录话语实践是如何构建社会行动和秩序的。正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p.19)所提倡的那样,应该让语言"休息一下",以便看清语言是如何建构课题的,否则,它将被视为主要是用来描述的。

分析的交叉有所不同。它贯穿整个分析过程,而不仅仅是在初始阶段。随着分析的推进,研究者会将日常生活事实交替定位为成员建构现实过程产生的结果和事实反身建构所需的资源。在某个时刻,为了通过话语实践记录其结果,研究者可能会漠视日常生活的结构。而在下一步的分析中,他或她又交叉了话语实践,以评估建构现实所用的资源的局部可用性、分配以及/或者其规则。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讲,就是既要注意使用中的语言,又要注意"让语言休息一下",交替考虑这些语言游戏,尤其是制度性的话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以及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可能采用哪种游戏。用福柯的话来讲,这也就是要时而考虑实践中的话语,时而记录与之相关的、有着清晰局部条理的话语实践。

分析的交叉相当于一种定向程序。它交替关注诠释实践的内容和方式(以正向或反向的顺序),以便收集日常用语的全貌,既包括以情境为背景的,也包括建构于情境之上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游走于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之间,对二者进行交替记录,并在此过程中使二者彼此参照。不管是话语机制,还是可用话语和/或限制,都变成了一种临时现象,而对另一方的关注只是暂时被搁置而不是被遗忘了。对诠释实践的方式和内容所做的分析不断相互影响,真切地反映出社会互动和产生互动的直接环境、资源、限制及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由于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是相互构成的,因此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分析应该起始或结束于任何一方,尽管各人在这个方面会有所偏好。例如,史密斯

(Smith,1987,1990a,1990b)提倡以“人所在的地方(where people are)”为起点,我们将其理解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制度性情境中所处的具体位置。相反,即使一些未被分析的“内容”能够典型地反映其成就,会话分析也坚持以话语实践(如日常会话)为起点。

不管从哪里开始,无论是话语的文化和制度细节,还是话语在社会互动中的真实使用,二者都不能事先决定彼此。如果我们暂不考虑谁先谁后或者谁有优先权的问题,只要我们牢记诠释实践内部的相互影响需要我们对其事实进行交替分析,我们就可以指定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并从那里开始推进。为了不使这些要素具体化,研究者要不断提醒自己,分析任务要以两个领域的辩证关系为中心,而不是彼此间的复制。

尽管我们不提倡对起点进行规定,但也没有必要担心整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或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例如梅纳德(Maynard,1998,p.344)把分析的交叉比作“想要搭乘不同方向的火车,开始时跳上一列,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跳到另外一列上”。他问到,“当火车开往不同的方向时,你怎么能从一列跳到另外一列上呢?”这个问题事实上只不过是阐释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最初该如何交叉。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梅纳德和其他民族志方法学者以及会话分析者各自研究的基础。答案很简单:交叉原则的知识使这一点成为可能。那些排除或漠视生活世界的人,当他们进行各自的经验材料研究时,或许很乐意先不考虑社会现实。这已经成为一种例行程序,就像早上起床,吃早餐,然后去上班一样[4]。另一方面,想要对包括交叉分析在内的任何一种交叉进行操作,使之成为明确编码的、有序的程序,就会把交叉变成一系列像食谱一样的分析指南,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我们认为,除了最顽固的操作主义者,没有人会用一本食谱来代替分析法[5]。

对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交替关注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把它们套用到我们的分析中。它能帮助人们分清社会成员的资源和自身资源,这对民族志方法学是非常重要的。交叉分析实质上一直都具有临时性。它反对完全将话语看成权力或知识的系统,而把它们与在现实经验中的呈现方式分离开来。分析的交叉也永远是经验性的,因为它并不想当然地将话语运用看成简单设置的操作原理。[6]

反对一概而论

处于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十字路口,建构主义分析法反对一概而论或者有所缩减。它调节了选择和行动的经验事实,其灵活性能够捕捉结构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它限制了福柯分析法将所有诠释都看作特定权力或知识的支配物的倾向。根据对“当下的历史”的相关论述,福柯倾向于特别强调话语在特定的时间或地点中建构意义范围的优势,认为话语充分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差异。一种更注重互动性的话语分析,即依赖话语实践的分析法,则反对这种倾向。

由于诠释实践是在制度目标和功能中以话语作为媒介来实现的,我们可以

辨别出权力/知识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中是如何操作的。然而,在一个制度场所中的运用并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场所的实践。不同的制度组成不同的,有时会重叠的各种事实。一个有组织的情境可以将媒介或主观性赋予个人,而其他情境可能通过不同的方法构成主观性(Gubrium,1992; Miller,1997a; Weinberg,2005)。

如果诠释实践是复杂的和动态的,那么它就不具有随意的社会性。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话语贯穿在无数的场所,而且具有多样的社会性。行动者通过使用不同的、局部有细微差异的、与各自生平有关的术语来系统地构建主观事实。这样就大大削弱了话语的运作方式,远不会出现福柯著作中所说的由权力或知识完全统一支配的体制。尽管如此,在参与者提及的正在进行的事务中,社会组织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参与者的谈话和互动反映了社会组织的要求。

相应地,建构主义分析需要解决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在日常生活的无数场合中建构什么样的现实或/和主体(Hacking,1999)。在实践中,话语的不同结合形式相互交叉和碰撞,有碍于建构一般的或一致的主体、对象和社会现实。不同的社会互动环境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诠释会依据其所参照的制度和文化而有所不同。当实践话语在方法上适应即时情况时,它们彼此折射。局部的话语实践不大可能会导致综合化,反而会为创新性、多元化和多变化做好准备(Abu-Lughod,1991,1993; Chase,1995; Narayan & George,2002)。

不同的方向

诠释实践的建构主义分析注重多样的分析方向,并且持续发展新的方向。一些方法现在正在"成熟化",例如由多罗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及其同事开创并持续发展的"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一些是较新的方法,如话语建构主义,以及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坦(Gubrium & Holstein,2009)对叙事实践进行的建构主义分析。不论是新方法还是老方法,它们都各自致力于研究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的相互影响,从不同的角度关注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内容。

叙事实践民族志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最近产生的方法,它以如何分析叙事和讲故事(story telling)相关诠释实践为中心。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叙事分析已经成为质性研究中一种流行的方法。如果说每个人(或大部分人)都是建构主义者,那么现在也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似乎在从事他们所谓的叙事分析。随着叙事分析的新浪潮变得精致和富有洞察力,此研究大多密切关注谈话的文本(例如,Riessman,1993)。研究者收集访谈中各种有关社会生活的故事,然后进行转录和分析,获取主题化等建构其内容的方式。

尽管建构主义分析者起初就尝试进行叙事分析，但是叙事过程定位于社会而展开的主观能动性亟须得到改变。对故事转录文本的关注会趋向于使叙事从其所处的社会组织和互动中剥离出来，把叙事当作社会产物，而不是社会过程。关注点应该更着重于以文本为基础的故事的"内容"及其架构方式，而不是叙事的产生方式。阿特金森(Atkinson，1997)等提出改变关注点：

> 无处不在的叙事及其集中性……并不仅仅使其优于那些形式。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检验那些叙述，并使其受到和其他形式相同的分析。我们应该对其运用中的建构给予应有的重视：演员如何临时发挥他们的个人叙事……我们应该关注如何部署社会共享的修辞和叙事资源，以产生可识别的、合理的、具有广博文化寓意的解释。(p.341)

这种重新定位鼓励研究者考虑叙事的环境、条件和目标——叙事者如何通过自身的解释来逐步建立和完成事情。这再一次印证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1958)的观点，即叙事者不只是讲故事，他们还要对故事进行加工。

根据阿特金森和其他人的建议，我们最近将自己的建构主义分析取向转向叙事的生成(Gubrium & Holstein，2009)。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需要超越故事文本，通过建构和讲述故事的场合及实践活动，捕捉叙述中能动的、定位于社会的尺度。通过考察叙事实践的领域，我们可以了解解释的内容及其内在构成，获取与"叙事如何组成、传达和接收"相关的交流条件和资源，还可得知讲述故事的日常影响。

对实践的关注强调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之间的反身影响。对故事原文的叙事分析可能能够完全展现故事的内在动力和组织，但是它却割裂了故事和其所处的互动制度之间的关系。例如，一份文本也许并不能显示情境的话语规则，诸如在特定环境中通常谈论什么、避免谈论什么，以及哪些话题是不被鼓励的等；它也不能表明具体的叙事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叙事方式，我们需要了解叙事场合的细节和媒介条件。为了辨别这些细节，我们只能直接考察所谓的"叙事工作"和"叙事环境"之间互为构成的相互影响。

叙事工作是指通过相互作用的行动对叙事进行建构、传达、维持和重新配置。其中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建构过程进行概念化?"以及"如何分析经验过程?"其中一些在故事文本中是可见的，但是大部分的叙事分析者都倾向于将文本从互动制度语境和会话风格中剥离出来。这就普遍使转录的叙事看起来是一种差不多完成的、自说自话的产物。在会话的互动中原生态的生成叙事已经消失了。

为了使叙事重新获得活力，我们检验叙事实践以得到能够激活或激励叙事的方法(Holstein & Gubrium，1995，2000b)。运用交叉分析方法的研究，其关注点在于会话的动力、机制以及形成的有序情境(许多传统会话分析的关注点)，同时保留了对更广泛的背景问题的敏感。其他的研究聚焦于叙事的联系和构成，即如何通过叙事建构意义(Gubrium，1993b；Gubrium & Holstein，2009)。对叙事表演性的研究表明了在具体的受众和环境中如何生成和传达叙事(Bauman，1986；

Abu-Lughod,1993; Ochs & Capps,2001)。在分析叙事实践中,协作和控制是另外的重要考量因素(Holstein & Gubrium,1995,2000b; Norrick,2000; Young,1995)。正是由于在互动中生成,叙事才成为突出的社会成就。

另一方面,叙事实践分析也关注叙事环境——构建叙事时所处的情境。叙事被整合并在某时某刻被告知某人,同时产生各种影响(与会话分析不同,我们并不将叙事环境局限于语言交流机制)。所有这些都对呈现故事的方式、传达的内容和达到何种目的产生明显的影响。正像内在因素能够影响故事讲述者的角色那样,讲故事时的环境能够形塑故事的内容和内在架构。对叙事环境的分析更强调叙述事实的内容而非方式,尽管交叉分析只是把它作为暂时且非唯一的焦点。一个主要问题是,"产生叙事的特定情境具有独特的理解、关注和资源,这种情境而非不同环境下的其他情境如何影响叙事的意义?"第二个问题是,"叙事实践采用特定方式的目的和结果是什么?"在呈现故事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回应时,讲述者和听讲者会面临一些风险,为了了解这些风险,致力于研究讲故事时的叙事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与正式和非正式的场景和组织有关的问题,从家庭到朋友关系、行业和职业(Gubrium & Holstein,2009)。米勒(Miller,1997a)和韦恩伯格(Weinberg,2005)对医疗机构进行的对比民族志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古布里厄姆(Gubrium,1992)的《失控:家庭治疗和内部失调》(*Out of Control: Family Therapy and Domestic Disorder*)更突出刻画了叙事环境的影响,它描述了不同的家庭治疗机构中由叙事产生的家庭烦恼。凯希(Chase,1995)的《模糊的授权:学校女性主管的叙事》(*Ambiguous Empowerment: The Work Narratives of Women School Superintendents*)和马瓦斯蒂(Marvasti,2003)的《无家可归:文本和叙事建构》(*Being Homeless: Textual and Narrative Constructions*)为某些社会成功人士的故事提供细致的描述,强调了叙事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些叙事建构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和挑战。

为了超越转录的文本,叙事分析需要一种能够获取广阔多样的叙事实践全景的方法学。事实上,研究者必须愿意抛开故事本身,进入生成叙事的互动、文化和制度领域,用叙事民族志的方法讲故事(Gubrium & Holstein,2008,2009)[7]。将民族志取向应用于故事讲述,适应了话语互动和描述叙事实践全景的需要。它为细致审视建构故事过程中的叙事环境、角色和行为提供了机会。很显然,这与传播民族志研究(Hymes,1964)、口头叙事研究(Bauman,1986; Briggs & Bauman,1992; Ochs & Capps,2001)和民间叙事民族志研究(Glassie,1995,2006)对语境进行的丰富研究产生了共鸣。

要考察故事在社会中的产生、分布和传播,我们需要跳出故事文本去考虑问题,比如谁制造了各种类型的故事?故事可能发生在哪里?它们的目的和影响怎样?谁是听众?某种叙事在怎样的环境中差不多是合理的?它们怎样被接受?它们遭遇哪些挑战?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有助于解答这些问题。通过系统的观察叙事的构建、应用和接受,我们发现,虽然对叙事的内在结构本身的理解很重要,但是它并未指向故事在社会中的运行方式。这并不是贬低以文本为基础的叙事分析的解

释价值,而是强调在处理叙事实践时,该方法应该增加哪些内容。

制度民族志

与话语实践和实践话语相关的另一种方法是史密斯的"制度民族志"研究计划(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E)[8]。该方法出现于史密斯(Smith, 1987, 1990a, 1990b, 1999, 2005)的女性主义研究中,这些研究探索了女性日常生活经验和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形式之间的断裂,这些知识看似是中立和普遍的,但是背后却隐藏着以性别、种族和阶层为基础的立场(McCoy, 2008)。这种方法认为日常世界既是其出发点,也是其问题的来源。这种研究始于社会中真实个体正在进行的活动,即史密斯特指的"以人为先"。目的是描绘管理和支配的跨地域进程,它们通过支配关系形塑了生活和环境。

主要的协调形式是史密斯所谓的"支配关系(ruling relations)",即关于"将我们生活中局部和具体的行为持续转录为抽象的和概括的形式……以及着力创建文本世界"的知识模式(Smith, 1987, p.3)。在制度民族志中,对于分析者来说,"文本"指实质上分离于意识体现之外的各种形式的表述(书面、口头、可视、数码或数字等形式)。这些文本为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建立联系,使知识生产与享有知识的个体之间的分离成为可能。现代管理和大规模协调发生于对以文本为基础的知识进行快速复制、概括和归纳的过程中。这些文本促成了"支配关系,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意识和组织,这些意识和组织作为个人和地点的外在构成被体现出来"(Smith, 2005, p.13)。但是要考察文本的协调方式,研究者必须考察文本在持续和制度性的行动步骤中生成、使用和适应中"所起的作用"(DeVault & McCoy, 2002; McCoy, 2008)。

这种方法存在制度和民族志的尺度。在制度民族志中,"制度"指相互配合和交叉的行动步骤和工作流程。"民族志"需要的是探索和描述这些行为的具体调查方式。制度民族志研究者的目的不是对研究的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对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进程进行鉴定和解释。制度民族志的实践者大多有关键性或解放性的目标,我们将对这种目标进行简短的论述。他们的调查是为了阐明产生主要和次要经历的思想和社会进程。就像史密斯及同事经常说的那样,制度民族志不仅仅是关于人的,而且是"服务于人"的社会学(DeVault & McCoy, 2002; McCoy, 2008; Smith, 2005)。

尽管制度民族志通常不被视为建构主义的分支(McCoy, 2008),但是它的概念起源和经验主义旨趣趋近于广义的建构主义课题,尤其是话语的资源和约束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形式的方式。制度民族志研究以文本(话语)调节的社会关系为中心,考察了似乎外在于个人和地点的意识和组织形式是如何被体现和构成的。然而,制度民族志分析致力表明,看似无情的社会生活形式在协同行动中被实现的同时,也在持续和制度性的行动步骤中被生成、使用和适应(McCoy, 2008; Smith, 2005)。从制度民族志的立场来看,结构和机构之间的互动是生活经验的社会组织的关键。

制度民族志是“服务于人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people)”,研究者将其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和情境:教育、社会工作、护理及其他健康科学,以及社会学(McCoy 2008; Smith,2006)。一般来说,制度民族志强调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有序的和有机的社会工作。对工作的解释是广义的——与有意识的意愿和习得的技能相关的活动,包括情感和思考,以及体力劳动和交往行为。它并不只限于职业雇佣,尽管这种形式的工作的分析时机也已成熟。例如,迪沃尔特(DeVault,1991)考察了供养家庭的工作,此前一些民族志研究已经调查了在不同的家庭和组织情境中,妇女做母亲的经验及相关工作的各个方面(Brown,2006; Griffith & Smith,2004; Weigt,2006)。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与艾滋病感染者共同生活(Mykhalovskiy & McCoy,2002)、育儿和住房(Luken & Vaughan,2006)、家庭陪护(Diamond,1992)以及职业培训和移民劳工(Grahame,1998)的境遇式经验。制度民族志在更为正式的(职业的)工作情境中实施调查,包括对教师(Manicom,1995)、保安(Walby,2005)、社会工作者(De Montigny,1995)、护士(Campbell & Jackson,1992; Rankin & Campbell,2006)和同性恋社区监管(G.Smith,1988)等工作的研究。进行这些制度民族志研究是为了发现在社会中如何组织和协调生活。这些课题的分析基础是展示制度实践和个人行动之间的互动。如果说制度民族志拒绝冠以建构主义之名,但是它仍与建构主义分析的诸多方法存在共通之处。

话语建构主义

话语建构主义和话语分析的旗帜下纳入了一些新的方法(Potter,1996; Potter & Hepburn,2008)。它的建构主义分析也是以诠释实践的互动为中心。正如波特和赫伯恩(Potter & Hepburn,2008)所指出的,话语建构主义本身就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标签,使大量与之或多或少相关的工作具有特定的连贯性。正是由于具有极强的程序性,它才成为令人信服的、强调社会互动反身复杂性的分析视角。

话语建构主义以日常会话、争论、工作以及其他互动场合的谈话为中心,它聚焦于行动和实践,而非语言结构。这种取向浮现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分析传统(例如,Gilbert & Mulkay,1984)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更广阔的视角(例如,Potter & Wetherell,1987;Hepburn,2003)。它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民族志方法学,也大量汲取会话分析的方法和成果。但是话语建构主义不同于会话分析,因为它明确突显了社会建构的实质性问题,并且它比一般的会话分析更关注社会互动的“内容”。尽管还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二者之间也存在大量的重叠,并且近年来有了更多的融合(Potter & Hepburn,2008)。

话语建构主义从两方面研究社会建构。一方面,不同结构化程度的组织中具有一系列不同的资源,话语建构主义的调查描述了话语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被建构的。这些资源最基础的形式是词语和语法结构,但是也包括分类、隐喻、俗语、修辞规则和解释库等更宽泛的要素。另一方面,词语、变体和分类等聚集在一起,描述了世界的静态、行动和事件。在这种意义下,话语建构主义强调了

话语的建构要素。以话语建构为中心,指的是话语不仅仅描述事件的客观状态,它还被用于建构具有特定目的的、不同形式的世界(Potter & Hepburn,2008)。

由此说来,话语建构主义认为所有的话语都具有情境性。在某种层面上,它处于会话(Sacks,Schegloff,& Jefferson,1974)及其他形式的中介式互动(例如,在法律或医学程序中的话轮分配、计算机显示器上的屏幕提示)的有序环境中。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内嵌于制度中。也就是说,它产生于日常持续的实践中并使其具有意义和结构,这些实践包括家庭谈话、购物交易和十二步骤聚会等。第三,在提倡某个版本及备选的对立面的话语建构中,话语具有修辞学意义(Potter & Hepburn,2008)。就这一点而言,对话语建构中利益相关及相应的"内容"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

话语建构尽管包含了实践中话语的观点,但是缺乏话语的扩展概念,这些概念被用于福柯的一些研究中。话语建构强调话语在日常实践中的作用,这种观点更具有局限性。尽管如此,话语建构的动态化和反身性足以使其强调福柯式分析所关注的现象,也使其将福柯对于制度、实践和主体特征的见解借为己用(Potter & Hepburn,2008)。例如,韦瑟雷尔(Wetherell,1998)认为对社会认同的理解离不开对话语的考察,认同是通过话语所提供的主体位置而生成的。

话语建构不是一个"连贯而封闭的体系"(Potter & Hepburn,2008,p.291)。它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但不限于话语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例如,Edwards,2005;Edwards & Potter,1992;Hepburn,2003;Potter,2003;Potter & Wetherell,1987)、认知(例如,Potter & te Molder,2005)、种族和种族主义(例如,Wetherell & Potter,1992)、性别(Speer & Stokoe,新闻报道)、年龄(例如,Nikander,2002)、事实(例如,Wooffitt,1992)和情感(Edwards,1999)等。

话语建构具有分析的张力。例如,社会结构和环境问题一直是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研究者如何着眼于辨别超越话语、主体位置或所有变体,对会话中的语句进行分析,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争论。在福柯或批判性话语分析中(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例如,Fairclough,1995;Van Dijk,1993;Wodak & Meyer,2009),问题是如何在关注建构的互动动力和环境的同时,批判地处理社会建构的实质"内容"(Wooffitt,2005)。完全转向先验话语研究存在着风险,会欺骗话语实践中有技巧的人类行为和中介(Wooffitt,2005)。

保持批判意识

我们通过分析的交叉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探索实践话语与话语实践之间分析互动的临界位,建构主义分析保持了批判意识。关注诠释实践的构成"方式"和实质"内容"为批判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平台。和先前的交叉不同的是,这种持续的分析交叉不会让我们安逸地置身于整个研究过程之中而对所经历的现实置若罔闻。它也不会让我们舒适地按照一成不变的自然主义方法来如实地记录

日常生活世界,这一世界并不是完全客观和固定的。事实上,它不断地让我们脱离这两种毫无生气的做法。

在考虑实践话语的问题时,有必要进行问题化或政治化的探讨,否则,这些问题的建构、管理和维持容易被认为过于社会化或个人主义。"内容"问题的紧迫性警示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互动的人际中介、技巧或机制就是全部内容。这种紧迫性促使我们对以下情况进行研究:在时间和环境中通过话语实践所建构事物的更广泛的来源,反映并影响建构过程的当前环境,以及那些以其特有的方式建构世界的个人及人际间的相关性。尽管诠释性实践分析法并没有像自然主义那样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它也没有认为日常生活就是在会话或是叙事的场合下,在互动谈话中平地而起的。其政治后果是使分析方法转向暗含了直接互动之外的社会组织及其控制。我们应转向更广义的情境中(尽可能地具有构建性)去寻找行动、控制、变革或稳定的来源。

当需要对话语实践进行分析时,有必要对想当然的现实的代表性问题进行批判质疑。"方式"问题的紧迫性警示我们不要假定现在的世界是必然的。这个警示促使我们将现实进行"分解"来寻找它们的结构,以揭示形成并维持特定现实的过程。在诠释实践的分析中,对"方式"问题的关注提醒我们记住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不管它们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守法还是违法、是男还是女、是老还是少——都是我们所创造的。在此之后,我们由此及彼,不断地构建和再构建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从政治意义上说,这表明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决定各种可能和方向,尽管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显而易见的组织可能阻碍其发生,但如果我们揭示出社会改革的结构性流动和延伸,我们也就揭示了这种变革的潜力(Gubrium & Holstein,1990,1995;Holstein & Gubrium,1994,2000b,2004,2008)。

当研究或日常生活中凸显或固化了话语或话语实践,建构主义分析中的批判意识使我们有必要对二者都一直持异议,从而使得方法论在寻求其目标的过程中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析的交叉就是具有其独特形式的批判意识。从政治框架来看,实践话语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分析的交叉转变为批判性的交叉,从而不仅为记录诠释实践,还为批判的评论其自身结构提供了基础。

注 释

1.然而,一些自称为民族志方法学家的人并不认为民族志方法学终究是"建构论者"或"建构主义者"的事业(Lynch, 1993, 2008)。一些人回顾了民族志方法学的规则,也清晰地表明建构主义是民族志方法学项目的诅咒(Maynard, 1998; Maynard & Clayman, 1991)。

2.尽管清晰地反映了加芬克尔的先驱贡献,但是对民族志方法学项目的这种描述可能更接近波尔纳(Pollner, 1987, 1991)和韦德(Wieder, 1988)的研究所传达的版本,而不是民族志方法学一些较新的"后分析"或会话分析的形式。

诚然,加芬克尔(Garfinkel,1988, 2002)和林奇(Lynch,1993)等人可能反对我们描述民族志方法学的方式。然而,我们主张,在对民族志方法学"经典"的"误读"研究中,以及加芬克尔自己更广泛的拥护社会学经典的实践中(Lynch,1993),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随着比喻中的"作家之死",对规则的教条式阅读应该不再有讨论的余地。

3.其他民族志方法学者借鉴了福柯的理论,但是并没有必然认可这些密切或相似之处。比如林奇(Lynch,1993),他认为可以用"局限和字面"的方式使福柯的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学调查相关,他反对通过高度偶然的"语言游戏"对话语体制进行概括。关于对福柯观点的民族志方法学借鉴的例证,请参阅:McHoul(1986),Lynch & Bogen(1996)。

4.还有其他一些有用的隐喻用来描述分析交叉的关注点如何从实践话语转变为话语实践。我们可以把这种操作比作在驾驶配备手动变速箱的机动车时的换挡。一种分析模式可能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它最终要对抗其自身暂时的分析目标所产生的阻力。当研究者注意到分析引擎苦于或陷于它当下不适合完成的限制时,她可以决定在事实上改变分析挡位,以便更深入地进行之前相等的交互诠释。正如开车时可以不用指示换挡那样(例如,一个人可以从不提前指明在什么速度应该加挡或减挡),改变交叉分析通常是一项有技巧的工作,等待着它遇到的经验主义环境。它的时间安排不能被预先设定。像开车时换挡那样,变化并不是随意或杂乱的。他们更是用有原则的方式,如果不是预定方式的话,来回应即将到来的分析挑战。

5.这可能正是林奇(Lynch,1993)对于会话分析家的责难,他们试图使会话分析形式化和专业化,成为一个"科学的"学科。

6.一些批评家(参阅 Denzin, 1998)担忧交叉分析代表一种选择性客观主义,一种"本体论的改划选区"。当然,这些都已经成为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争斗言论。但是我们应该冷静地回想伍尔加和包拉奇(Woolgar & Pawluch,1985)曾经的建议,开拓某种分析基础可能是任何社会学评论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的特征。我们对实践中话语和话语实践之间互动的持续关注,不断提醒我们二者之间的反身关系。改划选区者站在各自的立场并进行非反身的解构,相反,交叉分析鼓励对经验基础本身进行持续和系统的解构。这样可能产生一个不太整齐的画面,但是它仍旨在限制物化和控制无稽的意义。

7."叙事民族志"这一术语对于叙事的民族志取向来说是一个恰当的名称,也与另一种质性调查方法有关。一些研究者将这个术语应用于对民族志表征实践的批判分析中。他们的目的是反对民族志描述的具体化实践。这种形式的叙事民族志的实践者利用这个术语来强调研究者的叙述实践,因为这些研究者精巧地进行民族志记录。民族志学者具有主观性,那些处于所考察的世界和生活中的人也具有主观性,他们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特写。他们的民族志文本大多来自参与式观察,但是又独具特色,因为他们特别注意研究者自身的参与、视角、声音,尤其是他或她的情感经历,这些与所考察的经验领域都相关。古达尔(Goodall,2000)在《书写新的人类学》(*Writing the New Ethnography*)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场域遭遇的反身的和表征的交战,埃里斯(Ellis,2004)对叙事的自发民族志取向进行了表述。

8.在迈考依(McCoy,2008)看来,制度民族志学者通常反对被纳入建构主义的大旗之下。她提出,通过不与建构主义结合,制度民族志已经自由参与建构主义的会话,但是它有自己的方式。对于打算将人们的生活现状,而非理论制高点作为起点的制度民族志项目来说,这种独立的定位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Abu-Lughod, L. (1991).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In R.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pp. 137-162). Santa Fe, NM: SAR Press.

Abu-Lughod, L. (1993).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douin 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tkinson, J. M., & Drew, P. (1979). *Order in court.*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Atkinson, P. (1988). Ethnomethodology: A critical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441-465.

Atkinson, P. (1995). *Medical talk and medical work.* London: Sage.

Atkinson, P. (1997). Narrative turn or blind alle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7*, 325-344.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 Wang.

Bauman, R. (1986).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har, R. (1993). *Translated woman: Crossing the border with Esperanza's story.* Boston: Beacon.

Behar, R. (1996).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Doubleday.

Best, J. (2008).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defining issues of constructionist inquiry. In J. Holstein & J.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41-64). New York: Guilford.

Best, S., & Kellner, D. (1991).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den, D., & Zimmerman, D. (Eds.). (1991).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Bogen, D., & Lynch, M. (1993). Do we nee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problems? In J. Holstein & G. Miller (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 (pp. 213-237).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Briggs, C. L., & Bauman, R. (1992). Genre, intertextuality, and social power.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 131-172.

Brown, D. (2006). Working the system: Rethinking the role of mothers and the reduction of "risk" in child protection work. *Social Problems*, 53, 352-370.

Buckholdt, D. R., & Gubrium, J. F. (1979). *Caretakers: Treating emotionally disturbed children.* Beverly Hills, CA: Sage.

Campbell, M., & Jackson, N. (1992). Learning to nurse: Plans, accounts, and action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 475-496.

Chase, S. E. (1995). *Ambiguous empowerment: The work narratives of women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De Montigny, G. A. J. (1995). *Social working: An ethnography of frontline practi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Denzin, N. K. (1998). The new 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7*, 405-415.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Vault, M. L.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Vault, M. L., & McCoy, L. (2002).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Using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ruling relations.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pp. 751-776).

Thousand Oaks, CA: Sage.

Diamond, T. (1992). *Making gray gold: Narratives of nursing home c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ngwall, R., Eekelaar, J., & Murray, T. (1983).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family life.* Oxford, UK: Blackwell.

Drew, P., & Heritage, J. (Eds.). (1992). *Talk at work.*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 D. (1999). Shared knowledge as a performative and rhetorical category. In J. Verschueren (Ed.), *Pragmatics in 1998: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6th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Vol. 2, pp. 130-141). Antwerp, Belgium: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Edwards, D. (2005). Discursive psychology. In K. L. Fitch & R. E. Sanders (Eds.),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pp. 257-273).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Edwards, D., & Potter, J. (1992). *Discursive psychology.* London: Sage. Ellis, C. (1991).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 23-50.

Ellis, C. (2004).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Bochner A. P. (Eds.). (1996). *Composing ethnography: Alternative forms of qualitative writing.*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Ellis, C., & Flaherty, M. (Eds.). (1992).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Emerson, R. M. (1969). *Judging delinquents.* Chicago: Aldine de Gruyter.

Emerson, R. M., & Messinger, S. (1977). The micro-politics of trouble. *Social Problems*, *25*, 121-134.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Foucault, M. (1965).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lt, M. (1975).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Foucault, M. (1988).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J. Bernauer & G. Rasmussen (Eds.), *The final Foucault* (pp. 1-20). Cambridge: MIT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Garfinkel, H. (1988). Evidence for locally produced, naturally accountable phenomena of order, logic, reason, meaning, method, etc. in and as of the essential quiddity of 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 Vol. 1. An announcement of studies. *Sociological Theory*, *6*, 103-109.

Garfinkel, H. (2002). *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Working out Durkheim's aphor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Garfinkel, H. (2006). *Seeing sociologically: The routine grounds of social action.* Boulder, CO: Paradigm Publishers.

Garfinkel, H., Lynch, M., & Livingston, E. (1981). 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1*, 131-158.

Garfinkel, H., & Sacks, H. (1970). On the formal structures of practical actions. In J. C. McKinney & E. A. Tiryakian (Eds.), *Theoretical sociology* (pp. 338-366).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Gilbert, G. N., & Mulkay, M. (1984). *Opening Pandora's box: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cientists' discours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assie, H. H. (1995). *Passing the time in Ballymenon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n Ulster commu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lassie, H. H. (2006). *The stars of Ballymenon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oodall, H. L., Jr. (2000). *Writing the new 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Grahame, K. M. (1998). Asian women, job

training,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immigrant labor marke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53*, 75-90.

Griffith, A. I., & Smith, D. E. (2004). *Mothering for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Gubrium, J. F. (1992). *Out of control: Family therapy and domestic disorder.* Newbury Park, CA: Sage.

Gubrium, J. F. (1993a). For a cautious naturalism. In J. Holstein & G. Miller (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pp. 89-101).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Gubrium, J. F. (1993b). *Speaking of life: Horizons of meaning for nursing home residents.*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0). *What is family?*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5). Life course malleability: Biographical work and deprivatiz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53*, 207-223.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Eds.). (2001). *Institutional selves: Troubled identities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2008). Narrative ethnography. In S. Hesse-Biber & P. Leavy (Eds.),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pp. 241-264). New York: Guilford.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2009). *Analyzing narrative real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rium, J. F., & Holstein, J.A. (2011). "Don't argue with the member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2*.

Hacking, I.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pburn, A. (1997). Teachers and secondary school bullying: A post- modern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8*, 27-48.

Hepburn, A.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Sage.

Heritage, J.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Heritage, J. (1997).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talk: Analyzing data.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161-182). London: Sage.

Hewitt, J. P. (1997). *Self and society.* Boston: Allyn & Bacon.

Holstein, J. A. (1993). *Court-ordered insanity: Interpretive practice and involuntary commitment.*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4). Phenomenology, ethno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ive practi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62-272). Newbury Park, CA: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0a). *Constructing the life course* (2nd ed.). Dix Hills, NY: General Hall.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0b).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3). A constructionist analytics for social problems. In *Challenges and choices: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pp. 187-208).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2004). Context: Working it up, down, and acros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297-343). London: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Eds.). (2008).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Hughes, E. C. (1984). Going concerns: The stud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In D. Riesman & H. Becker (Eds.), *The sociological eye* (pp. 52-6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Husserl, E. (1970). *Log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Hymes, D. (1964).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6*, 6-56.

Jasper, J. M., & Goodwin, J. (2005). From the editors. *Contexts*, *4*(3), 3. Kendall, G., & Wickham, G. (1999).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 Sage.

Livingston, E. (1986). *The ethno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uken, P. C., & Vaughan, S. (2006). Standardizing childrearing through housing. *Social Problems*, *53*, 299-331.

Lynch, M. (1985). *Art and artifact in laboratory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ynch, M. (1993).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ordinary a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ynch, M. (2008). Ethnomethodology as a provocation to constructionism.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715-733). New York: Guilford.

Lynch, M., & Bogen, D. (1994). Harvey Sacks' primitive natural scien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1*, 65-104.

Lynch, M., & Bogen, D. (1996). *The spectacle of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ynch, M., Cole, S., McNally, R., & Jenkins, K. (2008). *Truth machine: The contentious history of DNA fingerpr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nicom, A. (1995). What's class got to do with it? Class, gender, and teachers' work. In M. Campbell & A. Manicom (Ed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ruling relations: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pp. 135-14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rtin, A., & Lynch, M. (2009). Counting things and people: The practices and politics of counting. *Social Problems*, *56*, 243-266.

Marvasti, A. (2003). *Being homeless: Textual and narrative construc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Marx, K. (1956).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 Bottomore, Ed.). New York: McGraw-Hill.

Maynard, D. W. (1984). *Inside plea bargaining.* New York: Plenum.

Maynard, D. W. (1989). On the ethnography and analysis of discourse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J. Holstein & G. Miller (Eds.), *Perspectives on social problems* (Vol. 1, pp. 127-146). Greenwich, CT: JAI.

Maynard, D. W. (1998). On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extramodern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 343-345.

Maynard, D. W. (2003). *Bad news, good news: Conversational order in everyday talk and clinical set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ynard, D. W., & Clayman, S. E. (1991). The diversity of ethnomethod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385-418.

McCoy, L. (2008).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d constructionism.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701-714). New York: Guilford.

McHoul, A. (1986). The getting of sexuality: Foucault, Garfinkel, and the analysis of sexual discours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3*, 65-79.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han, H. (1979). *Learning lessons: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classroo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ehan, H. (1991). The school's workof sorting students. In D. Zimmerman & D. Boden (Eds.), *Talk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71-90). Cambridge, UK: Polity.

Mehan, H., & Wood, H.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Wiley.

Miller, G. (1991). *Enforcing the work ethic.* Albany: SUNY Press. Miller, G. (1994).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3*, 280-306.

Miller, G. (1997a). *Becoming miracle workers: Language and meaning in brief therapy.*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Miller, G. (1997b). Building bridges: The possibility of analytic dialogue between ethnography,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Foucault.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24-44). London: Sage.

Mykhalovskiy, E., & McCoy, L. (2002). Troubling ruling discourses of health: Us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in community-based research. *Critical Public Health*, *12*, 17-37.

Narayan, K. (1989). *Storytellers, saints, and scoundrels: Folk narrative in Hindu religious teaching*.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Narayan, K., & George, K. N. (2002). Personal and folk narrative as culture representation.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815-8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Nikander, P. (2002). *Age in action: Membership work and stages of life categories in talk*. Helsinki, Finland: Academia Scientarum Fennica.

Nikander, P. (2008). Constructionism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413-428). New York: Guilford.

Norrick, N. R. (2000). *Conversational narrative: Storytelling in everyday talk*.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Ochs, E., & Capps, L. (2001). *Living narrative: Creating lives in everyday storytell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lner, M. (1987). *Mundane reas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ner, M. (1991). Left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radical reflexiv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70-380.

Pollner, M. (2011a). The end(s) of ethnomethod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2.

Pollner, M. (2011b). Ethnomethodology from/as/to business.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2.

Pollner, M. (2011c). Reflections on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2.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London: Sage.

Potter, J. (1997).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way of analyzing naturally- occurring talk.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44-160). London: Sage.

Potter, J. (2003). Discursive psychology: Between method and paradigm. *Discourse & Society*, *14*, 783-794.

Potter, J., & Hepburn, A. (2008). Discursive constructionism.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275-294). New York: Guilford.

Potter, J., & te Molder, H. (2005). Talking cognition: Mapping and making the terrain. In H. te Molder & J. Potter (Eds.), *Conversation and cognition* (pp. 1-54).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tter, J., &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Sage.

Prior, L. (1997). Following in Foucault's footsteps: Text and contex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 Silverman (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practice* (pp. 63-79). London: Sage.

Rankin, J. M., & Campbell, M. L. (2006.) *Managing to nurse: Inside Canada's health care refor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ichardson, L. (1990a).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9*, 116-136.

Richardson, L. (1990b). *Writing strategies: Rea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cks, H. (1972). An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usability of conversational data for doing sociology. In D. Sudnow (Ed.), *Stud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p. 31-74). New York: Free Press.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Vols. 1 and 2). Oxford, UK: Blackwell.

Sacks, H., Schegloff, E., & Jefferson, G. (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50*, 696-735.

Schutz, A. (1962).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Schutz, A. (1964). *Studies in social theory*.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Schu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utz, A. (1970). *On 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lverman, D. (1985).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and sociology.* Aldershot, UK: Grower.

Silverman, D. (1993).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data.*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Ed.). (1997).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8). *Harvey Sack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D. E. (1990a).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1990b).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London: Routledge. Smith, D. E. (1999).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 E. (2005).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Lanham, MD: AltaMira.

Smith, D. E. (Ed.). (2006).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s practice.* Lanham, MD: AltaMira.

Smith, G. W. (1988). Policing the gay community: An inquiry into textually mediated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the Law*, *16*, 163-183.

Speer, S. A., & Stokoe, E. (Eds.). (in press). *Conversation and gend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dlock, B.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 69-94.

Tedlock, B. (1992). *The beautiful and the dangerous: Encounters with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Viking.

Tedlock, B. (2004). Narrative ethnography as social science discourse.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27*, 23-31.

ten Have, P. (1990).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Bulletin de Methodolgie Sociologique*, *27*, 23-51.

Thomas, W. I. (1931). *The unadjusted girl.* Boston: Little, Brown.

Van Djik, T. A. (1993).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d Society*, *4*, 249-283.

Walby, K. (2005). How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surveillance organizes the social: An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189-214.

Weigert, A. J. (1981). *Sociology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Longman.

Weigt, J. (2006). Compromises to carework: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others' experiences in the low-wage labor market after welfare reform. *Social Problems*, *53*, 332-351.

Weinberg, D. (2005). *Of others inside: Insanity, addiction, and belonging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einberg, D. (2008).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13-39). New York: Guilford.

Wetherell, M. (1998).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ive repertoires: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post-structuralism in dialogue. *Discourse and Society*, *9*, 387-412.

Wetherell, M., & Potter, J. (1992) *Mapping the language of racism: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exploi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eder, D. L. (1988). *Language and social realit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Wittgenstein, L.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Wodak, R.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London: Sage.

Wodak, R., & Meyer, M.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Wooffitt, R. (1992). *Telling tales of the unexpected: The organization of factual discourse.* London: Harvester/Wheatsheaf.

Wooffitt, R. (2005).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Woolgar, S., & Pawluch, D. (1985). Ontological gerrymandering. *Social Problems*, *32*, 214-227.

Young, A. (1995).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Zimmerman, D. H. (1988). On conversation: The conversation analytic perspective. In J. A.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2, pp. 406-432). Newbury Park, CA: Sage.

社会正义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I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 凯西·卡麦兹(Kathy Charmaz)[1]

韩倩 译　朱志勇 校

一直以来,对于希望在公共领域和各自学科做出贡献的研究者而言,质性研究一直都具有吸引力。虽然很多质性研究都会主张有趣的知识性问题,研究一个令人关注的族群,或者探索一个未经充分研究的现象,却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社会正义或那些会产生不公平的政策等问题。这些研究通常可以再深入一个或两个步骤,去解释和探索社会正义问题,继而在全新的框架中讨论研究现象。社会正义研究需要什么?质性研究者如何在该方向推进?他们需要什么工具?

我所说的社会正义研究,指的是对于不公平和平等、障碍和通道、贫穷和特权、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以及它们蕴含的遭遇等进行的研究。社会正义研究也包括对影响个人和集体生活的社会结构和进程持有批判的立场。在此,我对不同领域和层面中浮现的社会正义问题撒开一张大网,包括对微观、中层和宏观层面,区域和全球,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以前,许多社会正义研究者认为他们必须聚焦宏观的结构关系,但是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发生在微观情境和中层环境,以及宏观的世界进程中。社会科学家可以研究宏观如何影响微观,以及微观进程如何影响更大的社会存在。全球、国家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集体和个人的意义和行为之间相互形塑。然而,关于这些条件影响具体群体和个人的时间、方式和程度,还未达成共识。

本章以我在本手册第3版中的论述为基础:质性研究者可以将扎根理论的方法应用于推进社会正义研究。这些方法始于归纳逻辑,运用突显策略,依赖比较研究,并且具有明确的分析性。所有这些特征都为社会正义研究者提供工具,使他们的分析更加敏锐和具体,使研究更具有分析的力度和影响,同时也更能促进研究进程。扎根理论方法为社会正义研究者提供的工具,不仅形成了创新的分析,也重新检验了已生成的概念。为了挖掘扎根理论方法对于社会正义研究的巨大潜力,研究者需要理解该方法的逻辑、不同版本的发展、认识论根源以及使用方式。

社会正义领域的研究考察民族和个人之间在权力、声望、资源和遭遇中的差异。它关注并促进资源平等、公平和消灭压迫(Feagin,1999)[2]。社会正义研究中的一些报告以明确的价值立场和变革议程作为起点(例如以下扎根理论研究:

Karabanow,2008；Nack,2008；Sakamoto,Chin,Chapra,& Ricciar,2009；Ullman & Townsend,2008)[3]。另外一些研究报告通常表达了对社会正义理所当然的关照(例如 Dumit,2006；Foote-Ardah,2003；Frohmann,1991,1998；Gagné,1996；Hyde & Kammerer,2009；Jiménez,2008；Lio,Melzer,& Reese,2008；Lutgen-Sandvik,2008；Mevorach,2008；Moore,2005；Swahnberg,Thapar-Björkert,& Berterö,2007；Tuason,2008；Veale & Stavrou,2007)。还有一些作者表明,他们之所以选择一个蕴含社会正义的、有争议的主题,是因为它能够阐明理论问题(Einwohner & Spencer,2005；Ogle,Eckman & Leslie,2003；Spencer & Triche,1994)[4]。然而,研究者可以从对社会事件的兴趣,而不是从改变它的豪情万丈中开始进行研究(Wasserman & Clair,2010)。但是,在见证参与者的生活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引发对之前并不理解或预料之外的社会正义的关注。

许多研究者都持有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更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通过经验研究来推进理念。对于自我认同为社会正义研究者的人来说,"应然"是研究进程和成果的一部分。表明确切的价值观点和研究有争议的话题会使研究者的工作经受质疑。因此,一些研究者对价值承诺保持缄默,选择在概念术语而不是关注社会正义的框架中进行研究。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5],它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通过浮现的交替过程互相沟通启发和形塑。"扎根理论"这一术语指的是这种方法及其产出,是从对数据的连续概念分析中形成的理论。研究者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收集方法时,可以采用扎根理论策略。扎根理论研究通常被作为访谈研究,一些研究也使用文本(Clarke,1998；Einwohner & Spencer,2005；Mulcahy,1995；Star,1989)或民族志数据(例如,Casper,1998；Thornberg,2007；Wasserman & Clair,2010；Wolkomir,2001,2006)。然而,我们通常很难辨别研究者运用扎根理论策略的程度(Charmaz,2007,2010；Timmermans & Tavory,2007)。

扎根理论策略为社会正义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包。扎根理论实践包括特别适合社会正义研究的研究决策和行动。扎根理论着重于经验主义的审视和分析的精确度,这种精确度促使研究者对社会经济条件在具体情境的作用方式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不论他们是否将其工作归入明确的理论建构范畴(例如,Ball,Perkins,Hollingsworth,Whittington,& King,2009；Dixon,2007；Jackson-Jacobs,2004；Lazzari,Ford,& Haughey,1996；Sixsmith,1999；Speed & Luker,2006)。这些分析不仅有助于知识的生成,还能够启示社会正义研究者追求实践和政策的改变。

研究者可以学习如何运用扎根理论的准则,并把它们应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包括质询社会正义问题。迄今为止,社会正义探究很少用扎根理论研究进行理论建构。但是有很多研究都通过扎根理论加强了主题分析。本章的目的在于厘清这种方法及其演变,阐明研究者如何具体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并且展示该方法如何补充社会正义探究。

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对扎根理论进行了经典论述,建

构主义对其进行了修正并假设人们通过行动同时构建研究现象和研究过程。这种取向认为历史、社会和情境的条件是外在于行动的约束条件，同时也承认研究者在形成数据和分析中具有能动作用。这种建构主义表述在社会正义研究中非常有用，因为它（1）拒绝要求客观性，（2）定位了研究者的一般化，（3）考虑到研究者和参与者的相对位置和立场，（4）强调反身性，（5）引入权力、特权、公平和压迫等敏感概念，（6）对变化和不同保持警惕（Bryant & Charmaz，2007；Charmaz，2006，2009b；Clarke，2005；Clarke & Friese，2007）。

尽管如此，采用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所共有的策略会促进社会正义研究，因此，我论述的是扎根理论所有版本的运用。

我的论述依赖于对社会正义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研究进行选择性综述。不同学科和专业中的相关研究在数量和范围上迅速发展，因此不可能进行全面综述。我所选择的研究（1）体现了社会正义研究和扎根理论之间的联系，（2）揭示了关于扎根理论的讨论，（3）展示了这种方法的使用方式。像其他的质性研究项目那样，许多社会正义研究仅在编码中显示出对扎根理论策略的运用，而对于理论归类所需的主题话题的生成存在困惑。本章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研究者对采用扎根理论的逻辑和策略的时间、方式和程度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扎根理论策略并不必然要生成一种扎根理论，它可以帮助学者进行多样化的追求。重点是做出明确的决定并清楚其含义[7]。

扎根理论的逻辑

扎根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一种方法。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首先指出，扎根理论方法由灵活的分析准则构成，能够使研究者聚焦于数据收集并构建中层理论。这些准则强调田野情境中的研究过程，主张同时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采用比较的方法以及核查和阐释进行试验性的归类。扎根理论者用系统的归纳方法开始研究，但并不止于这种归纳，还要对研究发现和试验性归类进行严格检验。

扎根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交替的、比较的、互动的和假设推论的方法（Bryant & Charmaz，2007；Charmaz，2006，2007，2008e；Charmaz & Henwood，2008）。扎根理论方法引导研究者游走于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因为二者彼此沟通和相互促进。通过在交替过程的每一步提出分析问题，研究者建立起分析的抽象层次并强化其力量。在分析及写作的过程中运用比较法，使研究者形成更敏锐的分析。此外，交替过程中的比较法对资料和已形成的分析提出分析性的问题，使扎根理论者与资料之间保持互动。因此，扎根理论的长处不仅体现在它的比较方法论，更存在于它的互动本质（Charmaz，2006，2007，2008a，2008e，2009b）。

这种方法鼓励研究者成为积极的参与式分析者。溯因推理使研究者一直参与其中。作为扎根理论者，在归纳式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偶遇意外发现时，我们要

进行溯因推理。于是我们为这一发现设想所有可能的理论解释,形成假设或者相关问题,随后用新资料检验这些解释(Peirce,1958; Reichert,2007; Rosenthal,2004)。溯因推理促进了理论建构。

这种方法的运用包含哪些方面?扎根理论促使我们通过贯穿于分析层次的对比来研究资料并与之互动。首先,我们把不同的资料进行对比,生成编码;然后,把资料与编码进行对比;之后,对比不同的编码并为试验性归类提出重要编码;接着,将资料和编码与这些类别进行对比;随后,将主要的类别作为概念;最后,我们将不同的概念进行对比,其中可能包括将我们生成的概念与学科概念做对比。我们在研究的现阶段进行的分析对比,形塑了下个阶段要做的事,这是不能被预先确定的。这种方法提醒我们与参与者、资料、编码和试验性归类进行互动。我们的早期分析在这些互动中浮现并成形(Charmaz,2006,2007,2008b,2008c,2008e)。这种对比的、互动的研究过程引导我们游走于互相沟通的资料收集和分析(Charmaz & Henwood,2008)。扎根理论着重于理论建构,影响了我们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为经验世界带来的问题(Charmaz,2009a,2009b)。

这种对比使我们的分析更加敏锐,交替资料收集使我们可以检验想法并检查形成的理论概念。扎根理论包括对资料和初步分析进行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和精确的检验(Charmaz,2006; Kearney,2007; Locke,2007)。系统的审查不仅增加了分析的精度,也使我们贴近资料,从而增强我们对资料的解释。这种方法能够帮助社会正义研究者展现工作和表达心声。

简而言之,扎根理论的逻辑包括通过编码对经验资料进行分割,用产生的编码建构抽象类别,这些类别适用于资料并对其进行概念分析(Charmaz,2006; Glaser,1978,1998)。扎根理论者从经验细节入手,走向对生成类别及其关系的一般论述。这种方法允许社会正义研究者对具体的经验世界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为这些类别在其他情境中的应用方式建立理论(Dixon,2007; Lutgen-Sandvik,2008; Rivera,2008; Shelley,2001; Wolkomir,2001)。

社会正义探究中的扎根理论策略

扎根理论的分析能力为质性研究者从事社会正义研究提供明显优势。扎根理论的五个强项使其成为社会正义研究者非常有用的工具包。

第一,该方法包含分析和定位过程的工具。因此,扎根理论的逻辑导向了(1)定义相关进程,(2)展示其环境,(3)指明这些进程发生的条件,(4)概念化其阶段,(5)解释使其稳定和/或变化的因素,以及(6)概括其影响。采用这种逻辑可以帮助社会正义研究者关注不公平的建构,以及人们如何对待这些不公平。因此,扎根理论逻辑引导研究者对经验世界中发生的事进行详细解释,并且为描述发生的方式和原因提供分析。

第二,扎根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解释其参与者暗含的意义和行动(例如,

McPhail & DiNitto,2005)。社会正义研究者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表象。田野情境中最值得注意的意义和行动通常是隐晦的。连续的、一丝不苟的扎根理论分析能够帮助研究者定义含蓄的意义和行动,并将其尝试作出的但看似合理的解释生成理论。其后,扎根理论核实直觉和猜想,这一准则鼓励研究者使其设想经历严密的审查,以形成更多稳健性分析。

第三,扎根理论的目的在于从资料中建构中层理论。因此,扎根理论能够帮助社会正义研究者增加其分析的概念化抽象层次。然后,社会正义研究者能够识别形成归类的条件,指明这些归类之间的关系,并且定义其结果。因而他们能够使分析复杂化,向研究现象的传统解释提出挑战。

第四,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版本关注情境、位置、话语以及意义和行为,因此能够促进研究者理解权力、压迫和不公平如何对个人、团体和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后但最重要的是,扎根理论方法为揭示具体遭遇和社会结构、文化、社会实践或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工具(Charmaz, 2007; Choi & Holroyd, 2007; Einwohner & Spencer,2005; Rier,2007; Sandstrom,1990,1998)。

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者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明确地为社会正义研究做出贡献或者使社会正义问题成为中心焦点(但是 Mitchell & McCusker, 2008; Sakamoto et al.,2009; Tuason,2008 是例外)。然而,大量扎根理论研究对正义含蓄的关注构成一个无言的框架。许多研究假设了社会正义目标的重要性(例如,Carter,2003; Ciambrone,2007; Hyde & Kammerer,2009; Jones,2003; Karabanow, 2008; Mcintyre, 2002; Roxas, 2008; Scott, 2005; Scott, London, & Gross, 2007; Wasserman & Clair, 2010),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其分析内容推进了这些目标(Frohmann,1998; Quint,1965; Sakamoto et al.,2009; Sixsmith,1999; Swahnberg et al.,2007; Ullman & Townsend, 2008; Valdez & Flores, 2005; Veale & Stavrou, 2007)。与扎根理论的逻辑一致,社会正义事件可以随着资料分析浮现出来,也可以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或者开始明确追求社会正义的立场中浮现出来。

追求社会正义目标的研究者丰富了对扎根理论方法发展的贡献。他们对语境、限制、权力和不公平的专注,促使在一般的质性研究,尤其是扎根理论研究中关注结构的、当下的和情境的语境。社会正义研究者能注意到结构和权力无声的作用。他们能够提醒扎根理论者关注历史和社会条件如何形塑现状。

社会正义研究的批判立场及其结构的焦点能够帮助扎根理论者在更大的结构中定位集群主体的经历,以及增加对结构作用方式的理解(Charmaz,2005; Clarke,2003,2005; Maines,2001; Rivera,2008)。许多扎根理论研究的焦点狭隘且规模较小,不利于研究者发现其资料的不同,也不利于理解结构和历史进程如何影响资料和分析。过去 50 年来,扎根理论者像大部分质性研究者那样,经常专注于明显的过程和公开的声明。社会正义的立场将批判探究引入隐蔽的过程和隐形的结构,从而使我们能够发现梦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目标与结果之间的矛盾。这种立场深化了对隐性、阈限和边缘的理解,这是其他立场可能看不到或忽视的,比如对于冲突的潜在来源。社会正义研究的批判优势能够帮助我们

重新检验资料并建立新的理论关联(Charmaz,2005)。

最近的扎根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探究社会正义问题。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强调权力、机构、结构限制和资源,并分析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贫困、压迫、灾难和被剥夺权利的人们的具体问题(Choi & Holroyd,2007; Ciambrone,2007; Hyde & Kammerer,2009; Mevorach,2008; Ryder,2007; Scott et al.,2007; Sixsmith,1999; Tuason,2008; Ullman & Townsend,2008; Veale & Stavrou,2007; Wilson & Luker,2006; Wolkomir,2001),以及质问社会正义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具体问题(Gunter,2005; McDermott,2007; Mitchell & McCusker,2008)。迄今为止,后者频繁出现在有关压迫问题或者遭遇不公平多重累积影响的小群体的研究中(例如,Dixon,2007; Jiménez,2008; Valadez,2008; Wasserman & Clair,2010; Wolkomir,2001,2006; Zieghan & Hinchman,1999)。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研究者主要将扎根理论方法应用于对个体行为的小型研究中,也有研究者使用其他质性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这并不妨碍将扎根理论用于开展组织和结构的研究,组织学研究(O'Connor, Rice, Peters, & Veryzer, 2003; Scott, 2005; Vandenburgh,2001)和科学社会学研究(Casper,1998; Clarke,1998; Star,1989)已经表明这一点。扎根理论方法在参与式行动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中已经站稳脚跟(Dick,2007; Foster-Fishman, Nowell, Deacon, Nievar, & McCann,2005; Kemmis & McTaggart,2005; MacIntyre,2002; Poonamallee,2009; Sakamoto et al.,2009; Teram, Schachter, & Stalker,2005),这种方法对于重新构想生活从而推进解放变革具有强大的潜力。

重建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具体的、一般的和广义的方法

扎根理论引用具体策略,为质性探究提供一般准则,同时具有广义的、重建的和质疑的策略。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1994)在15年前注意到扎根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质性方法。扎根理论方法论策略同时开展资料收集和分析、归纳编码和备忘录写作,这些策略已经渗透到质性研究中。然而,自称使用扎根理论的研究者可能正在进行的是更一般形式的质性研究。一些研究者自称使用扎根理论,是企图使归纳性质性研究取得合法地位;另外的起因是关于该方法的一些幼稚读物。早期扎根理论文本中抽象的准则和密集的写作使读者对其产生误解和困惑(Piantanida, Tananis, & Grubs,2004)。

由于扎根理论已经成为一般的方法,研究者可能只采用一两个扎根理论策略(Foster-Fishman et al.,2005; Mitakidou, Tressou, & Karagianni,2008)。其他研究者可能采用多种策略却对其产生误解。与奥勒森(Olesen,2007)对其研究的论述一致,一些研究者可能理解扎根理论策略,但是他们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导致扎根理论策略和其他质性方法的结合。研究者经常把扎根理论策略，尤其是编码，与叙事和主题分析结合起来（例如，Cohn，Dyson，& Wessley，2008；Hansen，Walters，& Baker，2007；Harry，Sturges，& Klingner，2005；Mathieson & Stam，1995；Moreno，2008；Salander，2002；Sakamoto et al.，2009；Somerville，Featherstone，Hemingway，Timmis，& Feder，2008；Tuason，2008；Williamson，2006；Wilson & Luker，2006）。

对扎根理论的误解使研究者意识不到其分析力量。简言之，关于扎根理论的误解主要存在于三方面：编码、理论抽样[6]和理论建构。笔者在此概述这些误解，并且描述扎根理论的编码原则，而在别处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Charmaz，2006，2007，2008b，2008c）。厄库哈特（Urquhart，2003）质疑扎根理论是否在本质上是一种编码技巧。编码是重要的，但是扎根理论不仅仅是编码技巧。然而，许多研究者仅将其用于编码，而且似乎依赖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软件 CAQDAS（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进行编码（Bong，2007，用 CAQDAS 进行编码为扎根理论带来了问题）。

扎根理论的编码策略包括分类、合成和汇总资料，但是此外，还要超越资料管理的这些形式。毋宁说，扎根理论编码的基本特征涉及资料的剖析以及界定其构成方式。通过询问小片段的资料中发生了什么，以及质询每个片段指向怎样的理论归类，扎根理论者能够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资料和生成通向创新分析的编码。通过同时提出关于权力及其与更大的社会单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社会正义研究者可以展示资料是如何以与众不同方式构成的。

早期的扎根理论著作（Glaser，1978；Glaser & Strauss，1967）缺乏对理论抽样的含义和方式的清晰描述。这种缺失和研究者对“抽样”一词的偏见经常会产生误解。理论抽样发生于原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之后。它指的是对资料进行抽样，以充实浮现的概念类别的内容（Charmaz，2006；Glaser，1978，1998；Morse，2007）。该策略也能帮助研究者发现归类的变量以及类别之间的差异。因此，扎根理论者是在形成资料的试验性归类之后，而不是在开始收集资料之前进行理论抽样。

理论抽样的目的是理论建构。呼德（Hood，2007）辩称，教科书作者经常将理论抽样混淆成目的抽样，目的抽样是在最初计划收集资料时对具有关键特征的代表设置标准。奈普斯泰德（Nepstad，2007）对方法论的陈述假设了一个通常的误解：“然后我联系了这些团结组织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的参与，我构建了一个有目的的理论抽样（Glaser & Strauss，1967），确保从地理区域、年龄分布、性别、参与度等多方面表现这场运动。”

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许多扎根理论者要求建构理论，但是他们疏于解释对理论包含内容的假设。如我（Charmaz，2006，p.133）之前所讨论的那样，他们关于理论构成因素的假设暗示了一系列的意义，包括（1）描述，（2）经验概括化，（3）变量间的关系，（4）对概念之间关系的抽象理解。如果我们将理论定义为解释概念间的关系，或者提供对其抽象的理解，那么大部分声称产生理论的研究都名不副实。这些作者断言自己建构了理论，但是他们的分析证实他们只是努力

综合资料和压缩主题。尽管一些人迈向了理论建构,但是大部分扎根理论者与他们所声称的相反,他们并没有生成理论。许多作者以扎根理论为幌子进行经验的描述。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潜力有待充分开发和利用。

扎根理论的具体方法

我们可以洞悉公认的扎根理论者之间趋同的方法,来强化扎根理论的具体方法。其他的质性研究者对主题和结构,而非行动和过程进行研究。扎根理论者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论策略?这与我们对资料的收集和处理方式有关系。对行动的研究使扎根理论区别于其他种类的质性探究(Charmaz,2010)。各种版本的扎根理论者代表都进行以下行动:

1.在交替过程中收集和分析资料
2.对行动和过程,而非主题和结构进行分析
3.运用比较的方法
4.利用资料(比如叙述和描述)生成新的概念类别
5.通过系统的资料分析生成归纳式类别
6.强调理论的建构,而不是对当下理论的描述或应用
7.进行理论抽样
8.寻找正在研究的类别或过程的变体
9.追寻生成类别,而不是覆盖具体的经验主题(Charmaz,2010)

展开前五项行动的研究者使其研究具有独特的分析性,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的质性研究,尤其是保持描述性的研究。扎根理论者的研究超越个人和实践,展现一个集体的分析故事。详述概念归类比参与者的解释和概括资料更重要。扎根理论者通过呈现资料的节选和摘要,以展示资料和类别之间的关联,以及证明类别的稳健性。很少有研究者进行其余的行动,但是他们使其分析走向了理论建构(Charmaz,2010)。

尽管关于这九项研究行动已达成共识,但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扎根理论研究尚无定论(Charmaz,2008e,2010; Timmermans & Tavory,2007)。已出版的著作中对方法的论述很少提及分析策略,更不用说对其进行详细描述[7]。一些研究(Qin and Lykes,2006;Roschelle & Kaufman,2004;Wolkomir,2001)阐释了不同的扎根理论逻辑,因为他们将进程的问题概念化,从资料的归纳对比编码中构建分析归类,定义类别的属性,详细说明类别间的关系,并且概括过程的影响。

如果读者在分析中不能辨别不同的扎根理论逻辑,那么就难以确定作者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主张是误解或是为了使归纳式质性研究合法化。尽管如此,一些作者的分析可能并没有表明扎根理论取向,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描述显示出对该方法深入的理解。范登堡(Vandenburgh,2001)在组织偏差的研究中做出以下论述:

> 我遵循特纳(Turner,1981)在对斯特劳斯进行解读时所建议的阶段,首

> 先利用现有资料进行归类，提出紧密适合这些资料的名义分类。然后，我竭尽所能寻找访谈资料中适合各个类别的所有例子，并对其进行累积，使这些归类得到充实。接着，我对某种现象更深层的例子纳入归类的标准进行说明，从而对每个类别进行抽象定义。我以出现的一些问题为基础进行后续追踪，继续使用这个归类。下一步，我对归类进行检查，了解它们是否需要更多的类别、更一般或具体的例子，或者相反的归类，这样就进一步利用这个归类。接下来，通过考察类别间的模式关系，以及假设其联系，我注意到并且建立类别间的关联。最后，通过从理论上阐明这些关系及其环境条件，我考量了建立这些联系的条件。这样我就适应了已有理论。(2001，p.62)

像范登堡那样，其他扎根理论者可能在对方法论进行讨论而不是分析中显示出对该方法的运用。凯斯珀(Casper，1997，2007) 和罗伯特·索恩伯格(Robert Thornberg)都通过显著的探讨阐明各自的研究。

扎根理论的内部争议

扎根理论是一种在内部和外部都充满争议的方法(参阅 Boychuk，Duchscher，& Morgan，2004；Charmaz，2006，2009a；Kelle，2005)。如今，这种饱受争议的状态使扎根理论研究的界定更加错综复杂。从 1967 年最初出现开始，扎根理论方法经历了其主要支持者的厘清和改变。扎根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演变的、一般的质性方法，它主要有三个版本：建构主义、客观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教导研究者如何使用扎根理论的主要文本代表了扎根理论的每个版本(Bryant & Charmaz，2007；Charmaz，2006；Corbin & Strauss，2008；Glaser，1978，1998；Strauss & Corbin，1990，1998)。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采用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对方法论策略的经典论述，但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结合了相对性和反身性。就这一点而论，这种方法将扎根理论从其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根源中解放出来，使研究者的角色和行动浮现出来。虽然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使用的方法论策略是由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代言人格拉泽(Barney Glaser)发展的，但是它的基础是内在于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的符号互动论的社会建构主义(Charmaz，2006；2007，2008)。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认为知识处于时间、空间和场景中，它重视研究者对浮现概念的建构。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同样着重于对浮现概念的构建，但是在进行独立于时间、地点和具体人物的抽象概括时，它强调的是研究者保持中立的实证经验主义(Glaser，1978，1998，2001)。然而，不同于以往的许多实证主义者，格拉泽不太关注为资料收集或评估其质量设置准则。他主张“所有都是资料(all is data)”(2001，p.145)，却未指明研究者可以将什么定义为“所有”。对于格拉泽而言，对资料的关注反映出“令人担忧的精确度”(Glaser，2002，第 2 段)，这正是他所反对的传统质性研究的特征。斯坦(Stern，2007) 是格拉泽扎根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他发现少量的案例足够充实研究者最初形成的分析类别。格拉泽认为，在对比

过程中检验大量案例使资料具有客观性。他早前认为,研究的参与者会告诉研究者他们主要关注情境中发生的哪些事情,这个观点可能有助于在资料中发现理论,仿佛理论只是简单地住在资料中[8]。我在很久之前就提出,我们不能假设参与者公开的表述代表了最重要的资料(Charmaz,1990,1995,2000)。相反,他们的表述可能被想当然的当作是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或者提供了管理印象的战略言辞(Charmaz,1990,2000,2008f)。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在一些基本方面有别于其客观主义前辈,正如我在上文所述以及下文概括的那样。后实证主义扎根理论(Corbin & Strauss,2008; Strauss & Corbin,1990,1998)采取二者的中间立场。相对于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取向,它不太强调浮现,因为它为资料的应用提供预想的编码和分析框架。后实证主义扎根理论认为现实的存在是不固定的和逐步发展的,并且接受改变。斯特劳斯和科宾的早期著作使扎根理论成为一种应用而不是创新的方法(Charmaz,2007)。

然而,在科宾最近的反思中,她概括了自己的研究取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描述了数十年前规范方法的灌输如何形塑了前两版《质性研究基础》(*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的写作(Strauss & Corbin,1990,1998)。这些规定导致研究者(1)寻找内嵌于研究资料的理论;(2)保持客观;(3)拒绝"入乡随俗";(4)在资料中捕捉"现实"的外衣并将其作为"理论成果"呈现出来,但同时相信真理并非唯一的存在 (Corbin, 2009, pp. 36-37)。科宾的清单,加上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质性研究基础》中的技术程序,证实了我之前的论点,即他们的早期版本包含了客观主义路线。但是现在,科宾(Corbin,2009)认可反身性,采取促进社会正义的价值立场,相信多重事实,并且拒绝刻板的应用技术程序。这些变化标志了最新的第三版《质性研究基础》,并且使其更接近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的三个版本都承诺通过分析资料对质性资料概念化、构建理论分析以及采取关键的扎根理论策略。每个版本都强调运用明晰的策略进行系统的研究,都始于归纳逻辑,都着重构建理论,并且目的都在于为研究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和相关实践者构建有用的分析(Charmaz,2009b)。各个版本使用、创建或者抛弃哪些策略,都存在重要的不同,反映了各自更喜欢或厌恶的方法。在此也体现出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不同。

扎根理论版本的认识论差异

扎根理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分歧的种子。格拉泽的理论背景是哥伦比亚大学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9],斯特劳斯的理论背景是芝加哥大学实用主义[10],二者对于现实的性质、调查目的和研究的过程和实践都采用不同的哲学和方法论预设。斯特劳斯留下的学术遗产停留在实用主义及其在符号互动论中的发展(Charmaz,2008d)。本手册的第2版对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进行了明确对比,突出体现了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扎根理论的区别(Charmaz,2000; Bryant,2002; Bryant & Charmaz,2007,in press; Charmaz,2002,2006,2007,2008e,

2009b；Charmaz & Bryant，2011；Charmaz & Henwood，2008）。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假设中立的观察者在单一的外部世界中发现资料。按照这种观点，研究者可以使其价值观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事实”分离开，表明了凯勒（Kelle，2007）所指的“认识论的原教旨主义（epistemological fundamentalism）”（p.205）。在这种方法中，资料收集不会对研究者的隐性假设、特权地位或者开展研究的具体定位提出质疑。研究者站在研究现象之外。资料是“存在于那里”，而不是被建构的。如果研究者愿意，他们可以添加关于资料收集和自身角色的反身性。然而通常来讲，中立但被动的观察者收集资料只是为了像权威的专家和积极的分析者那样进行分析。在客观主义逻辑中，案例的数量纠正了研究者可能产生的偏见。这种方法优先考虑研究者的声音和分析，并且认为研究者对参与者的描述是直截了当的，并不是其本身就存在问题。这样存在的风险是研究者可能将其未被承认的预设带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目标是对解释经验世界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抽象概括。这些概括构成了解释研究现象的中层理论。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采用明显不同的相对主义方法，改变了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Charmaz，2009b），并且使它们和斯特劳斯的实证主义传统形成联盟（Charmaz，2008a，2008d，2009b；Reichert，2007；Strübing，2007）。在这里，事实是多元的，观察者是被观察的一部分。主观性很重要。价值观塑造了“什么是事实”。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者尽可能地进入研究现象并且尝试从其内部进行考察。研究者和参与者通过互动共同建构资料。资料反映出其本身和研究者在历史、社会和情境中的定位（Charmaz，2009a，2009b）。对资料的陈述本身是有问题的和局部的。这些关注使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者在调查中始终保持自反性，并把它作为研究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Mruck & Mey，2007；Neill，2006）。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目的是阐释性理解，而不是理论概括。对概括化的追求消除了差异性并遮掩了变化（Clarke，2003，2005，2006；Clarke & Friese，2007）。对于建构主义者而言，概括化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和情境的。此外，概括化并不是中立的。正如邓津（Denzin，2007）公开宣称的那样，诠释具有内在的政治性。

所有这些对比改变了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扎根理论实践的差别也同样如此，比如文献综述存在的争议。格拉泽（Glaser，1978，1998，2003）主张在开展独立的分析之后进行文献综述，这样可以避免将资料纳入预想的类别和理论。然而，几乎没有博士生和专业研究者在不了解其领域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研究（Charmaz，2006；Lempert，2007）。在论文设计、拨款申请，甚至现在一些向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提交的人体受试申请中，都必须包括深入的文献综述。亨伍德和皮吉昂（Henwood & Pidgeon，2003）的理论不可知论（theoretical agnosticism）比理论无涉（theoretical innocence）更有意义。他们认为，针对某个现象所有可能的理论解释，研究者需要在文献或者自己的分析中进行严格的审查。也许最重要的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者主张，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立场，包括调查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都影响了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社会正义混合方法研究中的扎根理论

研究者已经认同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有用的质性方法应用于混合方法研究。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声称在混合方法中利用扎根理论研究增加研究主题的知识,但是其中几乎没有明显聚焦于社会正义研究。在社会正义混合方法研究中,扎根理论的地位有待发展。因此,我在此对混合方法进行简短的论述,这些可能是社会正义的扎根理论研究者要仔细考虑的。

混合方法研究通常既使用量化方法又使用质性方法,以得到对研究问题更多和更细致的分析。但是,混合方法的定义及其对调查意味着什么,是多元且存在争议的。对于混合方法的专家而言(例如,Cameron,2009; Creswell,2003; Morgan,2007),混合方法的急速上升是一场预示着范式转变的运动,这类似于邓津和林肯在1994年宣告的质性革命。对于许多研究者而言,混合方法是产生研究发现的工具,而不涉及他们使用这些工具的原因、对研究发现的分析,以及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利用接下来的分析。对于少数研究者而言,混合方法只是意味着使用不止一种方法,不论这些方法是不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混合[11]。约翰逊等人(Johnson,Onwuegbuzie, & Turner,2007)认为混合方法是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结合,包括它们各自的视角、分析和推断形式。他们指出,混合方法意味着将方法的要素结合起来,以获取"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解和验证"(p.123)。

对混合方法的探讨涉及邓津(Denzin,1970)早前提倡的三角验证(Greene,2006; Morse,1991; Tashakkori & Teddlie,2003)。许多研究者主张方法论的多元化。另外一些研究者持有更怀疑的态度,并且认为量化数据和分析不仅主宰混合方法研究项目,而且通过将质性资料转变成数字使其"量化"(Sandelowski,Voils,& Knafl,2009)[12]。然而,克雷斯韦尔等(Creswell,Shope,Clark,& Green,2006;Creswell & Clark,2007)认为,质性方法延伸了混合方法实践,应该在混合方法研究项目中占据优先地位。研究者在实践中使用混合方法是出于多种目的,包括(1)构建工具,(2)验证结果,(3)减少研究者和文化的偏见,(4)改进临床试验,(5)关注研究参与者的经历,(6)展示信度,(7)提高普遍性,以及(8)为专业实践和/或公共政策提供参考。

在混合方法研究中出现了结果和分析的整合问题。量化和质性调查结果的整合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个主要的方法论目标?当质性和量化数据的结果互相矛盾时该怎么办?布里曼(Bryman,2007)发现混合方法研究者经常取消质性分析。他主张"关键问题是在混合方法项目中最终的结果是否超过了单个的量化和质性部分的总和"(p.8)。这可能在实践中不会出现,或者研究者并没有此类意图,这正如布里曼观察到的那样。

混合方法研究设计通常包括复杂的程序,因此需要团队合作。扎根理论混合方法项目在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稳步增多,受资助的团队研究在这些领域中很常见。社会正义研究,尤其是对其外在形式的研究,不大可能成为一个由一批具

有不同但互补技能的方法专家参与的受资助的团队项目。很少有研究者同样精通量化和质性方法。社会正义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一项不被资助的个人工作,或者一项参与式行动研究,研究者是本地社区的成员并且对社区负责。

克里斯特(Christ,2009)确切地观察到,混合方法研究的目标与变革研究的目标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主要是社会正义目标。他指出,研究者进行批判和变革研究,"是为了改善社区或减少压迫,而不是把从一个非代表性样本得到的结果推广到更大的群体"(p.293)。然而,默滕斯(Mertens,2007,2010)强烈赞同在变革范式中使用混合方法促进社会正义,佩吉特(Padgett,2009)认为"社会正义价值观不需要靠边站"(p.101)。他们的目的是明晰的,而不是隐藏在"公共社会学"这样乏味的专用术语之下。

由于社会正义研究者可能要面对多疑的受众,因此在综合分析中呈现多种形式的资料可以支撑其报告。混合方法新兴的哲学基础会支持他们的努力。目前正在讨论将混合方法定位于一种实用主义,扎根理论因此适用于社会正义研究(例如,Duemer & Zebidi,2009; Feilzer,2010; Morgan,2007)。

教育研究者最习惯于在混合方法研究中使用扎根理论达到社会正义目标。但是在其他研究中很明显的是,研究者可能假设而不是论述社会正义目标,他们使用有限或广泛的扎根理论。为了引用一个有趣的例子,萨因-霍德卢吉尔等人(Sahin-Hodoglugil et al.,2009)在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中利用混合方法研究子宫帽这种低成本的HIV预防措施的效果。这种方法对女性进行控制,因为她们能够在其男性同伴不知道的情况下使用它。作者援用了交替过程,量化数据和质性发现在该过程中互相沟通。萨因-霍德卢吉尔等人通过质性分析了解子宫帽的隐蔽使用,为量化数据提供分析框架,随后通过搜集量化数据探索质性部分的一些调查结果。这些研究者发现,隐蔽使用比他们预期的以及随着连续披露出现的更为复杂。

简言之,社会正义研究者能够对多种类型的可靠数据进行分析,使他们的报告不易被驳回。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检验存在于利用所有可使用的方法进行可靠的工作,从而解答研究问题,实现研究目标并使相关受众确信报告具有意义。

在社会正义研究中使用扎根理论策略

我在这部分提供了扎根理论在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案例。编码、备忘录写作、理论的抽样和充实,以及整理备忘录都是过程的一部分。其他地方已经详细描述了这些扎根理论策略(Charmaz,1990,2001,2002,2005,2006; Corbin & Strauss, 2008; Glaser, 1978, 1998, 2001, 2003;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因此我只是介绍几个例子,以表明构建扎根理论分析如何推动社会正义研究。

过程编码

扎根理论者通过使用动名词对行动进行编码,使个人或团体的行动和过程

变得可见和有形。社会正义研究者能够利用扎根理论的编码策略展示人们如何制造不公正和不公平[13]。动名词定义了行动,使扎根理论者想象隐性的行动并识别其联系方式(例如,Schwalbe,2005;Schwalbe,Godwin,Schrock,Thompson,& Wolkomir,2000)。

对行动资料进行编码,以及挖掘资料和代码的理论潜力,使扎根理论与众不同(Charmaz,2006,2008b,2008c)。用动名词编码准确地描述行动,从而帮助扎根理论者对资料片段或事件描述中发生了什么进行定义。动名词使扎根理论者能够看到隐性的过程,为代码之间建立联系,并且保持分析的活跃和浮现。相比之下,对话题和主题进行编码有助于研究者对资料进行分类和综合,但是它既不会像扎根理论给行动进行编码那样容易对资料进行分解,也不会促进话题和主题之间隐性关系的显示。

逐行编码(line-by-line coding),即用动名词进行初步的扎根理论编码,是一种将研究者带入资料、与之互动并研究其每个片段的探索工具(表 21.1)。这种类型的编码有助于定义暗含的意义和行动,为研究者指明探究方向,鼓励对资料进行对比,并且帮助寻求和检查资料之间浮现的联系。表格中节选的资料讲述的是一名患了红斑狼疮的中年女性的故事,她的朋友们催促她在一场药物危机中找医生重新评估其药物。这些药物经常引起许多副作用,包括意识不清、忧郁、视力模糊以及不恰当的情绪反应。在两次转院后,这位女性的药物危机被重新定义为精神危机。随后,她的身体症状不被承认,她对红斑狼疮药物的需求被忽视。当医生发现另外一名患者帮助她完成详细的、保密的摄入量调查时,他被激怒了。在调查中得到帮助破坏了医院的规则,但是这位女性的视力问题意味着她不能阅读问卷,因此在医生禁止她得到帮助后,她只是随机地选择作答。考虑到她的处境,她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中的行动是讲得通的,但是这既不符合医院协议,也不适合她的治疗方案。尽管如此,当病情严重时,她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成为自己的拥护者。一个不了解或忽视她的病史的心理医生在为其治疗方法辩护时,会引发同样的事件。在这个案例中,扎根理论的编码记录了这位女性的生活和病情的连续失控。因此,摘录中的初步编码成为证实更一般编码的细节,即"抵制螺旋式的无能为力"。

表 21.1a 话题和主题的初始编码

编码示例	待编码的叙述资料
朋友的支持 住院治疗	P:他们给诊所打电话询问他们能否看看我,能否重新评估我的一些药物和材料,他们说"好的"。当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把我推来推去地等着。我最终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真的非常糟糕。我甚至控告了他,但是我输了。
与医生冲突	我:他做了什么?

续表

编码示例	待编码的叙述资料
转院	P:他们把我放进这儿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把我送到很远的西谷【60英里外的医院】。那里没有一个女医生,只有男医生,所以你没有选择,
不能选择医生	你分到一个医生,这个人就是你在那里的整个期间所能得到的。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很厌烦,我猜,我试图把我的红斑狼疮等问题告诉他,
与医生冲突	这激怒了他。【他命令她取下墨镜】我当时一直戴着【深色】眼镜,我想告诉他,你知道的,他关掉荧光灯,我才能去掉眼镜。他觉得我就是固
医师控制	执。我把配这副眼镜的医生的名字和电话给了他,他当着我面撕碎并扔了。在那里你必须一直去参加小组会议。我去了,我没和任何人讲
威胁	话。但是我确实去了,他们告诉我必须要做的事我都做了。他每天都在说要把我再次锁起来。十天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把我叫到一个
无能为力	小房间,屋里有两个大个子,他们抓住我,把我放在轮床上并绑着。他把我送到监禁病房,不让我打电话或做任何事。我体内的钾元素下降
缺少身体照料	得非常快,我指整体——我病了。他们不给我要吃的药,他甚至都不承认我有红斑狼疮。真是糟糕。

表 21.1b 扎根理论的初始编码

编码示例	待编码的叙述资料
在寻求关心时获得朋友的支持 要求重新评估 得到医疗服务 被准许入院 遇到"坏"医生 采取反对男医生的行动	P:他们【她的朋友们】给诊所打电话询问他们能否看看我,能否重新评估我的一些药物和材料,他们说"好的"。当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决定要把我推来推去地等着。我最终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医生,真的非常糟糕。我甚至控告了他,但是我输了。
被送走 没有选择女医生的机会;减少控制	我:他做了什么?
被迫接受男医生 解释男医生的行为 试图发声——解释症状 继续被忽视 自我主张 试图讨价还价	P:他们把我放进这儿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把我送到很远的西谷【60英里外的医院】。那里没有一个女医生,只有男医生,所以你没有选择,你分到一个医生,这个人就是你在那里的整个期间所能得到的。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很厌烦,我猜,我试图把我的红斑狼疮等问题告诉他,这激怒了他。【他命令她取下墨镜】我当时一直戴着【深色】眼镜,我想告诉他,你知道的,他关掉荧光灯,我才能去掉眼镜。
被误解 反击诊断 提供证据,不被重视 面临强迫参与	他觉得我就是固执。我把配这副眼镜的医生的名字和电话给了他,他当着我面撕碎并扔了。

续表

编码示例	待编码的叙述资料
保持沉默 “遵守”规则 每天都受到威胁 男医生实施威胁 被制服 经历身体限制 经历迅速的失控 目睹恶化 被拒绝提供药物 男医生否认病情	在那里你必须一直去参加小组会议。我去了,我没和任何人讲话。但是我确实去了,他们告诉我必须要做的事我都做了。他每天都在说要把我再次锁起来。十天之后他确实这样做了。他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屋里有两个大个子,他们抓住我,把我放在轮床上并绑着。他把我送到监禁病房,不让我打电话或做任何事。我体内的钾元素下降得非常快,我指整体——我病了。他们不给我要吃的药,他甚至都不承认我有红斑狼疮。真是糟糕。

对比两个方框中的代码就可以发现扎根理论编码保留了资料的特征,提供了对材料的精确处理,以及指明了需要进一步阐释的地方。编码为之后继续进行资料收集提供了线索。实境编码以研究参与者的措辞作为代码,以揭示其含义并理解其出现的行动。津汉和辛克曼(Zieghan & Hinchman,1999)的实境编码:“破冰”“指出如何帮助”和“设法理解”构成了他们对辅导成人学习者的大学生的研究。请注意他们用动名词作为代码来描述辅导者全力以赴处理情况时的行动。尽管学生辅导者增强了对贫穷和缺乏机会的认识,但是作者们从中了解到“校园生活与成人识字社区之间的交界是产生复制而非改变的场所”(p.99)。

如果用动名词编码如此富有成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研究者使用它们?在我看来,英语这种语言喜欢按照结构、话题和主题而不是行动和过程进行思考。此外,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合著已经指导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但是没有卡麦兹(Charmaz,1990,2006,2008c)和格拉泽(Glaser,1978,1998)的著作那样强调动名词。许多研究者的报告始于开放编码(open coding),即研究者对资料进行检查和归类的初步编码。有一些接下来转向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即一种把主类别与次类别联系起来的编码,或者转向主题编码,但不建立新的概念类别。斯特劳斯和科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追随者经常采用复杂的编码程序形成主题(Ball et al.,2009; Morrow & Smith,1995; Sakamoto et al.,2009; Ullman & Townsend,2008)。乌尔曼和汤森(Ullman & Townsend,2008)的编码程序生成了“女性主义/授权方式的定义”“控制的重要性”“授权的方法”和“支持者与机构定位”之类的主题,而不是生成一种理论或概念化的过程。尽管许多作者认为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编码程序是有帮助的,但是肯达尔(Kendall,1999)等人是例外。她说,“使用模型得出自然而然的结论让我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我不再考虑研究问题本身,而是这些资料正在告诉我什么”(p.753)。

扎根理论编码不需要复杂。通过研究过程初期的深入编码以及对资料和代

码进行对比,研究者能够辨别将哪些编码作为试验类别。反之,选择类别加快了调查,因为研究者接下来利用这些类别对大批量的资料进行归类。这种方法在从事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政策研究的社会正义研究项目中尤其有用。扎根理论的编码在保留经验细节的同时使项目逐步完成。

关于 CAQDAS(计算机辅助质性资料分析软件)

扎根理论者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某个 CAQDAS 程序编码资料。一些 CAQDAS 程序目的在于匹配扎根理论逻辑,并且认为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或者他们设想的扎根理论能够互换。软件开发者可能由于依赖扎根理论而被指责。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的产品可能更适合一般质性研究对话题和主题进行编码,而不是过程编码和进行对比分析。尽管许多研究者还没有意识到,但是扎根理论编码不只是贴标签、识别话题以及标记主题。

根据扎根理论者的技能和目标,使用 CAQDAS 的优势包括(1)对资料和代码进行相对轻松的寻找、检索、整理、拆分和归类,(2)能够同时进行多层面的分析,(3)既看到资料,又看到分析过程,(4)为团体研究提供共享文本,(5)组织管理资料和初步分析。自从 CAQDAS 出现以来,对于其可能具有的优势,很多研究者(例如,Fielding & Lee,1998; Glaser,2003; Weitzman,2000)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包括使用者与资料过于接近或疏远、软件设计操纵分析,以及使用者不用了解分析过程或分析范围就能够得到结果。CAQDAS 从早期就赢得了广泛的受众,现在的软件支持更复杂的功能(Fielding & Lee,2002)。随着软件变得更复杂,它对知识生产的作用可能发生变化。布林格等(Bringer, Johnston, & Brackenridge,2006)认为,对扎根理论方法的有效利用比是否使用某个软件包要重要得多。科诺帕希克(Konopásek,2008)主张,"软件……扩展了研究者的组织、记忆和系统性的心智能力。但同时,它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傻瓜式工具"(第 2 段)。然而对于科诺帕希克而言,软件不只包含工具,更是一个虚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出现了一系列媒介并生产个体根植于实践的知识。

凯勒(Kelle,2004)认为,CAQDAS 要求使用者说明其资料管理策略并继而考虑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p.473)。它要求吗?在何种程度呢?凯勒承认,CAQDAS 可以被视为质性研究合理化和机械化的一个步骤,其生成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这么多以扎根理论为幌子的、过于简单的 CAQDAS 论文证实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然而,凯勒认为 CAQDAS 帮助使用者清晰地认识理论构建涉及的过程。但是很多研究者使用 CAQDAS 和扎根理论主要是为了编码而非大胆构建理论。尽管如此,凯勒提出的目标仍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者应该首先学习使用这种方法。

通过资料分析定义显著概念

社会正义研究者使用能够反映结构安排和集体力的概念。他们可以采用扎根理论策略,根据经验特征对这些概念进行提炼或重新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他

们能够对敏感概念进行严格的经验分析。在下面的例子中,我检查了关于生病经历的资料,把边缘化作为一个敏感概念(Blumer,1969; van den Hoonaard,1997),并且从这个概念开始分析。这个叫作 Marilyn(Charmaz,2008f)的 46 岁的女性,讲述了她生病的过程,并且因慢性疲劳综合征和环境疾病失去语言能力。

Marilyn 将她现在无休止的生病危机与之前的成功故事进行了对比。

> 我做过很多有挑战性的事情,并且,你要知道,我曾经每个星期工作 50 到 60 小时,我挣了不少钱,得到很好的福利,我有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在一年之内都改变了,这一年确实挺突然的。从此以后,从经济到回忆,以及之间的所有,什么都没有了。(p.7)

Marilyn 计划在市政会议上为限制木材燃烧作证,因为它对患有肺部疾病、哮喘和化学过敏的人具有毁灭性影响。由于她预想到拥挤和封闭的房间产生的味道会使自己不舒服,因此她在允许社区成员发言的前 15 分钟到场,但是她等了很久。Marilyn 叙述道:

> 我必须戴着口罩,木炭(口罩中,用于过滤)在 2 个小时内已经用尽。当我站起来发言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我的语言表达出现了问题,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当你戴着口罩,人们……你知道的,你也见过妈妈们会把孩子们拉的离自己更近点儿吧。(pp.8-9)

Marilyn 在第一句就对她原来的身份进行声明。她的第二句话揭示了外貌和丧失时机产生的共同影响。随后,Marilyn 表现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不同,使她遭遇质疑和贬低——他者化(othered)。随着资料编码和事件对比,我发现可观察到的不同使病患和残疾人被边缘化。但是边缘化意味着什么?通过资料编码,我将边缘化社会根源和主观经验联系起来,对其特征做出如下论述:"边缘化意味着边界或障碍,疏远或隔离,分歧或差异。分离、贬低、歧视和剥夺都是边缘化经历的例证"(Charmaz,2008f,p.9)。此外,我还展示了人们实施边缘化的方式。用类似的方法使用扎根理论策略能够帮助社会正义研究者将具体含义注入那些理所当然的概念中[14]。此外,它还能帮助他们避免使未经检验的观点变得具体化、客观化和普遍化。

生成类别和发现意义

扎根理论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一种发现资料和理论的方法被看好。建构主义评论认为,这样的"发现"是定位于空间、时间和情境中的建构。但是扎根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建构新理解的工具。学习研究者如何定义其所处的情境,尝试领会他们呈现的内容,以及理解他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都成为我们"发现"的主要来源,也是我们对这些发现进行概念化并生成类别的主要来源。在对街头年轻人进行的研究中,卡拉巴诺(Karabanow,2008)发现了离开街头对这些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他把一个重要类别和离开街头的部分过程解释为"切断街头联系"。

切断街头联系意味着离开朋友、代理家庭和市中心的文化。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朋友和代理家庭是紧张的生存境遇产生的结果。(p.781)

卡拉巴诺的分类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进行对话。切断街头联系不只是离开街头。它发生在复杂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对年轻人来说,街头通常比安身之处更具有吸引力。卡拉巴诺的分析具有反响和力量,不仅是由于清晰的分析,也是由于资料的强度:对街头青少年的 128 次访谈,对服务提供者的 50 次访谈,对主题的长期实践,以及两位在街上流浪的研究助理的帮助。

请注意卡拉巴诺的分类,切断街头联系是离开街头这一更大进程的前提。当研究者审视资料,解释产生所研究的过程或现象的条件时,扎根理论分析具有这种特殊性。在对童年时期遭受性虐待的女性的研究中,莫罗和史密斯(Morrow & Smith,1995)寻找导致虐待的因果条件。他们发现研究参与者曾用于应对虐待的两种策略:"不要被威胁或被不安全感淹没"和"管理无助、无力和失控的情绪"(pp.27-28)。莫罗和史密斯发现,这些女性几乎没有能够提供帮助的资源,因而她们采用心理策略,聚焦内在的自身和情绪,比如减少负面情绪的困扰,回避或逃避情绪,或者用自我造成的肉体疼痛掩盖情感痛苦。

莫罗和史密斯不仅发现了这些女性如何应对状况,还发现了她们具有的意义。社会正义研究通常关注经历了可怕的强制和压迫的人们,他们的分类反映了观察到的无法承受的状况。韦勒和斯塔夫罗(Veale & Stavrou,2007)对被绑架的乌干达儿童的重新融合进行了研究,这些儿童被强迫与他们自己的乌干达人民国防军(UPDF)进行对抗。韦勒和斯塔夫罗认为,这些被绑架的儿童一半是叛军士兵,一半是他或她所在村庄的孩子,尽管他们被认定为"外在于村落的入侵者"(p.284)。韦勒和斯塔夫罗的分类将这种身份的冲突描述为"处理矛盾"。韦勒和斯塔夫罗声称,UPDF 是乌干达人的,对抗 UPDF 是悲伤的,因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杀死敌人。Victor 对这种矛盾进行了如下表述:

Victor:在与乌干达军队斗争时,我觉得自己一半是军人,一半是平民。

访谈者:你曾经从乌干达家庭偷取食物,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Victor:我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要偷的食物[来自]我的父亲或监护人,以及我的兄弟姐妹的监护人。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种士兵作为被绑架者的双重角色未能得到解决。(p.285)

韦勒和斯塔夫罗的分类的讽刺意味在于没有解决路径:矛盾超越了面临的现实,而这些矛盾却正是现实。

以上讨论的每种分类都接近研究的经历,并且描述了资料中发生的事情。扎根理论者建构理论分类,相反,当他们询问资料表明了什么理论问题和概念时,沃尔考默(Wolkomir,2001)的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将过程概念化

强调用行动术语进行编码能够使扎根理论者识别隐性的过程。对这些过程

进行检查能够帮助社会正义研究者提炼概念、形成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强大的文化脚本的作用方式,以及变得适应可能发生的变化。在对互助组中同性恋的和原同性恋的基督徒的研究中,沃尔考默(Wolkomir,2001)描述了他们如何通过"意识形态操纵"(p.407)来逃避和颠覆基督教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谴责他们的性行为,并且把他们视作"恶名昭彰的罪人(egregious sinners)"(p.408)。她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修正需要持续的努力,尤其是对于没有权力的边缘群体。

扎根理论强调分析社会和社会心理的过程,与之一致,沃尔考默的主要概念类别——意识形态操控,是一个过程。她通过研究他们的行为并且从他们的角度观察其面临的紧张局面来推进对该过程的分析。他们如何能够避开污名并提出道德基督徒身份的要求?沃尔考默(Wolkomir,2001)在文章中的主导分析问题提出,"这种变化(意识形态的变化)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并且如何完成的?"(p.407)。对情境进行此类提问和定义使沃尔考默的分析变得精确。此外,她还提供了一个理论概念,能够被运用于其他经验研究并得到检验。

沃尔考默的文章展示了扎根理论分析的基础,同时也对全过程和主要概念类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沃尔考默认为意识形态操纵的过程由三个子过程构成:(1)"有选择的瓦解现有意识形态,打开新的解释空间;(2)构建新的肯定意识形态;(3)验证新的自我意义"(p.408)。她把这些子过程当作分析类别,然后论证构成各个过程的行动。请注意,沃尔考默的分类是活跃和具体的,并且来源于资料。她的分类描述了这些人如何应对谴责和排斥他们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沃尔考默发现,在互助组中对现有意识形态的瓦解明显包括"重新定义罪过"(p.413)。这些人找到新的圣经解释,笃信同性恋罪过的意义被夸大了,并且推断"这种罪过并不比自私或传谣更糟糕"(p.414)。

沃尔考默不仅展示了这些人如何挑战并改变支配观念和层级关系,她也对产生变革的条件进行了说明。沃尔考默的分析并非止步于成功的意识形态操纵。相反,她将其分析定位于有关该研究更大的意义。沃尔考默的结论是,不平等限制了此类意识形态的修正,而且反过来,由于意识形态操纵允许大规模的、压迫的意识形态完好的保留,从而复制了不平等。简言之,沃尔考默的扎根理论分析促使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如何在受到限制的同时发生改变。

沃尔考默的过程分析在实践中示范了扎根理论。她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如何为自身情况赋予意义并表现意识形态立场。然而不止于此,沃尔考默的分析还包括详细的民族志描述、大量的过程类别以及生成意识形态操纵这一理论概念之间强有力的联系。沃尔考默继而运用更大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来定位其概念并为文章建立框架,这样的做法为机构和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动态分析。沃尔考默细致的理论阐释有助于实质领域的知识和学科的理论观点,并为研究社会正义的学者和活动家提供有用的理解。

定义变量

定义过程或现象中的变量是扎根理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尤其是后实证主义

和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会在调查结果和后续分析中发现变量。我们要学习如何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变量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写作,从而加强扎根理论的分析精度和效用。

扎根理论者将其分析和现存文献进行对比,这些文献可以作为资料阐明浮现类别的性质。一般来讲,扎根理论者首先形成自己的分析,然后利用相关文献进行对比分析。然而,对参与者和情境了如指掌的研究者可能在研究初期就会定义与文献之间的巨大分歧,然后由此建构自己的分析。沃瑟曼和克莱尔(Wasserman & Clair,2010)以及罗谢尔和考夫曼(Roschelle & Kaufman,2004)都发现无家可归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们都力图展示所找到的变量。罗谢尔和考夫曼对一个服务和庇护流浪家庭的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其关注点是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新的呈现,挑战那些认为无家可归的儿童具有成长和精神问题的早期结论。沃瑟曼和克莱尔采用类似的逻辑,认为有街头交际的流浪汉比待在庇护所里更安全。

所研究现象的情境和背景特征塑造了行为和事件。约翰逊-雅各布斯(Jackson-Jacobs,2004)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策略点,对之前关于可卡因使用及其世界的知识提出挑战。他把四个大学生使用可卡因的情境和背景的分析作为一个策略点,并将其和之前报道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对比。

遵循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的指导,约翰逊-雅各布斯(Jackson-Jacobs,2004)把文献作为资料,分析策略点之间的差异,形成因果推广,从而建立理论。约翰逊-雅各布斯指出,他的研究中有两个条件与之前关于可卡因使用的研究形成对比并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一方面,大学生可卡因使用者能够保持界限内的药物使用,因为他们(1)拥有资源,(2)想要避免被认定为可卡因使用者,(3)把吸食可卡因作为闲暇爱好,(4)从朋友处购买可卡因,以及(5)更注重常规参与[15]。另一方面,这些学生经常在大学生聚居区而非贩毒者和吸毒者闲逛的“安全”区域中更换居所。居住地点提供良好的环境,掩护致瘾麻醉品的使用。流动性允许他们在局势紧张或者害怕被辨认时进行转移。

通过长时间的跟随这些人,约翰逊-雅各布斯见证了他提出的两个条件的解释力。一个人对毒品使用失去控制,遭受朋友视其为失败者以及被母亲发现其毒品嗜好的污名。另外一个人的处境在搬家后改变。地点是关键。这个人失去了之前的街坊提供的安全性和相对的不为人知。他和郊区的朋友现在不得不在附近的城市贫民区购买可卡因,这样就改变了使用毒品的条件、含义和结果。他们惹上了毒贩和警察的麻烦,并遭受二者的暴力。

分析与现有文献的对比

在上述民族志中,研究者都感受到自己的观察和文献对研究现象的描述存在差异。在常规的扎根理论实践中,研究者首先形成自己的分析,然后转向文

献,定位其研究或者将文献作为资料。在对35个失聪成人的早期求学经历和同辈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中,狄克逊(Dixon,2007)描述了如何形成自己的分析。初步编码显示失聪儿童的同学使其遭受身体和心理攻击。狄克逊的初步编码由"扯出我的助听器""损坏助听器"和"敲打我的耳朵"等事件构成。孩子们不仅排斥失聪同学,而且串通起来使这个孩子违反团体规范,正如下面的文本所表明的那样:

> Bryony:如果有很多噪声,我基本上听不到任何东西……经常是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和(老师)试图讲一些事情时,他们就会开始敲击桌子(她演示着轻轻叩击桌面发出的声音)。
>
> 访谈者:所以说你会听不到?
>
> Bryony:所以我听不到……我不知道(讲了)什么……老师对于不得不一直重复会很不高兴,你知道的,"我必须要告诉你多少次"等,以及你会说"对不起,我听不到"……"好吧,很搞笑你刚才已经听了半个小时。"……"我觉得老师对我很有疑心。"

很显然,Bryony是在失聪之后被同学排斥才在学校与朋友发生矛盾。狄克逊没有指明教师的恼火反应如何促成排斥和骚扰的同步过程。教师有可能允许学生违反教室行为准则,助长对Bryony的骚扰[16]。狄克逊对访谈资料进行详细的扎根理论编码,在Bryony等的访谈中显示出排斥的迹象。随后,狄克逊把文献作为资料,界定排斥的一般特征、暂时的强制排斥的特征以及实际排斥的特征。她指出:

> 在频繁的组织编码的过程中,一些编码特别暗示了排斥。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对排斥的本质、作用和特征进行文献综述。如果确实发生了排斥,访谈资料会显示行为和情境因素,对其描述形成了一套编码。所有的资料都被重新分析。(Dixon 2007,p.9)

与常规的扎根理论实践一致,狄克逊首先对资料进行编码和研究。接着,她对其他作者如何看待排斥进行调查和编码。这种编码使她能够定义排斥的种类和"一般特征"(Dixon,pp.13-14),这些会在资料中被检验。狄克逊承认使用回顾性文本具有内在局限性,她区分出排斥和恃强欺弱联合起来的情况,并且指明排斥在哪些情况下是可取的[17]。狄克逊的扎根理论分析使她能够对孩子们的排斥问题和创新的干预处理都进行定义。

总结和结论

上述讨论有五重意义。第一,对扎根理论的综述厘清了扎根理论者共用的策略和方法。这些策略和方法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质性研究方法。同时,扎根理论对于质性方法的发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第二,概括不同版本扎根理论的相似点并陈述其差异,为对基本假设和研究实践进行方法论解释创造空间。扎根理论研究处于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取向之间,并通常包含二者的因素。但是致力于基本假设和研究实践构成了向反身性的重要转变。这样可以提高我们对研究抉择和研究行动的意识,而且由于我们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研究参与者,因此加深了对其处境的理解。

第三,建构主义版本使扎根理论从一种应用方法开拓为一种创新方法。沃尔考默(Wolkomir,2001)的分析例证了应用和创新之间的区别。她运用这种方法了解参与者的观点和担忧,而非将一套规则应用于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扎根理论仍是一种浮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形式和具体内容都随着研究者与手头问题的角力而浮现出来。因此,该方法浮现的特征有助于它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社会正义研究者提供易变的研究框架,他们能够根据研究问题和初步分析来调整框架。

第四,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认可其产出基础,要求将其方法在新领域复制,并使研究超越表面和显而易见。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用这样的方法回应女性主义学术(Olesen,2007)、后现代主义、表演和诠释民族志(Denzin,2007)之前对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批评,以及来自质性方法学家的批判[18]。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实证主义无视反身性、忽略伦理问题、不顾代表性问题以及在建构和解释资料时不关注研究者这一媒介等方面提出挑战(Olesen,2007)。

第五,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认可这种方法具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双重根源,并力图强调实用主义。与实用主义一致,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承认知识具有多维视角和多种形式。它的实践者变得适应经验世界的细微差别,认为具有单一方法和知识的研究者看不到这种差别,他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和无声的苦难,也因此抓不住这些差别。当研究者使用客观主义扎根理论或其他传统研究方法时都感受不到这种差别。传统的扎根理论阐明形成理论意识的方法。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在方法中加入了增强批判意识,因此对于社会正义研究具有巨大潜力。

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转变厘清了传统解释的策略,并使这种方法重新获得关注。它把克拉克(Clarke,2005)的情境分析等新成果补充进来并取得方法论进展。它为混合方法研究者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工具,并有希望促进软件的发展。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在现在乃至将来都是21世纪的方法。

注 释

1.感谢Adele E. Clarke, Norman K. Denzin,以及索诺马州立大学教师写作计划的以下人员——Sheila Katz, Lena McQuade, Suzanne Rivoire, Tom Rosin, Richard Senghas,他们为本章的初稿提出了有益的评论。

2.这样的关注点通常始于紧迫的社会问题、集体关注和慷慨激昂的声音。相反,罗尔斯(Rawls,1971)对公平的强调始于远离个人权利理论化,理性行为人在假设条件下的立场会带来风险。社会正义的概念必须既要考虑

集体利益,又要考虑个人权利,并且承认理性和"理性"的行为人的定义是处于时间、空间和文化中的——而且都会改变。为了促进正义,纽斯鲍姆(Nussbaum, 2000, p. 234)认为集体利益的增加不可以使某些个体的结果屈从于其他人。她通过观察发现了当不考虑团体内部的权力和机会层级来促进集体利益时妇女的遭遇。

3.在整个讨论中,我关注的是将扎根理论作为探究方法的研究。

4.他们的方法所遵循的设计研究惯例是为了学术消费,而不是表明社会正义的立场。

5.作为扎根理论的发起人之一,格拉泽始终认为研究者能够用这种方法进行量化和质性研究。他的新书(Glaser, 2008)重申了这个观点。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研究者将其付诸行动。

6.理论抽样是为了形成理论类别的属性,而不是为了代表群体。

7.探讨方法论的任务已经开始在其他地方展开,比如这本手册。出版社的质性方法列表、质性调查和社会研究方法国际期刊,以及许多期刊中的方法论文章都把方法论倾向和实践纳入视野。曾几何时,对方法的反思聚焦于调查场所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很多作者(如 Wasserman & Clair, 2010; Suddaby & Greenwood, 2005; Harry, Sturges, & Klingner, 2005 等)都对分析策略的透明化进行了大量的反思。这些作者转化了分析工作的后台,并把它带入讨论的前台。尽管我认为每项讨论只是扎根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参阅 Suddaby [2006]对非扎根理论进行的精巧描述),我钦佩他们进入方法论争论的坦率和意愿。

8.多年来,格拉泽(Glaser, 2001, 2003)已经改变了观点,他现在认为研究者使参与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概念化。

9.结构功能主义是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理论。它提出生物学的隐喻,强调社会制度的结构,并且评价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主要的社会任务,比如使儿童社会化和控制犯罪。结构功能主义假设个体和社会阶层存在一致性,它研究社会秩序并强调制度内部的社会角色(参阅 Merton, 1957; Parsons, 1951)

10.斯特劳斯不仅受到实用主义的启迪,他还通过符号互动论遵循并发展了实用主义传统。

11.费尔丁等(Fielding & Cisneros-Puebla, 2010)在新型的混合方法研究中整合了 CAQDAS 和 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

12.这些作者断言量化数据也发生了"质化"。

13.施瓦尔贝等(Schwalbe et al., 2000) 的文章和哈里斯(Harris, 2001, 2006a, 2006b)的研究例证了不平等是如何实现的。

14.在我进行这些分析的时候,文献包括许多将边缘化作为重要概念的研究。然而,这些作者只是暗示和理解了它的意义,而非将其视为一个问题。

15.最后一点分析与比尔奈基(Biernacki, 1986)的从使用海洛因中自然恢复的扎根理论形成共鸣。比尔奈基根据自己的发现,构建了对认同的分析。未经治疗而放弃使用海洛因开启了拥有和维持传统身份的意义。

16.关于如何制订校规的扎根理论,请参阅:Thornberg (2007)。

17.互动状态的交互影响在此发挥作用。并非所有被排斥的孩子都被欺负。狄克逊发现,同辈群体的暂时排斥使一些孩子保持着对爆发愤怒的控制和管理。

18.关于这些批判和我的回应,请参阅:Charmaz (2005)。

参考文献

Ball, M. M., Perkins, M. M., Hollingsworth, C., Whittington, F. J., & King, S. V. (2009). Pathways to assisted living: The influence of race and class.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28*, 81-108.

Biernacki, P. L. (1986). *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tion: Recovery without treat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ong, S. A. (2007). Debunking myths in CAQDAS use and coding i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Experiences with and reflections on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2*(Suppl. 19), 258-275.

Boychuk Duchscher, J. E., & Morgan, D. (2004). Grounded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emergence vs. forcing debat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48*(6), 605-612.

Bringer, J. D., Johnston, L. H., & Brackenridge, C. H. (2006). Using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oftware to develop a grounded theory project. *Field Methods*, *18*(3), 245-266.

Bryant, A. (2002). Re-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 *Th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4*, 25-42.

Bryant, A., & Charmaz, K. (2007). Grounded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 epistemological account.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31-57). London: Sage.

Bryant, A., & Charmaz, K. (in press). Grounded theory. In P. Vogt & M. William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Sage.

Bryman, A. (2007). Barriers to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1), 8-22.

Burawoy, M. (2004).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1), 4-28.

Cameron, R. (2009). A sequential mixed model research design: Design, analytical and display iss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le Research Approaches*, *3*(2), 140-152.

Carter, P. L. (2003). Black cultural capital, status positioning, and schooling conflicts for low-income African-American youth. *Social Problems*, *50*(1), 136-155.

Casper, M. J. (1997). Feminist politics and fetal surgery: Adventures of a research cowgirl on the reproductive frontier. *Feminist Studies*, *23*(2), 232-262.

Casper, M. J. (1998). *The making of the unborn patient: A social anatomy of fetal surger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asper, M. J. (2007). Fetal surgery then and now. *Conscience* *28*(3), 24-28.

Charmaz, K. (1990). "Discovering" chronic illness: Using grounded theo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11), 1161-1172.

Charmaz, K. (1995). Between positivism and postmodernism: Implications for methods.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43-72.

Charmaz, K. (2000). Constructivist and objectivist grounded theo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09-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armaz, K. (2002).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675-694).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armaz, K. (2005). Grounded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Ap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social justice studi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507-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armaz, K. (2006).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London: Sage.

Charmaz, K. (2007). Constructionism and grounded theory. In J. A. Holstein & J. F. Gubrium (Eds.),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pp. 319-412). New York: Guilford.

Charmaz, K. (2008a). A future fo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32*, 51-59.

Charmaz, K. (2008b). Grounded theory. In J.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pp. 81-110). London: Sage. (Revised and updated version of the 2003 chapter)

Charmaz, K. (2008c).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ent method. In S. N. Hesse-Biber & P. Leavy (Eds.), *The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pp. 155-170). New York: Guilford.

Charmaz, K. (2008d). The legacy of Anselm Strauss for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32*, 127-141.

Charmaz, K. (2008e). Re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In L. Bickman, P. Alasuutari, & J. Branne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pp. 461-478). London: Sage.

Charmaz, K. (2008f). Views from the margins: Voices, silences, and suffer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5*(1), 7-18.

Charmaz, K. (2009a). Recollecting good and bad days. In W. Shaffir, A. Puddephatt, & S. Kleinknecht (Eds.), *Ethnographies revisite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Charmaz, K. (2009b). Shifting the grounds: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method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J. M. Morse, P. N. Stern, J. Corbin, B. Bowers, K. Charmaz, & A. E. Clarke,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127-154).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harmaz, K. (2010). Studying the experience of chronic illness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In G. Scambler & S. Scambler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chronic and disabling conditions: Assaults on the lifeworld* (pp. 8-36). London: Palgrave.

Charmaz, K., & Bryant, A. (2010). Grounded theory. In B. McGaw, E. Baker, & P. P. Peterson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pp. 401-406). Oxford, UK, Elsevier.

Charmaz, K., & Henwood, K. (2008). Grounded theory in psychology. In C. Willig & W. Stainton-Rogers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pp. 240-260). London: Sage.

Choi, S. Y. P., & Holroyd, E. (2007). The influence of power, poverty and agency in the negotiation of condom use for female sex workers in Mainland China.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9*(5), 489-503.

Christ, T. W. (2009). Designing, teaching, and evaluating two complementary mixed methods research courses.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4), 292-325.

Ciambrone, D. (2007). Illness and other assaults on self: The relative impact of HIV/AIDS on women's live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3*(4), 517-540.

Clarke, A. E.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 of sex."*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arke, A. E. (2003). Situational analyses: Grounded theory mapping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553-576.

Clarke, A. E. (2005). *Situational analysis: Grounded theory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Thousand Oaks, CA: Sage.

Clarke, A. E. (2006). Feminisms, grounded theory, and situational analysis. In S. Hess-Biber & D. Leckenb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pp. 345-3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Clarke, A. E., & Friese, C. (2007). Situational analysis: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grounded theory. In K. Charmaz & A. Bryan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694-743). London: Sage.

Cohn, S., Dyson, C., & Wessley, S. (2008). Early accounts of Gulf War ill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 in UK service personn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 1641-1649.

Corbin, J. (2009). Taking an analytic journey. In J. M. Morse, P. N. Stern, J. Corbin, B. Bowers, K. Charmaz, & A. E. Clarke,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35-53).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Corbin, J., & Strauss, A. (200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200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design*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Creswell, J. W., Shope, R., Plano Clark, V. L., & Green, D. O. (2006). How interpre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extends mixed methods research.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1), 1-11.

Denzin, N. K. (1970).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Chicago: Aldine.

Denzin, N. K. (2007).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pp. 454-471). London: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Prefac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ix-xii).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3rd ed.). Thousand Parks, CA: Sage.

Dick, B. (2007). What can grounded theorists and action researchers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398-416). London: Sage.

Dixon, R. (2007). Ostracism: One of the many causes of bullying in group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6*(3), 3-26.

Duemer, L S., & Zebidi, A. (2009). The pragmatic paradigm: An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for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Education*, *59*, 164-168.

Dumit, Joseph. (2006). Illnesses you have to fight to get: Facts as forces in uncertain, emergent illness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 (3), 577-590.

Einwohner, R. L., & Spencer, J. W. (2005). That's how we do things here: The construction of sweatshops and antisweatshop activism in two campus communities. *Sociological Inquiry*, *75* (2), 249-272.

Feagin, J. R. (1999). Social justice and sociology: Agenda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1), 1-20.

Feilzer, M. V. (2010). Do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pragmatically: Implications for the rediscovery of pragmatism as a research paradigm.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4* (4), 6-16.

Fielding, N., & Cisneros-Puebla, C. (2010). CAQDAS-GIS convergence: Toward a new integrated mixed method research practice.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 (4), 349-370.

Fielding, N.,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London: Sage.

Fielding, N.,& Lee, R. M.(2002). New patterns in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qualitative software. *Field Methods*, *14*(2), 197-216.

Foote-Ardah, C. E. (2003). The meaning of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practices among people with HIV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everyday lif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5*(5), 481-500.

Foster-Fishman, P., Nowell, B., Deacon, Z., Nievar, M. A., & McCann, P. (2005). Using methods that matter: The impact of reflection, dialogue, and voi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6*(3/4), 275-291.

Frohmann, L. (1991). Discrediting victims'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Prosecutorial accounts of case rejections. *Social Problems*, *38* (2), 213-226.

Frohmann, L. (1998). Constituting power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Prosecutorial strategies for victim management. *Social Problems*, *45* (3), 393-407.

Gagné. P. (1996). Identity, strategy and feminist politics: Clemency for women who kill. *Social Problems*, *43*(1), 77-93.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1998).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2001).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2002).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3(3).

Glaser, B. G. (2003).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I: Description's remodeling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2008). *Doing quantitative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reckhamer, T., & Koro-Ljungberg, M. (2005). The erosion of a method: Examples from grounded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8* (6), 729-750.

Greene, J. C. (2006). Toward a methodology of mixed methods social inquiry.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13*(1), 94-99.

Gunter, V. J. (2005). News media and technological risks: The case of pesticides after *Silent Spring.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6* (4), 671-698.

Hansen, E. C., Walters, J., & Baker, R. W. (2007). Explaining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Perceptions of the role played by smoking.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9*(5), 730-749.

Harris, S. R. (2001). What can interactionism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inequality? The case of marriage and beyond. *Symbolic Interaction*, *24* (4), 455-480.

Harris, S. R. (2006a). *The meanings of marital equal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arris, S. R. (2006b).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social ineq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a special issue of J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3), 223-235.

Harry, B., Sturges, K. M., & Klingner, J. K. (2005). Mapping the process: An exemplar of process and challenge in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4*(2), 3-13.

Henwood, K., & Pidgeon, N. (2003). Grounded theor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P. M. Camic, J. E. Rhodes, & L. Yardley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Expanding perspectives in methodology and design* (pp. 131-15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od, J. (2007). Orthodoxy vs. power: The defining traits of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151-164). London: Sage.

Hyde, J., & Kammerer, N. (2009). Adolescents' perspectives on placement moves and congregate settings: Complex and cumulative instabilities in out-of-home care.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31*, 265-273.

Jackson-Jacobs, C. (2004). Hard drugs in a soft context: Managing trouble and crack use on a college campu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5*(4), 835-856.

Jiménez, T. R. (2008). Mexican immigrant replenishment and the continuing significance of ethnicity and r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3*(6), 1527-1567.

Johnson, R. B., Onwuegbuzie, A. J., & Turner, L. A. (2007).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 112-133.

Jones, S. J. (2003). Complex subjectivities: Class, ethnicity, and race in women's narratives of upward mobilit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0* (4), 804-820.

Karabanow, J. (2008). Getting off the street: Exploring the processes of young people's street exi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1* (6), 772-788.

Kearney, M. H. (2007). From the sublime to the meticulous: The continuing evolution of grounded formal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127-150). London: Sage.

Kelle, U. (2004).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473-489). London: Sage.

Kelle, U. (2005, May). Emergence vs. forcing: A crucial problem of "grounded theory" reconsidered.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u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6*(2).

Kelle, U. (2007). The development of categories: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191-213). London: Sage.

Kemmis, S., & McTaggart, R. (200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559-603). Thousand Oaks, CA: Sage.

Kendall, J. (1999). Axial coding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controversy.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1*(6), 743-757.

Konopásek, Z. (2008).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with Atlas. ti: Computer assisted qualitative analysis as textual practices.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9*(2).

Lazzari, M. M., Ford, H. R., & Haughey, K. J. (1996). Making a difference: Women of action in the community. *Social Work*, *41*(2), 197-205. Lempert, L. B. (2007). Asking questions of the data: Memo writing in the grounded theory tradition.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245-264). London: Sage.

Lio, S., Melzer, S., & Reese, E. (2008). Constructing threat and appropriating "civil rights":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gun rights and English only leaders. *Symbolic Interaction*, *31*(1), 5-31.

Locke, K. (2007). Rational control and irrational free-play: Dual-thinking modes as necessary tension in grounded theorizing.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565-579). London: Sage.

Lutgen-Sandvik, P. (2008). Intensive remedial identity work: Responses to workplace bullying trauma and stigmatization. *Organization*, *15*(1) 97-119.

MacIntyre, A. (2002). Women researching their lives: Exploring violence and identity in Belfast, the North of Irel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2*(3), 387-409.

Maines, D. R. (2001).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Mathieson, C., & Stam, H. (1995). Renegotiating identity: Cancer narrative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7*(3): 283-306.

May, K. (1996). Diffusion, dilution or distillation? The case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6*(3), 309-311.

McDermott, K. A. (2007). "Expanding the moral community" or "blaming the victim"?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Journal*, *44*(1), 77-111.

McPhail, B. A., & DiNitto, D. M. (2005). Prosecutori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bias hate crim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1*(9), 1162-1185.

Mertens, D. M. (2007). Transformative paradigm: Mixed methods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3), 212-235.

Mertens, D. M. (2010).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ntegrating diversity with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Merton, R.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Mevorach, M. (2008). Do preschool teachers perceive young children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differently?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 Education*, *29*, 146-156.

Mitakidou, S., Tressou, E., & Karagianni, P. (2008). Students' reflections on social exclus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versity in Organisations, Communities and Nations*, *8*(5), 191-198.

Mitchell, R. C., & McCusker, S. (2008). Theorising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within Canadia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6*, 159-176.

Moore, D. L. (2005). Expanding the view: The lives of women with severe work disabilities in contex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83*(3), 343-348.

Moreno, M. (2008). Lessons of belonging and citizenship among hijas/ os de inmigrantes Mexicanos. *Social Justice*, *35*(1), 50-75.

Morgan, D. (2007). Paradigms lost and pragmatism regaine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1*(1): 48-76.

Morrow, S. L., & Smith, M. L. (1995). Constructions of survival and coping by women who have survived childhood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2* (1), 24-33.

Morse, J. M. (1991).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Nursing Research*, *40*(2),120-123.

Morse, J. M. (2007). Sampling in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229-254). London:Sage.

Mruck, K., & Mey, G. (2007). Grounded theory and reflexivit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515-538). London:Sage.

Mulcahy, A. (1995). Claims-ma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itimacy:Press coverage of the 1981 Northern Irish hunger strike. *Social Problems*, *42*(4), 449-467.

Nack, A. (2008). *Damaged goods? Women living with incurable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Neill, S. J. (2006). Grounded theory sampl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flexivit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Nursing*, *11*(3), 253-260.

Nepstad, S. E. (2007).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privileged: Remaking religion in the Central America solidarity movement. *Critical Sociology*, *33*(4), 661-688.

Nussbaum, M. C. (2000). Women's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1*,219-247.

O'Connor, G. C., Rice, M. P., Peters, L., & Veryzer, R. W. (2003). Managing interdisciplinary, longitudinal research teams: Extending grounded theory-building methodologi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4*(4), 353-373.

Ogle, J. P., Eckman, M., & Leslie, C. A. (2003). Appearance cues and the shootings at Columbine High: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problem in the print media. *Sociological Inquiry*, *73*(1), 1-27.

Olesen,V. (2007). Feminist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pp. 417-435). London:Sage.

Padgett, D. K. (2009). Qual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work knowledge development. *Social Work*, *54*(1), 101-105.

Parsons, 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Free Press.

Peirce, C. S. (1958).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antanida, M., Tananis, C. A., & Grubs, R. E. (2004). Generating grounded theory of/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journey of three epistemorp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7* (3), 325-346.

Poonamallee, L. (2009). Building grounded theory in action research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subjective ontology and objective epistemology. *Action Research*, *7*(1), 69-83.

Qin, D., & Lykes, M. B. (2006). Reweaving a fragmented self: A grounded theory of self-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9* (2), 177-200.

Quint, J. C. (1965).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of information control. *Psychiatry*, *28* (May), 119-132.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Belknap.

Reichert, J. (2007). Abduction: The logic of discovery in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pp. 214-228). London:Sage.

Reynolds, L. T., & Herman, N. J. (Eds.). (2003). *Handbook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Walnut Creek, CA:AltaMira.

Rier, D. (2007). Internet social support groups as moral agents: The ethical dynamics of HIV + status disclosur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9*(7), 1-16.

Rivera, L. A. (2008). Managing "spoiled" national identity:War, tourism, and memory in Croat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4), 613-634.

Roschelle, A. R., & Kaufman, P. (2004). Fitting in and fighting back:Stigma management

strategies among homeless kids. *Symbolic Interaction*, *27*(1), 23-46.

Rosenthal, G. (2004). Biographical research.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48-64). London: Sage.

Roxas, K. (2008). Who dares to dream the American dream?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6*(2), 2-9.

Ryder, J. A. (2007). "I wasn't really bonded with my family": Attachment, loss and violence among adolescent female offenders. *Critical Criminology*, *15*(1), 19-40.

Sahin-Hodoglugil, N. N., vander Straten, A., Cheng, H., Montgomery, E. T., Kcanek, D., Mtetewa, S., et al. (2009). A study of women's covert use of the diaphragm in an HIV prevention trial in sub-Saharan Afric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1547-1555.

Sakamoto, I., Chin, M., Chapra, A., & Ricciar, J. (2009). A "normative" homeless woman? Marginalisation, emotional injury and social support of transwomen experiencing homelessness. *Gay and Lesbian Issues and Psychology Review*, *5*(1), 2-19.

Salander, P. (2002). Bad news from the patient's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the written narratives of newly diagnosed cancer patien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5*, 721-732.

Sandelowski, M., Voils, C. I., & Knafl, G. (2009). On quantitizing.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3*, 208-222.

Sandstrom, K. L. (1990). Confronting deadly disease: The drama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gay men with AI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 271-294.

Sandstrom, K. L. (1998). Preserving a vital and valued self in the face of AIDS. *Sociological Inquiry*, *68*(3), 354-371.

Schwalbe, M. (2005). Identity stakes, manhood acts, and the dynamics of accountability. In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28*, 65-81.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Group.

Schwalbe, M., Godwin, S., Holden, D., Schrock, D., Thompson, S., & Wolkomir, M. (2000). Generic process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An interactionist analysis. *Social Forces*, *79*, 419-452.

Scott, E. K. (2005). Beyond tokenism: The making of racially diverse feminist organizations. *Social Problems*, *52*(2), 232-254.

Scott, E. K., London, A. S., & Gross, G. (2007). "I try not to depend on anyone but me": Welfare-reliant women's perspectives on self-sufficiency, work, and marriage. *Sociological Inquiry*, *77*(4), 601-625.

Shelley, N. M. (2001). Building community from "scratch": Forces at work among urban Vietnamese refugees in Milwaukee. *Sociological Inquiry*, *71*(4), 473-492.

Sixsmith, J. A. (1999). Working in the hidden economy: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ed men in the UK.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2*(3), 257-277.

Somerville, C., Featherstone, K., Hemingway, H., Timmis, A., & Feder, G. S. (2008). Performing stable angina pectoris: An ethnographic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7), 1497-1508.

Speed, S., & Luker, K.A. (2006). Getting a visit: How district nurses and general practitioners "organise" each other in primary car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8*(7), 883-902.

Spencer, J. W., & Triche, E. (1994). Media constructions of risk and safety: Differential framings of hazard ev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64*(2), 199-213.

Star, S. L. (1989). *Regions of the mind: Brain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certain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ern, P. N. (1994). Eroding grounded theory. In J. Morse (Ed.),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p. 212-2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ern, P. N. (2007). On solid ground: Essential properties for growing grounded theory.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114-126). London: Sage.

Stern, P.N. (2009). Glaserian grounded theory. In J. M. Morse, P. N. Stern, J. Corbin, B.

Bowers, K. Charmaz, & A. E. Clarke,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pp. 23-29).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Strauss, A. L. (1969). *Mirrors and mask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Strauss, A.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uss, A. L. (1993). *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New York: Aldine.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Strauss, A., & Corbin, J.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übing, J. (2007). Research as pragmatic problem-solving: The pragmatist roots of empirically grounded theorizing.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580-601). London: Sage.

Suddaby, R. (2006). From the editors: What grounded theory is no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4), 633-642.

Suddaby, R., & Greenwood, R. (2005).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 legitimac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1), 35-67.

Swahnberg, K., Thapar-Björkert, S., & Berterö, C. (2007). Nullified: Women's perceptions of being abused in health car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8* (3), 161-167.

Tashakkori, A., & Teddlie, C. (2003).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 From data triangulation to mixed model designs. In A. Tashakkori & C. Teddlie (Eds.), *Handbook of mixed methods in social & behavioral research* (pp. 671-701).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ram, E., Schachter, C. L., & Stalker, C. A. (2005). The case for integrating grounded theory and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mpowering clients to inform professional practi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5* (8), 1129-1140.

Thornberg, R. (2007). Inconsistencies in everyday patterns of school rules.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2*(3), 401-416.

Thornberg, R. (2009).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good pupil embedded in school rules.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 *4* (3), 245-261.

Thornberg, R., & Charmaz, K. (in press). Grounded theory. In S. Lapan, M. Quartaroli, & F. Riemer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desig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Timmermans, S., & Tavory, I. (2007). Advanc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practice. In A. Bryant & K. Charmaz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rounded theory* (pp. 493-512). London: Sage.

Tuason, M. T. G. (2008). Those who were born poor: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hilippine pover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 (2), 158-171.

Turner, B. A. (1981). Some practical aspects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One way of organizing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er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Quantity and Quality*, *15*, 225-247.

Ullman, S. E., & Townsend, S. M. (2008). What is an empowerment approach to working with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6*(3), 299-312.

Urquhart C. (2003). Re-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or reinforcing old prejudices? A brief response to Brya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4* (3), 43-54.

Valadez, J. R. (2008). Shaping the educational decisions of Mexican immigrant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5*(4), 834-860.

Valdez, A., & Flores, R. (2005). A situational

analysis of dating violence among Mexican American females associated with street gangs. *Sociological Focus*, *38*(2), 95-114.

Vandenburgh, H. (2001). Physician stipends as organizational deviance in for-profit psychiatric hospitals. *Critical Sociology*, *27*(1), 56-76.

van den Hoonaard, W. C. (1997). *Working with sensitizing concepts: Analytical fiel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Sage.

Veale, A., & Stavrou, A. (2007). Former Lord's Resistance Army child soldier abductees: Explorations of identity in reinteg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13*(3):273-292.

Wasserman, J. A., & Claire, J. M. (2010). *At home on the street: People, poverty, and a hidden culture of homelessness*. New York:Lynne Rienner.

Weitzman, E. A. (2000). Softwar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803-820). Thousand Oaks, CA:Sage.

Williamson, K. (2006). Research in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s using ethnographic techniques. *Library Trends*, *55*(1), 83-101.

Wilson, H. S., & Hutchinson, S. A. (1996). Methodologic mistakes in grounded theory. *Nursing Research*, *45*(2), 122-124.

Wilson, K., & Luker, K. A. (2006). At home in hospital? Interaction and stigma in people affected by cancer.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2*, 1616-1627.

Wolkomir, M. (2001). Wrestling with the angels of meaning: The revisionist ideological work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men. *Symbolic Interaction*, *24*(4), 407-424.

Wolkomir. M. (2006). *Be not deceived: The sacred and sexual struggles of gay and ex-gay Christian m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Zieghan, L., & Hinchman, K. A. (1999). Liberation or reproduction: Exploring meaning in college students' adult literacy tutoring.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2* (1), 85-101.

22 以人权的名义：我听之前你应该怎么说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I SAY (HOW) YOU (SHOULD) SPEAK (BEFORE I LISTEN)

⊙ 安杰·克劳格(Antjie Krog)

张遐译　韩倩校

1872年，一个布希曼族的巫师Kabbo在南非开普敦向德国语言学家布利克(Wilhelm Bleek)讲述了一个故事。布利克花了从4月13日到9月19日的时间记录并把这段叙述的语言翻译成英语，下面两段描述了一个年轻妇女是如何追踪她的游牧家人的。

> 她(一个年轻的寡妇)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一个小池塘。在水边她看见了她弟弟的脚印。在水边她也看见了她妈妈的脚印。她还看见了她弟媳妇的脚印。
>
> 她告诉孩子们："祖父一家人的脚印都在这里；他们把死的跳羚扛到了水边，这样他们可以在狩猎回来的路上喝水。房子应该就在附近。我们应该跟随这个脚印，因为脚印是新留下的。我们必须去寻找他们的房子。我们必须要跟随这些脚印。这些脚印是今天留下的；在我们来之前不久人们刚取过水。"(Lewis-Williams,2002,p.61)

一百多年以来，这段话看起来像古老的布希曼故事中的另一段有趣的情节，直到研究者列本伯格(Louis Liebenberg)和现代布希曼人居住在一起。在他的著作(Liebenberg,1990)《追踪的艺术：科学的起源》(*The Art of Fracking*: *The Origin of Science*)中，列本伯格坚持认为，追踪足迹的本能能力，实际上是布希曼人采用一系列复杂的解码、情境符号分析来提出假设。

列本伯格区分了布希曼人三种水平的追踪：其一，跟随脚印的最简单的追踪。其二，系统追踪，涉及从符号中收集信息，直到发现行动的细节指征。其三，推测性的追踪，涉及基于(1)对符号的最初解释、(2)行为知识、(3)地形地域知识，而提出工作的假设。按照列本伯格的说法，这些追踪的技能和西方的智力分析类似，他暗示所有的科学都始于追踪(Brown,2006,p.25)。

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两段，人们可以看到年轻寡妇毫不费力地做了列本伯格所指出的那三种追踪。她识别出是谁的脚印，他们的来与往，他们扛着一些重东西或滴血的东西，他们很渴，他们狩猎回来的路上喝水了，她还指出他们在追跳

羚,她还指出了脚印是什么时候留下的,提出他们在做什么的假设,正是那天,她在哪里、如何能找到她的家人。

这里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把布利克(故事的记录者)、列本伯格(一个追踪学者)、我自己(把追踪理论应用到故事中)当作学者,把 Kabbo(布希曼人叙述者)、故事中的妇女(识别踪迹的)当作"原始材料"是正确的吗?

这种区分是如何遵守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的?

> 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意见和表达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了不受干涉地持有意见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体、不受疆域限制,寻求、接收和传递观念和信息的自由。

谁有可能进入谈话?

这篇文章中将讨论两个群体的权利:首先是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但是实际上每天生产着复杂的生存系统知识的人们的权利。其二是那些来自边远地区,但是只能通过非本民族的语言,通过基于异域的、结构疏远的对话,才能进入获承认的知识世界的学者们的权利。

虽然斯皮瓦克(Spirak)把第一个群体描述为下属阶层,而列本伯格在她著名的论文——"下属阶层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涉及了上述两个群体,并暗示到,一旦下属阶层发现她们自己处于能够被倾听的情境下,"她作为一个下属阶层的地位就会被彻底改变;她就不再是一个下属阶层。"(Williams & Chrisman,1994,p.190)

"Khonele 太太"作为一个下属阶层

南非真相和解委员会(TRC)在两年中举行的听证会中,有 2 000 个证据是公开呈现的。没有听取著名活动家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委员会从这种套路中走出来,提供了一个用土语讲述边远乡村地区故事的论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生活和先前不被承认的叙事能够得以被听见,能够通过翻译首次进入南非下属阶层的研究——解构史学,"关于下属阶层意识的消息"(Williams & Chrisman,1994,p.203)。

在国家电台播放的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其中一位女士的证词在我看来是最语无伦次的,我必须要指出来。我在想可能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弄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也在想是否应该用原始的科萨语来阐述,或者就是这位妇女实际上有精神障碍,或者是"文化霸权"还残余在我身上,使我听不懂她的话?

我尝试着在真相和解委员会的网站上找到她的证词,但是没有成功。检索中没有她名字的痕迹。在 Gugulethu 七个事件的标题下,她的姓被误写成"Khonele",她是这组中唯一一个没有呈现名字的母亲。她的真名是 Notrose Nobomvu Konile,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她的官方身份文件中,她的第二个名字被误写为"Nobovu"。

也许有人会问:可能听见这样一个来自南非乡村深处、没被提及过的、身份识别错误的、拼写错误的、证词不连贯的、被翻译的、被马虎地转录的妇女的声音吗?

我请两个在西开普大学的同事——来自科萨语系的 Nosisi Mpolweni 教授和来自心理、女性和性别研究系的 Kopano Ratele 教授——和我一起来读这个证词。二位教授对此很感兴趣。我们借用原始的科萨语记录并开始誊录和重译。然后我们使用不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文本;最后我们拜访和重新访谈了 Konile。开始只是一个下午茶的偶然的讨论,后来变成了一个两年半的项目,最后出了一本书:《就是这只山羊》(*There Was This Goat*, Krog, Mpolweni, & Ratele, 2009)。

但是首先,一旦下属阶层的声音被听见,就需要引入一些概念来发挥作用。

"原始材料"的意外受挫

我很自豪能够在一所大学任职,这所大学在种族隔离期间,故意忽视了优势白人学者的要求,关注学校周围受压迫的群体。学校以左派大学为荣,把所有的资源扔到了门后。

自从 1994 年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南非一直在尝试所谓的"标准任命"。5 年前我在这所大学任职几个月之后,我被要求提交一份当年发表作品的清单。幸运的是,或者我也这样认为,我当时相当积极:一部非虚构文学、诗集、报纸的论争板块以及更多的作品。因此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我收到一封邮件,说我所列清单上的作品没有一样"算数"时我有多惊讶。

我去见系主任。对话如下:

> "为什么我的出版物不算数?"
> "它没有被同行评审。"
> "它经过了所有报纸的评审。"
> "但是不是被同行。"
> 想知道为什么教文学的教授不能成为我的同行,我问道,"谁是我的同行?"
> "当然你是举世无双的,"这样说有点狂妄,"但我的意思是你领域中的人。"
> "我的领域是什么?"
> "那些人……",他摆动双手,"跟你在同一研究领域工作"。
> "好吧,"我说,"当我看他们的工作时,他们都引用我的。"
> 他的脸突然放光,"如你所见,你真是原始材料!"

起初我不在乎这个评论,但后来我逐步意识到了术语"原始材料"是多么有争议性、主观评判性和排外性。谁来决定谁是原始材料? Konile、Kabbo 和布希曼妇女是"原始材料"吗? 回顾我们的项目,我发现自己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三个同事如此容易地假设 Konile 就是原始材料,而不是我们文本的协力作者? 为

什么她的两个证词和一段访谈(她在其中建构、分析、演绎和总结),和我们的贡献相比,较少具有学术的贡献?在遭受毁灭性的丧子之痛之后,她对生存技能的评论总结不是偶然性的,而是从她的立场出发,经过仔细的计算和经历的体验。在我们的访谈中,我们甚至要求她解释她的文本。为什么她能够作为原始材料,进入我们的著作和学术领域?为什么她不能像我们三个人一样,作为封面署名的合作文本的提供者呢?

我开始想知道:另外一位 Gugulethu 母亲会问 Konile 什么问题?或者转向另一个领域:一位牧牛人怎样采访另一位牧牛人?一个牧牛人如何分析和评价另一位牧牛人的话?这样的访谈会和我访谈那位牧牛人有什么不同?最后,如果没有好心的学者的引导,这些经历如何进入学术对话领域?如果我们坚持所有的信息都是为了我们自己、都由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们如何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

学科的意外受挫

在被降格为"原始材料"之后,我及时地参加了一个关于如何写"非原始材料"的研讨会,通过在那些没人读但公认的期刊中发表文章,来满足得到同伴认可的需要。在我们的民主政府想让大学从事受资助研究的趋势日渐明显之后,这个研讨会由一所大学组织。我们不得不与已建立丰厚资源的白人大学,以及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历史相竞争。

我走进这个研讨会。有 40 个人参加。我是唯一的白人。在抽烟间歇,一位数学教授向我们倾诉了如下的故事:

> 一天一位会议代表告诉我,他在新南非的学校里负责安装科学实验室,这项工作很有趣,因为每所学校都是不同的。每个星期天他都在做这件事,直到某一次我告诉他应该把工作内容写下来。于是在我几乎把这个事情全忘掉的时候,他拿着一份 4 英寸的手稿跑来,跟我开玩笑:难道这不是一本文学硕士的论文吗?我看了看,这个手稿很新,这是一个很有方法意识的系统性研究,很能吸引读者。这本手稿现在到哪儿了?我说这不是数学研究,他应该把这个拿到科学系去。科学系的人说,这不像是科学研究更像是历史研究。历史系的人说不……

参加研讨会的群体都绝不是下属阶层,而是在先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里处于不利地位社区中的接受教育的第一代男男和女女。当我们参加随后的撰写学术论文的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本地经验的品质是如何通过英语和特定格式的学术论文,被挤进毫无生气的一堆废话中。我们也知道了一个重要的故事是多么容易死于学术论文的束缚中;如果没有理论,一个重要的观察什么也不是,一段重要的经历消解在学科之外。

理论的意外受挫

最后一个故事是我参加一个关于黑人组织的研讨会。研讨会开始时,一位

教授说当他被邀请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准备的论文已经被公认的期刊接收,讨论和同行评论或许已经一起发生。然而这个期刊已经拒绝了他的文章,因此……或许讨论应该从零开始。

这篇提交的文章的确有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言,当一个人看见一艘小船使劲全力,划过海浪、小鱼、小舰队、大船,鼓翼扬帆到达一个叫黑格尔的小岛时,一个人会有独特的感觉。桨在空中,直到直到……最后,桨终于碰到了黑格尔岛。然后这个人继续疯狂地划,直到刚刚碰到弗洛伊德岛和福柯岛。与此同时你想说忘掉那些岛吧,给我们展示你的船里有什么,指出你知道的鱼的名字,你怎样回避那些大船,你在哪里完成了这些著名的航行?

后来的讨论很特别。教授突然从他的论文事件中释怀开来,黑人学生和讲师开始发言,变成了一场奇妙的有关南非的分析。后来,我问这位教授:"为什么你不把刚才说的写下来?"他答道,"因为我找不到我所知的东西和已有文献之间的关系。这是个矛盾的情境:如果假设我乡下妈妈的思想和北美人、瑞典人没有差异,我就不能分析我的乡下妈妈。另一方面,我对乡下母亲的分析,只有基于对北美和瑞典人思维方式的呈现,才能被理解和听闻"。

边缘群体的学者

我的两位同事,保温尼(Nosisi Mpolweni)和拉特利(Kopano Ratele),是他们的家庭中第三代受过教育的,我是第四代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士。通过我们对Konile证词的集体解释分析,我们中的权力关系得以改变。这个项目是由我首创的,但很快我变成了知道得最少的一位。拉特利是我们当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已经公开出版了学术著作。保温尼的贡献在于她对科萨文化的了解和相关翻译。我写作还可以,但不是那种很棒的学术类的写作。英语是我们的语言,但只有拉特利能准确而恰当地说英语。在我们访谈Konile的实地考察旅行中,权力彻底转向了保温尼,因为我不了解科萨文化,在我们的实地调查旅行中我没有任何影响力。

然而,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当我们谈论我的同事有着极清晰的表达时——所有的话都围绕着某句话,我们会停下来意识到:是的,这就是它。这就是我们工作致力于抓住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回到写作文本中,这些核心句将毫无作用。

在其中一次会上我带了录音机,我们讨论为什么Konile在她的乡村集体世界观中,如此着迷地使用"我"这个单词。我把这段对话转录下来,给每个人发送相应的语块儿,这是Ratele回复过来的文本:

> Konile太太在她听说儿子遇害的头一天晚上梦到了山羊。真相和解委员会(TRC)不是关于梦的研讨会,但却是一个关于滥用人权真相的论坛。

我暗示通过讲述梦境,Konile 在向真相和解委员会(TRC)发出她和祖先世界联系的信号。

> 这个梦揭示了她仍然是完整的,她和活着的、死亡的,都有联系,显然她很少经历现存的孤独……她儿子的死亡把她引入到了孤单之中,引入到"我"之中。儿子的死亡使她变成了一个个体——选定的、阻隔的,好像变成了一个个体。她在说,"我在遭受痛苦,因为我已经被迫变成了个体。""我"这个词不再是谈论她真实的心理特性。Konile 太太使用"我"作为一种抱怨的形式。她在说:"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但是儿子的死,使我成了一个'我'。"(Krog et al.,2009,pp.61-62)

作为一个沉浸于个体性的白人,我起初没有注意到"我"的频繁使用,但是当我注意到的时候,也只是证实了非洲集体主义的概念被夸大了,尽管诸如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图图(Desmord Tutu)大主教之类的人很强调集体主义。拉特利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这是一个我至今尚不能得出的结论,也是真相和解委员会的白人分析者没有得出的结论。

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对我的书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是真相和解委员会(TRC)分析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我工作方法的重大突破。说话语气的自信、一种源自如下事实的自信——基于他所熟知的世界内外说话,已经被成功迁移到了纸上。拉特利正在跨越"疆域",跨过存在于教育、种族、背景、结构、语言、学术学科等所有的障碍,从后殖民时代、后现代、种族觉醒来解释她自己的世界,她有足够的自信游走于排外又规范的框架内外。

我想,在没有人向我们谈论这件事之前——黑人女性很了解这件事但白人女性并不了解,我的同事绝不会写出这个特定构想。

我们以三种不同的声音撰写了关于 Konile 的梦想的论文,但是这个文章被南非一个允许呈现对立观点的杂志拒绝了,因为语气过于口语化,没有生成任何的理论能够证明 Konile 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然而,我很乐意地看到,这篇文章被邓津等人(Norman Denzin,Yvonna Lincoln, & Linda Smith)关于本土方法论的书所接受。

结论:研究作为和解的改变

这些例子,从布希曼族的巫师,到黑人心理学教授,展示出在一个有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中做研究的复杂性,也展现了我们为进入研究对话的人设置条件的伦理问题。斯皮瓦克甚至强调伦理不是知识问题,而是关系问题(Williams & Chrisman,1994,p.190)。当她宣称下属阶层"不能说话"的时候,她意味着像这样的下属阶层不能被第一或第三世界的特权阶层所听见。如果下属阶层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被别人听见,她作为下属阶层的状态就会彻底改变;她就不

再是下属阶层。但那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下属阶层、最受压迫的无形的赞助者,像上述那样的人将停止存在"(Williams & Chrisman,1994,p.5)。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恰当地评论到,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是由他们进入主流体制的能力来衡量的"(Deleuze & Quattari,1987,p.520)。与此同时,德勒兹指出,准确地说,不同形式的边缘化、少数化,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但是变革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发生——适应和整合入标准化或大多数的立场。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边缘化人群以他们自己的表达形式和网格进入到我们的话语体系,由此我们可以学会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有忽视领域界限、通过任何媒体传递信息和理念的普遍权力,我们也有通过参加新形塑的行为来听取和理解他们的义务。

参考文献

Brown, D. (2006). *To speak of this land—Identity and belonging in South Africa and beyond.*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A thousand., & Quattari, F. (1987).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Lincoln, Y. S., & Smith, L. T. (Eds.). (2008). *Handbook of critical and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Krog, A., Mpolweni, N., & Ratele, K. (2009). *There was this goat—Investigating the truth commission testimony of Notrose Nobomvu Konile.*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Lewis-Williams, J. D. (Ed.). (2000). *Stories that float from afar—Ancestral folklore of the San of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South Africa: David Philip.

Liebenberg, L. (1990). *The art of tracking: The origin of science.* Cape Town, South Africa: David Philip.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Macmillan.

Williams, P., & Chrisman, L. (Eds.). (1994).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爵士乐和无花果树：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根和即兴创作”



JAZZ AND THE BANYAN TREE: ROOTS AND RIFFS 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 玛丽·布里登-米勒(Mary Brydon-Miller)
迈克尔·克劳尔(Michael Kral)　帕特里夏·麦奎里(Patricia Maguire)
苏珊·诺夫克(Susan Noffke)　阿努·萨波洛克(Anu Sabhlok)[1]

张遐译　韩倩校

当明格斯等人(Charles Mingus, Charlie Parker, Dizzy Gillespie, Max Roach, Bud Powell)1954年在梅西剧院登台演出摇滚乐时，这种不可思议的音乐轻而易举地在舞台和观众中起到了轰动效应。表面上这种制作精良的音乐自然而然爆发，实际上却是严格训练的结果——音乐理论和实践的一种综合。只有当演奏者认识到，每一种声音都是整个音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时，真正的即兴创作才有可能。只有当每个音乐家都发挥其专长，并且相互尊重彼此的贡献时，爵士乐的核心——创新和探索欲求，才有可能实现。

参与式行动研究(PAR)就像爵士乐一样[2]。其基于这样的理念：知识生产是一个合作过程，每个参与者各自的经验和技能对工作结果都至关重要。参与式行动研究结合理论和实践，通过行动和反思的循环，致力于解决具体的共同体问题，深化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力量的理解。参与式行动研究对变化中的情境积极响应，改变方法，利用所有参与者的资源，致力于满足某个群体的需求。

参与式行动研究就像无花果树。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使得“头发蓬松的无花果树”成为永恒，使它成为印度和佛教传统中“学习、沉思、反思、启智”的标志。无花果树也是普通大众集会的地方，大家在此开展群体讨论、作出决策。无花果树通过伸展枝干、扎下深根，扩充它的领地，创造生存和学习的空间。同样地，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了一个群体成员聚集在一起的空间，在此研究过程中，大家可以批判性地检视面临的问题、生成知识、采取行动，并解决问题。

这章中我们将利用隐喻和故事叙述的力量，向新读者提供理解和欣赏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那些对参与式行动研究比较了解的读者借此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首先把参与式行动研究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行动研究的背景下来定义。接着我们会对参与式行动研究及对其发展做出主要贡献的研究者作一个简要的历史综述。然后我们讨论支撑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各种

理论之间的关系,讨论使我们深化和反思对理论理解的各种方法论选择途径,包括讨论参与式行动研究伦理的概念框架。我们通过最近开展的三个研究项目解释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践是如何操作的,如何确定共同的主题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突出描述了这些研究,我们相信这些描述能够展示参与式行动研究的领域、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多样性,以及展示用于创造新知识、对群体带来有意义改变的各种各样的途径。由于描述凸显了参与式行动研究最重要的要素——参与者去做。最后,为了深化理解、改进课堂或社区情境中的行动研究,我们提出了教学策略,重新思考这些隐喻以及其未来的含义。

定义参与式行动研究

参与式行动研究是若干个别项的总和,这些个别项可以有多重组合和含义,其有一套特定的假设和流程。本章最重要的就是揭示这些研究背后的意图及其传达的特定的历史和当下的含义。参与是这些研究工作最主要的特征,不仅仅是从合作的含义上来说,并且是从认识论和政治原因角度来说,要求特定情境中所有人都要被纳入研究项目中。正如这些情境中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由于从一种不公正的境遇向过一种更好生活的改变成为研究的首要目标,所以行动被编织进整个研究过程。研究作为聚合知识、主张才智的社会过程,属于所有的人,成为更广泛的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正义斗争的一部分。参与式行动研究受到更广泛的行动研究方法框架的影响,所有的行动研究共享一个理念:知识产生于对有计划行动的反思,知识和行动带来变革(Reason & Bradbury,2008),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其聚焦于合作、政治承诺以及对社会正义的明确承诺。

探索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根源

追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历史常常会有些不确定性,就像无花果树一样,其根源是深远和宽广的。受到合作性思潮的显著影响,参与式行动研究起源的任一描述都包含了两者之间的张力:"授权个体开展工作"和避免"一个伟大专家"的陷阱。正如迈克德莫特指出,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论"抵制传统的赋予专家知识以特权的知识建构模式"(McDermott,2007,p.405),因此,我们在此致力于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历史放到全球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放到为其创生提供框架的学院环境内外,同时向为其发展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致谢。

所有的知识生产和调查方法都受到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影响。当20世纪早期社会科学成为独立学科时,参与式行动研究得到传播。非裔美国人和女性主义者(DuBois,1973; Lengermann & Niebrugge-Brantley,1998; Reinharz,1992)成为开创一种新的研究形式而努力的广泛力量的一部分,这种调查研究形式与

寻求社会公正、开展集体行动有深切的联系(Greenwood,私人交流;也参见Messer-Davidow,2002;Price,2004)。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价值无涉的知识生产主张是站不住脚的,挑战了客观性、普遍性的基本原理(Fay,1975;Kuhn,1970;Mills,1961),为更多的政治决策服务和社会参与的知识创造形式奠定了基础。参与式行动研究深受女性主义社会知识建构的影响(Calloway,1981;Maguire,1987,2001a;Mies,1982;Reid & Frisby,2007;Reinharz,1992;Smith,1989),承认参与者的身份和关系结构影响知识创造的过程和结果。

参与式行动研究主张,人们能通过研究、教育和行动理解并改变他们的生活,参与式行动研究会面临现存的权力结构的挑战,它要为解决社会问题,开发更多的参与、民主的解决方案的机会。许多社会斗争和运动为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资料,包括工人运动(Adams,1975)、妇女运动(Maguire,2001b)、人权和和平运动(Tandon,1996)。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20世纪60、70年代后殖民时期国际发展援助概念的重构,该运动回应了近25年发展政策的失败(Frank,1973;Furtado,1973)。

许多早期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产生于传统的学术环境之外,尤其是在"南方"或者第三世界,在远离西欧和北美的环境中。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芬兰社会科学家和坦桑尼亚土地使用和生产局一起,以及她在大学的学生们,用"参与研究"的术语描述他们和坦桑尼亚村民的参与研究和开发工作(Swantz,1974,2008;Hall,1993)。与此同时,拉美社会科学家使用术语*investigation yaccion*(参与式行动研究)来描述"为改变事实而调查事实的研究"(de Souza,1988,p.35;FalsBorda,1977,1979)。

另外一个对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成人教育的重构。成人教育作为一种传统殖民地教育的替代品,动摇了原来的支配关系(Freire,1970;Horton & Freire,1990;Kindervatter,1979;Nyerere,1969)。遭遇到"成人教育哲学和研究方法论实践之间的矛盾"(Tandon,1988,p.5),成人教育者寻求发展能折射出民主和参与价值的同样的研究方法,这些价值能为他们的教学提供资料。弗莱雷在巴西的读写教育(Freire,1970)、斯堪的纳维亚乡村学校运动、霍顿及高地研究和教育中心(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的其他创造者的贡献(Horton & Freire,1990;Lewis,2001)推动了批判教育学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发展。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联系和网络,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把存在已久的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联系起来。

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989)的颁布,认可了儿童有参与影响他们的研究项目的权利,把年轻人当作主体而非研究对象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有了极大发展(Fine & Torre,2005)。无论是社区本位的机构,还是学校相关研究,都由年轻人——显然不同于那些环境中的成年人——来提出问题、构想行动框架(Cammarota & Fine,2008;Fernández,2002;Groundwater-Smith & Downes,1999;Guishard,2009;Hutzel,2007;Lewis,2007;MacIntyre,2000;Morgan et al.,2004;Tuck,2009)。

综上所述,这些不同源起的参与式行动研究有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把处于非支配地位的群体当作局外人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持久挑战。参与式行动研究至关重要的要素是大众知识的生成。或许最重要的是参与式行动研究源自、伴随着社会运动不断成长(Mies,1982)。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学院内受到针对特定学科积极分子奖学金的推动。社会识字运动和工人运动者、女权运动者、劳工积极分子、公民权工作者、专业学者中的积极分子,都为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些都是它在当代社会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

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在参与式行动研究中,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区别受到如下假设的挑战:实践为理论提供资料、实践是理论的折射。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解释资料、处理数据的方法离不开认识论、社会理论和伦理立场,这些形塑着我们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的理解。

一方面,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论、方法、方法论是多种多样的,在每个情境中都有不同的发展演化,正是由于对合作、尊重本土知识、恪守社会正义的信仰,以及相信民主进程的能力,才导致了个人的、机构的、共同体的积极改变,提供指引这些工作的通用原则(Brydon-Miller, Greenwood, & Maguire, 2003)。参与式行动研究源自这样一种理解:知识是多元的,那些被系统排除在知识生产过程之外的人,需要在研究过程中积极参与,尤其是当这些研究是关涉他们本身的时候。收集到的数据的属性、分析的方法、反思的结果和行动,在群体的合作中呈现出来,并且此过程中常常(不总是如此)有一位学术研究者作为伙伴。为了反思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原则,学术研究者必须肩负艰苦的工作,检视他或她的多重身份如何形塑、报告他(她)和共同体成员的各种承诺和约定。

对身份的批判性反思要求作权力和特权动力学分析。从外部来说,对研究关系等方面的反思为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了资料。早期由葛兰西学派和女性主义者鼓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发展成为对政治日程和其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的一种响应。对植根于这些工作中殖民主义的批判(Fals Borda & Mora-Osejo,2003),对妇女努力参与社会重建角色的评论(Mies,1982),应该被视为从理论上阐明权力关系的努力。在当代背景下,这些都应该被视为从理论上阐明后殖民主义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工作者意识到了弗莱雷的作品以及他对于压迫制度的分析(Freire,1970)。随着其他社会理论被用于参与式行动研究中,社会理论和行动之间的整体联系成为参与式行动研究策略的一个基本部分。理论框架被看作和政治有整体联系,意味着不仅仅要检视权力的运作方式,并且要检视参与的属性,检视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行动主义。社会斗争和社会研究之间取得共鸣的一个例子是:参与式行动研究中使用叙事,在批判种族理论中突出反叙事(Brydon-Miller,2004; Ladson-Billings & Tate,1995)。正如德尔加多指出的那样,“故事能够粉碎自满和挑战现状”(Delgado,2000,p.61),也会挑战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主要目标。另一个理论框架和参与式行动研究之间的交叉点是探索所

谓的边界知识(borderlands scholarship)(Anzaldúa,2007; Torre & Ayala,2009a),深化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践的途径。在批判种族理论和边界知识的相互关系中,有一个互惠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式行动研究提供了使批判视角更明显的具体策略,要求在这些理论框架中体现社会公正(Brydon-Miller,2004; Torre & Ayala,2009b)。

近代的社会理论强调能动性、主体性、实用主义。图尔敏(Toulmin,1988)描述了最近的哲学转向:从普遍的、普通的、永恒的思考到口头的、特定的、地方性的和及时的调查。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通过检视当地和情境化的含义,以及与研究方法论密切相关的道德、历史、政治现实,挑战实证主义者的调查(Rabinow & Sullivan,1985)。奥特纳(Ortner,2006)认为把主体性、行动、权力整合进社会研究的需求,就是伯克(Burke,2005)所说的行动者的回归。在参与式行动研究中,行动者变成了研究主体,行动者的研究环境和社区被编织入研究图景中。参与式行动研究赞成在过程中包括不同的行动者。这是研究实践的本土化,本土化的机构例如加拿大国家原住民健康组织(NAHO)发展了伦理原则,要求社区深度参与、要求共享研究项目全部的所有权(NAHO,2007;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1993; Smith,1999)。在许多本土社区,研究者给他们自己造就了坏名声。史密斯(Smith,1999)写到,研究是"本土世界术语中最肮脏的词汇之一"(p.1)。这是因为,像其他殖民者一样,研究者太多次来到土著人的社区,收集本土居民的故事,然后一声不响地消失,也不对社区做出任何回馈。这是许多本土社区经历的另一种形式的剥夺。一些民族志研究者被看作是和提供信息者合作的"间谍"(Deloria,1997)。在殖民地自治化和回收对其生活控制权的背景下,一些本地人反驳自我呈现部分和现在被称为原住民主义的东西(Niezen,2003)。

阿萨德(Asad,1993)把实践看作被殖民的主体性的重建。合作、互惠、咨询、公众参与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研究日程。公共人类学在增加,包括了研究中有公众参与和授权,这些研究致力于解决世界的问题(Lamphere,2004; Rylko-Bauer,Singer,& Van Willigen,2006)。在方法论的教材中,也越来越强调实践和实用主义(Creswell & Plano Clark,2007; Maxwell,2005)。

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允许多元知识,拒绝深植于实证主义世界观中的假设,强调批判反思,为使用现存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革新之间开启了折中途径之门。参与式行动研究利用量化(Krzywkowski-Mohn,2008; Merrifield,1993; Schulz et al.,1998)和质性研究方法,他们坚信社区面临的问题、他们生成的致力解决这些问题的研究问题,应该推动研究方法的发展。焦点多半集中在创造对话和通过互动生成知识。参与式行动研究者常常使用亲身体验的方法和交流策略(Kindon,Pain,& Kesby,2007),尤其是在和边缘群体一起工作时。

一个特定记录领域就是使用艺术来产生和记录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过程。参与式行动研究强调认识的多元途径,为基于艺术的方法论(arts-based methodologies)实验和革新奠定了丰厚的基础。艺术提供了表达方式、挑战和表达的潜能。基于艺术的方法采用了包括叙述故事(Sangtin Writers & Nagar,

2006)、视觉艺术(Bastos & Brydon-Miller,2004; Hutzel,2007)、摄影(McIntyre & Lykes,2004; Wang,1999)、表演(Boal,1985; Guhathakurta,2008; Pratt,2004)、纤维艺术、本土艺术(Lykes,2001)、媒体艺术新形式等。此外,例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新技术,允许使用者收集、合成、呈现诸如"环境灾害、健康结果、收入和教育不一致、居住地的犯罪率"(Mapedza, Wright, & Fawcett,2003)等相关现象的信息,为革新性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提供了机会,这些方法帮助共同体重新构想变化。根据持续的研究策略的认识论转型,可以预料到这些创新性的数据收集技巧的出现。艺术、图像组织以及其他技巧不能作为外来研究者在作出分析和解释时,获取更多信息的途径。再者,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丰富的理解,而且是在社会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行动方案(Cammarota & Fine,2008)。重要的是,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行动变成了在受压迫社会环境中产生变革的方式,在参与者中产生一种希望感和行动感(Mies,1996)。

显然,在实施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和群体合作者有大量可供利用的途径。但无论选择哪种特定方法,它们都产生于如下情境:局外人和群体知识形式之间的互动、致力于解决的问题、行动的性质、项目进展的方式。过程和结果一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虽然研究结果很重要,参与式行动研究者还是很注重通过研究过程培养群体参与者的知识和技能(Kesby, Kindon, & Pain, 2005; Maguire,1987)。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要求重新审查研究伦理。现行体制依赖研究伦理的契约模式,强调知情同意,强调研究者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种模式进一步确认了研究者的权力和权威,即纽克柯(Newkirk,1996)所称的,通过研究者的解释和呈现,暴露研究对象的隐私、背叛研究主题。目前的研究伦理模式通过彻底改变潜在的强制关系,对居于参与式行动研究核心的关怀和承诺原则表示质疑。

一种替代模式建立在契约伦理(covenantal ethics)概念的基础上,"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工作的一种伦理立场"(Brydon-Miller,2009,p.244;Hilsen,2006; May,2000)。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伦理基础被认为是一种共同体契约伦理体系,其架构包括互惠责任关系、合作决策、权力共享(Brydon-Miller,2007)。该框架利用男女平等的研究伦理(Brabeck,2000),和目前许多本土社区建立基于社区的研究伦理指导方针的努力相一致(Battiste,2007)。加拿大皇家土著民族委员会 1993 年出版了研究伦理指导方针,其中参与是最重要的:研究者需要建立一个合作程序,使得群体代表能够参与研究计划、执行、评估研究结果。国家原住民健康组织(NAHO,2007)颁发了土著群体伦理研究实践的文件,认为"所有人通过计划、执行、数据分析和报道,参与到整个研究项目中来"(p.2)。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整合各种重构研究伦理概念的努力、清晰阐释检验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伦理标准。

参与式行动研究主题的变化

下面的范例展现了世界上不同群体的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处理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年轻人自杀、自然灾害的响应和复原、地方性知识的再利用以提高学龄儿童的健康水准。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强调了参与式行动研究可采用的不同实践途径。但是这三个研究都展示了研究者发展与共同体成员亲密和信任关系的承诺，展示了为促进社会积极改变的共同的努力，以及他们反思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挑战和矛盾的愿望。

欢迎没被邀请的客人：参与式行动研究和自我雇佣妇女协会

Anu Sabhlok

> 我自认为的弱点，尤其是我怀孕了这一事实，却给我（一个研究者）带来了未曾想到的有利条件。我很受欢迎，他们很热情地欢迎我到他们家中去。很快就有成群的妇女围着我。啊！我想我不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应。但是我又再次惊讶了。我还没来得及问我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你已经怀孕了，怎么还到这里来？你的丈夫在哪里？你的家人怎么会允许你长途旅行呢？你为什么没有带鼻环呢？"——好像关注的焦点颠倒了，我是研究对象，他们是研究者。我和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故事，形成了一种约定，创造了一种空间，研究变成了一种对话而不是单向的访谈。
>
> ——Anu Sabhlok，田野日志的摘要，2001

论文是个人的一种冒险事业——这是你的问题、你的研究，最终是你获得个人的学位。然而，正如我在古吉拉特邦做论文的研究经历所展现的那样，更多参与的、群体中心的研究动力学很难预测，在过程中常常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展现。古吉拉特邦，印度西部的一个邦，经历了 2001 年大地震，这一年我开始了关于地震复原的博士研究工作。在 2002 年，印度穆斯林暴力骚乱爆发，导致 5 万多人逃到难民营，他们主要来自少数民族穆斯林社区。

当开始从事这个项目时，我还是学建筑和地理的学生，专攻震后建筑物和临时救济庇护所。然而和当地人的讨论表明，重要的不是建筑房屋的数量或者收到的援助金钱的数量，而是需要解决使用权、贪腐、经济自由化（从福利型国家摆脱出来）、宗教理念、权力等问题。因此，我的研究焦点转向了从执行救济和接收救济的角度，理解救济工作的多重含义。

有时"专家"被发展机构邀请来指导参与式行动研究。另一些时候学者和社区之间发展一种有机合作的关系。就我个人的例子而言,我想做参与式的、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取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等级制度的研究。这个愿望源自我主张男女平等的认识论立场和训练。合作不是有机的,而且我没有被邀请——一个人怎样才能变成社区的一部分、和社区合作、共同致力于一个工作议程呢?

解决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问题同样很重要。参与式行动研究如何在跨1万英里的地域范围内实施?我和曾经赞誉过的一个机构——自我雇佣妇女协会(SEWA)——通过邮件建立了联系,SEWA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和甘地主义斗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穷人和非正式部门女性工作者的行业工会。SEWA的妇女启用了五个救济营,发起了和平中心(Shantipath Kendras)来培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对话。通过我的工作,我想表达和SEWA的一致立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EWA的妇女,忙于她们的基层工作,并不轻易欢迎我。想缩小和SEWA工人阶层妇女间的距离显得几乎不可能。但是我想我们的共同愿景是建设一个更公正、和平、为一个合作进程铺路的更民主的国家(尤其是在古吉拉特邦)。

最终,在拜访了SEWA办公室两个月之后,我被SEWA研究院接纳为志愿者。SEWA研究院是SEWA的研究分部,在过去30年中,一直从事基层研究。SEWA研究院培训穷人、文盲、妇女使用研究工具,帮助他们组成一个"赤脚研究者"团队。这些团队进入城镇和乡村家庭,确定和证明非正式部门穷人妇女的相关问题。SEWA妇女也制作一些参与式的影像资料,使得公众能听到她们的心声。通过几次分享性的会议,我们决定描述救济基层人员的多重含义。起初,我们组织焦点小组访谈,共享集体和个人救济工作的经验。然后,在一两个SEWA妇女的陪伴下,我开始对个别SEWA妇女实施深度访谈和生活故事分享会议。每周周末,我们会在SEWA研究院再次召开分享会议,会上我会做一个访谈分析,SEWA团队会共享正在执行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在我回到美国的头一天,SEWA研究院召开了一次经验分享会议,在会上我们反思合作经验,尝试搞清数据的意义。资料收集过程和交流对救济努力的理解,在个体和群体的水平上,使我们对救济的共同理解变得深化和复杂化。通过讨论,集体产生了对救济过程的分析,不仅勾画了受影响的人员和分配资源的数量,而且揭示了权力(在国际、国家和地方水平)和身份问题(尤其是宗教、性别、阶层和种姓)在救济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作用。

2005年我回到美国,我誊录、翻译、二次分析了这些访谈和讨论资料,写出了300页的论文。虽然在写作阶段,我们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但与SEWA的合作较少。2007年我毕业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理学和女性研究的博士学位(Sabhlok,2007)。当我写作如下部分时,我和许多问题在作斗争:参与式行动研究要到哪种程度?虽然研究问题源自对话,通过研究,我们合作和共享收集的数据,致力于实现一个共同的社会公正议程,然而论文却是我个人的分析和写作。我也和归属问题作斗争——很显然,有时我被接纳为局内人(我们共享类似的承诺),另一些时候我又处于局外人立场(在阶层和教育背景上存在差异)。虽然我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对SEWA妇女来说没有用处,但我想正是合作研究、共

享和反思的过程丰富了他们和我在其他世俗事务中灾害救济的视角(因此影响行动)。所面临的这个例子揭示了当机构中的学者独立沉浸在参与式行动研究中时的挑战。

SEWA 的网站上有一棵无花果树。树的顶端浓密的树叶代表着其成员,大量的根从树枝中生发出来,代表着合作社、社会安全机构、SEWA 研究院、SEWA 不同的联合会。根的相互关联给予了大树以力量,新长出来的树枝和树根为 SEWA 的共同承诺和行动创造了新的空间。回首往事,我把我自己作为独立生长的新根的一部分却总是和树相连。放眼未来,我想象这些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这篇论文仅仅是和 SEWA 妇女长期约定的一个起点。

"不要焦虑——我们的社区已经有数百年的种植花木历史":学校环境的青少年参与式行动研究

Alicia Fitzpatrick 及其学生

在这个例子中,Alicia Fitzpatrick,一个高中教师和她的 15 个学生,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为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开辟了新的空间(Eriacho et al.,2007;Fitzpatrick et al.,2007)。Alicia,一位前和平联合会志愿者,在美国西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非传统高中(备择学校)教了三年的科学课。她也是教师教育硕士项目的研究生,该项目旨在促进批判反思、变革意图的行动研究。在此项目中,教师从事行动研究(AR)、改善自身的教学实践、达致更深入的理解;尝试动摇不公正的权力安排和形塑美国教育的各种关系(Maguire & Horwitz,2005)。

正是在我上教师行动研究的课程中,从 Alicia 和学生的对话中,参与式行动研究浮现出来。反思她自己的教学实践带来的改变,Alicia 是这样记载她的课堂实验活动的,"想到这个事实,我仍然不舒服,学生仍然在寻找已经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Eriacho et al.,2007,p.6)。她通过行动研究改善教学,努力克服教学实践的困难,她的学生之一,Alex,和她谈到了学校午餐的质量问题。他注意到广泛传播的糖尿病和肥胖病,认为学校的午餐应该包括新鲜的农产品和蔬菜的选择。有关此对话的报道,Alex 记录了两件事情。其一,Alicia 小姐实际上在倾听;其二,她问他,"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Eriacho et al.,2007,p.7)。他的回答是学校应该种植自己的食物,这构成了教师和学生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框架。

基于 Alicia 的建议,学校开发了农业管理选修课程。15 个学生(在 Alicia 的推动下,广泛吸纳社区成员作为资源)使用一系列研究——行动循环,通过计划、修建、运作学校温室和传统的花园,合作开发农业课程。核心组员包括 9 个男学生、5 个女学生,以及青少年的家长,被其他学校开除的学生,被鉴定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当他们开始时,Richelle,其中一位学生,记录到,社区把备择学校中的学生看作毕不了业的"坏影响力"(Eriacho et al.,2007,p.14)。这个项

目慢慢改变了这个看法,因为学生和社区成员互动时展示了领导才能。

Alicia 和她的学生研究当他们合作培育学校温室和花园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坚持记反思日志,用图声技术来分析他们的工作照(Wang,1999)。一组学生和 Alicia 合作完成她的行动研究课程论文(Eriacho et al.,2007)。他们是第一个在新墨西哥教学绩效中心(New Mexico 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年度教师行动研究会议上合作展示的师生小组(Fitzpatrick et al.,2007)。

随着参与式行动研究越来越多地被青年人运用到社区机构、发展项目、课外项目等(Fernández,2002; Hutzel,2007; MacIntyre,2000;Nairn,Higgins,& Sligo,2007),基于学校的师生参与式行动研究不再普遍了,事实上,有学者(Groundwater-Smith & Downes,1999)已经批评了教师作为研究者运动(teacher-as-researcher movement)。在此运动中,教师检测自身的工作实践,把学生定位为教师工作对象,而不是课堂中行动研究的合作者。在学校温室和花园项目中,Alicia 有意创设一个意味深长的学生领导和决策过程。这很有挑战性,因为在教师行动研究文献中,支持学生作为合作研究者的结构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Brydon-Miller & Maguire,2009)。通过行动研究课程,Alicia 持续和其他教师及学生交流,如何为学生控制项目和农业班级创设进程和空间。

Alicia 和她的学生一起工作来提升儿童参与的阶梯(1997; 也参见 Arnstein,1969),从基础梯级的控制性参与、象征性的学生参与到更有意义的由年轻人发起和指导的参与。该运动要求教师分享权力和对学生的控制权,要求社区成员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遵循"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指令。起初,Alicia 不愿意承担农业课程的创建,因为她不知道太多的园艺工作。Alex 消除了她的疑虑,"别焦虑——我们的社区已经从事数百年的园艺工作了"。学生知道,只要给予一个框架,他们就能够在干旱的西南地区,逐步挖掘大量的、长期的、共同体把握的传统园艺实践知识。青少年也被要求从温床中走出来,开发课程,建立和社区资源的联系,学会在官员面前说话,保持规律的入学。

在项目中,当师生遭遇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安排扮演时,师生面临另一个不自在的问题。Alicia 注意到,当学生们起初分配工作时,男孩从事温室建筑工作,女孩从事项目网站工作。她也意识到在课堂中男性声音的支配地位。"我们立刻开始集体讨论使女性能够开口说话的方式……帮助男性变成积极听者的策略"。她意识到教师的沉默容忍了男性的支配地位,她很惊讶,自己的第一冲动是关注女孩(个人交流,2007 年 5 月 5 日)。尽管她对学校的理性理解是一个种族的、阶层的、性别的场域(Maguire & Berge,2009),Alicia,一个社区局外人,不愿意开始性别主题项目的对话。但只要被给予空间和结构,学生通过"照片之声"自己完成。例如,Alicia 写到,当分析照片的时候,一个男学生指出,一张照片中只有男孩,另一张照片只有女孩。"Alicia 小姐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我想加入男孩团队,但如果那样我就会变成唯一的女孩,我就会感觉不恰当、不合适。"(Eriacho,et al.,2007,p.23) Alicia 继续讲道:"当 Alicia 和我们分享了想法之后……一个紧挨着她坐的男学生说,'什么? 你感觉是这样的?'她看着他,说,

'是的'"。只有女孩意识到了明显的性别区分。在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中,如下状况是寻常的:性别是分配给女性而非男性的特性,工作中的性别机制常常受到忽视(Maguire,2001b)。这次讨论之后,两个女孩加入了先前全部由男孩组成的小组。

温室和园艺项目是参与式行动研究和把学校风景变成学习风景的环保项目相结合的例子(Lewis,2007)。正如刘易斯(Lewis,2004)描述的那样,学校提供了一个稀有的、非殖民化的第三方空间,参与性研究和教育项目能够在此扎根。

"我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个事情":加拿大因纽特人自杀预防和矫正

Michael Kral

北极圈当地青年人的自杀已经成为流行病。加拿大因纽特人有世界上最高的自杀率。为什么自杀?我们简短地回顾历史。Nunavut,建于1999年,位于加拿大北极圈的中东部,是因纽特人的政治领地。版图有26个乡镇,有两万七千多人。几乎所有的乡镇成员都是因纽特人,说因纽特语和英语。和局外人的显著联系,始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苏格兰和美国的捕鲸船,随着皮毛贸易、传教士和警察三股力量而不断持续。因纽特人历史的巨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加拿大政府尝试帮助因纽特人摆脱流行的肺结核病和饥饿。因纽特人从家中搬到聚居地。孩子们被安排在日托或寄宿制学校,他们在学校中不说自己的方言。北部地区服务官员来管理聚居地,建立了一个异质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男性的性别角色有了改变,新的福利国家制造了贫穷,对于一个亲属关系居于社会核心的民族来说,代际隔离也开始了。许多孩子没有在适宜的家庭教育和传统的教养方式下长大,于是20世纪80年代他们孩子的自杀数量开始持续攀升(Brody,2000; Condon,1988; Kral & Idlout,2009; Wenzel,1991)。

1994年,我在加拿大Nunavut首府参加了一次有关自杀预防的国际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拜访北极圈。鉴于我和会议主办方——加拿大自杀预防协会——的联系,我应邀主持一个自杀研究的小组讨论。我是该小组唯一的局外人。许多与会者都是因纽特人,讨论使用因纽特语和英语,并有同声翻译。在此会上,来自不同乡镇的因纽特人都谈到,他们需要知道相应的知识来预防青少年自杀。一位年长的因纽特妇女起身用因纽特语讨论,"在我们的乡镇,有许多人自杀。我的亲戚住在另一个乡镇,那里却没有人自杀。我们需要向那个乡镇学习。我们需要咨询健康事宜。"因纽特人也谈到如何收集信息。这种知识收集需要采用口述和集体的视角,以便和因纽特文化保持一致——强调分享。老人和青年人应该和其他乡镇成员保持联系。会议最后一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围坐在圆桌旁,我建议大家根据这些想法组建一个项目。

作为局外人我很紧张,不想被看作另一个在利用他们的殖民研究者。我在一位翻译陪伴下,问一位因纽特老人,我参加这样的项目,和因纽特人发生联系,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的心在这里,那就好了。在接下来的三年,我们开发了一个项目。EvaAdams 组建了一个因纽特指导委员会,我组建了一个学术研究小组。我们的工作全部基于因纽特人提供的研究问题和方法。我们申请和接受拨款,在两个 Nunavut 乡镇做我们的首次研究,我们首先和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做研究,他们帮助我们形成研究问题,指导研究怎样进行。老人们帮我们确定开放性访谈题目,Anthony 志愿当受访者。最后,经过一个焦虑的暂停后(对我来说),他微笑着对我说那些正是他想问的问题,我感到很安心。在计划和数据收集阶段,因纽特指导委员会提供了最多的指导。2003 年我们完成了报告,我们的拨款在数年前早就结束了,但还是很值得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件工作不能匆忙地做。正是在这次工作中我第一次了解了参与式行动研究,它以本土方法论的形式显现。

许多因纽特人参与到我们的参与性研究中,核心小组由四个因纽特人和我组成。在我们 Nunavut 的研究小组中,我是唯一的局外人,很荣幸我能被大家如此接纳。并非因纽特乡镇的每个人都接纳我,这是我要承认的现实。我的因纽特伙伴也承认我能给他们带来有用的局外人的视角。我的主要伙伴是 Lori Idlout,拥抱生活委员会的执行董事,该委员会是 Nunavut 一个致力于防止自杀和维护群体健康的因纽特人机构。Lori Idlout信任参与式行动研究,不能容忍我们以其他方式开展工作,她告诉我,"当和因纽特人工作时,参与式行动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学术研究形式。方法论是这样的,决策由研究者和涉及的群体合作制定"(个人交流,2010 年 6 月)。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过程受到因纽特人地方性知识和专长的指导。过程本身是一种产出,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Natar Ungalaq 是我们在 Nunavut 的 Igloolik 的合作研究者,他长期参与帮助社区青年的工作。当我们讨论人们之所以从我们的拨款中获得报酬的时候,他说钱不是他的首要目的。"我是发自内心想做这件事情。"这是面临一个较困难的研究主题时,我们合作研究的持久精神,这种精神催生了个人和共同体的成功故事。因纽特人正在建立独立自治区,指向回收对他们生活的控制权,我们的研究正是和此一致的(Kral, Wiebe, Nisbet, Dallas, Okalik, Enuaraq, & Cinotta, 2009)。我们的研究是因纽特人驱动的,然而思想和内心的合作、热爱生活的文化、个人和群体的合作、因纽特自豪感等,都成为我们研究的推动力量。

共同主题在当地的反复

这些例子凸显了和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践相关的许多问题。研究者和研究过程涉及的群体成员的角色和关系问题,常常根据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机制来形塑。

但是这种一分为二,忽略了关系的复杂性和研究者同时占据多重位置的可能性。Anu 印度年轻妇女的身份,把她带入社区家庭,但是她的种姓、阶层、受教育水平又使得她显得与众不同。Alicia 作为局外人,使她的角色改变(从教师到学习者)成为必要,挑战植根于教育实践中的传统权力、权威制度。Michael 被清晰地界定为一个局外人、一个外乡人,这使得团体成员质疑他的参与,他长期致力于解决共同体的关键问题,带来了有效的干预措施和热情的友谊(Humphrey,2007;Johns,2008)。

共同体知识和专长的重要性、谁拥有和控制知识、谁从研究中受益等也是参与式行动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Alex 使 Alicia 安心,指出他的社区已经存在对农业技能的有效理解,Alicia 对知识的尊重、把资源和技能全部用在为社区服务,这些都代表了居于参与式行动研究核心的真诚的伙伴关系。同样,在 Michael 的例子里,他的合作伙伴 Lori 也记录到,参与式行动研究比其他任何社会研究形式都容易与当地文化产生共鸣,参与式行动研究符合本土的宇宙论,在该研究中关系居于核心、接受参与者推动的标准的评估(Denzin & Lincoln,2008,p.11)。这是一种方法和学术界的去殖民化,是一种关注分享和相互尊重的权力再分配的政治立场。费恩等(Fine,Tuck, & Zeller-Berkman,2008)表明,参与性方法通过对"谁提出研究问题、做出研究设计、设计研究方法、做出研究解释、得出研究结论、实施监督"等有意的颠覆,是对那些政治危机的响应(pp.160-161)。

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行动是为了使结论有用,群体参与到这些项目中,受益是明显的。基于群体的项目对减少因纽特青年自杀方面的影响,是参与式行动研究引致积极改变能力的确凿证明。同样,Alicia 的学生,不仅仅通过获得健康的食物受益,而且发展了更强劲的学术技能,增强了自豪感,被悦纳为为社区做贡献的成员。甚至当 Anu 质疑带来变化的有效性的时候,很显然她的伙伴掌握了新技能,获得了新的理解,她为积极促进社会改变的持续努力会持续使社区受益。

与此同时,承认参与式行动研究更广泛的含义很重要,承认知识对其他研究者、其他群体和环境的可转移性也很重要。在每个案例里,研究都由这些学者来做——包括大学学者和以群体为基础的研究者——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一些共同重要问题的理解,为他人解决相似问题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Michael 和他伙伴的工作正在被扩充到极地地区的其他乡镇,Alicia 的项目为其他教师思考"使社区现存知识进入课堂、丰富学生和教师本人的学习经历"的途径提供了机会。Anu 的工作为研究灾害救济的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叙述,灾害救济是建立在与那些执行最艰苦、最基础的灾害救济工作人员合作的基础上。

每一个例子都反映了早期描述的群体契约伦理标准体系:互惠责任、合作决策、权力分享。Michael 的项目显然处于本土研究伦理体系中,该伦理使对研究伦理的理解更有生气、更活跃。通过和 SEWA 的合作,通过对共同体关注问题的响应,Anu 也反思了这些价值标准。通过和学生分享权力,通过一起工作得出有

关过程的结论,Alicia 允许他们创建一个具有个人和文化意义的项目。利用这些工作,为群体契约伦理概念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模式,为其如何在实践中应用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示范。

执行中的实践教学问题

爵士乐挑战关于"什么是音乐,音乐如何运作,什么使音乐更美丽动人"的假设。在讲授参与式行动研究的过程中,正如爵士乐一样,为了在难以预测的、具有多重声音的合作和群体工作过程中,寻求美丽和多产,第一步是要挑战实证主义哲学支配性的审美标准和传统的教学法。正如一位学生 Beverly Eby 在完成了一年的参与式行动研究课程之后写到,"差不多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如何做是正确的"。

参与式行动研究为无论来自哪里的人们、无论他们的"乐器"和技能水平怎样,能够合作来"创作音乐"提供了空间和特定的过程。参与者,无论是专家还是新手,必须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检视自我的身份、权力和特权地位、互动模式,以及检视上述因素如何持续影响研究过程。参与式行动研究教学法必须和这些基础的价值观一致,积极主动地邀请和推动不同学习者的贡献和对话(Maguire,2001b)。这既兴奋又有潜在的恐惧,因为这意味着放弃教室中的控制权,允许以学生为首。

参与式行动研究可以被描述为大众教育、基于群体的研究、旨在取得积极社会变革的合作行动的交集(Brydon-Miller,2001; Hall,1993)。参与式行动研究从非正式的、实验性的教育和群体参与评估技巧中提取养分(Chambers,1980; Kindervatter,1979)。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社区中心,或者是在其他非正式的教育环境讲授参与式行动研究,都必须要组合三个要素。传统的"筑堤教育(banking education)"形式(Freire,1970)必须让位于更有生产性的、探索性的、发现性的教育,与此同时,对清晰阐述的该方法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保持关注。以这种方式挑战已被接受的教学法实践,创造了对基础的教育结构建设性的破坏(Cochran-Smith & Lytle,2009,p.86),把权力从教育者转移到鼓励所有参与者参与和所有权的系统中,无论他们是课堂中的学生还是其他团体的伙伴。

结 论

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隐喻,结果会很难处理。最后让我们考虑爵士乐和无花果树隐喻的局限性,对居于参与式行动研究核心的权力和特权问题提供一个更具细微差别的理解。Bania(属于印度贸易商的从属种姓),坐在无花果树下,

制订战略和计划,被指责为榨取农民的丰厚利润(Kumar,1983)。虽然不是无花果树的错误,只不过无花果树为其提供了树荫。谁从无花果树荫下制订的战略中受益?为了什么和谁的目的?在相似的状态下,我们关注参与式行动研究被那些使用合作语言、群体控制、鼓励过程性参与,最终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术当权群体的利益的主体使用的可能性。

起初,爵士乐被批判是男性起主导作用的音乐形式。文化和性别限制性因素一并把女性排除在外,使玩爵士乐的女性演奏者得不到承认。种族团结并不能战胜性别歧视。Tucker (n.d.)问到,"如果女士一直玩爵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更多关于爵士乐的东西呢?"我们对非裔美国妇女和其他妇女对世界爵士乐所做贡献的认识有限的原因,和我们一度对妇女在参与式行动研究早期所起的广泛作用的认识有限的原因类似。那些变成标准的历史记录常常是由男性书写的,都是关于男性同事的,引用男性同事的出版物(Maguire,Brydon-Miller,& MacIntyre,2004)。我们并不指望男性社会科学家或者项目指导者会熟知推进女性主义的奖学金或者妇女工作项目。

伟大的爵士乐和无花果树要持久不衰,它们必须发展和改变。无花果树扩展枝干、放下嫩枝,嫩枝生根变成新树。像查尔斯·明格斯以及其他的音乐家,必须要欢迎舞台上新一代的爵士乐音乐家,甚至接纳新的音乐形式。因此参与式行动研究随着新的加入者而不断生长、改变和扩充。Anu、Michael、Alicia 以及在此领域中工作的其他学生、青年学者,代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新的形式和声音。个体对群体同伴的承诺,致力于取得有意义的社会改变,反映了前辈对他们的影响和价值。与此同时,理论和方法论的革新,包括越来越多可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国际对话、交流经验和实践的机会,使其成为可能,为此领域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之后就总体上与全球和地方的明显的社会斗争相联系,与当地的人如何使用研究方法来理解和改变世界相联系。

我们强烈相信参与式行动研究推动我们挑战和动摇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的力量,为那些平时最不能发声的人提供一个共享知识和智慧的机会,为那些共同致力于引发积极的社会改变、创造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人们创造机会。

注 释

1.作者的顺序按首字母排列,大家对这项工作做出了同等的贡献。

2.我们想感谢 Warren Foster,他建议用爵士乐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之所以选择爵士乐历史的这个时刻是因为引用 Rick Van Matre(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校爵士乐指导)的话,"绝大多数现代爵士乐音乐家仍然会想到明格斯以及在梅西音乐厅音乐会演奏的具有最高艺术和合作水准的音乐家"。Van Matre 继续谈道:"排除抨击对象、研究、分析、达到个人最好水平的原则,允许你和他人更直觉地、合作地互动,创造一个比部分更大的

整体,对所有的爵士乐和合作研究来说都是普遍的"(Van Matre,个人交流)。爵士乐形式,像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一样,不断发展,这种对艺术和合作的贡献,成为实践中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我们感谢 Norman Denzin 和 Rick Van Matre 对爵士乐历史、参与式行动研究和爵士乐之间的联系的洞见和反思。

参考文献

Adams, F. (1975). *Unearthing seeds of fire: The idea of Highlander*. Winston-Salem, NC: John F. Blair.

Anzaldúa, G. (2007).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3rd ed.).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Arnstein, S. R.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5*(4), 216-224.

Asad, T. (1993). Afterword: 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 In G. W. Stocking (Ed.),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pp. 314-32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astos, F., & Brydon-Miller, M. (2004). Speaking through art: Subalternity and refugee women artists. In B. M. Lucas & A. B. Lopez (Eds.), *Global neo-imperialism and national resistance: Approaches from postcolonial studies* (pp. 107-118). Vigo, Spain: Universidade de Vigo.

Battiste, M. (2007). Research ethics for protect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heritage: Institutional and researcher responsibilities. In N. K. Denzin & M. D. Giardina (Eds.), *Ethical futur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Decolonizing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pp. 111-132).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Boal, A. (1985).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Pluto.

Brabeck, M. M. (Ed.). (2000). *Practicing feminist ethics in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Brody, H. (2000). *The other side of Eden: Hunters, farmer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North Point Press/Farrar, Straus & Giroux.

Brydon-Miller, M. (2001).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ction: Theory and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D. L. Tolman & M. Brydon-Miller (Eds.), *From subjects to subjectivities: A handbook of interpretive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 (pp. 76-89).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Brydon-Miller, M. (2004). The terrifying truth: Interrogating systems of power and privilege and choosing to act. In M. Brydon-Miller, P. Maguire, & A. McIntyre (Eds.), *Traveling companions: Feminism, teaching, and action research* (pp. 3-19). Westport, CT: Praeger.

Brydon-Miller, M. (2007, September). *The community covenant: Understanding the ethical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Arbeidsforskningsinstituttet/Work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Norway.

Brydon-Miller, M. (2009). Covenantal ethics and action research: Exploring a common foundation for social research. In D. Mertens & P. Ginsberg (Eds.),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ethics* (pp. 243-258). Thousand Oaks, CA: Sage.

Brydon-Miller, M., Greenwood, D., & Maguire, P. (2003). Why ac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1*(1), 9-28.

Brydon-Miller, M., & Maguire, P. (2009).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tioner inquiry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17*(1), 79-93.

Burke, P. (2005).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alloway, H. (1981). Women's perspective: Research as re-vision. In P. Reason & J. Rowan

(Eds.), *Human Inquiry* (pp. 457-472). New York: John Wiley.

Cammarota, J., & Fine, M. (Eds.). (2008). *Revolutionizing education: You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Chambers, R. (1980). *Rapid rural appraisal: Rationale and repertoire* (IDS Discussion Paper No. 155). Brighton, UK: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Cochran-Smith, M., & Lytle, S. (2009). *Inquiry as stance: Practitioner research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Condon, R. G. (1988). *Inuit youth: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reswell, J. W., & Plano Clark, V. L. (2007).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lgado, R. (2000). 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 A plea for narrative. In R. Delgado & J. Stefancic (Eds.), *Critical race theory: The cutting edge* (pp. 60-7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Deloria, V., Jr. (1997). Anthros, Indians, and planetary reality. In T. Biolsi & L. J. Zimmerman (Eds.), *Indians and anthropologists: Vine Deloria Jr. and th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pp. 209-221).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2008). Introduction: Critical methodologies and indigenous inquiry.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Eds.), *Handbook of critical &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pp. 1-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 Souza, J. F. (1988). A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Latin America. *Convergence*, *21*(2/3), 29-38.

DuBois, W. E. B. (1973). *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en critiqu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Eriacho, R., Fitzpatrick, A., Jamon, A., Lahaleon, T., LaRue, F., Lewis, K., Poncho, G., Quam, R., & Tsethlikai, G., & Tsethlikai, S. (2007). *A student initiative to improve school lunch by practic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nd modern greenhouse management practi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We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 Gallup Graduate Studies Center, Silver City, NM.

Fals Borda, O. (1977). *For praxis: The problem of how to investigate reality in order to transform i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rtagena Symposium on Action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Cartagena, Colombia.

Fals Borda, O. (1979). Investigating reality in order to transform it.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1), 33-55.

Fals Borda, O., & Mora-Osejo, L. (2003) Context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A critique of Eurocentrism. *Action Research*, *1*(1), 20-37.

Fay, B. (1975).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Fernández, M. (2002). *Creating community change: Challenges and tensions in community youth research* (JGC Issues Brief). Stanford, CA: John W. Gardner Center for Youth and Their Communities.

Fine, M., & Torre, M. (2005). Resisting and researching: You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S. Ginwright, J. Cammarota, & P. Noguera (Eds.), *Social justice, youth, and their communities* (pp. 269-285). New York: Routledge.

Fine, M., Tuck, E., & Zeller-Berkman, S. (2008). Do you believe in Geneva? Methods and ethics at the global-local nexus.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 L. T. Smith (Eds.), *Handbook of critical & indigenous methodologies* (pp. 157-180). Thousand Oaks, CA: Sage.

Fitzpatrick, A., Concho, G., Jamon, A., Lahaleon, T., LaRue, F., Tsethlikai, G., & Tsethlikai, S. (2007, June 8). *Youth action research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a rural Southwest USA schoolyar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Fifteenth Annual Ac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at 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 Portales, NM.

Frank, A.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 K.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94-103).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Seabury.

Furtado, C. (1973). The concept of external dependence. In C. K.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18-123). New York: Random House.

Groundwater-Smith, S., & Downes, T. (1999). *Students: From informants to co-researche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Guhathakurta, M. (2008). Theatre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xperiences from Bangladesh.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2nd ed., pp. 510-521). London: Sage.

Guishard, M. (2009). The false paths, the endless labors, the turns now this way and now that: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mutual vulnerabi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quiry. *Urban Review*, *41*, 85-105.

Hall, B. (1993). Introduction. In P. Park, M. Brydon-Miller, B. Hall, & T. Jackson (Eds.), *Voices of chang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pp. xiii-xxii).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Hall, B. (2001, December 5). *In from the cold? Reflections o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from 1970-2002.* Inaugural Professori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Hart, R. (1997).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volving young citizen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are.* New York: UNICEF/Earthscan.

Hilsen, A. I. (2006). And they shall be known by their deed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action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4*(1), 23-36.

Horton, M., & Freire, P. (1990). *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Conversations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 C. (2007). Insider-outsider: Activating the hyphen. *Action Research*, *5*(1), 11-26.

Hutzel, K. (2007). Re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reclaiming a playground: 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tudy.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48*(3), 299-320.

Johns, T. (2008). Learning to love our black selves: Healing from internalized oppressions.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2nd ed., pp. 473-486). London: Sage.

Kemmis, S., & McTaggart, R. (2005).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559-603). Thousand Oaks, CA: Sage.

Kesby, M., Kindon, S., & Pain, R. (2005).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and diagramming techniques. In R. Flowerdew & D. Martin (Eds.), *Methods in human geography: A guide for students doing a research project* (pp. 144-166). London: Pearson Prentice Hall.

Kindervatter, S. (1979). *Nonformal education as an empowering proces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Kindon, S., Pain, R., & Kesby, M. (Eds.). (2007).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 London: Routledge.

Kral, M. J., & Idlout, L. (2009). Community wellness and social action in the Canadian Arctic: Collective agency a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L. J. Kirmayer & G. G. Valaskakis (Eds.), *Healing traditions: The mental health of aboriginal peoples in Canada* (pp. 315-334).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Kral, M. J., Wiebe, P., Nisbet, K., Dallas, C., Okalik, L., Enuaraq, N., & Cinotta, J. (2009). Canadian Inuit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suicide pre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rcumpolar Health*, *68*, 91-107.

Krzywkowski-Mohn, S. (2008). *Diabetic control and patient perception of the Scheduled in Group*

Medical Appointment at the Cincinnati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Medical Center.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H.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s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mar, K. (1983). Peasants' perception of Gandhi and his program: Oudh, 1920-1922. *Social Scientist*, *11*(5), 16-30.

Ladson-Billings, G., & Tate, W. F. (1995). Towards a critical race theory of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97*(1), 47-69.

Lamphere, L. (2004). The convergence of applied, practicing, and public anthrop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Human Organization*, *63*, 431-443.

Lengermann, P., & Niebrugge-Brantley, J. (1998). *The women founders: Sociology and social theory: 1830-1930.* Boston: McGraw-Hill.

Lewis, H. (2001).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social change: Highlande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pp. 356-362). London: Sage.

Lewis, M. E. (2004). A teacher's schoolyard tale: Illuminating the vagaries of 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pedagog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10*(1), 89-115.

Lewis, M. E. (2007, April). *Developing and practic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pedagogy in a NYC high school greenhouse project: An insider's narrative inquiry.*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IL.

Lykes, M. B.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ssociation of Maya Ixil women—New Dawn, Chajul, Guatemala). (2001). *Creative arts and photography i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Guatemala.*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pp. 363-371).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cIntyre, A. (2000). *Inner-city kids: Adolescents confront life and violence in an 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acIntyre, A., & Lykes, M. B. (2004). Weaving words and pictures in/through feminist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M. Brydon-Miller, P. Maguire, & A. McIntyre (Eds.), *Traveling companions: Feminism, teaching, and action research* (pp. 57-77). Westport, CT: Praeger.

Maguire, P. (1987). *Doing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feminist approach.*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guire, P. (2001a). The congruency thing: Transform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pedagogy. In D. Tolman & M. Brydon-Miller (Eds.), *From subjects to subjectivities: A handbook of interpretive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s* (pp. 276-289).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Maguire, P. (2001b). Uneven ground: Feminisms and action research.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pp. 59-69). London: Sage.

Maguire, P., & Berge, B.-M. (2009). Elbows out, arms linked: Claiming spaces for feminisms and gender equity in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In B. Somekh & S. Noffke (Eds.),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pp. 398-408). London: Sage.

Maguire, P., Brydon-Miller, M., & McIntyre, A. (2004). Introduction. In M. Brydon-Miller, P. Maguire, & A. McIntyre (Eds.), *Traveling companions: Feminism, teaching, and action research* (pp. ix-xix). Westport, CT: Praeger.

Maguire, P., & Horwitz, J. (2005, April 11). *Nurturing transformative teacher action research in a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Possibilities and ten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Mapedza, E., Wright, J., & Fawcett, R. (2003). An investigation of land cover change in

Mafungautsi Forest, Zimbabwe, using GIS and participatory mapping. *Applied Geography*, *23* (1), 1-21.

Maxwell, J. A.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y, W. F. (2000). *The physician's covenant: Images of the healer in medical ethics* (2nd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McDermott, C. (2007, June 6-9). Teaching to be radical: The women activist educators of Highlander. In L. Servage & T. Fenwick (Eds.), *Proceedings of the joi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dult Edu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and the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dult Education* (pp. 403-408), 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Halifax, Nova Scotia, Canada.

Merrifield, J. (1993). Putting scientists in their plac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In P. Park, M. Brydon-Miller, B. Hall, & T. Jackson (Eds.), *Voices of chang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pp. 65-84).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Messer-Davidow, E. (2002). *Feminism: From social activism to academic discours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ies, M. (1982). *Fighting on two fronts: Women's struggles and research.*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Mies, M. (1996). Liberating women, liberating knowledge: Reflections on two decades of feminist action research. *Atlantis*, *21* (6), 10-24.

Mills, C. W. (1961).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Grove.

Morgan, D., Pacheco, V., Rodriguez, C., Vazquez, E., Berg, M., & Schensul, J. (2004). You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on hustling and its consequences: A report from the field.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14* (2), 201-228.

Nairn, K., Higgins, J., & Sligo, J. (2007, June 9). Youth researching youth: "Trading on" subcultural capital in peer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National Aboriginal Health Organization (NAHO). (2007). *Considerations and templates for ethical research practices.* Ottawa, Ontario, Canada: Author.

Newkirk, T. (1996). Seduction and betrayal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 Mortensen & G. Kirsch (Eds.), *Ethics and representation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literacy* (pp. 3-16). Urbana, 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Niezen, R. (2003). *The origins of indige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yerere, J. (1969). Education for self-reliance. *Convergence*, *3*(1), 3-7.

Ortner, S. B. (2006).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acting subjec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ratt, G. (2004). *Working femin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rice, D. (2004). *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abinow, P., & Sullivan, W. M. (1985).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second loo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ason, P., & Bradbury, H. (2008). *The SAGE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Reid, C., & Frisby, W. (2007). Continuing the journey: Articulating dimensions of feminist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PAR).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2nd ed., pp. 93-105). London: Sage.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yal Commission on Aboriginal Peoples. (1993). *Integrated research plan: Appendix B. Ethical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Ottawa, Ontario, Canada: 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

Rylko-Bauer, B., Singer, M., & Van Willigen, J. (2006).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178-190.

Sabhlok, A. (2007). *SEWA in relief: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disaster relief in Gujarat, Indi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State College.

Sangtin Writers, & Nagar, R. (2006). *Playing with fire: Feminist thought and activism through seven lives in In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ulz, A. J., Parker, E. A., Israel, B. A., Becker, A. B., Maciak, B. J., & Hollis, R. (1998). Conducting a participatory community-based survey for a community health intervention on Detroit's East Sid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4*(2), 10-24.

Smith, D. E. (1989).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L. T. (1999).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 London: Zed.

Swantz, M. L. (1974). *Participant role of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ureau of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Land Use Planning,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Tanzania.

Swantz, M. L. (2008).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s practice. In P. Reason & H. Bradbur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 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2nd ed., pp. 31-48). London: Sage.

Tandon, R. (1988).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Convergence*, *21* (2/3), 5-18.

Tandon, R. (1996).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contemporary tendencies in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K. de Koning & M. Martin (Ed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health* (pp. 19-26).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Zed.

Tandon, R. (2005). *Participatory research: Revisiting the roots.* New Delhi, India: Mosaic Books.

Torre, M., & Ayala, J. (2009a). Envisioning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entremundo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19*(3), 387-393.

Torre, M., & Ayala, J. (2009b, August). *Participatory echoes of Chataway: A symposium reflecting on the social change legacy of Cynthia Joy Chatawa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oronto, Ontario, Canada.

Toulmin, S. (1988). The recovery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American Scholar*, *57*, 337-352.

Tuck, E. (2009). Re-visioning acti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theories of change. *Urban Review*, *41*, 47-65.

Tucker, S. (n.d.). *Women in jazz.* Available at http://www.pbs.org/jazz/time/time_women.htm

United Nations. (1989).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New York: Author.

Wang, C. (1999). Photovoice: 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trategy applied to women's health.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8*, 185-192.

Wenzel, G. W. (1991). *Animal rights, human rights: Ecology, economy and ideology in the Canadian Arctic.* Toronto,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4 什么是质性健康研究

WHAT 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 简尼希 M. 莫尔斯(Janice M. Morse)

张 遐 译　朱志勇 校

什么是质性健康研究？为什么从事质性健康研究的研究者需要学习单独的课程，需要坚守他们自己的学术期刊，要求有专门的方法论教材？成为一个好的质性健康研究者，都要求知道质性调查、擅长质性方法吗？并非如此。

本章我将讨论卫生保健领域的质性研究者遭遇的复杂性，参与者条件的严肃性，他们研究主题的生死属性，他们发现的临床意义，找出质性健康研究者和从事其他形式的质性调查者的显著不同之处，讨论质性健康研究的结果。在此，我将构想质性健康研究的起源、内容和范围。然后，根据对 2009 年所有在《质性健康研究》(*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上发表文章的内容分析(第 19 卷，142 篇文章)，我讨论了目前强调的领域、临床应用以及这些文章对医疗和卫生保健领域的贡献。在最后部分，我讨论质性方法为什么适用和怎样适用于病人和临床环境，结束时得出结论：质性健康研究正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子学科领域。

传统基础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当民族志(主要由社会学家执行)开始出现的时候，质性调查在医院和卫生保健机构、诊所，就已经存在。一些研究工作已经成为经典。这包括了医学学生社会化的研究《白人男孩》(*Boys in White*)(Becker, Geer, Hughes, & Strauss, 1961)；戈夫曼的《庇护所》(*Asylums*)(Goffman, 1961)；华盛顿地区精神病人和其他居民研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5)的《死亡意识》(*Awareness of Dying*)；奎因特(Quint, 1967)的《护士和垂死的病人》(*The Nurse and the Dying Patient*)；帕莱斯(Parsons, 1975)的《病人角色和内科医生角色的重构》(*The Sick Role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Reconsidered*)。20 世纪 70 年代在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格拉泽和斯特劳斯与他们的学生(Julie Corbin, Shizuko Fagerhaugh, David Maines, Barbara Suczek, Carolyn Weiner)(Strauss et al., 1975)合作

出版了《慢性病和生活质量》(*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为质性健康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护理方面,质性调查依赖来自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教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们开始写自己的方法教材,从别的学科发展到更集中关注护理学。他们也在健康领域开展重要的质性调查。杰曼(Germain,1979)的《癌症单元》(*Carcer Unik*)、本纳(Benner,1984)的《从新手到专家》(*From Novice to Expert*)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医药方面,克莱因曼(Kleinman,1980)的早期工作是开创性的。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建立了扎根理论,在他们的"第二代"学生(Phyllis Stern,Julie Corbin,Barbara Stevens,Kathy Charmaz,Adele Clarke)的努力下,扎根理论获得了持续发展,除此之外,其他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民族志方法(Morse et al.,2009)。

在现象学领域,伯格(Berg,1960)的《病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the Sick Bed*)是意义重大的。然后主要通过范梅南的工作——他的方法论教材(van Manen,1990)、人类科学会议、《现象学和教育学》(*Phenomenon and Pedagogy*)杂志(Vols.1-10,1983-1992)——现象学在北美获得了重要地位。范梅南和他的护理学学生,首先把疾病现象学发展为一个重要领域,调查疾病具身化(embodiment)的意义。

克莱伯特里和米勒(Crabtree & Miller,1992)的《做质性研究》(*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和家庭实践质性兴趣小组年度会议及其编辑的出版物在推动质性调查向药学领域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药学领域的叙事调查始于克莱因曼(Kleinman,1986)的《疾病叙事》(*The Illness Naratives*)和布劳迪(Brody,1987)的《疾病故事》(*The Stories of Sickness*),为了对关怀和照料的情况进行评估,他们把病人的体验带进医药领域(Engel,Zarconi,Pethtel, & Missimi,2008)。自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焦点小组作为一种方法,在精神病学和家庭医药学方面,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

质性调查,作为一种方法和研究途径,进入卫生保健领域,首先是通过一群护士人类学家的工作(最显著的就是Madeleine Leininger,Pamela Brink,Margarita Kay,Eleanor Bowens,Noel Chrisman)。他们通过美国人类学协会护理人类学家委员会(CONAA),为质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支持性的论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质性研究方面的教材开始出现(Field & Morse,1985; Leininger,1985),那时候多是面向研究生开设课程,鼓励国立卫生研究院护理研究国家中心(NINR,现在的国家护理研究院)资助质性研究。质性健康研究发表的文章散见于几个期刊,例如,《医学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in Medicine*),或者学科专业杂志,例如《医学人类学》(*Medicine Anthropology*)或者《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1991年,《质性健康研究》开始发行季刊,目前每年发行12期。

对于质性研究者来说,获得一种认同实属不易。卫生保健研究仍然受治疗、治愈、使用临床试验的医学研究的支配,而不是受更主观的、经验性的质性调查的影响。医学研究者倾向对疾病而不是病人进行研究,事实上他们和病人仅保

持有限的联系,他们把病人的体验全部放到了幕后。再者,医学研究资助机构长期以来过于由量化研究者把持,他们不了解也不欣赏质性研究的原理,因此质性研究获得承认的进程是缓慢的。

即使在今天,在医学领域,质性研究仍然受到贬抑。在英国,Cochrane 标准仍被用于评估医学领域的证明(Cochrane,1972 /1989;Sackett,1993)。这一体系建立了一套从最可信的临床试验到最不可信的"只不过是意见"的证据等级。虽然我不相信 Cochrane 标准想把质性调查纳入其等级,但是研究者还是倾向于把质性调查纳入最低等级中,把它归类为"只不过是意见"。这种分类的结果是质性研究被诽谤为无效的或者无价值的。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在澳大利亚,Cochrane 标准被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NHMRC)做出资助决定,质性调查被认为是没有竞争力的,人们耗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成功逆转该局面。如今,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委员会也资助质性调查,支持召开研讨会,委托开展质性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质性调查也被认为不适用于 Cochrane 标准。由珀佩(Jennie Popay)领导的委员会致力于将质性调查视作在确定证据方面足够严格的方法。《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开辟了一个质性研究方法的专栏,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和《美国医疗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ime Association*),都能偶尔见到质性研究的文章。为了支持质性调查的发展,受阿尔伯塔医疗研究遗产基金会的资助,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在 1997 年成立质性方法论国际学院(IIQM)。质性方法论国际学院努力把质性调查建成一个学科,它资助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质性健康以及质性研究方法进展的国际会议,并举办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称为质性思考),因此帮助培训新的一代质性健康研究者。质性方法论国际学院主办了一个多语言、全方位开放的在线杂志《质性方法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支持《质性健康研究》(一个国际杂志月刊),发起了一个博士后和博士的培训计划(增强对疾病过程及防护的质性理解[EQUIPP]),为国际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国内和国际拓展包括通过八个国际站点,和 115 所大学建立联系,这些站点的主要工作是在国际范围内轮流发起附加研究、建立研究中心、举办国际会议并建立相应机构。

2011 年的今天我们在哪里?质性健康研究在许多医学杂志上发表,虽然这些文章从总量上算少数。在许多大学,质性调查是研究生研究培训的基本组成部分,虽然和量化研究相比,其居于不平等的起点。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最近的 2008 年,采用质性研究的研究者仍被拒绝参加加拿大泌尿学会议(Morse,2008)。随着更多的研究者在质性调查方面能力不断提升并越来越有经验,早期存在的缺乏支持质性研究导师的危机正在逐步得到缓解,关于质量和标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毫无疑问这个领域在不断成熟。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

质性健康研究者研究什么?

目前质性健康研究发生在质性卫生保健的所有领域:医院、养老院、诊所、学校、工作场所、社区(街道、公园、家庭)。它聚焦于患病经历、病人状态和行为,具体包括事故、急性发作和慢性病。另外,看护者的体验,包括专业和业余看护者及其与病人的互动,也是其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质性调查检视人们对疾病的文化认知和反应,通常聚焦于个人、家庭和群体。质性健康研究也包括了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教育、为病人及家人提供卫生保健信息。

为了具体解释,下文我举了一些属于质性健康研究的具体例子,做了对《质性健康研究》杂志(2009 年 1-12 期,第 19 卷)的一个简要综述。

质性健康研究的贡献

采用质性方法聚焦于卫生保健研究能够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例如其中一种方法是根据参与者的年龄、种族、医学专业或者疾病划分,或者根据行为观念或研究方法种类进行划分。为达成本章的目的,我将采用最宽泛的方法对研究进行分类,即根据临床应用、教育主题、后续研究群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正在检视卫生保健需求识别、卫生保健障碍和路径、寻求卫生保健的过程、对疾病的响应、调整适应生病的状态、忍受疾病、治疗反应、专业看护者的行为和体验、业余看护者体验、专业看护者视角、专业和业余看护者的共同体验。也有很多的研究强调疾病支持系统和疾病康复经历研究。有助于医药、护理及其他相应的医疗从业者的研究也很重要,它们有助于症状描述。最后我将讨论卫生保健评估、给病人讲授卫生保健知识和对医疗从业人员开展教育等内容。

表 24.1 呈现了意识到生病的过程(对急性发作和偶发事件的响应)、寻求和接受看护的过程以及康复的过程。

卫生保健需求的识别

这种类型的研究指出了医疗制度内并非目前才致力于被忽略的或新出现的卫生保健问题,它们要么没有处理,要么处理不当。根据某些危害健康的共同要素,这些问题可被分为许多子类,它们会是医疗制度忽视的一些因素,也会是环境中损害健康的因素。在这些研究常常使用民族志和访谈的方法,指出不平等待遇和健康问题。例如,在迪玛科等人(De Marco,Thorburn & Kue,2009)的研究中,营养不良的参与者谈道:“在一个像美国一样富有的国家,人们应该在不停地吃”。

表 24.1 2009 年《质性健康研究》文章举例

文章标题	作　者	引　用
卫生保健需求的识别		
俄勒冈州城市和乡村地区居民对食品不安全的看法	De Marco et al.	19,1010-1024
更年期:描绘应对策略的复杂性	Kafanelis et al.	19,30-41
识别寻求卫生保健的模式		
癌症病人协商多种治疗选择的解释	Broom	19,1050-1059
新西兰和萨摩亚地区的萨摩亚人如何寻求治疗	Norris et al.	19,1466-1475
荷兰的土耳其丁克移民的不自觉经历	Van Rooij et al.	19,621-632
描述疾病经历		
向家人和朋友公开癌症诊断	Hilton et al.	19,744-754
健康看护中的尊严侵犯	Jacobson	19,1536-1547
女性 HTV 携带者的艾滋病疾病含义:合并免疫和生活经历	Scott	19,454-465
儿科姑息治疗文化	Davies et al.	19,5-16
适应疾病状态/带病生活		
食管切除术后的生活适应	McCorry et al.	19,1485-1494
死亡阴影下寻求生活的意义	Kenne Sarenmalm et al.	19,1116-1130
躁郁症在线论坛的社会支持和主动提供的建议	Vayreda & Antaki	19,931-942
易受抗逆转录病毒失败侵害的 HIV 女性感染者的服药视角	Stevens & Hildebrandt	19,593-604
乌干达 HIV 女性感染者的生活改变、应对策略和结果披露	Medley et al.	19,1744-1754
乳腺癌患者的外照射治疗经历	Schnur et al.	19,668-676
肾移植失败的经历	Ouellette et al.	19,1131-1138
专业看护提供者的经历和实践		
二级劳动中的出生谈话	Bergstrom et al.	19,954-964
精神病治疗访谈中医生的问题立场	Ziółkowska	19,1621-1631
业余看护者的经历和实践		
照料癌症晚期配偶的老年妇女的希望历程	Holtslander & Duggleby	19,388-400

续表

文章标题	作　者	引　用
专业和业余看护者的视角		
在生命晚期遭遇非正式的、专业的看护	James et al.	19,258-271
曾经是病患的从业者的移情和许可	Fox et al.	19,1580-1588
支持系统的识别和分析		
与另一个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在一起	Champlin	19,1525-1535
复苏和攻击性进程中的家庭存在:护士的看法	Miller & Stiles	19,1431-1442
疾病经历的反思		
儿童癌症存活的悖论	Cantrell & Conte	19,312-322
儿童哮喘的常规策略	Protudjer et al.	19,94-104
我女儿的噩梦:宫外孕	Lahman	19,272-278

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是,健康状态不好、低收入、失业都对营养不良有助推作用,但是这些研究表明了营养援助计划、可替代的食物来源、补充饮食的社会支持("天赐之物")的重要性。作者建议政策应该聚焦于增加预防营养不良的人力资本。

这个建议听起来是不是很显然?通过比较,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妇女应对更年期的复杂描述(Kafanelis, Kostanski, Komesaroff, & Stojanovska, 2009)。这些作者写到,妇女们的反应时而强烈时而低落,她们在生活事件的转换中时而困惑、时而崩溃、时而寻求改变、时而安庆……这种易变性使得妇女能够创造、发现和重新解释她们的经历……使得妇女们能够维持、巩固、固化不同的应对策略(p.39)。卡菲奈里斯(Kafanelis)等从混乱中厘清了三种响应:有发明才能的(能够有效地响应、能够解决各种经验问题),困惑的(焦虑、消极、增加冲突地回应),反应性的(坚决的、主动的、博学的、积极的)。这个研究阐明了质性调查具有反映生活、揭示隐藏的内容、对提供看护的人较有实用性的能力。很显然一个好的质性调查,能够从平凡的问题中产生有意义的发现。

识别寻求卫生保健的模式

西方提供看护的模式是简单的:病人怀疑自己有了健康问题,就会向医生寻求治疗和护理。医生进行诊断并给出治疗建议,病人遵从治疗进而获得康复。但是对某些病人来说,这种模式是失败的,因为存在护理的障碍,阻碍他们接受治疗。

一个新西兰萨摩亚人的研究小组描述到,当人们生病时,根据对疾病症状的解释,根据家庭中其他成员投入的效果,来选择不同的治疗过程和方案,他们进一步解释了萨摩亚人如何选择西医或者传统的萨摩亚卫生保健和治愈资源,或

者两种结合。个人也许会选择一种行动方案,但有可能会被家人推翻,这一事实对所有那些家庭是重要的治疗决策单元的文化来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Norris, Fa'alau, Va'ai, Churchward, & Arroll, 2009)。当病人去看医生时,这种模式有可能失败。病人在美国会被询问他们的治疗偏好,会被告知每一种替代方案的优点、效果和副作用。治疗方案的多种选择是不可阻挡的,西方体制希望病人能参与到治疗方案的决策中来。在治疗选择中融入病人的选择,是若干可获得的辅助性医疗。布卢姆(Broom)描绘了病人从西方的和辅助的医疗系统中拼凑出治疗方案,用直觉的、客观的科学知识,自己作出决定从而评估治疗的有效性。

疾病经历

这些分类构成了质性健康研究分支学科的主要内容(这也能解释发表在《质性健康研究》杂志中的大部分文章)。这些种类包括了对疾病的响应、适应生病的状态、带病生活经历等。

研究者往往对急性和慢性疾病的世界着迷,这些疾病对个体来说是极大的改变,是个体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改变。疾病影响和改变个体的核心部分(Jacobson, 2009)。疾病意味着向亲爱的人传递坏消息(Hilton, Emslie, Hunt, Chapple, & Ziebland, 2009),从而家属的痛苦和病人的痛苦交织在一起。

乌干达作者的一篇文章(Medley, Kennedy, Lynyolo, & Sweat, 2009)调查了感染艾滋病(HIV)的妇女在获悉诊断结果后如何应对那些变化。斯蒂芬斯和希尔迪布兰特(Stevens & Hildebrandt, 2009, p.601)展现了在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治疗中遇到困难的妇女的有意思的观点。接受药物治疗"产生存在的焦虑,干扰身体机能,带来自我损耗"。每当她们接受药物治疗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实际上不接受药物治疗被看作"一件积极的事情——使她们自己感觉像一个完整、有尊严的人""乐意设法在一些时间接受最低限度的药物治疗"。

有学者(Kenne Sarenmalm, Thorén-Jönsson, Gaston-Johansson, & Öhlén, 2009)生动描述了与癌症复发相关的复杂情感。这些妇女的支配性的情绪情感是"震惊、恐惧、焦虑、难过和沮丧、冷漠和无精打采"。她们的损失很严重——她们感觉自己丧失了女性特质、外貌和吸引力,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我感觉自己是一个长着双腿的行尸走肉"。他们经历着丧失自我、丧失控制、丧失对情境的影响力、丧失独立性、完全依赖他人等一系列经历(Kenne Sarenmalm, Thorén-Jönsson, Gaston-Johansson, and Öhlén, 2009, p.1121)。

舒纳等人(Schnur, Ouellette, Bovbjerg, & Montgomery, 2009)描述了患乳腺癌的女性接受放射治疗的经历。经历的副作用不"仅仅"是副作用。副作用除了被认为是"随着治疗产生的问题"之外,还被认为是一种"未来症状的征兆",或是"个人毫无价值的指征"。例如,"对内科医生来说,劳累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对女性来说却是一种"衰弱"的迹象。在一些人看来,皮肤毒副反应或许会被看作太阳的灼伤,在另一些妇女看来,这种反应是极可怕和丑陋的。妇女们常常自我批判(自我贬抑),很难允许她们自己放轻松。她们是"残忍的",这种自我批评超越了她们的治疗,渗透到她们"一个自觉的工人、一个好的父母、一个好病

人、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的自我认同之中(p.673)。

正如欧勒蒂等(Ouellette, Achille, & Pâquet, 2009) 所言,治疗并不总是“成功的”。肾移植失败和被迫回到透析状态的病人,似乎要重新定义关于现实的陈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这种重新定义取决于他们和他人的比较,取决于他们如何寻求常态。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重新获得一种对生活的控制感,取决于个人特征和移植失败的次数。

这些文章揭示了疾病经历的细微差别,并对互动和干预的需求和机会进行了再调查。

专业看护者的经历和实践

疾病带来依赖,最私密的功能也要依赖于他人的援助。对病人来说,接受专业的看护比接受或许由孩子提供的私密看护更容易。依赖专业看护者不只是涉及接受身体看护。伯格斯特洛姆等(Bergstrom, Richards, Proctor, Bohrer, Morse, & Roberts, 2009)描述了“经过充分考虑的讨论”——给处于分娩第二期的产妇提供“舒适的对话”——如何辅助产妇与看护者合作,克服分娩第二期的恐惧,重新获得控制感。看护者本人的疗法对产妇安全分娩至关重要。

看护病人的经历对看护者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病人死亡之后仍在延续。霍尔茨兰德等(Holtslander & Duggleby, 2009)探索了年长丧偶妇女们对希望的理解,她们曾经照料了癌症晚期的配偶。当她们的配偶被诊断出得癌症的时候,丧失自信、丧失未来安全感、压倒性的损失感伴随着希望的丧失。没有了希望,“人根本就不想继续,现实不重要了”“她们根本就不在意”。窍门在于“寻求新的希望”来填补空白,这才能使得她们得以“继续”。

对专业和业余看护者的访谈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1)专业和业余看护者的比较和对比;(2)曾经是病人的专业看护者的研究。成为病人的经历改变了医生后来和病人互动的方式——同情、自我揭露和反省、认识到病人被剥夺权利的状态。福克斯等(Fox, et al, 2009)建议把这些内容引入医学系学生的课程中。

家庭看护者有专业知识。他们是专家和保护者,拥有对他们的亲人“什么样的看护是最好的或者最无害”的实践知识。然而当亲人被转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只能靠边,谨遵医院的治疗和看护,等待着病人的死亡(James, Andershed, & Ternestedt, 2009)。

从疾病中康复

康复进程有不同的模式:快速的、彻底的、部分的、拖延的。最终,住在社区中的人跟残疾人一样生活。凯普林(Champlin, 2009, p.1525)描述了对精神病患者的持续照料过程,其中一方接受患者的这种改变并为其感到悲伤,他接受看护的挑战,认为看护过程是永无止境和不可预料的,虽然他常常对看护指控感到孤立和模棱两可,但他对患者很了解,接受看护责任。

康复彻底完成了吗?坎特雷尔和康特(Cantrell & Conte, 2009)描述了癌症患

儿的经历,他们处于现实的机能状态和远离治疗、幸存下来的矛盾经历之中。他们必须学会,从疾病和治疗的不确定上,重新聚焦到他们能有梦想、希望和计划中来,"从受损失和错过的机会"调整到"未来他们可能获得的成功和经历"中来(2009,p.320)。

有助于对护理及其他行业开展检查的研究

起初医学症状概要来自对单个病人的仔细观察——质性观察。这一贡献奠定了医药学的基础,至今症状识别的作用依然继续着。质性调查有助于描绘症状,也有助于识别新的综合征。

但是诊断难题——尤其是精神病诊断——不断地持续。在一篇检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信念、感觉和症状的文章中,斯布恩特(Spoont et al., 2009)使用叙事法探索创伤后退伍军人的感受,以及他们自己把这种感受标定为PTSD的过程。虽然一些退伍军人的经历是清晰、有效的(拥有有效的治疗选择),但是其他一些人的经历更模糊,退伍军人对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案都没有把握。缺乏清晰的诊断结论使退伍军人不能验证他们自己PTSD的种种痛苦,也不确信他们应该如何继续寻求照料,"促成了对他们痛苦遭遇的否认"。作者得出结论,PTSD的诊断结论"为那些经历创伤相关痛苦的病人提供了意义和验证",但是对"可能装病(例如为了私利而假装生病)"的担忧也存在(p.1463)。

对病人的认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类范畴,质性调查把病人评价和后期干预要用的特定信息作为目标。正如表24.2提及的一些研究所示,这些评估没有被包括进常规的评价协议,而是用于调查、深入了解症状(见例如Spoont et al., 2009, for PTSD),作为开发评估工具的基础(例如,Forgeron et al.,2009,在泰国北部针对儿童疼痛的研究),或者用来开发某种模式,例如沙里夫特(Shariff,2009)关于对付关节炎疼痛的研究。

表24.2 2009年《质性健康研究》中为改善药物治疗和护理做出实质性贡献的文章举例

文章标题	作　者	引　用
泰国北部的儿童疼痛评估	Forgeron et al.	19,71-81
为幸福传递计划中的妇女开发健康筛查问卷	Lutz et al.	19,105-115
神经心理学测试的生态效度	Gioia	19,1495-1503
风湿性关节炎和慢性疼痛的身体和精神策略	Shariff et al.	19,1037-1049
PTSD:感觉、症状和精神疾病的信仰	Spoont et al.	19,1456-1465
结肠直肠筛查中的医师——病人交互文化	Gao et al.	19,778-789
探讨肺结核病人遵守大量治疗和预防项目	Naidoo et al.	19,55-70
帮助种族恐怖主义的直接和间接受害者:以色列社会工作者的经验	Shamai & Ron	19,42-54

这些文章推进了许多重要的应用性信息，这些信息能被转而应用到临床领域，或者直接为质性工具开发做出贡献。例如医学领域，利用仔细地观察来建立症状可以追溯到18世纪；这种努力时至今日仍在持续。斯布恩特(Spoont et al., 2009)关于创伤后紧张症的文章，通过访谈那些提交伤残索赔的退伍军人，一头扎进了关于这种失调的争论(它到底是极度创伤的一种自然反应，还是一种精神失调?)。40个参与者中约有半数目前正在接受精神治疗，所有的人都有服兵役的历史。案例包括了男患者和女患者。所有的人都极度痛苦。判断他们的症状是否和PTSD的典型描述相一致，或者他们是否由于症状强度的变化而模糊不清地描述，都会导致症状自我识别和诊断的困难。在考虑具体情境中的个案时，退伍军人常常和症状的常态作斗争，抵制有关精神病的描述。综合征的模糊属性既帮助也阻碍了退伍军人。斯布恩特(Spoont et al.,2009)谈到，一方面它确认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缺乏关于诊断结论的清晰描述，给他们带来是否应该继续寻求治疗的不确定性。

卫生保健评估

质性调查对评估是极有利的，评估范围可从社区健康到卫生保健机构，再到病人对看护的自我评估(详见表24.3)。这些文章与医疗制度有关，而不是关于先前分类中描述的个人症状。皮里帕的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它采用民族志方法，建构了一个泰国北部妇女如何认识幼儿痢疾的解释性模型(Pylypa,2009)。这些母亲认为痢疾对减轻婴儿的身体重量很有必要，这样婴儿才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坐、站和行走。因此，她得出结论，“母亲们没有花太多精力去预防，也没有采取和生物医学建议相一致的处理方法”(Pylypa,2009,p.965)，“健康教育不可能消除这种强烈的人种学信念”(Pylypa,2009,p.974)。作者指出，重要的是，该信息是“通过在泰国痢疾研究中长期缺失的深入的、质性访谈的方法而获得的”(Pylypa,2009,p.974)。

帕克(Parker et al.,2009)结合当地和专业质量改进人员的方法，提供有关质量改进的更广泛的视角。这些研究者指出，正如一线管理者和职员间必须建立对话一样，最好的对话方法是面对面，讨论的焦点有时会很不相同(例如，工作量与成本)。研究参与者感觉该项目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并且，卫生保健机构不仅要做好准备，为医务人员照料病人支付报酬，而且要准备做好看护领域的工作改进。

表24.3 2009年《质性健康研究》健康看护评估方面的文章举例

文章标题	作者	引用
病人、媒体、医疗学术界关于性别和抑郁方面的话语差距	Johansson et al.	19,633-644
创造质量提升的对话：利用一线员工、经理和专家的知识，以促进健康看护质量的提升	Parker et al.	19,229-242

续表

文章标题	作　者	引　用
腹泻疾病的情境诊断和老权威:泰国东北部常态的未成年人的发展	Pylypa	19,965-975
从外伤到创伤后精神紧张性精神障碍:有关感觉、症状和精神疾病的信仰	Spoont et al.	19,1456-1465

给病人讲授卫生保健和医疗专业人士的教育

这个类别中的文章(见表 24.4)致力于医疗从业者使用的教学技巧和策略,包括独特的课程(Oman, Moulds, & Usher, 2009)和开发教学模式(Jenkins, Mabbett, Surridge, Warring, & Gwynn, 2009)。医学和护理学教学有其独特性,需要查房,且一定要涉及病人。由不同的专业和医师来负责不同病人的看护,这些专业人士负责看护的领域不同。质性调查揭示了使用、评估和改进这种独特教学结构的内在的优势和劣势。

从研究聚焦的上述各种各样的情境、视角和条件出发,我们探索对卫生保健领域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必要的适应。

表 24.4　2009《质性健康研究》有关教育和模式的文章举例

文章标题	作　者	引　用
医疗教育		
病人遭遇医院病床边的教学	Monrouxe et al.	19,918-930
医疗项目		
斐济执业医师受训者的职业满意与不满:防止移民的含义是什么	Oman et al.	19,1246-1258
内科医学的交流渠道:改进的专业内部的合作	Gotlib Conn et al.	19,943-953
健康教育		
预防移民体重相关问题的健康物资和策略	Ferrari et al.	19,1259-1272
护理模式		
对社区护理模式行动学习和实践发展的协作调查	Jenkins et al.	19,1303-1320

做临床质性健康研究

尝试进入病人、残疾人、即将死亡的人的世界的过程引起了特定的伦理的和方法论的问题:伦理上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疾病的影响,留下较少的参与空间,方法论上的问题主要是疾病进程限制了参与者。下面将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

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IRBs)对质性健康研究的困惑

质性研究或许被认为是对参与者生活的干扰和侵入。正如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在审查过程中考虑的这些因素,有时他们通过讨论病人有没有精力、意向或时间参与质性研究,来寻求保护参与者(McIntosh & Morse,2009)。例如,假如病人很痛苦,连呼吸都困难,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就会认为,这些病人不应该被研究"打扰",也不应该被同意程序和访谈打扰,他们的隐私不能因观察者的在场而暴露。如果一个病人即将死去,质性研究会占用病人应该和他的家人在一起的宝贵时间,占用病人有能力成功、高效率完成一些任务的时间。研究对参与者及其家人只有有限的益处,如果研究结论的概括性受到质疑,质性调查对后续病人的"益处"也是有限的。因此,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对要求进入请求的批复持谨慎态度,甚至当已经习惯和病人一起工作的护士提出请求时,也是如此(Morse,2002)。

然而,研究者报道,病人不想参加研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参与者很感激所获得的支持、感激交谈和被倾听的机会、接受观察者的存在。病人们谈到他们能看到研究给他人带来的好处,不认为研究过程是对隐私的侵犯。如果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关注点是正确的,一些病人不想参与到研究中,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想参与,病人的时间问题不应该是其不同意的原因。病人本人应该被给予选择参加研究与否的机会。

一个尚未被很好研究的领域是急救护理,急救护理中治疗优先于同意程序。医疗研究涉及药物试验和其他一些有着特殊规定的治疗,该规定允许即使没有病人本人的同意,但有两位医师的同意也可以允许研究继续。但是质性调查没有获得这样的特许,即使在广泛意义上它不涉及治疗、不影响看护。

成千上万的阵容。看护的复杂性,以及直接、间接涉及病人看护的人员数,即使以 8 小时或 12 小时轮班,使得利用视频手段从事观察研究很难获得同意。假如研究焦点是病人,也要征得和病人互动的其他人的同意。这些互动人员和病人发生接触,从医生到清洁工,再到发送报纸的人员,因为他们都可能被录到磁带里。在一个涉及对创伤治疗录像的项目中,项目开始前我们获得了尽可能多的同意——包括了急救医疗技术人员(EMTs)、许多医学专业人士、所有愿意参加的人员、辅助人员(例如放射科医生和清洁工)。然后,在我们实际录像过程中,我们在门口贴了一个告示,说明我们由于研究的目的正在录像。当他们冲进来的时候,我们站在门边,提醒他们我们正在收集研究数据。任何人,包括病人,都可以随时要求关掉录像机。磁带是严密保护的,直到病人同意或者谢绝参与研究。在后一种情况中,磁带会被立即清除掉。这说明了这样的研究能够开展,但同时这些研究当然也很不容易。

易受伤害的参与者。对病人实施的研究要冒很大风险,因为病人很容易受伤害。因此所有在机构中从事的研究必须要取得伦理制度审查委员会的同意,对临床领域的审查必须包括研究负荷——是否在同一领域有太多的研究项目在

实施?是否给病人参与者带来了太多的工作?医务人员是否要被占用太多的时间?

病人易受伤害性很明显,尤其是当病人有认知损伤时(不能自己表达同意的意见,但是会被要求同意,或者要求监护人同意),或者当病人是未成年人时(希望孩子们参与研究,由父母提供同意)。

同意成了制度化的病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当获准同意的人、实施研究的人与提供看护的人是同一个人时,这种可预知的强制性效果会被认为是一种冒险。潜在的参与者会问,"如果我不参加,我应受到的照料遇到克扣,该怎么办?"因此,常常由那些直接和病人的看护无关的人获准研究、进行研究解释,也会强调病人可以随时撤离研究项目,而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的事实。医务人员必须知道哪个病人在参与研究,病人档案里面会有一份同意参加研究的复印件。许多机构雇佣监察专员来监督研究项目,处理存在的问题和抱怨。

隐私法律。一旦研究者获准在医院实施研究,锁定必备特征的病人就成了一个问题。在美国,联邦隐私立法 HIPPA(1966 便携式健康保险和责任法案),禁止随便和病人接触。加拿大有两部联邦隐私法律,隐私法案、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档法案(PIPEDA),许多省份还有自己的隐私法律。例如,阿尔伯塔有加拿大信息自由和隐私保护法案(FOIP),防止没有获得病人许可,随意向非医务人员泄露病人的姓名和其他信息。这意味着那些适合参加研究的人员必须首先通过医务人员来联系,或者由医院出面给病人发送信件,询问他们是否对参与研究感兴趣。

进入/看门人。不幸的是,获得行政审批,并不保证研究者能够接近病人。一些机构要求医生的审批和院系主任的批准。首先是医生,即使你的研究不涉及治疗,出于礼貌你最好通知医生这个项目。如果研究涉及治疗——或者涉及对先前病人的识别——尝试着使医生对你的研究项目感兴趣,或者使他成为一个合作者。在你邀请病人参加研究之前,医生的许可是基本的。

获得护士长的许可也很重要。护士会使您在环境中感觉到轻松,"教会你门道",帮助你鉴别病人,帮助你得到医疗人员的合作。她会召集一些会议,让你跟医疗人员解释你的研究,使他们对你的研究感兴趣,因为无论研究是否涉及医疗人员,他们都必须知道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不在病房。一定要记住所有医疗人员的名字,包括后勤人员。在医疗人员会议上带上甜甜圈——它们是医院里的流行物——在特定场合表示你的感谢,当完成研究撤离时,记得给医疗人员带一个特别的蛋糕作为感谢(Kayser-Jones,2003)。

获得授权的病人。或许你会到一个长期监护病房,在此病人受到严格而显著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你开始研究之前获得许可是很重要的。这包括了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向委员会主席解释你的研究,使得他们对你的研究感兴趣。进而他们会邀请你参加下一轮的全体大会,在会上宣讲你的研究,回答问题,获得全体大会的同意以开始你的研究。这个小组有权力再一次准许或阻止你进入研究情境。

对记录的恐惧。医疗人员对临床实践记录的最大恐惧是害怕评估。这种害怕从非正式的不安(所以有医务人员会建议,“干脆让非专业护士来监控摄像机得了”,这样她们不会感觉自己的看护工作在被评估),到对“某位医疗人员出现在记录数据中,因为‘做错某件事’感到尴尬和受责备”的担心,再到害怕数据用来传讯和针对某位医疗人员。这使得临床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信任、机密和匿名问题,都非常重要。

这引出了另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果研究者观察到一种次优的医疗看护实践,会发生什么?他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检举者吗?他们应该在哪一点干预?

干预的成本往往是很高的——研究者很可能会丧失一个调查点。当然,这也有赖于问题是什么;记住,研究者的首要职责是为了病人(Kayser & Jones,2002)。当研究私人疗养院老年痴呆病人时,她和她的研究团队一丝不苟地记录了这些患者的食品摄入量,称患者的体重,记录他们进食的时间。但是如果病人强烈要求,研究者毫不犹豫地给其食物和水,但是要记下这些行动,使其成为数据的一部分。为了引发改变,他们和私人疗养院的管理者讨论饥与渴的问题——除了发表她们的研究成果之外,她们还为政府提供了证据。

数据的所有权。如果你在临床情境中做研究,那么研究数据应该属于谁呢?如果研究受到了外部机构的资助,研究数据属于(对研究提供资助的)大学;为了获准实施研究,执行研究的机构会放弃对数据的所有权。然而研究者有保护数据的责任。数据总是敏感的——转录本中必须隐去人名,给她们分配像假名一样的代号。数据不能就事论事地记录,就像所列出的越来越多的识别标签一样,数据越简单就越容易识别出参与者。数据必须被保存在上锁的橱柜中或其他上锁的地方。相类似地,研究地点不应该被揭示,或许连研究所在的城市也不应该被披露。一些机构要求作品在发表前要获得批准和同意——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遇中——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要求,你就会被要求更改和调整报告,这就是一种审查制度。

如果你的数据很敏感,它们有可能被要求传唤——病人或许想利用你研究中的数据对看护者提起诉讼,或者第三方想将它作为证据。研究者可以通过申请国家健康研究机构(NIH)机密证书来保护他的数据(以及保护参与者)。这些证书即使是那些没有受到国家健康研究机构(NIH)资助的研究者,也能申请获得。

研究得重大疾病和垂死的病人会遇到的困难

质性调查常常被限定在提供看护的领域:医院,有时候限定在某个科、病房、医生办公室,或者病人的房间;社区诊所;这些研究常常是民族志和参与研究。一方面研究以病人为中心,它也常常包括病人的家人、看护者或者病人和看护者之间的互动。由于医院的组织方式,类似病情的病人共享同一个空间——例如心脏病房或实施肾透析、化疗的病人——很难有私人空间实施访谈。

疾病带来的沉默。病人常常由于疾病而沉默。他们或许无意识,或许因上

呼吸机而不能说话;或许实施口腔外科手术,或许是口腔干燥症,不能清晰地说话;或许糊涂了,或许患有精神病,不能连贯地表达自己。如果要集中于访谈,他们会有太多痛苦。他们会太疲乏、困倦而无法参与。治疗会减弱病人的声音——病人或许会带着口腔支架,或许已经经历了外科手术,或许刚拔牙不能说话。他们或许已经服药、昏昏欲睡,或许喘不上气,或许缺乏说话的欲望。有时病人受休克和疼痛的折磨,除了排山倒海的疼痛之外,一无所知。

为身体状况所困,病人会从心理上去努力克服伤害和疾病。病人太困惑了,搞不清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事情的意义,更不用说把它报告给研究者了。

不稳定/快速改变/很难接近。如果病人状况不稳定,他会迅速地恶化,于是护士和医生就必须努力使病人复苏。研究者后续想去采访病人关于复苏的感受,但是管制的药物可能会抹去病人的记忆。再者,病人想努力弄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的意义,却常常不能向他人报告这些变化。

在这些环境中,看护的紧急和节奏,以及看护牵涉的人的数量,意味着研究者或许看不见病人,更不用说收集数据了。参与者或许会死亡、转移、在突然恶化的情况下或许会离开医院。当一个人开始收集数据的时候,访谈会变得很困难。病人缺乏时间,没有隐私,没有安静的、不受干扰的接受访谈的空间。最后,病人的体味、痛苦的声音、受伤害的视力组合在一起,使研究者感到晕厥、恶心,不能继续收集资料。如果有上述感觉了,在你成为医务人员需要额外照料的病人之前,赶紧离开这个环境。

质性健康研究要求修正方法吗?

传统的质性调查使用正统的质性方法,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质性健康研究者使用和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研究者同样的教材。唯一的例外就是,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护理学院发展建立起来的扎根理论,后来被其他学科所采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学科间有了一些方法论上的一致性。

虽然病人和机构本身会干扰资料收集,但在医院里也能做任何一种类型的质性研究。当然,访谈研究很困难。假使研究者实际能看见病人,观察研究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当仅仅用观察方法的时候,研究者在解释病人的体验方面就会有困难。她在空中挥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考虑到上述限制和困难,有一些策略使得临床质性研究成为可能,或者几乎成为可能。

1.做回顾性的访谈。有趣的是,病人对有意义的事件决不会忘记(或忘记得很慢)。疾病和住院治疗是那些难以忘记的事件之一。实际上,事后请病人回忆事实和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反反复复地访谈相比,常常是一个更有效的设计。如果病人有时间反思疾病、反思疾病对生活的影响,从忍耐中的情感压抑中走出来,有了情绪反应和情感痛苦,那么访谈质量将会更好。病人会有完成较好的质

性描述所需要的情感表达。记住关键事件,在回忆事件中感受到的情感,反映了事件原初发生时的情感,这样访谈就保持了有效性。并且"回顾"方法和扎根理论能够很好地一起使用,把事件放在相继次序和简化过程排序的架构中。

2.如果由于隐私和治疗的限制,研究者在访问病人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那么可收集短期数据,采用一个真实的界定的时间周期,相应地修订主题。例如,"如何告知坏消息"的主题能够通过视频录像、音频咨询的方式较容易地解决。这些记录可以采用对话分析来检视,后续可和访谈一起来获得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3.例如参与行动研究(PAR),会涉及使看护者成为调查者的合作者。看护者可以用其他案例故事、事件来不间断地补充数据收集,这样就可以不断发展你的数据库。类似地,病人的家属和看护者会是观察数据的极好来源。

4.最重要的建议是"慢慢来"。努力在临床环境中多花一些时间,多了解病人和医务人员。

结　论

本章开始的时候我就在问,质性健康研究是质性调查领域的一个子学科吗?质性健康研究迥然不同的特征是什么呢?

疾病的性质给了人们一个全然不同的关于生命的视角。病人会经历痛苦、行动不便和自我的改变。从社会层面来说,他们会经历失业、经济地位的改变、依赖他人(即使是私密功能)、日常生活的限制,没有帮助他们或许不能吃和呼吸。病人的时间需要分配给治疗、体检,病人维持生命的时间很有限,在外界研究者要求对他们进行访谈和观察之前,病人的时间必须得到优化。对研究者来说,疾病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外界"日常生活氛围完全不同。这种变化的环境包括生死、痛苦、遭遇不幸,包括了活下来的欣喜。研究者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优先权,他们必须在病人治疗、治愈日程中靠后站。并且,从事这样的研究工作要求专业知识和额外技能:研究者必须知道医院里的正式规定和行为规则,必须对病人有同情心,不会对医院里即将死亡的故事或其他所见所闻招架不住或心烦意乱。研究者必须要有理解急性疾病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把访谈拆分为可控制的小段,以防止病人劳累,或者管理急性疾病痛苦的情感。

奇克(Cheek,个人沟通,2010)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对于质性或者量化研究来说,疾病经历的特征或者卫生保健环境是一样的吗?假如是一样的,这是不是给质性和量化研究更多的共性呢,尤其是当和其他学科研究比较时(例如和教育学科研究比较时)?换句话说,研究中环境和主题的差距是不是大于研究方法之间的差距?

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事实,量化研究者能够更容易地——也期待如此——保持和研究对象的分离,保持研究主题所使用的方法的客观性。这就意味着他们对研究主题和参与者没有情感涉入,

就这点而言,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不能归为同类研究。

将来该学科可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随着采用质性健康研究学生数量的增加,随着他们的毕业,缺乏足够导师的问题会逐步消散,这个子学科本身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教材、课程和研习会的数量会增加,质性健康研究会变成主流。这种推力来自意想不到的渠道——例如,来自评估和混合方法的推动将有助于加速那些质性调查发展缓慢的领域。

因此我得出如下结论,质性健康研究是质性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质性健康研究的情感要素显著不同,伦理问题也足够独立,质性调查在教育、培训、方法和知识传播上有自己的需求。机构状况和病人参与者的特征实质上都有显著不同,所以质性健康研究被认为是一个"专业领域",要求特定的知识、研究设计和方法的修正。

参考文献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nner, P. (1984). *From novice to expert: Excellence and power in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Bergstrom, L., Richards, L., Proctor, A., Bohrer Avila, L., Morse, J. M., & Roberts, J. E. (2009). Birth talk in second stage labo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54-964.

Brody, H. (1987). *Stories of sick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om, A. (2009). Intuition, subjectivity, and le bricoleur: Cancer patients' accounts of negotiating a plurality of therapeutic option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050-1059.

Cantrell, M. A., & Conte, T. M. (2009). Between being cured and being healed: The paradox of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hip.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312-322.

Champlin, B. E. (2009). Being there for another with a serious mental illnes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525-1535.

Cochrane, A. L. (1972/1989).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 London: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Original publication London: Nuffield Provincial Hospitals Trust, 1972]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1992).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vies, B., Larson, J., Contro, N., Reyes-Hailey, C., Ablin, A. R., Chesla, C. A., et al. (2009). Conducting a qualitative culture study of pediatric palliative ca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5-16.

De Marco, M., Thorburn, S., & Kue, J. (2009). "In a country as affluent as America, people should be eating": Experiences with and perceptions of food insecurity among rural and urban Oregonian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7), 1010-1024.

Engel, J. D., Zarconi, J., Pethtel, L. L., & Missimi, S. A. (2008). *Narrative in health care: Healing patients, practitioners, profession, and community.* Oxford, UK: Radcliffe.

Ferrari, M., Tweed, S., Rummens, J. A., Skinner, H. A., & McVey, G. (2009). Health material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immigrants' weight-related problem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259-1272.

Field, P. A., & Morse, J. M. (1985). *Nursing research: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 Croom Helm.

Forgeron, P. A., Jongudomkarn, D., Evans, J., Finley, G. A., Thienthong, S., Siripul, P., et al. (2009). Children's pain assessment 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Perspectives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71-81.

Fox, F. E., Rodham, K. J., Harris, M. F., Taylor, G. J., Sutton, J., Scott, J., et al. (2009). Experiencing "The other side": A study of empathy and empowerment in general practitioners who have been patient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580-1588.

Gao, G., Burke, N., Somkin, C. P., & Pasick, R. (2009). Considering culture in physician-patient communication during colorectal cancer screening.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778-789.

Germain, C. P. (1979). *The cancer unit: An ethnography.* Wakefield, MA: Nursing Resources.

Gioia, D. (2009). Understanding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neuropsy-chological testing using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495-1503.

Glaser, B. G., & Strauss, A.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Glaser, B. G., & Strauss, A. (1967).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Goffman, E.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Gotlib Conn, L., Lingard, L., Reeves, S., Miller, K., Russell, A., & Zwarenstein, M. (2009).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n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A description of baseline patterns for improved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43-953.

Hilton, S., Emslie, C., Hunt, K., Chapple, A., & Ziebland, S. (2009). Disclosing a cancer diagnosis to friends and family: A gendered analysis of young men's and women's experienc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744-754.

Holtslander, L. F., & Duggleby, W. D. (2009). The hope experience of older bereaved women who cared for a spouse with terminal cance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388-400.

Jacobson, N. (2009). Dignity violation in health ca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536-1547.

James, I., Andershed, B., & Ternestedt, B.-M. (2009). The encounter between informal and professional care at the end of lif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258-271.

Jenkins, E. R., Mabbett, G. M., Surridge, A. G., Warring, J., & Gwynn, E. D. (2009). A cooperative inquiry into action learning and praxis development in a community nursing modul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303-1320.

Johansson, E. E., Bengs, C., Danielsson, U., Lehti, A., & Hammarström, A. (2009). Gaps between patients, media, and academic medicine in discourses on gender and depression: A metasynthes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633-644.

Kafanelis, B. E., Kostanski, M., Komesaroff, P. A., & Stojanovska, L. (2009). Being in the script of menopause: Mapp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ping strategi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30-41.

Kayser-Jones, J. (2002). Malnutrition, dehydration, and starvation in the midst of plenty: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qualitative inquir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2*, 1391-1405.

Kayser-Jones, J. (2003). Continuing to conduct research in nursing homes despite controversial findings: Reflections by a research scientist.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 114-128.

Kenne Sarenmalm, E., Thorén-Jönsson, A.-L., Gaston-Johansson, F., & Öhlén, J. (2009). Making sense of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death: Adjusting to a recurrent breast cancer illnes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116-1130.

Kleinman, A. (1980).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leinman, A. (1986). *The illness nar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Lahman, M. K. E. (2009). Dreams of my daughter: An ectopic pregnanc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272-278.

Leininger, M. M. (1985).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nursing*.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Lutz, B. J., Kneipp, S., & Means, D. (2009). Development of a health screening questionnaire for women in welfare transition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05-115.

McCorry, N. K., Dempster, M., Clarke, C., & Doyle, R. (2009). Adjusting to life after esophagectomy: The experience of survivors and carer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485-1494.

McIntosh, M., & Morse, J. M. (2009).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ethics of emotion. In N. K. Denzin & M. D. Gardina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social justice* (pp. 81-107).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Medley, A. M., Kennedy, C. E., Lynyolo, S., & Sweat, M. D. (2009). Disclosure outcomes, coping strategies, and life changes among women living with HIV in Uganda.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744-1754.

Miller, J. H., & Stiles, A. (2009). Family presence during resuscitation and invasive procedures: The nurse experien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431-1442.

Monrouxe, L. V., Rees, C. E., & Bradley, P. (2009). The construction of patients' involvement in hospital bedside teaching encounter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18-930.

Morse, J. M. (2002). Interviewing the ill. In J. Gubrium & J.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317-330). Thousand Oaks, CA: Sage.

Morse, J. M. (2008). Excluding qualitative inquiry: An open letter to the Canadi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Editorial].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8*(6), 583.

Morse, J. M., Stern, P. N., Corbin, J., Bowers, B., Charmaz, K., & Clarke, A. (2009) *Grounded theory: The second generation*.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Naidoo, P., Dick, J., & Cooper, D. (2009). Exploring tuberculosis patients' adherence to treatment regimens and prevention programs at a public health sit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55-70.

Norris, P., Fa'alau, F., Va'ai, C., Churchward, M., & Arroll, B. (2009). Navigating between illness paradigms: Treatment seeking by Samoan people in Samoa and New Zealand.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466-1475.

Oman, K. M., Moulds, R., & Usher, K. (2009). Professional 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among Fiji specialist trainee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ng migr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246-1258.

Ouellette, A., Achille, M., & Pâquet, M. (2009). The experience of kidney graft failure: Patients' perspectiv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131-1138.

Parker, L. E., Kirchner, J. E., Bonner, L., Fickel, J. J., Ritchie, M. J., Simons, C. E., et al. (2009). Creating a quality improvement dialogue: Utilizing knowledge from frontline staff, managers, and experts to foster health care quality improvement.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229-242.

Parsons, T. (1975). The sick role and the role of the physician reconsidered. *The Mil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Health and Society*, *53*(3), 257-278.

Protudjer, J. L. P., Kozyrskyj, A. L., Becker, A. B., & Marchessault, G. (2009). Normal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ldren with asthma.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4-104.

Pylypa, J. (2009). Elder authority and situational diagnosis of diarrheal diseases as normal infant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Thailand.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65-975.

Quint, J. (1967). *The nurse and the dying patient*. New York: Macmillan.

Sackett, D. L. (1993). Rules of evidence and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9*(6), 487-489.

Schnur, J. B., Ouellette, S. C., Bovbjerg, D. H., & Montgomery, G. H. (2009).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periences of external-beam radiotherap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668-676.

Scott, A. (2009). Illness meanings of AIDS among women with HIV: Merging immunology and life experienc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454-465.

Shamai, M., & Ron, P. (2009). Helping direct and indirect victims of national terror: Experiences of Israeli social worker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42-54.

Shariff, F., Carter, J., Dow, C., Polley, M., Salinas, M., & Ridge, D. (2009). Mind and body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hronic pain and rheumatoid arthriti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037-1049.

Spoont, M. R., Sayer, N., Friedemann-Sanchez, G., Parker, L. E., Murdoch, M., & Chiros, C. (2009). From trauma to PTSD: Beliefs about sensations, symptoms, and mental illnes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456-1465.

Stevens, P. E., & Hildebrandt, E. (2009). Pill t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V-infected women who are vulnerable to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failu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593-604.

Strauss, A., Corbin, J. S., Fagerhaugh, S., Glaser, B., Maines, D., Suczek, B., & Weiner, C. (1975).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St. Louis, MO: Mos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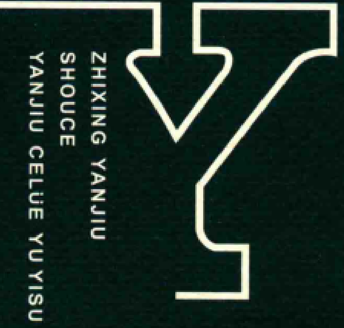
van den Berg, J. H. (1960). *The psychology of the sick bed*.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van Manen, M. (1990). *Researching the lived experience*. London, Ontario, Canada: Althouse Press.

Van Rooij, F. B., van Balen, F., & Hermanns, J. M. A. (2009). The experiences of involuntarily childless Turkish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621-632.

Vayreda, A., & Antaki, C. (2009). Social support and unsolicited advice in a bipolar disorder online forum.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931-942.

Ziółkowska, J. (2009). Positions in doctors' questions during psychiatric interview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 1621-1631.




更多服务


ISBN 978-7-5689-1313-3

9 787568 913133 >

定价：58.00元